



政見

CNPolitics.org

政見合輯
二〇一五年春

政见合辑

二〇一五年春



轮值主编：武卓韵
本期设计：钱争予



政见 CNPolitics
新浪微博

政见 CNPolitics
微信公众号

政見 CNPolitics
fb.me/cnpolitics

团队成员

观察员

曹起瞳 陈铎川 杜月
方可成 归宿 韩笑
李泽人 林知阳 刘冬舒
刘冉 刘岩川 卢凯悦
马亮 缪莹 邵立
宿亮 谭宏泽 陶郁
王绍达 王韬 王也
武卓韵 杨鸣宇 杨天兆
尹月 奚应红 张跃然

制图师

黄俊如 焦佳文 吕妍
钱争予 苏颢云 姚辰
周优游

新媒体运营

邓哲远 韩紫熙 李大岩 季文仪
蓝培源 卢凯悦 马军 王菁
吴睿 徐驭尧 余莉 于灵歌
赵蒙旸 张烨 子微

设计师
江锦 林亦然 钱争予 魏子杰
王婧雯 朱丹青

工程师

黎达 林育颖 周优游

其他成员

陈仲伟 励轩 刘含章 汪昌杰
王磬 吴瑶 袁幼林 周航

感谢曾经为政见团队做出贡献的：

常远 操傲文 陈磊 傅若兰 韩智轩 江舟忆 宋广易 羽人 袁林 张韧刚

靠谱地谈论中国

关于政见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从官员到农民，从时评人到的哥，似乎人人都可以评头论足一番；但是，似乎又没有人能真正将它弄明白、说清楚。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充斥着令人目不暇接的信息和似乎永无止境的争吵，但是，它们都太局限了。

要想更靠谱地谈论中国，你需要接触更智慧的头脑，吸取更优质的思想资源。

我们的使命与愿景

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的“政见 CNPolitics”，希望带给你这样的

资源。我们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独立网站，成员包括海内外政治学研究者和国内一线时政记者。我们秉持专业、独立、理性的原则，跟踪阅读全球学术界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最新研究，从中挑选出最具价值的部分呈现给你。

我们引介的思想资源，绝大部分都是在大众传媒上无法见到的。它们呆在仅有专业人士才经常问津的学术期刊、报告、会议中，普通公众鲜有机会接触。

当然，来自学界的研究成果也有其局限性。但至少，比起大众传媒提供的快餐，比起社交网络上那些泛着情绪化泡沫的争吵，学界的研究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基于丰富的研究材料，经过了理性的逻辑推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近真相，提供更具解释力的观点，是更值得你参考的信息。

我们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多位大学教授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了我们制作的内容，中央编译局出版的期刊曾转载我们的文章，还曾有省部级官员与我们联系，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得到了包括大西洋月刊在内的众多外媒译介。不过，比起这些，我们更看重每一位普通读者从“政见”的内容中吸取的营养、得到的启发。

我们的风格与旨趣

我们致力于发掘理性、靠谱的思想资源，理性并不等于枯燥，它们往往是鲜活、有趣、令人茅塞顿开的。

我们将普通人难以接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强调“专业性、趣味性、信息量”的写作风格呈现给你，节省你的宝贵时间。

媒体报道

他们不忙着在公共辩论中站队，而是为读者普及热门话题背后的知识；

他们不直接发表政治意见，而是编译介绍外国的学术观点；

他们管自己做的事情叫“政治科普”。

〈年轻政网深入浅出〉，《联合早报》，2013年6月30日

5月21日，一个由青年人自发组织的非盈利网站“政见”发布了一条“图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微博。3个月内，这条微博被转发2786次，评论382条。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转发微博并评论道：“中国公民基础知识之一：多民族。好帖。收了！”

一个名为 CPGTour 的网友评论道：“太棒了，要顶！如果这个有英法文版就更好了，给外国人介绍时更加生动。以前没见到过这么棒的图文并茂又简洁的分析介绍。”

《凤凰周刊》主笔黄章晋曾写过一个关于少数民族的专题，他看到这张图后，留言道：“看到这图，想想我的呈现形式，我觉得我像一条听到自己腰椎咔嚓一声折断了的小狗……费劲巴拉地写了一大堆，被人一张大图给灭了。”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中国民族报》，2012年7月24日

新一代人对现实的认知和行动力，完全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他们知道怎么通过社会网络激发参与和共建新的平台，从生活的裂缝本身，给社会撕开了新的出口。

《商业周刊 / 中文版》(Bloomberg Businessweek)

各界评价

口水少、有新知，值得关注。

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学者

总体来说，“政见”的信息图新闻产品引领了业界的潮流，树立了一定的评判标准。经由“政见”的介绍和推广，信息可视化的概念在国内新闻界得到了广泛关注。虽然“政见”团队自身具有有别于专业媒体的特殊性，它的信息图新闻也并非量产，但它在新闻领域作出的信息可视化尝试确实在逐渐改变国内传统的生产模式，更新了受众的阅读体验，这对于信息时代新闻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龙昊，《新闻信息可视化的尝试——以“政见 CNPolitics”的信息图新闻生产为例》，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

一群年轻的新闻人将目光投向海内外的学术界，将最新的中国政治研究成果简洁但又严谨地报道出来，为

普通公民提供更为专业、独到的优质信息。如果你渴望在时政话题上比市井杂谈、网络吐槽有着更为深入地表达和理解。

北大媒介观察

与其关注大 V，不如关注 @政见CNPOLITICS，理性地思考政治。

微博网友 @Nate_invictus

“永远不要怀疑那一小部分有思想并且持续努力的公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这样。”——这种精英主义的话刊登在 @政见CNPOLITICS 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微博网友 @龍助

目录

编者的话

生命联系万岁	1
--------	---

2015 猜想

美国如何重返亚太再平衡?	5
--------------	---

国际恐怖主义能消停吗?	11
-------------	----

热点

热点解读

国际恐怖活动是“文明冲突”? 别幼稚了!	18
----------------------	----

期待人民点赞, 政治人物为“接地气”也是蛮拼的	24
-------------------------	----

果敢危机解决方案：隔离或是“协和式”民主？	28
-----------------------	----

性别平等

数据说话：中国女性面临着怎样的不平等	37
--------------------	----

男人天生比女人更有竞争性？看看行为经济学家怎么说！	44
---------------------------	----

奥斯卡

奥斯卡里的社会学：为什么获奖感言总要感谢很多人	55
-------------------------	----

当经济学家遇上电影	63
-----------	----

新加坡

当“新加坡华裔”遇见“新加坡华人”	72
-------------------	----

“新加坡模式”究竟是什么？它可以被借鉴吗？	76
-----------------------	----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支撑点和大选格局	90
----------------------	----

政见圆桌

关于李光耀的诸多疑问，政见为你一一解答	98
---------------------	----

智库那些事

2014 全球智库排行榜发布，中国智库缺什么？	113
-------------------------	-----

数据解码

世界上有多少国家能造核武器?	131
交通部门发布的车祸死亡人数仅是真实数字的零头?	138
五张地图展示世界各国债务状况	146
日本为何难出女性政治家?	153

新新青年

“太阳花”照亮台湾?	161
为什么出国留学后感觉自己更爱国?	166
“海鸥”与“海龟”:回流之后如何重新适应中国社会	171
“蓝翔”们的困境:差生才去职业学校?	176
为什么人人都说自己是“屌丝”?	181
如何“优雅”地让你爱国:历史教育的作用	187

环境与健康

怎样让市长关注环境治理?	193
资源何以成为善治的“诅咒”?	199
跨省污染:为什么污染企业喜欢扎堆在省与省交界处	205

高速公路长假免费通行的环境代价	209
空气污染如何影响平均寿命：来自环境经济学的解释	213
空气污染数据造假，这些城市嫌疑最大	217
越来越胖的中国孩子，越来越不平等的肥胖率	225

民主迷思

我们在见证民主的衰退吗？	232
美国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影响力基本为零？	236
如何（科学地）破除民主迷思？（一）	243
议会中谁最支持宽松的社会福利政策	256

恐怖主义与国际关系

“伊斯兰国”：中亚地区的新威胁？	260
《外交事务》：巴基斯坦的亵渎神明法与恐怖主义	266
恐怖袭击、种族报复与社会同化程度	269

社会

社会应该怎么管？从云南民间机构说起	274
-------------------	-----

福建之谜：“半自发性”组织如何减少农村集体上访	280
为何中世纪德意志地区鼓励大学发展，而晚清政府打压新学？	285
拉铁摩尔与他的时代：怎样寻找一套理论解释社会的兴衰？	293

经济

亚投行面临的三大内部挑战	300
钱去哪儿：中国海外投资扫描	304
经济学家：社科世界中的殖民者？	313
民营企业家：中国经济腾飞的幕后功臣	325
韦伯错了吗？——来自发展经济学的证据	334
在外企打工的本地工人，怎样跟外企老板博弈？	341
为什么欧元区深陷债务危机泥潭无法自拔？	346
让·莫内的欧盟理想与欧元困境	351
请前政府官员做董事，能抑制公司高管天价薪酬？	355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村官的裙带关系如何发挥作用	359

国内政治

中纪委反腐行不行？	368
-----------	-----

人大代表到底是怎样“间接选举”出来的?	373
中国式协商民主：有助维稳，还是促进变革?	377
街名政治学：“西东方红大街 174 号”是什么单位?	383

外交

中朝关系：从同志战友到贸易伙伴	396
如何打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僵局?	402
兰德公司报告：中美如何避免“擦枪走火”	407
“宙斯盾”？多少钱一斤？	412
今天的中美关系 = 一战前英德关系？	418
中国对外援助：为何有的见效，有的无效？	425
美国的亚洲朋友圈	430

法律

“任性”的权力：以打击内幕交易为例	435
为什么公办军校只招男生是违宪的	442

访谈

古德曼：超过八成的财富和地位是世代相传的	450
----------------------	-----

何式凝：在性别与亲密关系里寻找另一种民主	471
陈志武：政治学、社会学应该向经济学学习	487

致政见制图师大猫：愿声声海浪伴你入眠

愿声声海浪伴你入眠	504
-----------	-----

编者的话

生命联系万岁

政见 2015 年的年度合辑终于要陆续和大家见面了。

在我们的精心策划之下，yǐ zài tuōyán 2015 年政见没有发布任何季度的合辑，随着年关将近，天寒地冻，政见的网站、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在一次事故中烟消云散，我们终于意识到，是应该给 2015 这个波澜壮阔的年份做一个总结了。

虽然名为年度合辑，但我们依然延续了之前按照季度编排的体例，共分春夏秋冬四卷，里面包括了 2015 年几乎所有正式发布的研究速览和其他各种类型的文章。和以前一样，这些文章依然用最靠谱的方式，谈论着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政治、外交、经济、历史、法律和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

和以前不一样的是，在这一年中，我们更加努力地尝试了许

多新的文章类型，更努力地将象牙塔中的宝贵资源让更多人了解。对社会热点，我们有观察员赶制分析文章，有新媒体团队的志愿者加班编排发布；对生活细节，我们的同仁大开脑洞，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提供了新颖生动的分析视角。在如何靠谱地谈论中国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在探索和努力。

作为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盈利，也没有任何商业化意图的志愿者组织，我们只是依靠每天一篇文章的精耕细作，在微信公众号上积累了超过 16 万靠谱的读者。但没有料到的是，这些精耕细作在过境冷风中一夕就被吹散。

2015 年夏天在政见内部是非常值得纪念的，许多从未谋面的团队志愿者，在天南海北以各种形式见到了彼此，并由此发展出了政见著名的“生命联系理论”，即对于一个志愿者团队来说，之所以有成员愿意拼死拼活的干活，并不是对组织的目标和价值有着多大的认同，也并非是试图从组织这里获得什么好处，最根本的是，成员和成员之间能够产生超出一般同事之间的深刻的生命联系。因此，生命联系才是第一生产力。

如果说那些曾让我们引以为豪的阅读量、粉丝数和排名是开出的花朵的话，生命联系应该是就是政见生生不息的根。在事故

后，众多热情的读者施以援手，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感激且欣慰。团队内部讨论许久，最终决定，重头再来过。

于是，新的公众号在一月份上线，网站、微博、知乎等各种平台账号也重新开始运作。短时间内，我们就找回了超过两万的读者。这让我们发现，生命联系并不仅存在于政见内部，这些年我们的辛苦付出和读者的热心关注，也已经在团队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了超越了普通的媒体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这些广泛而深刻的生命联系，是政见的第一生产力。冬天还未离去，我们用这一套合辑，向 2015 年致敬，向生命联系致敬，愿它能唤起我们对过去一年的记忆，和对春暖花开的希冀。

武卓韵

2016年2月于北京

2015 猜想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吗？

新年的钟声还未散去，政见团队向 2015 年提问。

美国如何重返亚太再平衡？

作为影响未来美国外交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举措，重返亚太再平衡很可能成为 2015 年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将如何重返亚太再平衡？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 归宿

“亚太再平衡”可以说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乃至外交政策的主基调。但在过去几年，由于中东、乌克兰危机不断，加之美俄关系持续紧张，奥巴马政府并未全力投入“亚太再平衡”，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成果大打折扣。

不过，随着奥巴马的总统任期进入最后两年，他留下政治遗产的愿望也更为强烈。相较于需要复杂政治角力的国内政治议程，

外交领域无疑更容易有所建树。前不久，奥巴马不顾反对，突然宣布与古巴恢复完全外交关系，就充分展现了其在外交领域“有所作为”的决心。重返亚太再平衡（Return to the Asia Rebalance）作为影响未来美国外交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举措，在国内也有一定政治共识，很有可能成为2015年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美国的主要智库早已为此做了充分的智力准备。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初发布的《大赌注和黑天鹅：外交政策简报》中，就将重返亚太再平衡列为“强力推进”（Double Down）项目。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在研究报告《成本增加战略》中提出，奥巴马政府效仿冷战后期的里根政府，在亚太地区主动提高竞争的成本，并以此配合重返亚太再平衡进展。兰德公司的报告《美国陆军在亚洲：2030—2040》，则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框架内，论证了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将主要陆军军力部署调整至亚太的必要性。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近期的报告《亚洲的联盟防御》，则强调美国应通过重返亚太再平衡，与地区盟国构建联合防御体系，以应对地区不断上升的各类安全挑战。

大西洋委员会（Atlantic Council）的《美国在亚洲的拓展威慑战略》(*The Future of US Extended Deterrence in Asia to 2025*) 特点更为鲜明。这篇报告由美国前副防长阿米蒂奇和前副国务卿坎贝尔领衔的工作组（task force）审阅，带有更多的鹰派色彩，提出的建议也更具体强硬，表明了美国推进重返亚太再平衡的一种典型思路和范式。

报告开篇即指出，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缘地位日益重要，安全环境趋于复杂，美国及其盟国在地区遇到的各类挑战也明显增多。这其中，对美国利益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中国、朝鲜等国家“蚕食”现状，试图逐步构成既定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颠覆亚太地区现有秩序。由于这些“蚕食”行动往往规模不大，美国难以“大张旗鼓”加以应对，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核威慑甚至常规军事威慑失效，损害美国在地区的承诺和信誉，甚至危及美国在地区的联盟体系。

报告认为，当前美国在地区的利益碎片化、多元化，有必要改革现有的威慑战略，推行“拓展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战略。这意味着：尽管核威慑核心地位不可动摇，但威慑的范围需

要得到进一步延伸，包括常规军力打击投送、争夺网络和太空主导权、经济制裁等非核乃至非军事手段要素也应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报告指出，“拓展威慑”战略应由三大支柱支撑。

其一，是美国依然作为世界和亚太的重要力量的承诺。这要求美国继续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并持续向亚太盟国传递“美国不会离开”的信息。

其二，是建立地区“反反介入-区域拒止”(Counter-A2AD)网络。由于中国近年来着力发展DF-21等“点穴式”精确打击武器，在此基础上着力构建沿海防卫体系，已形成一定的反介入能力，对美军在亚太兵力投送使用构成阻碍。目前来看，美国在亚太建立新的集体安全条约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有必要加强与盟国和东盟重要国家防卫政策的沟通和协调，建立安全网络应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反介入能力。

其三，是发展轻便、灵活、小型化的快速反应能力，并扶持国防领域颠覆性新技术的建设。当前美国处于财政减支状态，防务支出需要“精打细算”，价格相对低廉的潜艇、无人机以及更为

小型化、可快速反应的打击平台更符合“拓展威慑”的要求。加大对于颠覆性新技术的投入，其目的也是在开支削减的背景下，保证在未来的技术竞争中占据上风。

报告最后针对“拓展威慑”战略提出了九条具体政策建议，其中包括：与亚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加强战略对话；与中国全面接触，构建更为全面稳定的战略关系；升级加强美日、美韩同盟；通过高层推动以及加强与相关国家协调等方式，保证美国主要军事力量调整部署至亚太的承诺落实；加速推动完成 TPP 谈判，充分发挥经济和贸易手段在“拓展威慑”中的作用等。

长期以来，有不少人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直指中国”，其主要目的就是“遏制中国发展”。更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在国内外发展、改革以及利益拓展中遇到的阻碍全部归咎于“亚太再平衡”。事实上，尽管中国的崛起的确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其主要目的，还是以此应对变化中的国际和地区力量格局，并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占据主动。

亚太地区是全球力量发展变化最为迅速的区域，仅从美国自身国家发展来看，重返亚太再平衡也是必行之举。对于中国而言，

美国重返亚太再平衡使得周边外交牵制因素增多，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这就要求中国更好的分配外交资源，统筹好大国和周边外交两对关系，同时在涉及海洋、领土等敏感问题上的决策和行动更为慎重。美国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倒逼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一步科学化、精细化。

参考文献

- Manning, R. A. (2014). *The Future of US Extended Deterrence in Asia to 2025*. Atlantic Council, 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国际恐怖主义能消停吗？

“伊斯兰国”的强势崛起是 2014 年国际政治安全领域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一，也带动国际反恐形势进一步复杂化。2015 年，国际恐怖主义能消停吗？

◎ 归宿

“伊斯兰国”（ISIS）的强势崛起是 2014 年国际政治安全领域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一。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几年前曾被美军和伊拉克逊尼派部落武装联手打得奄奄一息的组织，竟然能在叙利亚内战中“满血复活”，成功卷土重来，更在伊拉克西部和叙利亚北部站稳脚跟，建立所谓“哈里发国”。

尽管去年 8 月以来，美国及盟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持续实施较高强度空袭，但效果并不明显。更值得警惕的

是，“伊斯兰国”的外溢效应已经有所显现。近期，澳大利亚和法国都发生了受“伊斯兰国”煽动的本土极端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事件，也使得全球反恐安全形势更为紧张。

在 2015 年，国际恐怖主义能消停吗？目前来看，答案并不乐观。正如兰德公司的反恐专家塞斯·琼斯（Seth Jones）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的，当前以“基地”、“伊斯兰国”为代表的萨拉菲圣战（Salafi-Jihadist）恐怖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已对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国际社会构成“持久威胁”（persistent threat）。

什么是萨拉菲圣战恐怖组织？报告认为，这种组织兼具“萨拉菲”和“圣战”，是逊尼派武装组织中最为极端的一派。“萨拉菲”，即强调回归纯正的伊斯兰教；“圣战”，则意味着将暴力圣战看作“个人主命”（fard ‘ayn）。暴力和宗教极端主义是萨拉菲圣战恐怖组织的两大特征。

报告搜集了近万份关于“基地”等萨拉菲圣战恐怖组织的资料，其中包括一些解密文件，并就此建立数据库。通过分析相关数据资料，报告总结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几个趋势性特点——

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明显抬头。数据显示，受叙利亚、利比亚等中东国家动乱影响，2010—2013 年，全球萨拉菲圣战恐怖组织

数量增长了 58%，组织成员数量则翻了两倍多，这其中有不少是前往叙利亚参加内战的各国极端分子。这些恐怖组织制造的恐怖袭击数量也明显上升，不过 99% 以上的袭击对象是中东地区国家军警、平民等“近敌”（near enemy），直接针对西方国家本土等“远敌”（far enemy）的袭击尚不太多。

国际恐怖活动出现“去中心化”加剧。国际恐怖组织结构分为四层。第一层是以扎瓦西里为首、盘踞在巴基斯坦部落区的“基地”核心层，第二层是叙利亚、索马里、也门和北非等地正式向“基地”效忠的分支组织，第三层是未正式投靠“基地”，但认同“基地”意识形态的恐怖组织，第四层则是全球范围内受“基地”意识形态影响的各类组织及个人。在国际社会的共同打击下，传统的“基地”核心层被严重削弱，对于全球“圣战”圣战运动的掌控能力减弱，但各恐怖组织及极端分子活动的自主性则相应增强。目前，对于全球“圣战”运动的发展方向，各组织意见并不统一，更多恐怖组织是根据自身利益和“理想”实施“圣战”，现在风头正劲的“伊斯兰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国际恐怖组织的威胁趋于多元。一些国际恐怖组织热衷“攻城略地”，占山为王；另一些仍将西方国家本土作为主要袭击目标，

意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并引发群体恐慌。最值得警惕的是，国际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正在全球加速扩散，一些人受极端思想影响激进化，转化为本土恐怖分子（domestic terrorist）。而这些本土恐怖分子隐蔽性强，行动突然，预防并挫败此类恐怖袭击难度很大。

报告指出，国际恐怖主义仅凭军事打击很难彻底铲除，还是应从国家能力建立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入手予以解决。对于美国而言，与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并应充分考虑恐怖主义成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报告建议，对于全球各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国家，美国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比如对于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等恐怖主义活动对美国构成现实威胁、但政府管治能力低下的国家，应全面接触（engagement），即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全面支持现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在必要时也可直接介入打恐。对伊拉克、尼日利亚、埃及等恐怖主义活动尚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国家，可以采取前沿伙伴（forward partnership）战略，为其提供打恐装备保障和技能培训，加强其反恐能力。而对于摩洛哥等国际恐怖主义可能渗透，而政府有一定控制能力的国家，美国应发挥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作用，鼓励并帮助当地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并遏制极端思想进一步蔓延。

中国当前的恐怖主义威胁也日益严峻。2014年，中国境内发生多起恶性恐怖袭击案件，不仅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新疆等地区社会形势紧张，对经济民生发展造成阻碍。不过，从目前情况看，尽管中国境内恐怖袭击事件与国际恐怖活动的联动性有所上升，但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中国已成为国际恐怖组织主要袭击目标。中国目前更多面临的还是本土恐怖袭击威胁。

不过，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仍需引起中国警惕，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影响更值得关注。随着以北约为首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从阿富汗撤出，“基地”、“巴塔”、“哈卡尼网络”等恐怖组织将进一步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扩充实力。同时，“伊斯兰国”等地区外恐怖组织也正加大向阿富汗、巴基斯坦渗透，力图在此建立新的分支组织。上述因素相互交织，会使本已脆弱的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不仅威胁中国西部安全稳定形势，也会对推进“一带一路”规划造成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 Jones, S. (2014, June).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RAND Corporation.

热点

热点

热点解读

《查理周刊》蒙难，果敢地区硝烟再起，总书记说官员们“蛮拼的”。

新闻热点背后有什么样的学术思考？

政见带你领略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是如何思考社会热点问题的。

国际恐怖活动是“文明冲突”？别幼稚了！

国际恐怖活动震颤人心，袭击者被警方追捕、被民众痛恨。缘何起杀心、下杀手？难道真的是“文明的冲突”？别幼稚了，恐怖团体的活动一样有理性和逻辑的解释。

◎ 宿亮

《查理周刊》蒙难，漫画家成为恐怖活动的最新牺牲品。事发生后，不少人把恐怖袭击与《查理周刊》曾经刊载的涉及伊斯兰教漫画作品联系起来，指责西方傲慢激化矛盾，导致极端团体袭击。把恐怖袭击与宗教、文明联系起来并非政治正确，但每次恐怖袭击后总有人拿出“文明冲突”论说事，殊不知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的“主义”一样有着合理的政治逻辑解释。

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学者 Eric Neumayer 和 Thomas

Plumper 曾经在〈国际恐怖主义与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分析了恐怖团体的战略逻辑。

恐怖团体领导人为什么热衷袭击西方国家？

在分析恐怖团体动机时，必须要区分的两个概念是恐怖团体的领导人和追随者。这两类人在恐怖团体中处于不同层面，动机和行为逻辑也极为不同。

恐怖团体领导人很少直接参与恐怖袭击。对他们来说，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斗争博弈的理性战略，恐怖袭击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工具”。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多元化的，例如改变某种政策、颠覆某个政体，或控制更为广阔的地盘等。

达到目的有很多方法，为什么这些领导人一定要诉诸恐怖袭击呢？这是因为他们在所处的政治生态中往往面临很多困难，如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或与政府对比力量上处于明显劣势。恐怖袭击能够制造恐慌、增加社会稳定的成本，迫使政府增加安全支出，因此成为这些领导人的主要政治手段。同时，恐怖袭击引发官方弹压，让支持恐怖团体主张的人生活更困难，因此愿意加入恐怖组织。另外，袭击吸引媒体注意，让恐

怖团体领导人得以发声，增加影响力，进一步壮大力量。

既然恐怖团体领导人的目标是本国或本地区的影响力或控制力，他们为什么要去打击别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呢？

首先，攻击西方目标形成的影响力更能满足恐怖团体的需要，让本国或本地区政治力量无法不正视这样的恐怖团体；其次，不少国家政府受西方国家支持和帮助，甚至是接受西方国家干涉其内政，这种模式能够影响恐怖团体政治利益的实现。

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并试图在中东建立新秩序，反而越反越恐。其原因或许就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干涉影响了恐怖或极端团体领导人政治利益的实现，另外这种干涉还使恐怖团体更容易找到新人。这也是为什么，支持中亚国家的俄罗斯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往往来自中亚地区，而印度、中国这些对外干涉不多的国家受到国际恐怖袭击次数相对较少。

恐怖团体追随者有哪些特征？

再说恐怖团体的追随者。他们的行为就不能用理性或是策略性来分析了。这些人是恐怖袭击的主角，每个人追随恐怖主义的原因各不相同，或许每人都有一个故事来说明自己加入恐怖团体

的缘由。

不过，总体来看，还是能够总结出恐怖团体追随者的三个共同特征。

首先，这些追随者都受到恐怖意识形态或极端思想的吸引。从反面来看，历史上不少失败的左翼极端恐怖团体就输在没能让自己的意识形态得到足够多人的支持，现代恐怖团体则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包装推销”其思想，让更多人接受。

其次，这些追随者互相之间以及在不同恐怖团体追随者之间存在相互认可。一个小群体中的相互认可让恐怖团体成员不断巩固极端立场，愈发不把恐怖袭击看成是极端暴力犯罪，而是看成英雄主义的战斗，愈发容易加入、遵从，甚至献身恐怖团体。

最后，这些追随者都对现行社会及国际秩序存在不满。不满可能来源于自身遭遇或其他渠道的影响，但都能够增加他们对恐怖团体的认同，从而拿起枪弹走上不归路。

为什么用“文明的冲突”解释国际恐怖主义是错误的？

国际恐怖团体领导人受理性支配采取战略性的恐怖活动，这是犯罪，不是“文明冲突”。

“文明冲突”是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提出的。他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出自不同文明的本质差异。在亨廷顿看来，不仅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是西方的威胁，伊斯兰文明本身都是西方世界的威胁，因为冷战的结束把双方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打趴下”，加上西方文明的衰弱，文明之间的差异导致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进而导致文明之间因多个世纪形成更加深刻的差异，发生冲突。

亨廷顿提到恐怖主义，认定伊斯兰文明倾向于使用武力，因此无法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但这就没法解释为什么其他文明在历史中也不乏使用恐怖活动作为工具。亨廷顿提到 15 岁至 30 岁的男子失业是恐怖主义潜在动因，但伊斯兰文明以外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问题。

说到底，亨廷顿针对恐怖主义的结论没有逃出“恐怖主义是弱者经常使用的工具”这样的历史结论。换句话说，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文明没有直接联系。

亨廷顿提到七八个文明在未来社会将会发生“冲突”，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冲突？在他的表述中，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主要是经济上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主要是军事的，那到

底什么才算“文明的冲突”？

如果真的用“文明的冲突”解释国际恐怖袭击，那这种袭击就是不可避免的，是为了暴力而暴力的行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这样的行为吗？

“9·11”以来，国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要么评说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如何弥合分歧；要么议论国际旧秩序的不平等如何加剧矛盾。跳出宏观的叙述逻辑，分析个体恐怖团体的行为逻辑，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症下药，减少惨剧呢？

参考文献

- Neumayer, E., & Plumper, T. (2009).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04), 711–734.

期待人民点赞，政治人物为“接地气” 也是蛮拼的

“接地气”的官方讲话是一种国际潮流。背后的原因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那些看起来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经验和知识，要比专家意见更加可靠。这反映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专业知识和精英分子的怀疑情绪。

◎ 陶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盛赞各级干部“蛮拼的”，并高调为“伟大的人民点赞”。在官方讲话中使用日常语言的政治人物，并非只有“习大大”，即便在社会等级相对鲜明而政治制度与中国迥异的英国，紧贴日常生活的声音、事迹和观点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政治人物的正式讲话之中。

由英国利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两位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20年间，英国三大主要政党领导人在正式讲话中，

都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直接源于日常生活的话语和案例支撑自身论点，越来越少引用专业意见。研究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那些看起来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经验和知识，要比专家意见更加可靠。而在这种现象背后，则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专业知识和精英分子的怀疑情绪。

为了解英国政治人物在演讲中使用日常生活掌故的实际情况，研究者对 1990 年以来该国三大主要政党领导人在历次全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进行了系统分析。数据显示，二十多年以前，英国政治人物在正式演讲中并不常提及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掌故。但是，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直接源于日常生活的话语和掌故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官方讲话之中，最近十年间更几乎成为了英国主要政党每次代表大会主旨发言的保留内容。

有趣的是，最初掀起这股风潮的，是一般被认为与上流社会和“精英人士”关系更为密切的保守党。此后，工党和自民党这两个相对贴近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中左翼政党也迅速效仿，他们的领导人在官方讲话中提及日常生活掌故的频率后来居上，一度超越了保守党。然而，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卡梅伦于二零零五年出任保守党党魁后，在演讲中大量使用这种修辞方法，甚至让

他的工党和自民党对手们相形见绌。

具体来说，英国政治人物在演讲中所提到的日常生活掌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自身经历的小故事，另一类的主人公则是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普通民众。通过前一种方式出现的掌故，往往与演讲人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经历密切相关。例如，一位试图说服公众相信社会福利对国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自民党政治家，不仅饱含深情地讲述了自己父亲在缺乏公共福利的年代里如何因贫穷而与梦想失之交臂，还不厌其烦地告诉听众公共福利如何一步一步地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此外，政治家们也常在演讲中引述来自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故事，突显自己与群众沟通顺畅、交流密切，不仅以此来捍卫自己的观点，也常常用这些掌故攻击对立党派的政策措施。

不过，无论源于日常生活的掌故如何繁复多样，也无论政治家本人是否在这些掌故中“出镜”，掌故的主角通常都是“普通民众”，而内容则通常都是这位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经历”或“寻常态度”。因为这些掌故的主角被刻意定调为“普通民众”，他们的经历和话语不仅显得更接地气，而他们的“平凡经历”或“寻常态度”似乎也格外“靠谱”与“可信”，成为支撑某个政治观点的

绝佳佐证。

日常生活掌故风靡英国政坛，只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此前，政治家们更习惯于引用新闻媒体、官方报告和档案文献中的专业意见来佐证自己的论点。随着日常生活掌故出现在正式演讲中的频率越来越高，专业意见所占的分量却越来越轻。那些经由寻常百姓亲眼见证的事情，似乎比专业人士通过精心设计和专门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具公信力。研究者们认为，这种变化既与政治家和民众之间交流增多有关，也是演讲者向新媒体等更具公众亲和力的传播方式学习的结果。

可见，接地气的官方讲话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研究者们认为，这种潮流不仅仅是沟通技术和演说技巧方面的革命，更反映着深刻而重要的社会变革：政治家们之所以要拼尽全力让自己的演讲接地气，在于如今群众“点赞”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更接近他们生活的话语、事例和观点。

参考文献

- Atkins, J., & Finlayson, A. (2013). "... A 40-year-old black man made the point to me": Everyday knowledg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leadership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litics. *Political Studies*, 61(1), 161–177.

果敢危机解决方案： 隔离或是“协和式”民主？

对于解决缅甸这样的民族冲突，政治科学家们给了两个解决方案。是“拉开他们，先消消气”呢，还是“不要打，坐下来好好谈”？

◎ 邵立

缅甸政府与果敢地区之间的内战已经持续多日，所引发的难民潮也已波及中国。预测这场内战的最终结果也许很困难，但以什么样的制度设计结束内战能达到最理想的结果，却早已在政治理学界得到大量讨论。

民主之不可能？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武装。缅甸内战冲突本质上是民族冲突。其实，多民族并不必然意味着民

族矛盾。如果民族构成过于分裂，每一个民族都无法占有绝对优势，反而会促进他们之间的民主合作（参见 Reilly 发表于 2006 年的研究）。但缅甸的民族构成有三个特点导致了民族冲突的不可避免——

第一，缅甸的人口构成中有 68% 是缅族，而第二和第三大民族是掸族和克伦族，分别只占总人口的 9% 和 7%。这导致了缅族的政治权力既占鳌头，却又不具有绝对支配的统治力。

第二，缅甸的民族分野与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分层高度重合，这导致了经济政治不平等和民族身份捆绑。社会其他方面的冲突，都会轻易转化为民族冲突，从而动员大规模的群众参与进去。

第三，缅甸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比较集中。例如克伦族在克钦邦占大多数，华人主要聚居在果敢。这导致在某个地区之内，少数民族具有权力优势，与缅族为主的中央政府在自治权上产生矛盾。

根据政治学家泽沃斯基的理论，在多数主义的民主制度下，缅族总会毫无疑问在全国选举中获胜，则民主失去了它应有的“不

确定性”。其他各族眼见长期内无出头之日，自然不会答应这种毫无胜算的制度。因此，即使民主制度在缅甸实行，也不会持久。

那么，有什么可以让各族都比较满意的一个方案呢？

“拉开他们，先消消气”

政治学家提出的第一个办法是：“民族隔离”。这不是指南非那样的种族隔离制度，而是指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的法理上的主权分割（*de jure partition*），即分裂地区独立。

Chapman 和 Roeder 考察了 1945 年到 2002 年之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 72 场内战，比较四种处理模式的优劣。他们发现，法理隔离之后的双方，仅有 14% 在两年内会重新爆发暴力冲突。但对于事实隔离（*de facto separation*）的案例，这个数字是 50%；维持统一，重新冲突率升高到 63%；自治放权（*autonomy arrangement*），重新冲突率上升到 67%。Kaufmann 更是认为，在民族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免大规模屠杀的出现，首要工作是将冲突双方的民族隔离到能够防御彼此的安全地带，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和谈或者制度探索。

正与日常生活中劝架时把双方拉开一样，隔离是一个很有效而且简单的方法。但它也有无法回避的缺点。第一，隔离并不是一个“双赢”方案，而是以国家领土分裂作为代价，来换取对人们生命安全的保护。第二，这不是本质上解决民族冲突的方法。因为民族身份实质是不确定的。今天，我们可以一致对外打倒日本鬼子；明天，说不定我们就嘴里咒骂着“骗省”、“砍省”、“大吃省”杀成一片；后天，当省外矛盾加以解决，苏南和苏北、宣武和崇文又磨刀霍霍向对方……

“不要打，坐下来好好谈”

于是，另一派的政治学家认为，面对如此分裂的民族割据局面，最好的方法是以和谈代替隔离，用协商代替冲突。而在这派理论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就是提出“协和型民主”（Cosociational Democracy）的李普哈特（Arend Lijphart）。

李普哈特的学术生涯很大一部分都贡献在“协和型民主”这个概念上。他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是 1969 年。但在 2004 年《民主期刊》发表的文章中，他将协和型民主的制度设计阐述得更为清晰

——其核心在于“权力分享”和“群体自治”。

权力分享是“协和型民主”第一个特点。它的意思是，各个主要的社群（communal groups）都应该有代表参与政治决策。即每个政治决策都必须得到各社群的代表同意方可落实。具体到在立法制度上，他提倡“单一议会制”。议会组成与民族、社群构成比例相近。例如缅甸有 3% 的华人，议会里就应该由约 3% 的议席属于华人代表。总统是虚位无实权的国家元首，行政机构是议会选出的“大联合内阁”（Grand Coalition Cabinet）。“大联合内阁”的意思是，在决策内阁里，应该包含不同社群的代表。用缅甸的例子来说，就是总理可以是缅族人，但财政部长是克伦族人，外交部长是掸族人，教育部长是华人……等等。他反对采取总统制。因为总统过大的权力会破坏共识和协商的可能。

在选举制度方面，李普哈特认为应该运用“多议员选区-政党公开名单-比例代表制”。比如，一个选区选取三个代表。一个选民可以将第一票和第二票投给政党 A，将第三票投政党 B。在两个政党名单上，该选民有权选择候选人的当选顺序。选举最终结果根据选民投票的比例决定。如果在一个五个代表的选区里，政

党 A 拿了 40% 的票，排名前两名的 A 党候选人就会当选议员。

除此之外，李普哈特认为权力分享可以出现在任何层级国家机构内，包括军队、公务员、法院和警察系统。

协和型民主的第二个要义，是群体自治。意思是群体内部的事务，尤其是关于文化和教育的事务，由社群自身决定。例如，国家制定统一刑法，但民法，尤其是婚姻法，由各群体自己做主。例如在印度，印度教徒是一夫一妻制，但穆斯林按照自己的方式允许一夫多妻。不同民族群体可以有自己的教育系统，教授自己相关文化和语言课程。此外，国家的行政区域规划，应尽量体现“同质性”原则，让一个行政区域里的民族构成尽量单一化。

协和型民主的设计，背离了“多数主义”的民主假设，它赋予了少数族群，尤其是“大联合内阁”的成员过大的决策权，因此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统治制度。李普哈特也承认这一点。但他认为，这种制度设计没有背离规范意义上民主的要义。在高度分裂的政治系统中，多数主义并不能尽可能照顾每个人的利益。反而是这种建立在精英合作之上的权力分享制度更能满足民主要求。在 2012 年，他将协和型民主重新表述为“共识型民主”（Concensus Mod-

el)，并认为以瑞士、比利时为代表的共识型民主是能与以英国为代表的多数主义民主（Majoritarian Model）并驾齐驱的不同民主模式。

不过，协和型民主远非毫无破绽的解决方案。首先，李普哈特所标榜的“模范国家”之一黎巴嫩，便在70年代深陷十几年的内战之中。而他所欣赏的另外一个国家——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几乎全盘复制英国的多数主义民主国家。他辩解道，印度虽然是多数民主，但在很多执政原则上却体现了协和型民主的精神。此外，协和型民主其实也不能解决民族分歧。在选举制度设计上，它强化了民族之间的对立，无助民族和解。而且，作为一种精英统治制度，协和型民主的成功实施，必须依靠执政精英们的表现。这些精英既要有对自己所代表的族群有足够政治影响力，又要善于妥协、积极合作的品质和愿景。而培养这类精英，必须要有良好的教育和相对富足的生活等“土壤”。

因此，对于人均GDP只有1700美元、教育支出仅占GDP总值0.8%的缅甸来说，要走到协和型民主的终点，路很漫长。

参考文献

- 中央情报局缅甸简介: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bm.html>
- Chapman, T., & Roeder, P. G. (2007). Partition as a solution to wars of nationalism: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04), 677–691.
- Kaufmann, C. (1996).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solutions to ethnic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4), 136–175.
- Lijphart, A. (2004). Constitutional design for divided societ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5(2), 96–109.
- Lijphart, A. (2012).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illy, B. (2000–2001). Democracy, ethnic fragmentation, and internal conflict: confused theories, faulty data, and the “crucial case” of Papua New Guin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3), 162–185.

热点

性别平等

春晚将男女平等和女权主义这个话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女权主义者是想太多吗？

看看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再来听听经济学家是怎么说的。

数据说话：中国女性面临着怎样的不平等

中国女性面临的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在工作和家庭场合遇到的不平等对待，还更多地体现在人们的观念里。倘若不争平等，歧视终会成为不争的事实。

◎ 缪莹

一年一度的春晚，今年观众的反应好像有点不太平常。单纯吐槽的段子少了，正经的反驳多了，舆论也逐渐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面，不满于各种赤裸裸歧视梗的人们觉得这次的一些语言小品真是“恶心他妈夸恶心——好恶心”；另一方面也有旁观者觉得，“想多了吧！大过年的，这么上纲上线做啥？”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哪怕是禁放爆竹的地区，好像也能闻到隐隐的火药味。

关于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的文章想必大家也看了许多，观点

和理论都不缺了，那么究竟女性在当下的中国生存现实究竟如何呢？通过 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或许可以一窥究竟。

教育和工作：有改进，还差点

教育对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作用至关重要——有了教育，可以找更好的工作；经济解放了，自然也从被男性主导和控制的家庭关系中解放出来。同时，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注重自身健康，生育率也相对较低。二十年来，中国在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在 1990 年，农村有 34.7% 的女性没有接受过（哪怕是最基础）教育；到了 2010 年，这个数字降到了 6.6%。城市未受过教育的女性比例则从 10.9% 下降到 3.5%。然而，地域上的不平等还是存在：在 2010 年，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女性平均只有 6.8 年受教育的机会（小学刚读完），比北京和天津地区附近的农村女性要少了 2.2 年。

在农村，女性受教育的意义并不被重视，家里对女性的“期待值”也相对要小。调查显示，对于农村女性来说，离开学校的决定更多是因为她们家长所做的（36.8%），而家长干涉农村男性的教育则较少（27.9%）。更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农村家庭认为教育

对女性不重要，而同样的数字对男性来说只有 3.5%。

在工作方面，中国女性比起周边一些国家的女同胞有更多的机会。尽管数据不多，但基本可以看出，四个中国女性里有三个工作，比印度（三个里只有一个）、日本、韩国和菲律宾（都只有两个里不到一个的比例）要好很多了。但是，女性的就业率从 1990 年起就在下降，城市里尤甚。在下岗的大潮流中，女性比男性更难再就业，于是有更多的女性回到了家庭：在 1990 年，76.3% 的女性在岗就业，而 2010 年这个数字跌到了 60.8%。在 2005 年，吉林和黑龙江等地区，女性就业比例只有 35% 到 45%。

实际上，经济改革给所有人带来机会的同时，女性依旧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女性的失业率比男性高出 50%，在工作场合受到骚扰的可能性更是多出两倍。2010 年，每五位女性里就有一位无法做到经济独立，而这样的男人只有 4.7%。

社会印象：男女依旧有别，女人们也这么想

性别刻板印象在中国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在 2000 年，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男强女弱”、“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这种说法表示认同，十年后基本仍是如此。在 2009 年的另一项独立

调查里，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受访者和将近 40% 的男性受访者认为女性工作机会少是因为“她们能力弱”，另外三分之一觉得该归罪于“女性天生的体力弱势”，更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原因在于“女性并不对自己的工作上心，也不够有事业上的野心”。

当被问到“你对一男一女分别做同样工作，但男人却赚更多工资这个情况怎么看”的时候，有 20.5% 的男性受访者觉得“这是正常的”，41.8% 觉得这是“不公平但可以接受”的。尽管觉得这种现象“正常”的女性受访者只有 7.9%，却也有 40.6% 觉得“这不公平，但可以接受”。实际上，女性受访者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权益被侵犯而对这些观点激烈反驳，反而表现出对这种男权常态的麻木。

更重要的是，社会对性别之间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减弱，甚至还有所增加。在被问到怎么看待“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这句话的时候，男性受访者和女性受访者各有一半对这种说法表示同意；而这个比例在过去十年内还上涨了：在 2010 年，有超过 61% 的男性对这句话表示支持，表示支持的女性也增加了四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干得好不如嫁的好”这种说法也更受欢迎了：从 2000 年到 2010 年，支持这种说法的受访者上升了十个百分点——女性从 37.3% 到 48%，男性从 30% 到 40%。

这再次说明了在女性心里，男权社会的思想反而更根深蒂固。

家庭角色：女性做家务仍被视为理所应当

尽管总的来说中国女性对她们自己在家庭里的地位表示满意（85.2%，2010年），但在这些表示满意的女性里也有人同时表示自己受到过言语上或肢体上的家庭暴力（在整个调查中的总比例高达五分之一）。同样有许多女性报告她们在家庭内部受到过经济和个人自由上的剥夺，或者被迫发生性关系。

尽管女性现在在家庭拿“大主意”的时候有了话语权，比如银行贷款和财政投资方面（2010年74.4%，1990年65.5%），但女性独立拥有房产的比例依旧很低（13.2%，相比于男性的51.7%）。这种不平等和女性是否已婚也没有关系：21.8%的单身汉是有房一族，只有6.9%的单身女性有房。

在做家务这一方面，女性也依旧比男性付出得更多：在2010年，女性平均在家务上付出的时间是男性的2.5到3倍。这在大众观点里也是一个字面上“不争”的事实：几乎没有受访者对这种安排有太大的异议。然而，这看似细枝末节的事情对女性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女性做家务被看成是理所应当，那么她

对一个家庭在工作和经济上的贡献便被认为是“副业”。于是，在工作机会减少的同时，她们往往最先退出自己事业的追求而转为注重家庭。这就意味着女性在找工作的时候要面临双重竞争：一方面来自工作场合，一方面也来自自己的家庭内部。

性别不平等：“不争”的事实

尽管中国女性的地位从 1950 年来因为多项法制改革有很大的改善，但不平等的现象依旧存在。这种现象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在工作和家庭场合遇到的不平等对待，还更多地体现在人们的观念里：一个女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容易被家庭和外界轻视，从而无法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最重要的是，这种轻视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极端行为表现，而往往在价值观的潜移默化里扎根发芽。在一个家庭只能负担一个孩子的学费的时候，考虑到男孩子今后更好的发展空间，女孩子要嫁人育子的“事实”，女孩往往只能给她们的哥哥弟弟让步，老老实实地出演自己“相夫教子”已经被决定的人生。城市里努力打拼出人头地的姑娘们，在和“玻璃屋顶”和工作场合的不公做斗争的同时，还要和周围喋喋不休的“结婚生子回归家庭”的声音做搏斗，甚至需要说服自己心中那个小小犹疑的

声音——这些都是容易被公众所忽略的。于是，从姐姐打工支撑弟弟读大学的新闻，到被各大媒体乐此不疲作为笑柄的“剩女”和“女汉子”，社会上的不平等和家庭里口口相传的隐形歧视相辅相成，最终将想象中的“现实”变成了真的现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倘若不争平等，歧视终会成为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 Attané, I. (2012). Being a woman in China today: A demography of gender. *China Perspectives*. Retrieved from <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6013>

男人天生比女人更有竞争性? 看看行为经济学家怎么说!

相比男性，女性确实更加不擅长竞争，尤其不擅长同男性竞争，这导致了人才配置的无效率。生理、经济和文化因素，都可以解释上述差异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干预，如平权法案等，可以有效缩小两性在竞争性方面存在的鸿沟。

◎ 王也

男女两性在行为模式上表现出的差异，也许是世界上被讨论得最多、最令人着迷的话题之一。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讨论，往往囿于刻板偏见（“女司机驾驶技术都很差”）和选择偏误（“我有一个女性朋友数学特别不好……”），不能得出准确结论。相对而言，利用统计学手段，在大样本中考察两性的平均差别，是更加科学而可信的办法。

但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过于复杂，即便有足够大的样本，

也总有一些干扰项无法被很好地控制。过去十几年中，行为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性别差异的研究之中。利用在实验室或田野中进行的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从而尽可能精确地估计两性在各类经济行为中存在的异同。

在这个领域中，目前被研究得最为透彻的一个主题，就是男女两性在竞争性方面存在的差别。最近，斯坦福大学的 Muriel Niederle 教授对近年来该方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她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现有证据表明，相比于男性，女性确实更加不擅长竞争，尤其不擅长同男性竞争，这导致了人才配置的无效率。生理、经济和文化因素，都可以解释上述差异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干预，如平权法案等，可以有效地缩小两性在竞争性方面存在的鸿沟，增加社会福利。

太少的高能力女性选择参与竞争

在 2007 年的一篇论文中，Niederle 和 Vesterlund 两位教授构建了一个精巧的实验，揭示了两性在竞争性上存在的差别。她们将 40 名女性受试者和 40 名男性受试者随机分入由两男两女构成

的 20 个小组，并要求他们先后在两个环节中进行两位数加法的计算。第一个环节是计件工资，受试者根据其答对题目的数量多少获得奖励；第二个环节是锦标赛，每组中答对题数最多的人才能得到奖励。在这两个环节中，男女两性的表现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差别。

在接下来的第三个环节中，研究人员要求每个受试者先在计件工资和锦标赛两种模式中进行选择，再开始答题，奖励将由选择的模式和答对的题数共同决定。她们观察到，选择锦标赛模式的女性比例要显著地低于男性（女 35%，男 73%）。这里的巧妙之处在于，每个受试者的回报并不取决于队友的选择（比如说，你选择了计件工资而队友选择了锦标赛，那么即使你的表现并非最好，你仍然可以按计件工资得到奖励），因此女性的利他精神（不希望损害队友的福利）无法解释这里的结果。

为了排除风险偏好对结果的干扰，研究者又设置了第四个环节，让受试者根据自己在计件工资环节的表现，选择计算报酬的模式。与环节三相比，受试者在环节四中面对着相同的激励和风险，但并不需要实际参与竞争。在所有环节结束之后，受试者还被要求猜测自己在前两个环节中的相对表现。两位作者发现，在控制了

受试者的信念（即对自身表现的猜测）之后，环节四中两性的选择并不存在差异。但即使是控制了信念、环节二中的表现，和环节四中的选择之后，环节三中观察到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这说明两性对待竞争的态度确实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事实上，与有效率的情形相比，高能力的女性参与竞争的比例太低，而低能力男性参与竞争的比例则太高。

这一发现被其后的一系列文献所证实。比如，在另外一些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女性更少选择高难度的任务（即使她们的能力胜任，见 Niederle 和 Yestrumskas 在 2008 年发表的研究），也更不愿意在团队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便她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见 Cooper 和 Kagel 在 2013 年发表的研究）。

女性在与男性竞争中的表现较差

在更早进行的一项实验中，Gneezy、Niederle 和 Rustichini 三位学者发现，在某些竞争性的环节中，女性的表现也确实会差于男性。

研究人员将受试者随机分组，并要求他们在电脑上解决走迷宫问题。结果显示，在计件工资或是随机选择胜利者的模式下，男

女两性的表现并没有差异；但在锦标赛模式下，男性解出的迷宫数量要远远高过女性（男 15，女 10.8）。然而，如果是将男女两性分开进行锦标赛，则两组的平均成绩也非常接近。这说明，女性并非不能竞争，而是不愿意同男性展开竞争。

Cotton、McIntyre 和 Price 发表于 2013 年的文章，基于重复进行的数学竞赛发现，两性的差异只体现在第一次竞赛中，其后就慢慢消失。这一差异出现的原因，是高能力女孩在第一次竞赛中的表现往往低于预期，而低能力男孩第一次的表现则会高于预期。

什么因素导致了性别差异？

男女两性在竞争性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实验室中发现的有趣现象，对于现实生活也有着重要的影响。Ors、Palomino 和 Peyrache 发表于 2013 年的论文研究了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入学申请考试。他们发现：在这一竞争性极强的考试中，男性申请者的成绩要明显好于女性。但就其高中毕业考试（非竞争性）成绩而言，女性申请者要显著强于男性。

Buser、Niederle 和 Oosterbeek 在 2014 年的论文中考察了荷兰中学生的专业选择。他们观察到，女性中学生竞争性更弱，也

更愿意选择数学难度低的专业就读。而 Flory、Leibbrandt 和 List 发表于 2010 年的论文也发现，女性更不愿意申请竞争性较强的工作岗位。

接下来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上述的性别差异？目前的研究指出，女性对待竞争的态度受到激素水平（孕酮和雌性激素，见 Buser 发表于 2012 年的研究）、社会地位（来自底层的孩子更不愿意竞争，见 Almas 等人发表于 2014 年的研究）、性格特征（情绪稳定性差的人更少参与竞争，见 Muller 和 Schwieren 发表于 2012 年的研究）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尤其有趣的，是文化背景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 Gneezy、Leonard 和 List 发表于 2009 年的文章中，研究者分别在坦桑尼亚的 Maasi（一个父系社会）和印度的 Khasi（一个母系社会），用实验手段考察了当地居民的竞争性。结果发现，在 Maasi，男性更愿意参与竞争（跟西方社会一样）；而在 Khasi，情况恰恰相反，女性比男性表现出了更强的竞争意愿。

而 Leibbrandt、Gneezy 和 List 发表于 2014 年的文章考察了巴西的两组渔民：一组居住在湖边，捕鱼主要依靠个人努力；另一组居住在海边，捕鱼要仰仗集体行动。他们发现，随着年龄增长，

来自湖边的（更加个人主义的）男性渔民相比于来自海边的（更加集体主义的）男性渔民表现出了更强的竞争性，但（不参与捕鱼的）女性在竞争性方面并不存在差异（事实上她们对待竞争的态度跟海边的男性渔民相似）。

“平权法案”干预效果明显

上述结论似乎说明，两性在竞争性方面存在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无法选择的因素（生理、性格、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但 Niederle、Segal 和 Vesterlund 三位研究者发表于 2013 年的文章发现，简单的政策干预就可以显著地缩小两性在竞争性方面的鸿沟。她们在 Niederle 和 Vesterlund 的研究基础上，对实验进行了简单的修改：每个小组由三男三女组成，锦标赛中的前两名将获得奖励。此外，她们增加了一个称为“平权法案”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每组的第一名，和女性中的第一名都将获得奖励。研究者们发现，在实施了“平权法案”之后，会有更高比例的女性选择参与锦标赛模式。由于之前高能力的女性过少地参与竞争，“平权法案”下的人才配置是更加有效率的结果。

此外，Balafoutas 和 Sutter 发表于 2012 年的文章也发现，如

果将女性的答对题数增加一到两道再跟男性对比，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在传统观念中，男性一直被认为是两性中更具竞争性的一方。行为经济学家在过去十几年中的研究，无疑证实了这一观念。但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告诉我们，男女两性在竞争性方面的差异并非天生，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塑造的产物。通过政策干预手段，这一差异可以被显著地缩小。当女性不再受缚于文化观念，勇敢地投身于跟男性的竞争之中时，整个社会都将因此受益——这一结论不由让人想起歌德的名句：“永恒之女性，引我们上升。”诚然，由于样本规模的限制，在实验室里得出的结论，并不能直接应用于政策实践之中。如何将上述发现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验证，并在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一般性之间，求得合意的平衡，这还有待后来的研究者们不懈地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 Almås, I., Cappelen, A. W., Salvanes, K. G., Sørensen, E., & Tungodden, B. (2014). Willingness to compete: Family matters (NHH Discussion Papers). Retrieved

from <http://ssrn.com/abstract=2382592>

- Balafoutas, L., & Sutter, M. (2012).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promote women and do not harm efficiency in the laboratory. *Science*, 335(6068), 579–582.
- Buser, T. (2012). The impact of the menstrual cycle and hormonal contraceptives on competitivenes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3(1), 1-10.
- Buser, T., Niederle, M., & Oosterbeek, H. (in press). Gender, competitiveness and career choi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Cooper, D., & Kagel, J. H. (2013). A failure to communicate: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Working Paper).
- Cotton, C., McIntyre, F., & Price, J. (2013).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peated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school math contes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86, 52–66.
- Flory, J. A., Leibbrandt, A., & List, J. A. (2010). Do competitive work places deter female workers? A large-scale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job-entry decisions (NBER Working Paper 16546).
- Gneezy, U., Niederle, M., & Rustichini, A. (2003).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Gender differen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3), 1049–1074.
- Gneezy, U., Leonard, K. L., & List, J. A. (2009).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a matrilineal and a patriarchal society. *Econometrica*, 77(5), 1637–1664.
- Müller, J., & Schwieren, C. (2012). Can personality explain what is underlying women's unwillingness to compet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3(3), 448–460.

- Niederle, M. (2014). Gender (NBER Working Paper 20788). Retrieved from <http://www.nber.org/papers/w20788>
- Niederle, M., Segal, C., & Vesterlund, L. (2013). How costly is diversity? Affirmative action in ligh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veness. *Management Science*, 59(1), 1–16.
- Niederle, M., & Vesterlund, L. (2007). Do women shy away from competition? Do men compete too mu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3), 1067–1101.
- Ors, E., Palomino, F., & Peyrache, E. (2013). Performance gender gap: Does competition matte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1(3), 443–499.

热点

奥斯卡

政见教你如何用正确的姿势“看”电影。

奥斯卡里的社会学： 为什么获奖感言总要感谢很多人

社会学研究发现，获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即便是个人性质的奖项，也不单看个人能力。另外，不要以为曲高和寡的电影就一定是在追求艺术，也许那只不过是一种风险较大的赚钱策略而已。

◎ 刘冉

今年的奥斯卡，《鸟人》成为最大赢家；《少年时代》《爆裂鼓手》等早已在业内口碑爆棚却仍被视为小众的作品，也因为获得最佳影片提名并斩获表演类奖项而获得了大众的注意。朱丽安·摩尔成为第一个最佳女主角大满贯，梅姨也创下了第十九次提名的纪录；万年配角 J.K. 西蒙斯终于一鸣惊人，而在事业多年不见起色的迈克尔·基顿也凭借《鸟人》焕发了第二春。

在有着 IMDB、Metacritics、烂番茄、豆瓣等多种电影评分网

站的今天，为什么无论业界还是观众都依然如此关注奥斯卡？什么样的影片和演员更容易获得奥斯卡提名？奥斯卡对于电影票房有怎样的影响？这些娱乐话题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社会学的问题意识。

个人奖项也不是单看个人能力

奥斯卡获奖者们总喜欢在得奖致辞中感谢一大串人，其实这种做法大有道理——社会学研究发现，获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

UCLA 社会学系学者 Gabriel Rossman、Phillip Bonacicha 以及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 Nicole Esparza 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电影以及其他许多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团体合作的成果，然而大部分重要奖项（例如奥斯卡最佳男 / 女主角）嘉奖的却是个人成就。事实上，我们很难剥离团体合作的成果而去单独评判某一个演员的表现。那么，这些奖项真的是单纯基于个人成就评选出来的吗？当个人才能深嵌团体合作之中时，评委们又如何做出判断？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们选取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

会（AMPAS）以及IMDB两个数据库中1936到2005年间符合奥斯卡评选标准的电影进行分析。每部电影中，只有排在演员表前十位的演员被纳入研究范畴；最终数据覆盖了16392部电影中的37183位演员。通过分析这些演员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几率，研究者们发现，在个人能力之外，还有两种机制影响奖项提名：团体溢出和社会地位效应。

所谓团体溢出，其实指的是“鸡犬升天”效应——有幸与著名导演、编剧及演员合作的演员，自己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一点通过数据很容易就得到了证实：在电影相关变量（类别、投资、发行方、团队人数、上映日期等）以及演员自身人力资本变量（已经参与的电影数目）都相同的情况下，与曾经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导演、编剧及其他演员合作，将显著提高演员自身获得提名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曾与罗伯特·奥特曼、保罗·托马斯·安德森、路易·马勒、科恩兄弟、托德·海因斯、格斯·范·桑特、阿方索·卡隆等多位大师级导演合作的朱丽安·摩尔想必深有体会。

第二个机制涉及社会地位的衡量，也是该研究的创新之处。人们常常用“地位”或“声誉”来判断他人的能力，然而事实上，地

位与能力未必直接相关。在电影界，也许我们最开始评判一位演员确实是基于其才能，然而随着时间发展，各种偶然因素的累积、演员之间的互动关联、固有印象的自我加强、为尊者讳等等机制交织在一起，使得演员的才能与地位之间的关联愈来愈弱，而地位也由此成为介于才能和奖项之间的中间因素。

要想证明这一机制的存在，首先要想办法衡量一名演员的地位。研究者提出，演员在电影海报“billing block”（即演员名单，通常位于海报最下方）中的排名顺序，能够很好地体现其地位。显然，这一排名未必与戏份成正比，而是与演员的票房吸引力和议价能力等直接相关。例如，在《莎翁情史》中饰演伊丽莎白一世的朱迪·丹奇仅出场八分钟，却是海报上的五名主演之一，并以此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不过，要想同时衡量所有演员的地位，又涉及他们在不同影片中的相对排名——仅仅计算平均排名可不行，关键要看排在前后的人是谁。因此，作者使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计算出每一位演员在整个演员表网络里的“中心度”，作为其地位的衡量标准。简单来说，这一“中心度”不仅考虑演员自身的位置，也同时考虑其前后邻居的身份，并综合计算出每一个演员的相对地位。

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演员在电影界的这一“中心度”对于其能否获得奥斯卡提名也具有相当显著的影响。如果经常排在乔治·克鲁尼前面，那肯定能提高获得提名的几率！

社会地位与团体溢出这两个机制，说明了个人奖项并不单纯只看个人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电影界存在累积优势或曰“马太效应”。得奖——影界地位提高——吸引优秀合作者——得奖，若能形成这一良性循环，演员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

那么，获得重要奖项或者提名，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奥斯卡提名与电影票房

还是这位 UCLA 的 Gabriel Rossman，这次换了同校的合作者 Oliver Schilke。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2005 年，有两部极其相似的电影同时上映。它们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美国西部农村，投入都在 1500 万美元左右，主要演员都曾获得奥斯卡提名，都讲述了遭受社会歧视的少数群体的故事，也都针对奥斯卡进行了营销。然而最后，其中一部获得了八项奥斯卡提名，最终斩获 8300 万美元国内票房；另一部却在奥斯卡提

名上颗粒无收，最终票房也仅为可怜的 900 万。

这两部电影分别是：《断背山》和《艾斯卡达的三次葬礼》。

两部在各方面都十分相似的电影，为何票房会有着天壤之别？真的是影片质量的差异吗？事实上，这两部影片在各大电影评分网站上的得分都相差不大。那么，难道奥斯卡提名真的具有如此惊人的票房魔力吗？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研究者分析了 IMDB 中 1985 年到 2009 年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及奥斯卡提名情况（共计 2919 部电影）。当然，不能直接看奥斯卡提名和票房的关联，因为二者可能同时受影片质量或受欢迎度这一潜在变量的影响。于是，研究者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变量来衡量每一部电影对奥斯卡的“追逐度”：看其风格、类型、剧本关键词和上映日期与最近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影片有多高的相似度。结果发现，“奥斯卡追逐度”跟影片本身盈利多少毫无关系——哪怕挤破脑袋想拿奖，观众也未必买账。

如果重要奖项的竞争对票房毫无影响，为何片方仍然如此重视奥斯卡？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表面上的“零关联”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二元模型：在那些拼命想要获奖的影片之中，最终得到提名的影片将获得超乎寻常的回报，而提名失败的影片则下场

凄凉。正是两种相反的效应互相抵消，才导致表面上看不出什么联系。

具体来说，这项研究发现了奖项竞争的三个结构特点：首先，消费者会将奖项作为值得信赖的评判标准来做出消费决定；第二，奖项的存在将原本水平近似的影片一刀切地区分开来，并产生了“赢者通吃”的效果，导致各方面近似的影片在市场上遭到天壤之别的对待；最后，若想对评委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大众口味的迎合。三个特点结合起来，我们发现，追逐奖项是一种高风险策略：虽然获奖将带来巨大的收益，但参与竞争本身需要极大的投入与牺牲；最糟糕的结果莫过于加入战局却最终失败，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研究者们将这一机制称为“塔洛克彩票”，或曰“全支付拍卖”，即一种无论输赢都要付钱买单的拍卖形式。在这种规则下，所有参与角逐者都要付出代价，而只有最终的幸运儿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

显然，这一发现并不仅仅适用于电影界；文艺界各个领域的奖项评选，恐怕都是一种“塔洛克彩票”。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在这种机制下，奖项评选有促进文化市场多元化的作用。以电影界

为例，奖项的存在能够给片方一个动力来生产偏离大众口味的影片，而这一作用甚至无需改变片方追求利润的大前提——不要以为曲高和寡的电影就一定是在追求艺术，也许那只不过是一种风险较大的赚钱策略而已。

参考文献

- Rossman, G., Esparza, N., & Bonacich, P. (2010). I'd like to thank the Academy, team spillovers, and network centr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1), 31–51.
- Rossman, G., & Schilke, O. (2014). Close, But No Cigar The Bimodal Rewards to Prize-Seek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1), 86–108.

当经济学家遇上电影

看过奥斯卡颁奖，让我们听听经济学家怎么研究电影吧。

◎ 王也

经济学是什么？货币、需求、出口、股价……？其实，自加里·贝克尔以来，经济学的触手已经伸向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扩张势头在近年来是如此迅猛，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名词：“经济学帝国主义”。相比于其他学科，经济学以个人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基于一些简单的假设（如一个人不能喜欢 A 胜过 B，喜欢 B 胜过 C，同时又喜欢 C 胜过 A），建立起了一套用以分析个体决策的严密理论框架。只要稍加改动，这套框架几乎可以为任何人类行为提供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解释。而计

量经济学的发展，又使得通过实际数据对理论进行证伪成为了可能。事实上，当前经济学关注的主题，远远超过了经济现象本身：战争（Miguel et al., 2004）、犯罪（Levitt, 1997 & 2004）、性行为（Cheng & Smyth, 2014）、语言结构（Chen, 2013）、人脑运行机制（Alonso & Brocas, 2014）等等这些看起来跟“经济”并不沾边的内容，背后都有经济学帝国的庞大身影——最近，甚至连电影都成了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

当然，经济学家讨论电影，并不会着眼于电影本身，而是希望以相关的个体行为作为切入点，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从而可以在更加一般的层面上对社会现象加以解释。

口碑传播对票房贡献高达 32%

在 2011 年的一篇论文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动经济学家 E. Moretti 以电影票房为例，讨论了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这一机制对个体观影选择产生的影响。他指出，电影首映周的放映场次，反映了院线基于剧情、阵容、宣传等因素对影片质量进行的估计；如果首映周实际票房和放映场次之间的差距——Moretti 称之为“惊喜程度”——相差较大，则说明影片的质量高

于预期（反之则低于预期）。如果社会学习真的有显著作用，那么观众会从身边朋友同事的反馈中，得到关于影片质量的准确信息。随着时间推移，那些惊喜程度较高的电影会收获更多的观众，票房下降的趋势会比较缓慢。

基于 1982 年到 2000 年间在美国上映的 4992 部电影的每周票房和首映周排片场次数据，研究者证实了这一结论。而无论广告投放、影评界反馈还是上映的具体时间，都不会对主要结果产生干扰。此外，作者还发现：在事前质量比较确定的电影（如系列片的后几部），较少受到社会学习的影响；而面向青少年的电影则更依赖于社会学习效应——相比于成年人，青少年往往有着更大的社交网络，从而信息的更新更加迅速。这些结果都和社会学习理论模型的预测相符合。

但是，仍然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惊喜程度高的电影票房下降较为缓慢，并非由于观众根据身边人的评价确定了影片的真实质量，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希望去观看那些流行的电影，从而可以跟朋友一起讨论。这一机制在经济学理论上，被称为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亦称社会效用，Social Utility）。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Moretti 考察了影片首映当天美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显然，天气状况和影片质量并无关系，从而不会影响人们通过社会学习获悉的信息。然而，如果在首映当天遭遇恶劣天气，影片的表现很可能不那么尽如人意，倘若网络外部性真的存在，那么其之后的票房仍然或多或少会受到干扰（相比于正常状况，这部电影显得没有那么流行）。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是，首映时的天气状况，对影片之后的票房走势并无显著影响，也就是说，网络外部性的作用对于电影行业来说，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重要。

最后，研究者估计得出，平均而言，社会学习对于影片全部票房的贡献高达 32%，或者说相当于广告宣传三分之二的作用。因此，更多地通过社交网络进行影片推广，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两年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的潮流）。

早在 2003 年，哈佛大学的 Glaeser 等人就提出了所谓“社会乘子”（social multiplier）的概念，指出某些个体变量（如教育程度）的实际作用会通过社交网络而不断放大。但是，这种效应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具体有多大规模，又是通过何种渠道产生影响，都是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通过对电影票房的研究，Moretti 成功地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了解答，明确了社交网络在信息扩散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媒体影评不会给同一集团出品的电影当“水军”

在 2014 年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来自伯克利的行为经济学家 Stefano DellaVigna 同其合作者研究了影评偏向性的问题。

2007 年，华尔街日报被新闻集团收购，而同在默多克掌控之下的，还有 20 世纪福克斯这样的电影公司。那么，被收购之后的华尔街日报，会不会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为 20 世纪福克斯出品的电影撰写更多的正面影评呢？这背后更加一般性的问题是，在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媒体对声誉的看重能否保证其报道的公正性？

利用两家影评网站（Metacritic 和 Rottentomatoes）所提供的电影资料库，两位研究者根据发行时间和网友评分等要素，将每部 20 世纪福克斯出品的电影与其他公司（非新闻集团控股）出品的十部电影进行了匹配，使得这些电影在各个维度上都较为相近。然后，他们考察了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对每组十一部电影的评分，发现新闻集团旗下下属媒体的影评家们，并不会给 20 世纪福克斯出品的电影打出更高的分数——即使是在这种做法可以带来可观收益（电影质量较高或投资较大）的时候也是如此。同样，时代

华纳下属的媒体，也未表现出对华纳兄弟出品电影的明显偏爱。

两位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偏向性的影评并不会给媒体带来直接的收益（只会使幕后老板从中获利）；而影评的多样性，使得不公正的评分很容易被读者发觉，从而媒体的声誉会受到损害。因此，至少在电影评分方面，我们无需太过担心相关利益集团在背后进行的操控。

暴力电影吸引潜在犯罪者走进电影院

在更早的一篇论文中（*QJE*, 2009），Stefano DellaVigna 还研究过暴力电影和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

先前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暴力电影的放映会助长犯罪行为；来自实验室的证据也表明，在观看过暴力情节之后，受试者的侵略性会明显增强。那么，现实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在分析了 1995—2004 年间美国各个周末的电影放映情况之后，研究者发现，在暴力电影观影人数较多的周末，全美发生的案件数量事实上会显著降低，这一效应甚至会持续到电影放映结束之后（第二天的凌晨）。研究者指出，相比于一般电影，暴力电影对犯罪倾向较高的人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当这些潜在的犯罪者都选择买票走进影院

时，原本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自然消弭于无形。同时，由于美国的电影院不允许饮酒，观影也降低了酒后闹事发生的概率，这就解释了为何第二天凌晨的案件数量也会相应减少。

为了进一步支持上述结论，研究者还利用美国的家户消费数据做了微观层面的研究。他们发现犯罪倾向较高的年轻群体会在看电影上花费更多，同时观影支出的增加会带来酒精饮料购买的减少。而在影评网站 IMDB 上，暴力倾向较高的电影也确实更受年轻观众的追捧。

这是否意味着，实验室得到的结论实际并不成立呢？作者认为，也不尽然。通过在暴力电影内部进行对比，他观察到，其实中等暴力程度的电影对犯罪的抑制作用最大。这意味着暴力电影可能确实会增加人们的犯罪倾向，只是这一效果被其他机制（将犯罪分子带进影院和减少饮酒）抵消了而已。

上面列举的几项研究，虽然着眼点各不相同，但仍有一些共通的地方：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入手（票房、影评、暴力电影），落脚处却都在探讨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社会学习、声誉 vs 利益、媒体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事实上，由小见大，正是今天经济学研究的普遍特点。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在经济学理论的透

镜之下，往往能呈现出意想不到的瑰丽色彩。“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迷人之处，也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 Alonso, R., Brocas, I., & Carrillo, J. D. (2014).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bra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01–534.
- Chen, M. K. (2012). 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economic behavior: Evidence from savings rates, health behaviors, and retirement ass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0–731.
- Cheng, Z. M., Russell, S. (2015). Sex and happines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 DellaVigna, S., & Hermle, J. (2014). Does conflict of interest lead to biased coverage? Evidence from movie review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Glaeser, E. L., Sacerdote, B. I., & Scheinkman, J. A. (2003). The social multiplier.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2–3), 345–353.
- Dahl, G., & DellaVigna, S. (2009). Does movie violence increase violent crim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2), 677–734.
- Levitt, S. D. (1997). Using electoral cycles in police hiring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police on crim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70–290.
- Levitt, S. D. (2004). Understanding why crime fell in the 1990s: Four factors that explain the decline and six that do no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3–190.
- Miguel, E., Satyanath, S., & Sergenti, E. (2004). Economic shocks and civil conflic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4), 725–753.
- Moretti, E. (2011). Social learning and peer effects in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movie sal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8(1), 356–393.

热点

新加坡

李光耀的逝世让这个弹丸小国重新变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失去了这位政治强人之后，新加坡的政治将如何发展？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新加坡华裔”遇见“新加坡华人”

低生育率、少劳动力、资源稀缺的地方需要调动移民来维持竞争力。但在个人层面，再宏观的经济好处都敌不过家园逐渐陌生的生活体验。

◎ 林知阳

在移民与族群研究者看来，新加坡也许保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华人离散群体（diaspora）。虽然不同地域的华人在文化上有相通之处，但新加坡是一个尤为独特的环境：以华人为主体的移民社会通过族群混居政策，已经构建出新的国家认同。

跨族群的聚居是一把双刃剑。它促进了不同群体间的频繁交往，但也很可能因为接触频繁而产生更多隔膜。新加坡的情况甚至更复杂一些：九十年代以来，有数十万（纽约时报亦曾报道一百万）

中国新移民来到新加坡定居，成为这个国家五百万人口结构中举足轻重的部分。

新加坡人是怎样看待这些新移民的？这些新移民又如何影响着新加坡原有的族群关系呢？

以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南洋相逢自然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刻板印象里，占当地人口四分之三的离散华裔居民会积极欢迎新来的华人（而且老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是重视传统家庭的潮汕、客家移民）。可近二十年来，随着华人新移民不断涌入新加坡，本地排外情绪亦随之高涨。有趣的是，同为华裔的马来西亚华人却免于类似的排外敌意，而被新加坡华人视为“弟兄”一般的群体。

南洋理工大学的刘宏教授在《族群与种族研究》上发表文章，通过访谈以及对新加坡社交媒体的分析，梳理出“新加坡华裔”对“新加坡华人”的三种主流叙述。这些叙述（discourses）策略性地把“新加坡人”与新移民区分开来，并且已经成为本地身份政治的一部分。

※ 叙述之一：社会文化差异巨大。“虽然我们长得像，但社会文化背景不一样。”

- ※ 叙述之二：稀缺资源争夺激烈。“中国移民来新加坡，掠夺本地机会和资源。”
- ※ 叙述之三：新移民缺乏国家忠诚。“中国移民虽入籍新加坡，但依旧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前两种叙述在其他大陆移民涌入的区域（诸如香港与台湾）并不罕见。第三种叙述则常见于新加坡互联网。在 2011 年雅虎的网络问卷调查里，30,000 样本中有 41%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新移民到新加坡仅为短期利益，并最终会离开。与之相印证的是 2009 年张元元的例子：彼时张女士已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却仍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阅兵，并在采访中表达对“祖国”中国的忠心。这一消息在新加坡激起轩然大波。

移民的涌入也戏剧性地增强了新加坡本地的跨种族团结。移民潮揭露出的华裔族群内部的巨大差异，反使因国籍和地缘联系起来的不同族群走得更近，巩固了国家 / 地区认同。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院在调查 5000 户家庭后指出，93.8% 的非华裔新加坡人愿意受雇于新加坡华裔、和他们共事、或做他们的邻居。被问到受雇于新移民、与他们共事或成为邻居时，这一比例则显著下降。不过，这种差异并非完全因“中国”导致。非马来裔的新加

坡人中，有 92.7% 愿意与新加坡本地出生的马来裔为邻，可面对“新马来移民”时，这一数据也骤跌了 5.9%。

研究者指出，新加坡当局已然认识到与移民问题相伴相生的不满情绪，并且一面控制移民数量，一面采取积极行动帮助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但宏观看来，全球化带来的矛盾，即国家、公民社会、个人三者在塑造身份认同时的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从国家角度来看，低生育率、少劳动力、资源稀缺的地方需要调动移民来维持国际竞争力，并主动通过政策同化和吸收新移民。但在个人层面，再宏观的经济好处都敌不过家园逐渐陌生的日常生活体验啊。

参考文献

- Liu, H. (2014). Beyond co-ethnicity: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tiating and integrating new immigrants in Singapo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7(7), 1225–1238.

“新加坡模式”究竟是什么？它可以被借鉴吗？

和战后西方主流思想对“制度”的近乎迷信不同，李光耀认为任何政治制度的运转和维持，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本身，更依赖于制度当中的人。他的见解指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不足之处：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虽然可以提供有效的问责机制，却无法保证选拔出优秀的政府或领导人。

◎ 刘含章

作为新加坡国父、战后一代的亚洲政治强人，李光耀在担任总理的 26 年里将新加坡从一个资源贫瘠的后殖民港口迅速打造成为高度富裕的国际化都市。快速的经济腾飞和独特的政治体制，让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令人瞩目，也因此被打上了“新加坡模式”的标签。

究竟什么是“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如何形成？“新加坡模式”是否可以被借鉴，它背后都有哪些考量？想要回答这些

问题，我们必须走近李光耀，了解这位新加坡开国之父的政治和经济主张。

出版于 2000 年的李光耀回忆录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讲述了新加坡 1965 年独立之后，李光耀和他的同僚们如何面对困境，为这个热带岛国谋求发展的经历。无论是应对国内或国际问题，李光耀都展现出过人的政治敏锐与高瞻远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位资深政治家在表达观点时的明晰、自信和坦诚。在“新加坡模式”已成为一个热搜关键词的今天，我们通过重读这本书，梳理李光耀主政期间的思想脉络。

经济发展战略：如何克服独特劣势

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顾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历程，我们很容易将它与其他三条亚洲小龙（韩国、台湾和香港）笼统地混为一谈，或简单地把它归类成“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参考 Wade 发表于 1990 年的论文）的成功案例。的确，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战略，既有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外向型特征，也有“发展型国家”政府高度主导和干预的烙印。

但是，这些与亚洲其它经济体的相似之处，让人容易忽略新

新加坡独立初期所面临独特困难和挑战。在《从》一书中，李光耀指出新加坡与亚洲其它经济体根本上的两点异同：一是自然资源匮乏，二是没有国内市场（如韩国和台湾）或内陆腹地（如香港）。前者造成了发展本地工业的困难，后者则意味着产品的基本销路没有保障。加上和马来西亚政治联姻失败导致双边关系紧张，以及印度尼西亚国内政局动荡，更加剧了新加坡在区域内的生存困境。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独立初期面对的最大挑战，并非快速发展经济，而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持续的高失业率不仅意味着经济停滞，更带来社会不稳定和潜在的政治动乱。李光耀比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更早意识到，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不仅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就业，更需要从发达国家引入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创造新加坡的比较优势。因此，新加坡跳过传统制造业（如纺织、玩具制造等），直接瞄准欧美跨国公司，吸引包括电子制造和光学仪器在内的高科技、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新加坡设立工厂。

经过反复思考和试错，李光耀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战略总结为两点。

第一，绕过东南亚，化地缘劣势为优势。这个想法来自于以色列经验的启发。和当时的新加坡一样，以色列在建国初期也面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意，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十分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干脆绕过邻国，与欧美国家做起了生意。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可以效法以色列，直接与发达国家成为贸易伙伴。这不仅解决新加坡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更带来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帮助新加坡提升生产力。

第二，把新加坡变成第三世界地区的第一世界绿洲，成为发达国家在东南亚地区落脚和中转的营地，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意味着新加坡必须超越邻国，提供一流的服务。

不难看出，这两条发展战略的落脚点和前提，都是高质量的劳动力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可以说，人力资本和社会稳定，贯穿了李光耀的主政思想。他对人力资本高度重视，认为只要通过充分的培训、适当的激励和必要的纪律，就能有效开发人的潜能，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为吸引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建立工厂，新加坡政府出资设立培训中心，帮助外资训练合格高效的工人。

保证新加坡社会稳定，是另一个李光耀高度关心的议题。独立初期的新加坡，不同种族仍各自聚居。为加强民族和谐，创造

并强化国民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李光耀通过政府组屋计划（详见下文），按比例把不同种族的住户分配在每一个住宅区，打破原先的社区格局。为创造和平稳定的劳资关系，他不惜采取高压手段，迫使工会让步并停止一切罢工运动。用他的话说，“为了生存，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指导原则，那就是新加坡（的劳动力）必须比区域内其它邻国更坚固耐久，更组织严明，更有效率。”

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在社会公正的议题上，李光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选择以增加财富而非补贴消费的方式进行再分配。”与西方国家盛行的“收入再分配”不同，李光耀主张适度的“财富再分配”。在他看来，这两者间是授之以“鱼”和“渔”的区别。收入再分配影响个人购买力，虽然可以改善当期的民生状况，对国民未来个人发展的影响却很有限，还会对企业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相比之下，财富再分配不但能改善大部分人的收益能力，更将他们的未来收益与新加坡的生存和稳定紧密挂钩，对他们进行有效吸纳，变成“体制内”的一员。用李光耀自己的话说，“我最关心的是让每一个公民的命运都和这个国家及它的未来休戚相关。”

最能体现财富再分别的一项基本国策，是让新加坡成为一个“全民拥屋”的社会。李光耀认为，政府不仅应该帮助国民居有定所，更应做到“居者有其屋”。和廉价的政府出租房相比，提供平价的私有住房更能稳定社会，收买民心。在独立之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大力开发政府组屋供普通人购买。政府一方面提供强大的财政支持，同时也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包括降低利率、延长还款年限、及允许使用公积金支付首期房款。据新加坡统计署的数据显示，新加坡的房屋拥有率从1980年的58.8%增长至2014年的90.3%，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香港（同期50.6%）。其它财富再分配政策还包括面向国民低价出售国有上市企业股票，并以发放红利股的方式鼓励长期持有。

与大力推行财富适度再分配的政策相比，李光耀对收入再分配的福利社会持不赞同态度。他认为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应由个人承担，不仅因为福利社会政策增加政府开支、相应高税收不利于吸引投资，而且因为这些政策会削弱人们工作的积极性，降低社会生产力水平。因此，新加坡公民的医疗服务与年金基本由个人公积金账户支付，社会或代际间的共享与分摊程度非常低。李光耀主政期间，除1985—1987年经济衰退时期外，政府预算连年

结余，政府开支始终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 20% 左右，远低于 G7 国家同期的 33%。

从政治学的角度解读，适度财富再分配是十分高明的制度设计。关于政权动态的经典模型（Acemoglu & Robinson, 2001; Boix, 2003）把一个社会抽象地分为两个阶级：拥有财富或生产资料的精英和没有财富的普通工人，两个阶级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上。如果不能达成令工人阶级满意的再分配安排，他们就会进行革命，并在此过程中破坏生产资料，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流失。通过适度的财富再分配，李光耀让新加坡的普通人也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不仅能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更使他们有激励和动力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

适度财富再分配的制度安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李光耀对不同范畴权自由的理解。例如，他声称房产所有权可以帮助培养公民自豪感，并为军人和军属保卫国家提供一个恰当充分的理由。这样的描述，似乎有以经济权利替代公民自由的嫌疑，并回避了发展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的问题。阿马蒂亚·森在 1999 年的文章中曾总结说，发展即扩展人们实质自由的过程。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是否还满足于以自由换发展，或是会要求更

多自由与权利？近年来新加坡政治局势的变迁似乎更指向了后者。

精英政治的崇高地位

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经济发展，李光耀的思想中都流露出浓厚的“人治”情怀。这首先体现在他对精英政治的信心和依赖。他反复强调，新加坡和人民行动党（PAP）成功的关键，是选拔优秀人才并委以重任。从回忆录的讲述中可以看出，每当危机或挑战出现时，李光耀似乎总能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人选。为保证政府和执政党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给，新加坡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府奖学金机制，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送他们进国内外一流大学深造，之后进入政府各个部门供职。

另一个依赖精英的例子，是李光耀在新加坡独立后废除了英联邦原有的陪审团制度。相比起陪审团参差不齐的判断能力，李光耀相信法官的专业知识和使命感能够更好的维护法律的公正。

然而，在精英政治的背后，是李光耀对制度的信心匮乏。在谈到新加坡的选举政治时，他一方面承认年轻选民需要反对党在议会制衡 PAP，另一方面又忧虑这种需求会导致“不合格的人”当选。显然，李光耀认为从政者有优劣之分，而选民并不总能做出

“正确”的判断。这反映出他对代议制度的理解，并非由议员传达多数选民的意见，而是通过选举让选民把政策制定大权全盘托付给议员。正因如此，他担心草根出身的反对党议员没有足够的资质或使命感履行相应职责。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生态是否会持续不变，李光耀在 2000 年的判断就已经是否定的。他意识到科技的进步和年轻一代的思想文化都将重塑新加坡未来政治走向；而 PAP 是否能继续一党独大，则取决于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魄力。不难看出，李光耀思考新加坡政治的出发点仍是“人治”，对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认识显得不足。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新加坡 2009 年首次出现经济负增长，尽管 2010 年经济反弹强劲（15.2%），由金融危机带来或加剧的社会矛盾，依然使 PAP 在 2011 年的大选中遭遇史无前例的挑战。选举结果，PAP 仅赢得 60.1% 的选票，并首次在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失利。时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在大选之后宣布将不出任新内阁的任何职务，结束了他长达 52 年的内阁生涯。

多少有些讽刺的是，李光耀“重人治”的政治作风，很可能

使延续他的政治遗产变得更加困难。他主政期间取得的发展成就和政治胜利，有赖于上一代人对生活改善和社会稳定的强烈渴望。随着社会和经济环境的改变，新一代年轻人对生活的期待和对政治的理解与父辈截然不同。他们的诉求将逐渐淡化李光耀留下的印记。

解读李光耀的政治思想

如何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定位李光耀是件非常难的事情。一方面，他反对福利社会，打压工会组织，与西方保守主义十分接近。另一方面，新加坡被戏称为“保姆国家”，政府不但高调参与和引导经济活动，更是从禁口香糖到优生优育，高度干预公民的私人生活。除此之外，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政治参与和媒体管控，都是西方国家批评和非议的对象。

李光耀对代议政府的理解，与当代西方主流观点是不同的。他强调代议制中政治精英扮演的角色，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 Edmund Burke 的观点不约而同。Burke 在 1826 年的书中提出，议员在代议政府中的职责不是简单机械地传达选民诉求，而是运

用他自己“公正的意见、成熟的判断和开明的良知”，为选民谋求最大福利。相应地，由精英组成的政府应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智识和洞察力。

新加坡的发展轨迹与保守派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关于国家发展的经典论述相吻合。亨廷顿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维持政治秩序是十分艰巨但非常必要的。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社会和政治的自由化，不仅难以达成民主化，更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和政治体制的崩溃。亨廷顿的学生、美国记者 Fareed Zakaria 在此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为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做出规划，建议先在威权之下发展经济，再进行“威权转型”。

又或许，试图用西方意识形态体系去理解和定义李光耀的政治，是不恰当的。上世纪 90 年代，李光耀卸任总理一职之后，发起并参与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李光耀不同意“民主是人类共同最终命运”（福山 1990 年所言）的说法，对西方自由主义推崇的个人主义至上亦不能认同。作为“亚洲价值观”的代言人和捍卫者，他认为亚洲社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亚洲价值观”的独特元素，譬如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集体

主义、以及精英治国的传统，不仅解释了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更为新加坡的“软性威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

李光耀对世界价值观一元化的批评和挑战，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也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西方媒体质疑李光耀对“亚洲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认为他不过是工具性地借用所谓文化论点，为自己推行的各种政策辩护。毕竟，李光耀生长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从小接受正统西方教育，直到30岁才因政治需要开始学习中文（参见 Zakaria 发表于 1994 年的文章）。例如，在回忆录中，李光耀反复强调亚洲文化对“自力更生”的推崇，因此政府不必要也不应该过多提供国民福利。更有力的反驳来自其他亚洲国家领导人。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 1994 年对李光耀的回应中，承认亚洲国家有独特的文化传统，但这些文化的独特性与民主制度并不冲突。亚洲国家需要探索的，是如何在独特的文化背景下保证民主制度的运行。

在李光耀的主政思想中，最具“亚洲价值观”或儒家文化特点的，莫过于他对人力资本的强调。这体现在他对提高工人质量的重视，对全民教育的强调，以及对精英主政的坚持。和战后西方

主流思想对“制度”的近乎迷信不同，李光耀认为任何政治制度的运转和维持，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本身，更依赖于制度当中的人——他们的才智以及使命感。因此，设计一套有效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机制，是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可以说，李光耀的见解指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不足之处：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虽然可以提供有效的问责机制，却无法保证选拔出优秀的政府或领导人（参见 Besley 2006 年的著作）。李光耀对人才的重视，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加坡强大的国家能力（参见福山 2014 年的著作）。

结语

新加坡正式进入后李光耀时代。根据新加坡宪法规定，下一次大选将在明年年底之前举行。新加坡的政治局势将如何变迁，又会对她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笔者不敢大胆臆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如何发展，都不会影响和泯灭李光耀对这个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新加坡成功的发展经验和独特的政治体制，与其说挑战了西

方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想，不如说为当今学术和政策界对许多重要议题上思考，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启发。

参考文献

- Lee, K. Y. (2000).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 1965–2000*. Harper Hollins Publishers.
- 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2001).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8–963.
- Besley, T. (2006). *Principled Agen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od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ix, C. (2003).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E. (1826).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Boston: Wells and Lilly.
-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ess.
- Fukuyama, F. (2014).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Jung, K. D. (1994). Is culture destiny? The myth of Asia's anti-democratic values. *Foreign Affairs*, 189–194.
-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Zakaria, F. (1994). Culture is destiny: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109–126.

“后李光耀时代” 新加坡的支撑点和大选格局

时至今日，他仍然像一个巨人一样，新加坡人活在他的阴影中。不管人们持怎样的态度，他都会在长久的时间里影响新加坡人的话语、行为和未来。

◎ 马亮

判断一家书店是不是位于新加坡，其实很简单。走到书店的橱窗，或者步入书店的门厅，赫然映入眼帘的一排书，如果清一色是李光耀的面孔，那么毫无疑问，你是站在新加坡的书店里。

作为这个东南亚热带岛国的缔造者，建国之父李光耀的思想在新加坡深入人心，从书店的布局就可见一斑。去年本地畅销的一本书，就是李慧敏的《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看书名就让你意识到，李光耀代表着新加坡，新加坡就像是李光耀的。

毋庸置疑，政治强人李光耀为新加坡留下了许多最关键的政治遗产。时至今日，他仍然像一个巨人一样，新加坡人活在他的阴影中。不管人们持怎样的态度，他都会在长久的时间里影响新加坡人的话语、行为和未来。

有“后李光耀时代”吗？

也正因为如此，李光耀去世的消息对新加坡而言影响巨大。国际媒体和政界也十分关心——上个月，英国《金融时报》不失时机地刊出了戴维·皮林的《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不吝铺陈新加坡可能面临的种种困境。

但是，经过了建国 50 年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特别是在李光耀于 1990 年卸下总理职位的最近 25 年来，李光耀实际上在日益淡出普通新加坡人的生活和视界。

新加坡的华文报纸《联合早报》，甚至在 2011 年李光耀退出内阁之际，就刊发社论《后李光耀时代的开始》，认为“今天就是新加坡谱写全新政治历史的重要起点”。

不错，他仍然担任所在选区的议员，仍然作为资政提供决策意见，仍然被媒体和学者追捧与热议。但是，新加坡过去 20 多年

的平稳发展已经证明，“后李光耀时代”可能是个并不存在的伪命题。

政见观察员认为，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可能不会像一些观察者所预测的那样危言耸听，但也不会像某些乐观者所期许的那样美妙绝伦。

国民心中的李光耀

由于问题较为敏感，有关李光耀的本地民意调查并不多。不过，大多数新加坡人对他的态度，以感恩、尊敬与认同居多。当然，私底下骂李光耀的新加坡人也不在少数。特别是一些底层的低收入者和“夹心层”的工薪阶层，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往往更有怨言。

新加坡人对李光耀的态度，可以说是“爱恨交织”。禁酒、禁烟、限车、无处不在的罚款、强制公积金制度，这些不自由乃至被人视之不人道的政策，饱受国民和外国人的诟病。

相对来说，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对李光耀的认同感可能更高一些。在这里，至少你有了切实的参政议政权利。

强人政治会给一个国家打下深刻的个人烙印，并成为维系这个国家声望和前景的灵魂。于是，关于新加坡“改朝换代”或“变

天”的忧虑和争论，一度甚嚣尘上。

尽管强势领导人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很大，但他们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制度建设和文化塑造。“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或许会出现短暂的闹腾，但很快就将复归平静。

未来新加坡的信心点

对新加坡未来的信心，可以从以下方面找到支撑点。

与李光耀当年建立国家时不同，如今的新加坡以发展国家为首要任务。建国时的新加坡可谓“四面楚歌”，周边国家虎视眈眈，弹丸之地缺水少矿，执政者面对的是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只有通过高压政策和强力制度，才能将国民“拧成一股绳”，共同渡过初创期的难关。

经历了高速增长和巨大转型的新加坡，在经济、科技、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已然渡过了最艰难和最险峻的时期。在社会步入良序发展的阶段，许多原本出于自保和防卫的政策开始松动。

一些人将政府推动的公积金、健保计划等政策改革，视为执政党“讨好”选民的“糖果”。但是，财力充沛、经济平稳且货币稳健的新加坡，完全有能力作出这些政治承诺。

李光耀的宝贵遗产，就在于逐渐淡化人治色彩，而不断强化法治立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树立法律和规则的威严，以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我们在关注新加坡的政治时，实际上忽略了它至关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其官僚制的牢固稳定和高效运转。新加坡的总理和部长等高级政府官员们，大可以“走马灯”地调换。实际上，许多资深议员的确都在其政治生涯中，次第担任多个部门的部长。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个固若金汤的公务员制度，却可以有效保障官僚体制的运转，以及各项公共政策的接续。

我们不必担心李光耀的离去，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它独特而有力的社会文化。经过两至三代移民后的新生代国民，根深蒂固地有着强烈的新加坡人意识。他们会抱怨和投诉公共服务问题，但却少有人会选择行贿和涉腐。他们讲夹杂着华文和马来语的新加坡英语（Singlish），见人彬彬有礼又敬而远之。国民意识的塑造和不断强化，锻造了新加坡人的强烈的身份认同感，是这个国家可以屹立不倒的关键支柱。

如果当年的李光耀还会担忧，新加坡人会“大难来临各自散”的话，那么如今人们大可不必对此担忧了。新加坡人乐于服兵役，

并会为捍卫自己的国家挺身而出。当这道密实的心理国境线树立起来以后，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就不是一个值得过分担忧的问题了。

新加坡大选格局

两年前的榜鹅东区补选，人民行动党折戟，让许多人对其继续执政感到担忧。一些人开始讨论“两党制”和“多党制”的优劣，潜在地认为某个在野党可能会壮大，并对执政党形成有威胁的挑战。

李光耀离去的讯息，之所以牵动人心，还同下一届选举迫在眉睫密不可分。按照选举法的规定，李显龙要在 2017 年前选择一个时间进行大选。建国 50 年的大规模纪念，为其选举助力良多。但李光耀的离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民心。

由于选区划分规则、少数党的苛刻组阁要求、强制投票等制度设计，使“一党独大”往往成为新加坡政治的必然结果。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行动党的得票比例，往往远低于其国会所占议席的比例。

为了赢得大选，政绩不俗的李显龙仍然可以再任一届，以择机培养和推出合适的接班人。可以预见的是，下一届大选仍然会是人民行动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并牢牢控制国会的多数议席。

但是，在李显龙以后，会由谁来代言人民行动党？这至今仍然是一个让人难以评判的问题。当强人政治的色彩日渐褪去时，平稳过渡后产生的新时代政治领导人，看似显得娇嫩和平凡，但却恰恰证明了一个成熟政体所应具备的特征，那就是它对某个政治领导人的依赖在弱化，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需要承认的是，当前的新加坡社会，的确面临许多亟待破解的经济社会问题。对外劳的过度依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乏力，不断影响其经济发展的长期预期。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相叠加，使本国人口结构难堪改良。多种族和谐政策较为稳健，但风险和隐患仍不可小觑。但是，作为一个业已步入“第一世界”行列的发达国家，这些问题并不会“伤筋动骨”，不会影响新加坡的政权稳定。

也许李光耀离去后，新加坡的书店仍将会大做特做他的生意。我们仍旧可以一打眼，就辨认出我们是不是置身于新加坡的书店。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李光耀会永远活在爱他、恨他或对他已麻木的新加坡人的心中，恰如新加坡永远都是李光耀深感忧虑并难以割舍的心田。

政见圆桌

政见圆桌，欢迎提问。

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关于李光耀的问答。

关于李光耀的诸多疑问，政见为你一一解答

李光耀是如何在政坛起步的？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契机？李光耀影响了很多
人，谁又是最影响李光耀的人？政见观察员为你一一解答。

一、关于李光耀个人

戴小川：李光耀是如何在政坛起步的？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契机？
李光耀影响了很多人，谁又是最影响李光耀的人？

刘含章 / 政见观察员

李光耀从政的动机与二十世纪中叶新加坡的命运是分不开的。二战时期，原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遭日本占领（1942—1945）。日本投降后，英国虽重新接管新加坡，但威信大不如前。李光耀

深受战后民族独立运动思潮的影响，当时尚在英国求学的他就打定主意毕业后回国从政。1950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从事律师工作，代表本土工会与当时的政府谈判，赢得了很高的个人声誉，也为日后从政奠定了群众基础。

1954年底，李光耀联合其他从英国回新的受英语教育的中产阶级华人，以及受华文教育的左翼和工会领袖，创立了人民行动党（PAP）并出任秘书长。PAP作为新生政治力量参加了1955年新加坡首次选举，并成为第三大党。选举产生的温和左翼执政党劳工阵线上任后施政不利，党内矛盾不断。待1959年新加坡获得完全自治并举行第一次全国大选时，劳工阵线已四分五裂，失去竞争力。PAP抓住机会，一举拿下议会51个席位中的43个，上台执政，李光耀出任内阁首相。

值得注意的是，创建初期的PAP有两股组成力量：以李光耀为代表的在英国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是独立运动中的温和派或右翼），和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工人和底层民众（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是独立运动中的激进派或左翼）。这样广泛的群众基础使PAP可以在1959年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然而，PAP上台之后，党内左右两派的政治分歧

日益尖锐。以林清祥为首的左派于 1961 年退出政府和 PAP，另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成为左派反对党。借着冷战的环球政治局势和与马来西亚合并的政治需要，新加坡政府 1963 年展开“冷藏行动”，一举逮捕包括林清祥在内的 100 多名社会主义人士，扫清了国内左翼势力，巩固了 PAP 的政治地位。

陳鍋一荀：李的政敌有哪些？

刘冬舒 / 政见观察员

李光耀的政敌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是 1963—1965 年新马合并期间来自吉隆坡的政敌，包括以当时的马来西亚首相东姑为代表的马来族政治家。他们对新马合并的国家究竟应该“以马来人为主”还是“各民族平等”存在分歧。第二类是共产党、左派和华语文化支持者，例如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领袖林清祥、谢太宝和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他们主要是在左翼活动和华语政策方面与李光耀存在分歧。第三类是新加坡国内的政治反对势力，典型例子是新加坡主要反对党新加坡工人党的领袖诸如惹耶勒南和近期的邓洪亮等人。

需要指出的是，李光耀在新加坡国内的政敌大多没有对他形成实质的挑战，主要因为李光耀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严厉打压。谢太宝及林清祥等左派领袖曾被长期监禁而不予正式起诉。陈六使则被直接吊销公民权。邓洪亮和惹耶勒南等政敌也被李光耀通过打官司索取巨额赔偿金的方式逐出政坛，甚至被迫流亡海外。可以说，李光耀对待政敌的态度是一贯严苛而残酷的，这也为他招来了海内外的诸多批评。

纯洁而且善良的韩良宇：请教李光耀家族对于新加坡各行业的掌控。

刘冬舒 / 政见观察员

李光耀家族对新加坡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淡马锡投资公司”来完成的。这是一家由新加坡财政部 100% 控股的投资公司，成立于 1974 年。该公司从未公布过财报，具体财务情况相当神秘。淡马锡控股了新加坡大量重要企业，例如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海皇航运、新加坡电力、吉宝集团和莱佛士饭店，其控股企业占新加坡股市市值近一半。可以说，淡马锡虽然没有完全控制新加坡的所有行业，但其在重要

行业的控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淡马锡公司目前的首席执行官是何晶，即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事实上，由于李光耀家族之前对新加坡政府的控制力以及淡马锡由财政部控股的事实，李家在该公司的影响力一直是十分明显的。此外，新加坡另有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控制新加坡主权基金的海外投资。李光耀生前一直亲自担任该公司董事长。

二、李光耀与中国

丘亦山：李光耀去中华化，是对中华传统失望，还是处于生存的现实考虑？

刘冬舒 / 政见观察员

李光耀的“去中国化”主要表现在语言方面，而李光耀本人选择的语言政策——即以英语为新加坡第一语言——很大程度是出于对现实的考虑。在他关于新加坡双语政策的著作中，李光耀列举了他制定语言政策的三大动机。首先，他认为英语不是任何一个新加坡主要民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的母语，因此

使用英语可以创造全新的、统一的国家认同，利于新加坡的统一和稳定。实际上，李光耀在上世纪 80 年代也在华人群体内发起推广国语而摒弃各地方言的运动，其着眼点同样在确保华人群体的团结和稳定。第二，李光耀认为使用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利于新加坡人与世界交流，而融入世界是新加坡发展的唯一可行之道。第三，新加坡独立之初的华文学校和南洋大学有大量的左派和共产主义者活动，而这些华文学校成了他们与中国沟通的渠道。出于反共和防止中国渗透的政治目的，李光耀关闭了大量的华语学校和南洋大学，这也导致了新加坡华语和中华文化的衰落。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李光耀开始重新提倡华语和中华文化。这更多的也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不过，新加坡的华语政策目前仍然明确地将华语定位为第二语言。

罗小罗：李光耀对华政策是怎样的？

杨天兆 / 政见观察员

总体上，李光耀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既非朋友，也不是敌人”。在毛时代，由于李光耀在国内打压通过各种渠道支持中国的

亲中人士、马来亚共产党和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加上彼时中国封闭自守，新加坡和中国都将对方视作威胁。改革开放以来，中新关系在经济层面上一直向好。经过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国自然和李光耀的发展理论不谋而合，这也使得新加坡在华投资不断增长。人均 GDP 超过香港的苏州工业园（副省级），不拘一格专注高科技产业的广州知识城都是新加坡政府来华投资的典范。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由于新加坡一贯善于在大国间博弈，中国崛起 – 尤其是近年大陆在南海领土争议中逐渐强硬的态度 – 使得李光耀不支持美国重返亚太。作为一个威权政治下的华人政治家，李光耀终归会和中国模式在意识形态上有着难解的联系。让我们别忘了那些年有多少中国官员在新加坡接受培训。与此同时，在具体政策上，对华和对其他大国一样，最终都是为了新加坡在马六甲隘口的地缘政治中生存，没有什么是不能变的。

马亮 / 政见观察员

说起中国官员在新加坡的培训，我所在的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的“市长班”是主要渠道，当然还有高级培训课程。南大“市长班”目前已培养了 1300 多名中国政府官员，至今已有 1 万 3 多

名官员到南大接受短期培训 *。此外，苏州工业园在 1994 年以来，几乎将所有相关人员轮训多次。当然，如果加上国大和其他民间机构和企业的培训，这个数字可能翻番。国家外专局仅审批公务员培训，实际上中国很多企业也选派人员培训，因此准确数字很难说。但可以说，在中国以外，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得上新加坡在培训中国官员方面的规模和影响。

三、李光耀的政策

咸云野鹤：说到新加坡就会和“威权主义”相联系，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是不是“威权主义”？中国如果移植新加坡模式有哪些益处？又会有哪些不足？

邵立 / 政见观察员

新加坡是威权主义。威权主义是一个比较含糊的“余数”（residual）概念，即它指代一些没有明确特征的政体的总和。

* <http://www.ncpa.ntu.edu.sg/Chi/AboutUs/Pages/AboutNCPA.aspx>

从两分法的角度说，所有非自由民主政体都属于广义上的威权主义，而自由民主政体的最低要求是民主选举具有普及性和竞争性，过程要公正，没有大规模舞弊。新加坡虽然有选举，但选举缺乏真正的竞争，而且还有在选票上印编号这种破坏投票保密性的制度，所以不能达到自由民主制度的要求。

另外一种流行的分法是将非自由民主政体进行细分。例如林兹和斯蒂潘将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和苏丹化主义区别开来。实质上将威权主义看作是一类相对接近自由民主制度的温和专制政体的标签。这种政体允许一定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公民社会。

无论从哪个分类出发，新加坡都应该属于威权主义范畴。新加坡的特点在于经济权利的自由化和政治权利的不自由。中国某种程度上早已在“移植”这一理念。

李光耀在新加坡缔造的威权主义政体并不符合自由民主的西方价值观，却为何能受到西方媒体、领导人广泛的溢美之词？

刘冬舒 / 政见观察员

事实上，李光耀并没有受到西方媒体和舆论的广泛赞誉。西

方媒体多有批评李光耀和他对新加坡的“不民主”统治。李光耀本人对西方媒体的批评也是不以为然并经常予以还击，常用手段包括起诉媒体诽谤并索取巨额罚金，或削减其在新加坡的发行配额。《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亚洲周刊》、彭博新闻社等国际媒体都因批评李光耀而受到打压。当然，李光耀在治国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他的成就受到赞誉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至于西方政要，称赞李光耀的原因则更为复杂。首先，这种赞誉很可能出于外交和国际礼仪的考虑。其次，政治家们大多更可能赞同李光耀的现实主义和实用政治，因此对其治国理念颇多赞扬。最后，李光耀在国际政治局势和地缘政治方面有着独到且深刻的洞察力，这种能力也会使得许多与他打交道的外国政要深受启发而赞不绝口，例如昨日发表悼文赞美李光耀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四、关于新加坡

新加坡为什么没能像台湾、韩国一样走上民主化道路？后李

光耀时期新加坡是否能继续维持威权政体？

邵立 / 政见观察员

学界对于“民主化为何会发生”并不存在一致看法。有一派理论认为，民主化的启动完全是偶然的。例如，韩国的民主化和全斗焕、奥运会的举办有关；台湾民主化则和蒋经国、李登辉的个人选择有关。另一派理论则认为民主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平等程度、文化、威权制度本身特点甚至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等因素有关。

对于后一派理论来说，新加坡保持威权主义的可能原因有：

1. 社会不平等，统治精英忌惮民主化带来的经济损失。新加坡2013年基尼系数达46.3，而台湾是34.2（2011），韩国是31.1（2011）。
2. 一党型威权制度让人民行动党深入基层，统治基础深厚。
3. 经济和政治上不受西方国家牵制，贸易伙伴中马来西亚、中国大陆、香港和印尼占大头。美国由于忌惮中国，也不太敢得罪新加坡。

后李光耀时代可能导致新加坡民主化的因素有：

1. 经济发展水平高，人们早已进入“后物质主义”时代，着重于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对民主的需求更加迫切；
2. 在后李光耀、甚至后李显龙时代，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克里斯马光环会逐渐消失，统治精英之间谁也不服谁，政治竞争不可避免。

民主化很可能脱胎于这种竞争。

对比来看，人民行动党很可能就是民主化与否的关键。如果人民行动党主要靠李家的权威来维持，那么在李家权威退散之后，它就很可能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如果出现与李光耀相似的强势领导人，或者党内领导层能长久保持一致共识，那么新加坡目前制度还是有可能继续保持稳定。不过保持这两个条件的可能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

无论如何，如果新加坡一旦启动民主化，它将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不太会重蹈乌克兰和埃及的覆辙。原因是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很高，行政官僚系统治理能力强，民众受教育程度高，也早已存在民主制度机构（议会、选举）等给民众“练习”的机会。政治竞争则很有可能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式进行，这也就是民主制度能够延续的关键。

王君荣、@龙龙、@Herbert：李光耀执政新加坡时期，新加坡的国情怎样？是殖民地嘛？新加坡执政党是什么？李推行了什么政策使得新加坡发生巨大变化？新加坡建国历史阶段。李为什么能够执政31年之久？李的接班人是其后代，新加坡会否家族政治？李光耀滴性格是什么样滴？新加坡第一语种是什么？

刘冬舒 / 政见观察员

这些问题归类后的结果，因为时间限制无法一一作答。

李光耀初入政坛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自治殖民地。1963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合并，李光耀继续担任新加坡州的“总理”。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开除出联邦，李光耀开始担任新加坡建国总理。新加坡的执政党一直是李光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新加坡成功的政策原因较为复杂，简单来说包括威权统治下建立廉洁且高效的政府、融入国际市场、吸引外商投资、拓展金融行业等。为了实现这些政策目标，李光耀也推行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来保证新加坡的高效、稳定、廉洁、开放及金融、服务业的高质量。

李光耀得以长时间执政，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建国总理的他在新加坡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威望以及巨大的执政成就，另一方面也

源于他对政敌的无情打压。不过，李家的家族政治目前看来较难维系。李显龙日前也被查出患有癌症，可能需要提前退休，而且目前李家第三代尚没有合适人选接班。所以，目前新加坡的家族政治乃至现有统治制度得以延续的前景相当不乐观。

李光耀本人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结合逝世后众多回忆他的文章所见，李光耀应该是一个性格坚强、沉稳、坚韧、有魄力但也冷酷、无情、决绝的人，应该算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强人。例如，李光耀在面对新加坡航空员工发起按章工作抗议行动时直接公开表示，新航员工“要么立刻停止工业行动”，要么他将会尽一切可能狠狠教训这些员工。这种强硬而又直接的言论在李光耀政治生涯中比比皆是。

新加坡的第一语言是英语。然而考虑到周围马来族国家环绕的现实，新加坡理论上的“国语”是马来语。其他主要语言包括华语（华人）及泰米尔语（印度裔）。

智库那些事

2014 年智库排名揭晓，“智库那些事”
继续带您第一时间关注。

2014 全球智库排行榜发布，中国智库缺什么？

2014 年全球智库报告刚刚放榜，中国智库数量排名第二，但质量乏善可陈。

中国智库缺了什么？如何成为一家好智库？全球智库发展趋势如何？这份报告都提供了回答。

◎ 武卓韵 ◎ 归宿 ◎ 方可成 ◎ 张跃然

全球智库报告又发榜了。2015 年 1 月 22 日，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发布了《2014 年全球智库报告》。这已经是此项目连续第八年给全球智库排座次了。在这份刚刚出炉的报告中，有哪些内容值得特别关注？请看政见团队为您总结的亮点——^{tǔ cáo}

1、全球智库日子不好过

近来，智库在中国是一大热门，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

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写入决议，这似乎标志着中国智库的春天就要到来。但是放眼全球，智库增加的速度却有放缓的迹象。

这份报告着重指出，近些年来，政府对于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监管与日俱增，但是慷慨的资助者却越来越少；背靠政府的有官方背景的智库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建立短期的研究项目而非长期的智库机构。

智库不仅要面对同行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就连专业咨询公司甚至律所都要在这个市场当中分一杯羹。

再加上近些年互联网、新媒体、社交网络甚至云计算都对智库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而部分智库完成自身使命后的光荣退休，也导致了智库增速放缓。

2、中国智库：数量很多，顶尖的少

毫无意外，美国依然是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但很多人猜不到的是，全球智库数量第二多的国家竟然是……中国！

根据报告，美国以 1830 家智库的成绩遥遥领先，中国以 429 家智库的成绩屈居第二。

但是，数量不代表质量——在美国之外的智库排行 Top 100

中，中国仅有六家智库上榜。它们分别是（括号内为排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16），中国社会科学院（28），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3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62），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64）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94）。

3、好智库的秘密

如何做好一家智库？从这份智库排行的评价标准中，似乎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虽然有些评价标准看不见摸不着，有些虚头巴脑，比如智库首脑的组织领导能力、智库雇员的整体素质、研究报告的质量、智库的独立性等等。但也有些指标可被量化，从而为智库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发挥聪明才智、提升自己智库的排名提供“窍门”：比如智库中“顶尖学者”（如曾于大学任教的学者或受过正式学术训练的博士毕业生）的数量、研究成果在学术期刊的发表情况和引用次数、是否使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积极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网站的更新频率和维护状况、（以及最要命的）资金来源的多少和研究成果是否让金主满意。

除此之外，多条评价标准和智库在政策界的口碑、关系网、

影响力密切相关，而这就并非是大多数中国智库本身能控制得了的了。

4、中国智库缺什么？

分析榜单可以发现，中国智库缺的真的不少。

首先，在全球智库专业化、专门化的趋势下，中国的智库多体型庞大，在许多细分研究领域的表现乏善可陈。通过榜单可以发现，在国际关系、国防安全、经济政策这些传统意义上智库的重点关注领域，中国智库的排名都不太高，仅有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国际关系榜单上进入了前十。而在更为细分和新兴的国际卫生政策、国际环境政策等国际发展和治理领域，中国智库的表现也更不尽如人意。而在科技智库方面，中国官方主要智库更无一上榜，也反映了当前此领域中国智库建设的重大缺失。

其次，中国智库普遍对于媒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不太感冒，公众参与程度也不是很高。在最佳利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两个跟互联网有关的榜单上，没有出现中国智库的身影。这也与我们平时观察的印象一致：大部分中国智库，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智库，网站在设计和功能等方面都乏善可陈，与欧美主要智库差距很大。

同时，欧美主要智库的研究员也大多开设了 Twitter、Facebook 账号，与公众互动频繁。反观中国智库研究员，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的并不是很多，即便有些开设了，也多属于个人行为，并没有得到所在智库的支持和推广。

中国智库在利用媒体和公众参与榜单上也交了白卷，则意味着中国智库更多还是小圈子、象牙塔里的游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国智库的运行模式乃至中国的政策决策机制有一定关系。一方面，中国智库大多数还属于政府、大学的附属，主要任务是向上级提供研究产品，自身主动向公众推广、宣传政策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策决策机制中，内参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不少智库乐于当“帝师”，主要精力也放在写内参，找上层关系渠道上，甚至有智库将能把材料送进中南海，得到领导人批示作为最高目标。这与欧美智库向社会公开发布政策研究报告和建议，通过引导舆论最终达到影响政策制订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中国智库的创新能力不足。在“最具创新政策建议”这一榜单上，我们没能够发现中国智库的身影。而布鲁金斯学会、CSIS、卡内基基金会、彼得森研究所等欧美主要智库都榜上有名。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智库重形势和政策阐述，轻分析预测有关。更有甚者，有些智库和研究员已经沦为现行政策的“吹鼓手”，无论是发表文章还是参加会议，观点都与当前政策“高度一致”，这其实也已经丧失了作为智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中国智库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依然欠缺。在对公共政策最有影响力的智库榜单上，我们只看到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位列第 57，而众多大型的智库则无缘这一榜单。在当前中国智库存在诸多问题的背景下，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智库“大而不强”也是各方普遍共识。可喜的是，中国官方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中办、国办于近期发文，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一些体制内的学者，也已开始进行建设民间智库和学术共同体建设的积极尝试。总之，中国智库建设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新起点，未来发展依然值得关注和期待。

5、全球智库发展趋势

这一年全球智库的运营模式和工作状态中，呈现了那些智库发展的长期趋势？

有些趋势并不让人惊讶，比如越发全球化，对于独立的数据

和分析有更多的需求，大数据和超级计算机的应用。

也有一些趋势颇为引人深思，如智库本身的民主化（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上），有关政府决策的辩论更加公开，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以及对全球“黑客文化”、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情绪的迎合。

报告提出的未来智库发展趋势，也反映出了智库可能的发展方向。有更多的智库可能不仅仅满足于提出建议，而是更加积极的参与政策制定，或直接采取行动以实现自己的政策理念。

6、排行榜的小花絮

除了严肃的排名外，报告还有两个有意思的榜单。

在最佳政治倡导智库（Best Advocacy Campaign）中，我们看到了不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比如排名前三的大赦国际、透明国际、人权观察（嗯，你懂的……）。令人意外的是，我们在这份榜单中还发现了中国智库的身影。不过再定睛一看，原来都是香港的智库（嗯，你懂的……）。他们分别是排名第 65 的新力量网络（SynergyNet）和排名第 68 的思汇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

全球智库千千万，赚钱到底哪家强？最佳盈利智库排行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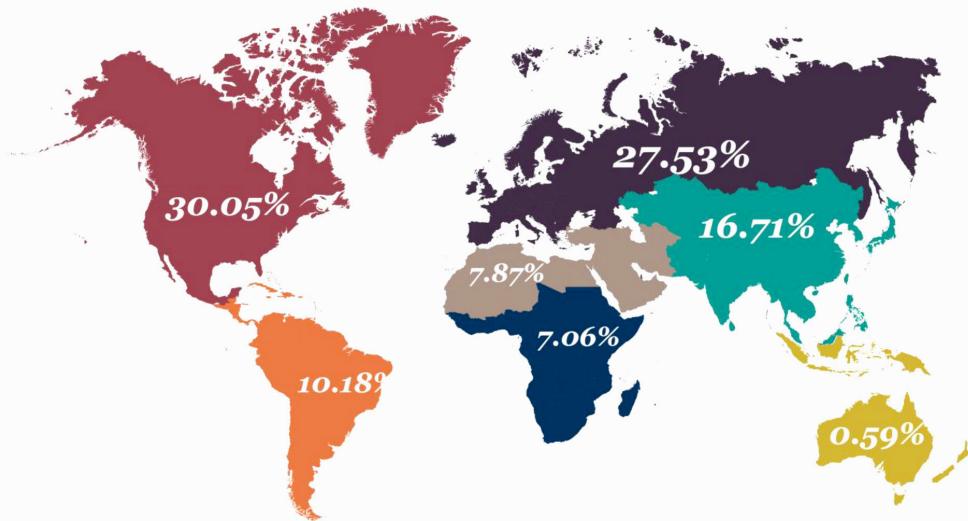
(Best For Profit) 告诉你答案。在这份排行榜中，《经济学人》情报部 (EIU)、麦肯锡、Google Ideas、安永、德意志银行研究部等高大上的单位位居前五。不过，虽然排名前列的主要都是经济和商业类智库，但欧亚集团 (Eurasia Group)、Stratfor、基辛格事务所 (Kissinger Associates) 等聚焦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的智库也排进了前十五，学国关的小伙伴们也不用太灰心。☺

7、排行榜中的差错

政见团队在整理全球智库 Top 150 榜单时发现，榜单第 48 名和第 99 名都是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应该是一处笔误。政见团队已经向此项目负责人去信询问。

在全球 Top 150 中，有七家中国智库上榜：中国社会科学院 (27)，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36)，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4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48 或 99)，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61)，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71) 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战略研究院 (106)。

附1：2014年全球智库分布图（总数 = 6681）



附2：2014年智库最多的10个国家

Rank	Country	No. of Think Tanks
1	United States	1830
2	China	429
3	United Kingdom	287
4	Germany	194
5	India	192

Rank	Country	No. of Think Tanks
6	France	177
7	Argentina	137
8	Russia	122
9	Japan	108
10	Canada	99

附3：2014年全球智库排行榜

1. 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e (美国)
2.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atham House (英国)
3.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美国)
4.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美国)
5. 欧洲与全球经济治理实验室 Bruegel (比利时)
6.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瑞典)
7. 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美国)
8. 外交关系学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美国)
9. 国际战略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英国)
10.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美国)
11. 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英国)
12. 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德国)
13.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日本)
14.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德国)
15.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美国)
16. 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美国)
17. 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美国)
18. 瓦加斯基金会 Fundação Getulio Vargas (巴西)

19. 菲莎研究所 Fraser Institute (加拿大)
20.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法国)
21. 国际危机组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比利时)
22.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英国)
23.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比利时)
24. 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美国)
25. 美国进步中心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美国)
26.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 Carnegie Moscow Center (俄罗斯)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
28.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日本)
29. 阿登纳基金会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德国)
30.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FES) (德国)

以上由政见团队翻译，以下除中国智库外翻译略

31.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 (United Kingdom)
32.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EMO RAS (Russia)
33.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GAP (Germany)
34. Clingendae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therlands)
35. Wilfried Martens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FKA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Belgium)
3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37.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Lebanon)

38. Consejo Argentin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CARI (Argentina)
39. Da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IIS (Denmark)
4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41.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Ifw (Germany)
42. IDEAS (United Kingdom)
43.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Canada)
44.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RUSI (United Kingdom)
45.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 (Republic of Korea)
46.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Switzerland)
47. Human Rights Watch, HRW (United Kingdom)
4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49.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KDI (Republic of Korea)
50. 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CCS (India)
51. Al-Ahram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ACPSS (Egypt)
52.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IEA (United Kingdom)
53. Libertad y Desarrollo, LYD (Chile)
54.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Australia)
55.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 (United Kingdom)
56. Food,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Policy Analysis Network, FANRPAN (South Africa)
57. Bon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onversion, BICC (Germany)
58. Barcelon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CIDOB (Spain)

59.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 (Norway)
60. East Asia Institute, EAI (Republic of Korea)
61.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62. 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 AERC (Kenya)
63. African Centre for the Construc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ACCORD (South Africa)
64. Razumkov Centre (Ukraine)
65. RAND Europe (United Kingdom)
66.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ISM (Poland)
67. Center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CASE (Poland)
68. Demos (United Kingdom)
69.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Indonesia)
70.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CER (United Kingdom)
71.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72.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EU ISS (France)
73.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UPI (Norway)
74. Turkish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Foundation, TESEV (Turkey)
75.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ECIP (Belgium)
76. Civita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ivil Society (United Kingdom)
77.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FANS (Republic of Korea)
78. 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IIA (Singapore)
79. Fundacion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y el Dialogo Exterior, FRIDE (Spain)

80.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IDSS (Singapore)
81.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AIIA (South Africa)
82.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DIE (Germany)
83. Fundacion para el Analisis y los Estudios Sociales, FAES (Spain)
84. Centre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CCR (South Africa)
85.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IAI (Italy)
86. Heinrich Boll Foundation, HBS (Germany)
87. Association for Liberal Thinking, ALT (Turkey)
88. Timbro (Sweden)
89.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CPS (United Kingdom)
90.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 CPPS (Malaysia)
91. Centro de Estudios Publicos, CEP (Chile)
92.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 (Singapore)
93.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 (United Kingdom)
94. Real Instituto Elcano (Spain)
95. Facultad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Sociales, FLACSO (Costa Rica)
96. African Technology Policy Studies Network, ATPS (Kenya)
97. 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IDS (Bangladesh)
98. 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VOP (Russia)
9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00.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IDSA (India)

101.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 CIS (Australia)
102.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GIMO (Russia)
103. Center for Free Enterprise, CFE (Republic of Korea)
104.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SS (Israel)
105.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CRIER (India)
106.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107.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TERI (India)
108. Fundacion Libertad (Argentina)
109. IMANI Center for Policy and Education (Ghana)
110. 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 CPS (Hungary)
111.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ISS (South Africa)
112.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IIPS (Japan)
113. EGMONT – The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gium)
114.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 (India)
115. European Policy Centre, EPC (Belgium)
116.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PIK (Germany)
117. Fundacao Armando Alvares Penteado, FAAP (Brazil)
118.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 ISPI (Italy)
119. Free Market Foundation, FMF (South Africa)
120.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CODESRIA (Senegal)
121. Lithuanian Free Market Institute, LFMI (Lithuania)

122. Istituto Bruno Leoni, IBL (Italy)
123.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SAM (Azerbaijan)
124. Instituto Ecuatoriano de Economia Politica, IEEP (Ecuador)
125. Gulf Research Center, GRC (Saudi Arabia)
126.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d Global Governance, DRI (France)
127. Regional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RCSS (Sri Lanka)
128. Centro de Divulgacion Conocimiento Economico para la Libertad, CEDICE (Venezuela)
129.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DA (India)
130. Centro Euro–Mediterraneo sui Cambiamenti Climatici, CMCC (Italy)
131. Centro de Estudio de la Realidad Economica y Social, CERES (Uruguay)
132.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ESD (Azerbaijan)
133.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NIDS (Japan)
134. Kenya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nd Analysis, KIPPRA (Kenya)
135.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ntre, EPRC (Uganda)
136. Ifo Institute–Leibniz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Germany)
137. Institucion Futuro (Spain)
138. Organization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OSSREA (Ethiopia)
139.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 ELIAMEP (Greece)
140. 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 FEEM (Italy)
141.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IIA (Finland)

142.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GMF (United States)
143.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 FNF (Germany)
144.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CGD (United States)
145.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NIRA (Japan)
146.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Economicas Nacionales, CIEN (Guatemala)
147. Israel-Palestine: Creative Regional Initiatives, IPCRI; FKA Israel-Palestine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Israel/Palestine)
148. Centro Studi Internazionali, CE.S.I. (Italy)
149.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ISSER (Ghana)
150. Caucasus Institute for Peac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CIPDD (Georgia)

数据解码

想靠谱？让我们先用数据说话。

数据就一定靠谱吗？

请和政见一起优雅地解读数据。

世界上有多少国家能造核武器？

一个具备了对原材料的浓缩和再加工能力（ENR）的国家，距离核武器就只有一步之遥了。1939 到 2012 年间，有 31 个国家和地区建造了 241 个 ENR 设施。日本和伊朗两个国家的 ENR 设施数量即将达到核武器国家的级别。

◎ 柯来阳 / 特约观察员

自冷战以来，学界对“核扩散”（nuclear proliferation）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是有关“核潜力”（nuclear latency）的研究仍然留有大片空白。所谓核潜力，指的是拥有建造核武器的能力。那么，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国家拥有核潜力？拥有核潜力的国家是否有意愿将核潜力转化为核武器？拥有核潜力会降低还是增加国家间冲突？

由于缺少相关的数据，核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很难对

这些重要问题深入研究。来自德州农工大学的两位学者正在通过新的方法来衡量全球各国的核潜力，并运用新建立的数据集初步分析了核潜力与国际冲突的相关性。

原材料浓缩和再加工能力才是关键

过去，要衡量核潜力，基本上靠的是关注一国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本等指标，比如国内铀存量、采矿能力、钢铁产量、冶金学家 / 化学家 / 核武器专家的数量。但研究者提出，过去的方法都忽略了对原材料的浓缩和再加工的能力（enrichment and reprocessing technology，即 ENR）。事实上，只有 ENR 才是发展核武器最关键的一环。一个国家如果达到了能够对原材料进行浓缩和再加工的程度，那么它距离核武器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自然，此时该国肯定已经具备了前面所说的那些传统衡量指标。

根据研究者们的理论，核潜力体现在一国至少拥有一个 ENR 工厂或运行多个 ENR 设施。那么，如何找出 ENR 设施呢？首先，通过找出哪些国家正在运行至少一个研究用反应堆来缩小范围，因为研究用反应堆是建立 ENR 的前提条件。其次，对于已经建立了研究用反应堆的 69 个国家，再通过搜集多种来源的资料

来证实哪些国家建立了 ENR 设施，这一步排除了 38 个国家没有发展 ENR 技术，最后得出有 31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ENR 设施。

在找到所有的观察单位之后，研究者们又建立了八个变量来测量这些 ENR 工厂。这八个变量分别是：1) 建立和运行的时间，2) 设施的规模，3) 设施的类型，4) 军事用途，5) 隐蔽性，6) 保护措施，7) 外国协助，8) 多国所有权。

全球核潜力一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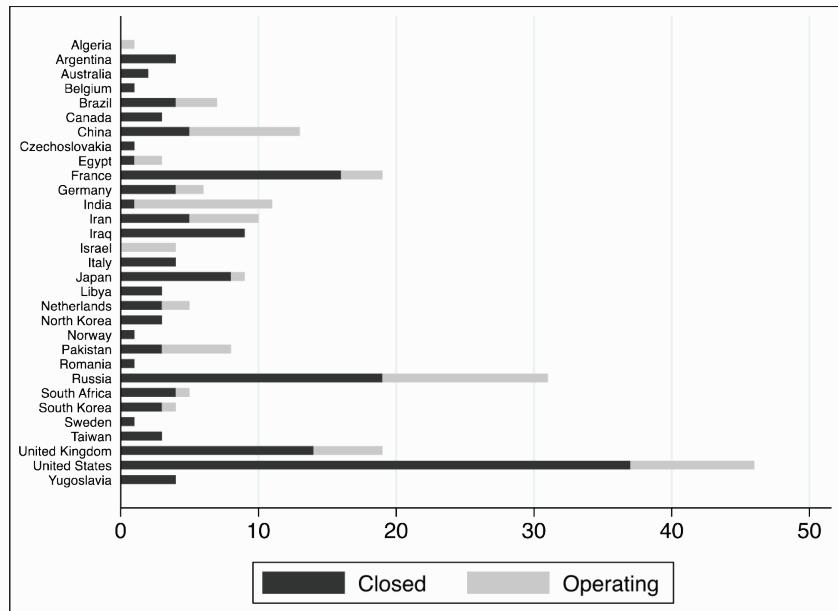
用这一新的指标测量出来的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全球核潜力的相对全面的图景。

研究者们指出，从 1939 年到 2012 年间，有 31 个国家和地区建造了 241 个 ENR 设施（如下表所示）。ENR 设施的数量在 1980 年代后期达到顶峰，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核不扩散运动的开展，从 1990 年代起，前苏联国家开始拆除核设施，并且 ENR 设施数量也在不断减少，直到 2005 年左右又开始上升。目前世界范围内拥有 ENR 设施的国家一共有 18 个。

国家（地区）	ENR 设施运行年份	国家（地区）	ENR 设施运行年份
阿尔及利亚	1992–2012	意大利	1966–1990
阿根廷	1968–1973, 1983–1989, 1993–1994	日本	1968–2012
澳大利亚	1972–1983, 1992–2007	利比亚	1982–2003
比利时	1966–1974	荷兰	1973–2012
巴西	1979–2012	朝鲜	1975–1993, 2003–2012
加拿大	1944–1976, 1990–1993	挪威	1961–1968
中国	1960–2012	巴基斯坦	1973–2012
捷克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	1977–1998	罗马尼亚	1985–1989
埃及	1982–2012	俄罗斯（苏联）	1941–2012
法国	1949–2012	南非	1967–2012
德国（西德）	1964–2012	韩国	1979–1982, 1997–2012
印度	1964–1973, 1977–2012	瑞典	1954–1972
伊朗	1974–1979, 1985–2012	中国台湾	1976–1978
伊拉克	1983–1991	英国	1952–2012
以色列	1963–2012	美国	1941–2012
		南斯拉夫	1954–1978

1939—2012 年间建立 ENR 设施的国家（政见根据论文出处修改制图）

每个国家拥有的核潜力是有差异的，这主要取决于 ENR 设施的规模。在下图中可以看到：拥有 10 个以上 ENR 设施的国家，除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外，还要加上印度。其中，美国和俄国仍然处于领先地位，拥有超过 30 处以上的 ENR 设施，是全世界最具核潜力的两个国家。中法英三国的核潜力差距不大。其他国家的核设施规模相对较小。



各国拥有的 ENR 设施的数量（政见根据论文出处修改制图）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伊朗两个国家的 ENR 设施数量即将达到核武器国家的级别。尽管伊朗没有核武化，但作为唯一一个拥有巨大核潜力的中东国家（从上图看，伊朗核潜力要远超过以色列），伊朗因此长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

在所有的 ENR 设施中，40% 是实验室规模，30% 是商业规模，还有 30% 属于试验工厂规模。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商业规模的 ENR 设施更容易生产出可裂变的核材料，但研究者指出，以色列和朝

鲜的例子说明实验室级别的 ENR 设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此外，40% 的 ENR 工厂是民用设施，而 60% 属于军事用途。一些国家的位置比较微妙，比如日本，就站在核武器的门槛前。虽然他们采取了“核对冲”（nuclear hedge）的战略：其 ENR 设施能迅速转化为核武器，但由于没有公然武器化，因此也被归为民用。

其他一些有意思的数据还有：21 个国家建造了至少一个的秘密 ENR 工厂，27 个国家建造的至少一个 ENR 工厂是受到外国协助的。到 2012 年为止，全球至少一半的 ENR 设施处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下，只有 20 个 ENR 设施是多国联合所有，这其中的 16 个都是由欧洲国家所有。

数据集的初步应用

最后，研究者还尝试用新建立的核潜力数据集来考察核潜力与国际冲突的关系。

在 2009 年，已经有学者检验了包括核武器、民主化程度、地理等各种因素对国际冲突的影响。研究者在他们的基础上增加了“核潜力”和“追求核武器的意愿”两个指标。结果发现，原先存在的那些因素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不变，而核潜力与军事冲突呈负

相关。这说明，核潜力与核武器一样拥有威慑效果，可以止慑国际冲突的爆发。

研究者在结论中指出，以上结果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检验，但这一新的数据集应当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核扩散的不一样的视角，同时，也能帮助国际关系学者拓展研究的广度。

参考文献

- Fuhrmann, M., & Tkach, B. (2015). Almost nuclear: Introducing the Nuclear Latency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doi: 10.1177/0738894214559672

交通部门发布的车祸死亡人数 仅是真实数字的零头？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统计，2010 年中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65225 人。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重新核算后，这一数字一跃飙升到 27 万人。这意味着，警方报告的数据可能只是实际值的零头。

◎ 马亮

中国汽车保有量连年攀升。尚在发育中的“道路文化”和“马路文明”在横冲直撞的铁皮引擎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对中美两国驾驶员的访谈显示，中国司机更关注驾驶技术和能力，而美国司机更注重实用的安全驾驶规则。对中国司机的实地观察显示，64% 的人会系安全带，但雨雪天气打开行驶灯的接近于零，而日落后打开车头灯的时间也明显晚了，只有 40% 的司机在变道时会开启转向灯以提示他人（Zhang, et al., 2006）。

道路交通事故的惨烈场面和惨痛教训让人心有余悸，但究竟有多少人葬身在“马路杀手”的车轮下，直至今日仍然莫衷一是。尽管反映道路交通事故的数据越来越多，但多个来源的数据往往不一致乃至相互冲突，无法令人信服，也很难为追踪高危地区和时段提供准确依据。

车祸是 45 岁以下人群的头号杀手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3 年全球道路安全状况报告》显示，全球 182 个国家的道路交通死亡人数仍高达每年 124 万人。但是，只有占全球 7% 人口的 28 个国家颁布了健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令，以制裁酒驾、超速、不戴摩托车头盔、不系安全带和不配备儿童安全措施等五大风险因素。

尽管中国颁布了法律法规以应对上述道路安全风险隐患，但执法状况却令人堪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0—10 分的量表，中国的摩托车头盔和安全带执行状况仅得 2 分，超速限制的执行得 4 分。只有酒驾制裁的执行状况达到令人满意的 9 分。

按照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从 1951 年到 1999 年的近 50 年间，中国的道路交通事故量、受伤率和死亡率分别增长了 68、56 和 97

倍。超速驾驶是交通事故的主要肇因，而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而不断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则助长了交通事故的爆发。可以说，道路交通事故是中国 45 岁及以下人口死亡的“第一杀手”(Wang, et al., 2003)。

另一项研究同样发现，中国的每十万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从 1985 年的 3.9 人攀升到了 2005 年的 7.6 人，增加了将近一倍。跨省比较显示，无论是东南发达省份，还是西北落后地区，都经历了死亡率的快速增长。其中，西藏、青海和新疆这些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却恰恰是死亡率最高的 (Hu, et al., 2008)。

两套数据 “两张嘴”

但是，上述数据都来自公安部门的统计，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的真实情况。如果利用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那么中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情况更加不容乐观。实际上，公安和卫生两个部门的统计数据“打架”的情况时有发生，且多数情况下是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远低于卫生部门。

有关道路交通事故的警方报告数据主要来自警方记录在案的资料，一般可以从《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获取。而《中

国卫生统计年鉴》披露的数据则来自医生签署的死亡证明，是官方的死亡认定依据，因此更为可靠。

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胡国清等对 2002—2007 年间两组数据的分析发现，死亡登记数据核算的道路交通死亡率几乎是警方报告数据的两倍。警方报告数据显示死亡率在几年间显著降低了 27%，而死亡登记数据则显示它增加了 8%。

另一个研究小组利用 2006—2010 年间中国疾病监测点的数据发现，每十万骑自行车的人死亡率从 1.1 人攀升到 1.6 人。更为重要的是，超过 90% 的自行车死亡事故未被公安部门统计在内。在此期间，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死亡率降低了 64%，可谓“政绩卓著”；而疾病控制点的数据则表明死亡率不降反升，增长了约 34% (Zhou, et al., 2013)。

最近，中美两国学者综述了四个国家级的数据源，以评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状况。这四个道路交通安全伤亡数据库相互补充和印证，但又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通常使用卫生部的重大登记系统和警方报告，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疾病监测点和国家伤害监测系统的数据却较少被使用。尽管卫生部和疾控中心的数据都存在漏报低报的问题，它们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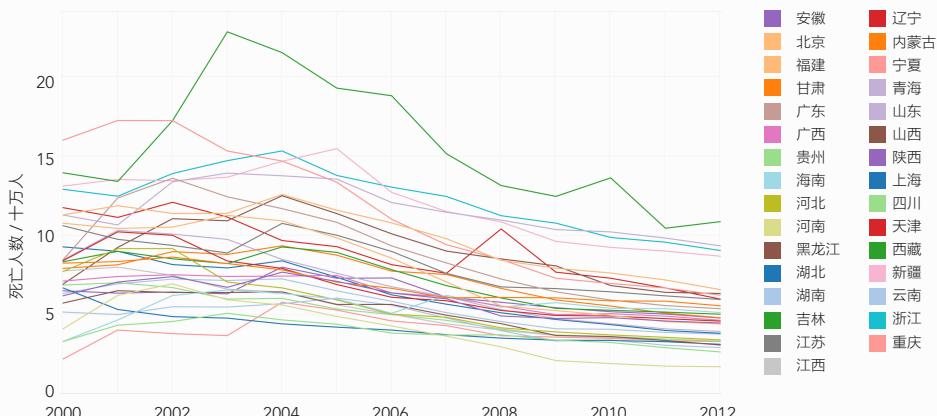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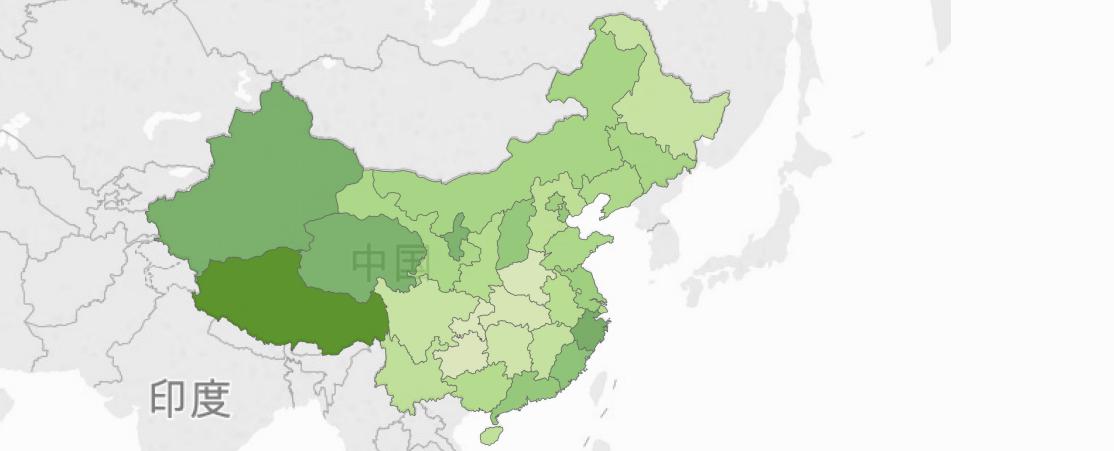
交通死亡估计仍然达到警方报告数据的三倍 (Ma, et al., 2012)。

数据重估后，中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惊人

由于人口基数大，2010 年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计的中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到 65225 人，仅次于人口大国印度的 13 万人。但是，世界卫生组织通过模型模拟而核算后，这一数字一跃飙升到 27 万人，这让中国成为世界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是基于数据完整且可信的国家资料建模，用风险因素、政策干预和其他影响因素来预测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然后将其估计的模型参数套用到中国等数据存在缺陷的国家上，以此得到一个近似的估计数据。这项做法尽管也存在问题，但已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可。

换句话说，警方报告数据严重低估了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状况，其数据可能只是实际值的“零头”。但是，政府依然使用警方报告数据，因为道路交通安全的管辖权归属于公安部门而不是卫生部门。与医院急救中心的统计数据相比，学者们也主要利用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因为它覆盖的指标更多，可比性也较强。



2000—2012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 十万人（分布图及趋势图）

重建中国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数据库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农村的道路交通事故数据。由于道路状况差、教育水平低和观念守旧等原因，农村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令人堪

忧。但是，涉及农村地区的事故数据存在更多问题，以至于很难精确估计。利用卫生部的登记数据，研究者们发现2005—2010年间，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死亡率飙升了70%，而同期城镇地区仅增长了4%。这使农村地区的每十万人道路交通死亡率（22.7人）几乎成为城镇地区（13.9人）的两倍（Huang, et al., 2013）。

不过，警方低估道路交通死亡数据的情况不独中国，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类似现象。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界定问题，也有其所使用的数据收集方法问题，更有可能是由于警方故意低估死亡数据以规避责罚。

如果无法获得道路交通事故的准确数据，就难以构建严密的风险监测与控制体系，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的政策努力也无从下手。公安部门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死亡率逐年下降，当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为此而沾沾自喜时，可能会误导性地影响未来道路交通安全政策的走向。更为重要的是，忽视真实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是对伤亡者的极大不尊重，并无助于人们从中汲取教训和加以警醒。

参考文献

- Hu, G., Baker, T., & Baker, S. P. (2011). Comparing road traffic mortality rates from police-reported data and death registration data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89(1), 41–45.
- Hu, G., Wen, M., Baker, T. D., & Baker, S. P. (2008). Road-traffic deaths in China, 1985–2005: threat and opportunity. *Injury Prevention*, 14(3), 149–153.
- Huang, Y., Tian, D., Gao, L., Li, L., Deng, X., Mamady, K., & Hu, G. (2013). Neglected increases in rural road traffic mortality in China: Findings based on health data from 2005 to 2010. *BMC public health*, 13(1), 1111.
- Ma, S., Li, Q., Zhou, M., Duan, L., & Bishai, D. (2012). Road traffic injury in China: a review of national data sources. *Traffic injury prevention*, 13(sup1), 57–63.
- Wang, S. Y., Chi, G. B., Jing, C. X., Dong, X. M., Wu, C. P., & Li, L. P. (2003). Trends in road traffic crashes and associated injury and fatal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1–1999. *Injury Control and Safety Promotion*, 10(1–2), 83–87.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3).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road safety 2013.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o.int/violence_injury_prevention/road_safety_status/2013/en/
- Zhang, W., Huang, Y. H., Roetting, M., Wang, Y., & Wei, H. (2006). Driver's views and behaviors about safety in China — What do they NOT know about driving?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 38(1), 22–27.
- Zhou, M., Hu, G., Wang, L., Ma, S., Wang, L., Li, Q., & Hyder, A. A. (2013). Bicyclist mortality between 2006 and 2010 in China: Findings from national Disease Surveillance Points (DSP) data. *Injury Prevention*.

五张地图展示世界各国债务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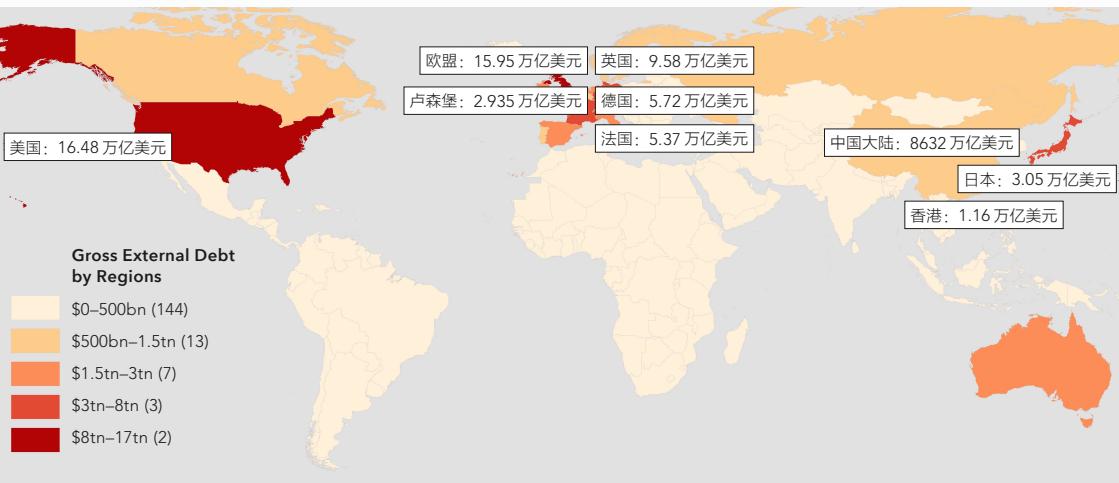
美国不光从其他地区借钱，比如来自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投资者，还向自己借钱，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岛资本回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也都是投资者，相比之下规模较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这个全球金融体系的游戏之外。

◎ 王韬

当我们讨论债务问题的时候，第一直觉是富人当债主、穷人负债。但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可不是按这个逻辑。事实上，全球对外负债最重的都是发达经济体，而不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处在一个金融深度全球化的世界，发达经济体拥有体量庞大且开放的金融市场，巨额负债、高杠杆、密集的金融资本流动是发达经济体的主要特征。以 2013 年（部分经济体是 2012 年）的数据为例，我们来看看各国的外债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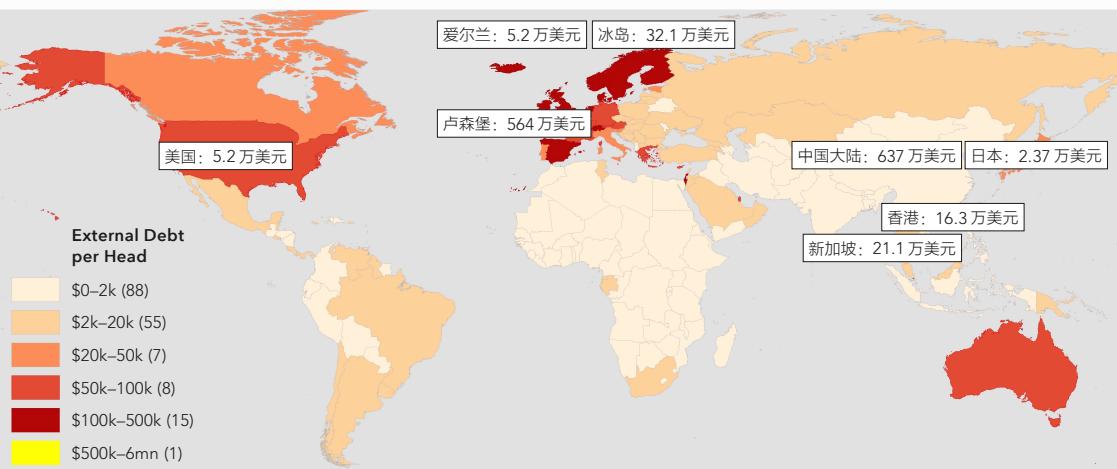
以外债总额衡量，各国的外债水平如何？如下图所示，美国、欧洲、日本都位列前茅。美国外债 2013 年末达到 16.48 万亿美元，超过其当年 GDP。整个欧盟总体位列第二，规模相当。相较之下，日本的 3 万亿外债略显逊色。



中国在哪？中国外债总量为 8600 亿元，在各国中排在将近 20 名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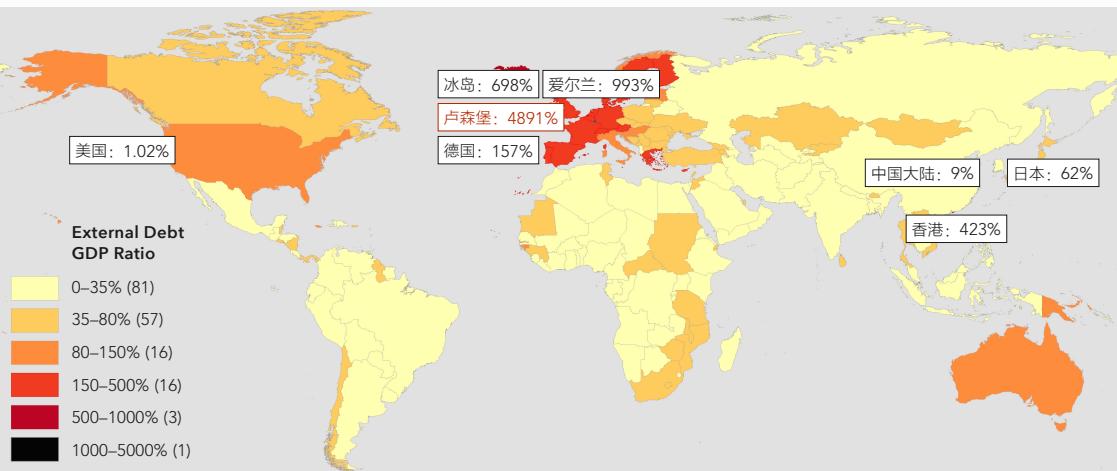
不少人都知道中国总体债务水平很高，但主要是内债，不是外债。在外债方面（如下图），按人均算，有一个国家立刻甩出其他国家几条街：卢森堡，人均外债水平 560 万美元。卢森堡面积

小，人口少，但长期都是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位列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列。紧接着是爱尔兰。冰岛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都名列前茅，这些国家都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此外，香港和新加坡两个亚洲金融中心也都位列前十。除了卢森堡外，其他各地的人均外债水平都在 10 万到 50 万美元之间。美国位置要靠后一些，人均外债大约 5 万美元，排在 25 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均外债在 2000 美元以下。南北世界差距不小。



前面两个指标呈现了整体的情况，但是却不具国家间的可比性。各国经济体量不同，绝对的外债数量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所

以第三张图我们来看看外债占 GDP 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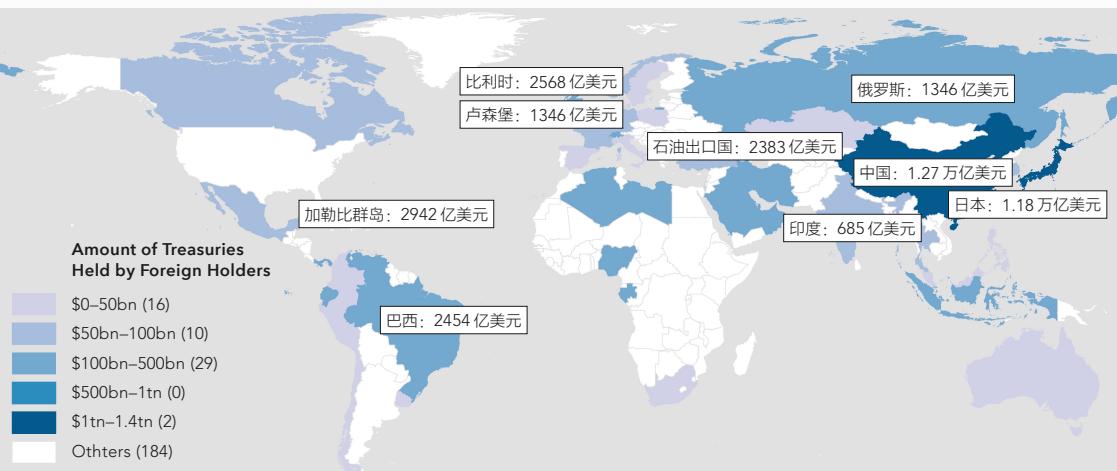
从图片来看，传递的信息差不多：以 GDP 占比衡量，外债最重的国家都在欧洲，卢森堡仍然位列第一位，是 GDP 的 400 多倍，爱尔兰、冰岛、新加坡、香港都很高。城市金融中心，资本大进大出。其他发达经济体外债占比也很高。中国的外债占 GDP 比重只有 9%。一直以来，中国都资本账户管制和金融抑制，因此向海外借债规模很小。

从上面三张图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和各大金融中心的外债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不过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图景并不完整。

外债水平高，不是单向向外借款，真实的情况是发达经济体间大借大贷，关键是高杠杆。接下来以美国为例，我们来看一下谁是美国的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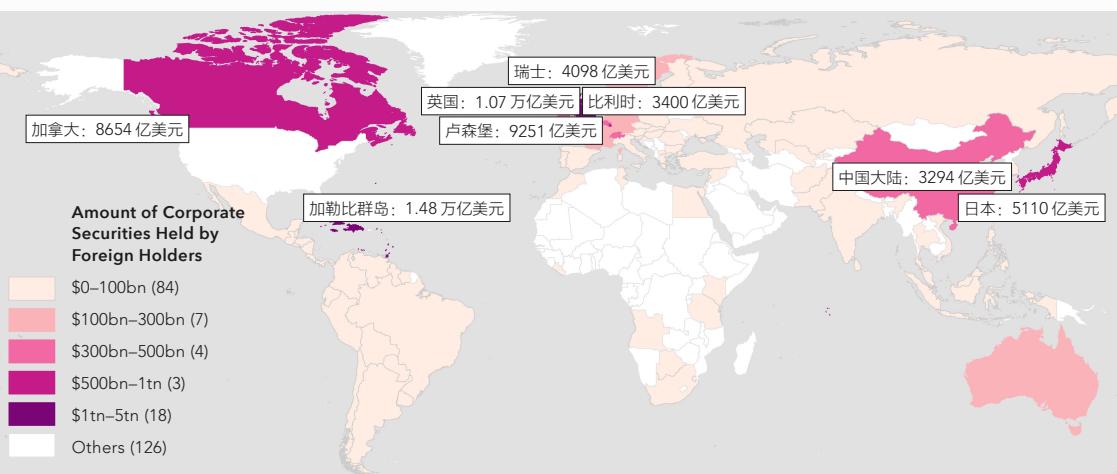
我们选择美国外债中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美国联邦政府债券市场和美国企业长期债券市场。二者是美国对外负债的主要形式。

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和日本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最大债主。两国持有的美国公债都超过 1 万亿美元，而且真实水平比图中数据要高。此外，石油出口国和其他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比如挪威、新加坡也是美国公债的主要持有国。



最有趣的是排名第三的加勒比群岛。这些都是著名的避税天堂和离岸资本中心，包括著名的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等岛屿。来自这些岛屿的资本最初来源很多样，但是主要还是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本土。所以，美国不只向世界借债，也自己给自己借钱，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

长期企业债券市场上，主要以外汇储备投资的中国不再突出。加勒比诸岛一起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整个欧盟国家总额。“自己借自己钱”的情况更明显。本来来自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再次回流到美国本土的债券市场。此外，金融中心和其他主要的借债国、比如卢森堡、爱尔兰和香港，也是美国企业债券的主要持有者。



从美国联邦政府和企业债券两个方面看，美国不光从其他地区借钱，比如来自发达国家经济体的投资者，还向自己借钱，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岛资本回流。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都是投资者，相比之下规模较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这个全球金融体系的游戏之外。

可预见的未来，伴随着中国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资本账户逐渐开放，跨国的资本流动将更加显著，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流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也会有更大数量的外来资本流入国内，外债规模会有显著上升。

本文数据来自 CIA Factbook、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Treasury International Capital System）。

日本为何难出女性政治家？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 尹月

林语堂先生曾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这话或许调侃的意味多，认真的意味少，但日本女性给予世人的刻板印象确实是对丈夫点头哈腰、温柔恭顺的好太太形象，日本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更是“尽人皆知”。

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2014年“男女差距指数”，日本的性别平等程度的确不容乐观，在接受调查的142个国家和地

区中排在第 104 位。虽然相比上次调查提高了 1 名，但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仍然很低，仅好于韩国。

日本女性“参政难”，是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冰山一角。

本届内阁有 4 名女性，已是着力拔擢的结果

目前，日本众议院的 480 名议员中仅有 39 名女性，占总人数的 8%，创下 2005 年总选举以来的新低。根据日内瓦国会联盟（IPU）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编制的排名，日本国会女性议员人数比例在 189 个国家中跌至第 130 位，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列末位。在拥有两院制的国家中，女性议员人数平均比例为 21.9%，亚洲地区的这一比例也达到 18.3%，日本可谓远远落后。

再从女性内阁成员人数比例来看，除了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2001 年 4 月—2005 年 9 月，不包括小泉第三届内阁）女性内阁成员人数达到 3 名以上（最多时 5 名）之外，1989 年以降，女性内阁成员一直保持在 1—2 名的水平。在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于去年 9 月底组建的本届内阁中，女性内阁成员升至 4 名，而这已是安倍着力拔擢的结果。国家审议机构、司法机关、学术界和各类民间团体中的女性成员比例也依然徘徊在较低水平，与日本

于1999年6月颁布的《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中描绘的愿景相距甚远。

与女性在政治领域难有作为的现状可相对照的，是日本女性国民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和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较男性为低。根据一份稍早的数据（日本东北大学于2003年—2004年实施的“COE项目”调查）显示，女性在投票、签署请愿书和募捐这三种政治参与活动中与男性齐头并进，但在除此之外的其他9项活动（包括与政治家或官僚接触、参加竞选集会、游行等）中均大幅落后于男性。

此外还有一项数据引人注目：当被要求对女性议员人数进行评价时，回答“目前的人数正合适”的男女受访者分别为49.1%和48.4%，回答“人数过少”的男女受访者分别为18.1%和18.6%，男女双方并无显著差异。而当16.6%的男性受访者认为女性议员“人数过多”时，14.9%的女性受访者也做出了这一回答。可见大部分受访者，尤其是63.3%的女性受访者并不认为政界中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是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再来看一下日本选民对女性政治家的看法。对女性政治家抱有歧视的受访者比例极低，且大都直率承认男性政治家更易受到

“优待”的现实。多数受访者虽然支持促进对女性员工和女性公务员的录用，但却对为女性候选人分配更多参选名额以调整男女比例的举措持消极态度。当被问及是否期待女性政治家在推动促进女性权益的政策制定方面更有作为时，近 60% 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政客性别，只要政策合理即可，表现出片面的“平等主义”，而在“夫妇不同姓”和“堕胎”等议题上则又一次退居保守。选民的态度如此暧昧不明，也就难怪日本女性对投身政界游移观望了。

大部分女议员要借助父辈或丈夫的力量

那么，日本女性“参政难”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综合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女性受教育程度整体仍然略低于男性，而教育程度与政治关心和政治参与均呈显著正相关。

其次，繁重的家务与生儿育女的责任仍是阻止女性向政界发展的重要原因。IPU 于 2002 年汇总的报告指出，61% 的女性议员是已婚者，73% 的女性议员拥有子女。而即使在瑞典、丹麦等男女平权运动较为发达的国家中，女性通常仍需承担 60%—70% 以上的家务。因此，对于女性政治家而言，来自家人，尤其是配

偶的支持尤为必要。但日本男性在这方面的表现显然不尽如人意。OECD 在去年 3 月上旬实施的调查显示，日本男性每天用于家务的时间为 62 分钟，仅为女性的五分之一左右。另据政见观察员粗略统计，在日本众议院的 39 名女性议员中，已婚人士为 16 名，只占总人数的 41%，可见，摆脱婚姻和生育负担的女性更有可能投身政界。然而，就在去年 6 月 18 日的东京都议会上，当一名单身女议员谈到有关优化生产及育儿相关政策时，却遭到男性议员的奚落：“那你早点结婚不就行了？”“你生不出孩子吗？”虽然这名男议员事后道歉并退党，但女性政治家面对“婚”还是“不婚”的尴尬处境可略见一斑。

第三，日本有俗语称，欲进军参众两院，“地盘”（票仓），“看板”（即广告牌，喻指在选区的知名度），“钱包”（指选举资金）三者缺一不可。一般认为，曾从事国家公务员、地方议员、政治家秘书等职务的人士或“世袭”政治家（即其亲属曾在某一选区竞选成为议员）较容易获得竞选资源。不过，正如上文所述，能在行政职位或地方政界等有所作为的日本女性本就少之又少，仿佛无源之水，能够通过其他渠道跻身国政选举的女性自然就更罕见了。在日本 39 名女性众议员的维基百科主页中，明确标有“无世

“袭”字样的议员为 11 人，仅占总人数的 28%，其他女性议员或多或少都需借助父辈或丈夫的力量。

最后，有研究者将女性较少投身政界的原因归结为罕有女性将从政设定为事业目标，参政议政意识尚薄弱。东北大学 COE 项目的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当一年国会议员时，超过 80% 的女性表示“不想”，而只有不到 70% 的男性做出同样回答；另有近 20% 的男性表示有这个意愿，但只有不到 10% 的女性认为可以一试。此外，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 2012 年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愿意成为“家庭主妇”的未婚女性受访者比例大幅降至 19.7%，但超过 40% 的 40 岁以下女性对未来事业并无明确规划，且有近半数女性仍然持有“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认识。政见观察员发现，就连日本女性众议员中亦有不少人抱持着男尊女卑思想。如在维基百科主页中谈及“能否设立女性天皇”的 12 名女性众议员中，仅有 2 人表示赞成，1 人认为应废除天皇制及允许女性首相当选，而其余 9 人都予以反对。在谈及“能否允许夫妇不同姓”的 25 名女性议员中，仅 10 人赞成，15 人反对，理由包括夫妇不同姓可能造成一夫一妻家庭的“崩坏”等等。

近年来，由于选择独身或不生育的女性越来越多，日本“高

“老龄少子化”的危机愈发危重。为了缓解日本人口减少趋势，为女性创造更良好的就业和育儿等条件已迫在眉睫。首相安倍晋三在大选期间多次承诺推进男女平等，重用女性被写入自民党竞选纲领之中。不知何时才能看到“日本好太太”蜕变为女议员、女大臣、女首相的那一天。

参考文献

- 川人貞史, 山元一 (Eds.) (2007). 政治参画とジェンダー. 東北大学出版会.
- 木本喜美子, 榎一江 (2014). ジェンダー平等と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 5 (3) , 3-10.
- 高橋幸市, 荒牧央 (2014). 日本人の意識・40 年の軌跡 (1) —第 9 回「日本人の意識」調査から. 放送研究と調査, 64 (7), 2-39.
- 斎藤英之 (2002). 女性議員が少ない理由、増えている理由. 上智短期大学紀要, 22, 61-84.
- 内閣府 (2012). 男女共同参画白書 (平成 25 年版).
- 山田真裕 (2007). 日本人の政治参加におけるジェンダー・ギャップ. 政治参画とジェンダー, 265-279. 東北大学出版会.

新新青年

看啊，
这些复杂的年轻人！

“太阳花”照亮台湾？

“太阳花”是台湾民主发展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它给台湾带来了哪些变化？它的目标和任务有没有达成？

◎ 奚应红

2015年3月19日的台湾媒体头版早早就被预定。当“经济民主联合”（原“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决定在3月18日晚重返立法院反思整整一年前爆发的“太阳花”运动、重申人民主权、呼吁改革不止的时候，亲历者们已经开始摘下去年的光环，抚摸结痂的伤疤。“太阳花”是台湾民主发展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它给台湾带来了哪些变化？它的目标和任务有没有达成？为此我们

有必要回顾一下 2014 年的台湾，尤其是后“太阳花”时代台湾的政治社会发展。

2014 年的台湾大事频发、小情绪不断。从 2013 年夏天就开始谈判的两岸服贸协议，在经历了洪仲丘事件之后终于浮出水面，并且在国民党立委张庆忠 30 秒快速宣读通过后，以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方式受到抵制。立法院随即被“攻陷”、占领长达二十四天，而走上街头抗议的民众一度达到 30 万。七月，台湾第二大城市、工业重地高雄发生气爆，28 人罹难，三百多人受伤。这一灾难把台湾人的心情打到谷底。顶新的馊油事件像一把匕首，戳穿了黑心企业的良心，挑明了政府监管的失职。所有这些都汇聚成一把利剑，指向了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国民党一败涂地。

“太阳花”的寓意言简意赅，即照亮黑暗、打破黑箱。然而，那次学运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结果，其带来的影响也波及深远。

分析“太阳花”学运，很多人抓住了“年轻世代”和“社交媒体”的关键词，认为年轻世代与年长一辈甚至野百合一代对民主的看法已经大相径庭。年轻人更重视自由，更关注程序民主、程序正义，而不像年长者看中政府的治理绩效。年轻人对生活的困

惑、对未来的绝望与大财团独享两岸开放红利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党派意识淡薄，拥有更多独立的思考，而且誓与龙应台、陈文茜等“保守”一代决裂。

抛开代际的差异，社交媒体的存在也大大提高了社会动员的能力。瞬间就能聚集 30 万参与者的“太阳花”已非声嘶力竭、磕磕绊绊才带动几万人的“野百合”可比。因此有学者开始大声疾呼“太阳花”是年轻世代的胜利，是“太阳花路线”的胜利。还有人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分析太阳花学运，认为马英九拥有党主席和议会多数党之便却未能迅速搞定服货贸协议，以及和王金平矛盾的公开化，直接影响到对学生占领立法院事件的处理。

运动的爆发让岛上民众开始质疑马英九自 2008 年执政以来力推的两岸经济合作。他们越来越恐惧中国大陆以经逼政的可能，担心过度依赖大陆会牺牲台湾的自主性。马英九两岸“和平协定”遥遥无期，诺贝尔和平奖的梦想更是不敢再做。年底的选举给了国民党一个响亮的耳光，使马英九不再恋栈权位，只能躲在角落里做一个安静的“总统”，静待任期的结束。这是后太阳花学运的台湾民众对执政党的报复性投票。情绪弥漫，回天乏术。

在“后太阳花”时代，更多的人乐于关注政治、参与政治。各类学术科普团体、网站纷纷成立，如“菜市场政治学”把政治学的话语和实践从学者的手中抢夺过来，用更浅显易懂但烟火气息十足的方式取而代之。g0v，“零时政府”，把那些枯燥乏味、普通人看不懂的数据、表格简化成人人都看得懂的信息，鼓励全民监督政府，以图实现真正的人民主权，人民统治。

“太阳花”不仅影响到岛内的政治气候，还外溢到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不断质疑一国两制的香港。两个小兄弟此刻同呼吸共命运，“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口号，显得有些悲壮和无奈。虽然香港的事态最后没有呈现出如台湾一样的状况，却给大陆的主政者带来新的思考。

太阳花学运的最初诉求是退服贸、反对黑箱政治、捍卫民主。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这一目标无疑已经达成。尽管如此，活动组织者的诉求不止于此。他们还希望以“太阳花”为起点，真正改变台湾的民主模式、政治生态，让人民真正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甚至修改宪法，改变公投。所以一年之后他们又回来了，除了追踪两岸服贸货贸的进展，还想表达更大的政治诉求，但缺少

一个激发民众情绪的单一事件。人们还能不能走上街头，去改变一个在多数人听来抽象而飘渺的议题？这是摆在年轻的运动组织者面前的新考验。太阳花照亮了黑箱，可未见得能照亮台湾的民主之路。

参考文献

- Hsieh, J. F. S. (2015). Taiwan in 2014: A besieged President amid political turmoil. *Asian Survey*, 55(1), 142–147.
- Rowen, I. (2015). Inside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Twenty-four days in a student-occupied parlia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g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4(1), 5–21.

为什么出国留学后感觉自己更爱国？

有些受访者坦言，他们来美国之前经常批评中国政府。但这种观点来美国之后却发生了变化，“人民”和“政府”的分野被民族和国家认同所取代。

◎ 邵立

很多人出了国到欧美留学，不仅没有被“西化”，反而变得更加爱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的博士生 Henry Chiu Hail 最近撰文研究了这种现象。他发现，很多中国留学生抱怨美国人对中国情况不了解，却喜欢对中国的时事发表带有偏见的言论，造成了双方关系的紧张和冲突。

Hail 运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调查了 18 位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和助理教授。他发现，中国留学生面对美国同学谈论中

国事务时，通常会产生四种心理防御机制。

第一种是基于（国家）地位的机制（status-based）。受访的留学生抱怨美国人总是试图“攻击”或“威胁”中国和中国人的“地位”。留学生们说，美国人喜欢谈论中国的缺点，比如环境污染、盗版软件或者西藏问题，却无视中国的成就（比如举办奥运会），这让他们感到很生气。虽然有时候美国人只是批评中国的某一方面，留学生们却会把它和中国、中国人的整体地位联系起来。

第二种心理机制基于（对国家的）忠诚（loyalty-based）。有留学生说，当有美国朋友的妈妈跟她聊西藏问题的时候，她感到自己有义务去解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有的留学生跟研究者抱怨中国存在各种问题之后会感到内疚，感觉不应该向一个外国人说那么多关于中国的坏话。研究者认为，这是基于“忠诚”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

第三种心理机制被研究者称为“寻找和谐”机制（harmony-seeking）。中国留学生经常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状态，一方面想维护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又要和美国朋友、同事和睦相处。有受访者表示，每当美国同学在交流中表现出偏见时，他往往会避免争论。他认为争论没有必要，他相信美国人来中国旅

游后自然会“发现真相”。中国学生总是试图通过避开争论来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

最后一种机制叫“功利主义”机制 (Utilitarian)。一些学生面对美国人的批评，会衡量哪些批评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一个留学生表示，如果这种批评只是着眼于中国落后的方面，那即使不中听，还是可以听一下；但如果批评着眼于要分裂台湾和西藏，那她就会“强烈反对”这种批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实际发展比外国人的看法更重要。他们会更激烈地反对那些“伤害中国”的批评。

受访者们普遍承认，到了美国之后对中国的羁绊感觉更强烈。当他们住在中国时，能很容易分清“人民”和“政府”——有些留学生坦言，他们来美国之前经常批评中国政府。但这种观点来美国之后却发生了变化。“人民”和“政府”的分野被民族和国家认同所取代。他们觉得美国媒体总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觉得美国人视自己为外国人，永远不会完全接受。因此，出于对中国的认同，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家，留学生更迫切地希望看到中国正面的形象。

尽管在留学交流中，中美学生之间会产生种种紧张，但 Hail

在访谈中也发现了这种跨国交流产生的正面影响。他发现，越融入美国社会的中国人，就越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想问题，即使双方对敏感问题的看法完全相反。例如，一个加入了基督教会的中国学生，会觉得自己美国教友批评中国是出于善意的理由，尽管她认为这种善意是建立在误解之上。

此外，中国学生在美国生活学习中，可以目睹美国人实践政治自由的过程。例如，上课时师生政治观点不一却能尊重彼此，公民和政府沟通更顺畅等等。这些经历会让他们更希望中国的政治变得更开放。但是，尽管他们向往美国的这种制度，但当美国朋友批评中国目前没有类似的制度时，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还是会启动，马上反驳美国同学。

Hail 最后分析道，一个人的个人认同和自尊与社会身份紧密联系。中国留学生与本地学生的冲突，是出于对民族荣誉的捍卫和民族忠诚的表达。留学生的这种心理防御机制是基于对民族间等级关系的认知之上。少数群体的成员比多数群体的成员对这种群体认同更为敏感。因此留学生对民族和国家身份的认同，跟随他们出国的脚步，变得愈为强烈。这种民族国家认同越强，中国学生就越希望被外国人所尊重，越希望自己的民族被正面地看待。

当中国留学生感到中国遭受西方媒体和抗议人士的攻击或者自然灾害的伤害时，就会激发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和情感联系。

研究者认为，如果想避免跨国交流中的冲突，最好的办法是使双方相信对方是出于善意。而要取得双方的信任，则需要留学生和本地学生有更强的群体认同。

参考文献

- Hail, H. C. (2015). Patriotism abroad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encounters with criticisms of China.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海鸥”与“海龟”： 回流之后如何重新适应中国社会

旅居海外多年的精英们，不得不重新面对中国的“关系社会”。多年海外经历令大多数受访者对拉关系的行为有所保留，但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回乡随俗”，亲力亲为地拉客户、陪领导吃饭、请挂名顾问，种种方式不一而足。

◎ 林知阳

“海归”正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及“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政策，大量精英海归回流国内。与传统意义上的“落叶归根”并不相同，他们在离乡背井数年至数十年之后重返中国，已成为尚未被充分探索的“二次移民”。

香港大学的两位学者深度访谈了12名居住在上海的回流华人。他们发现，回流的精英遭逢种种现实挑战，并发展出一种更为灵活的身份认同观念。在他们的研究中，“海归”并非一个同质的群

体。引用网络流行语，研究者将他们分为“海鸥”与“海龟”，这两种人回流面临的动机与挑战大不相同。

“海鸥”：重新学会拉关系

“海鸥”指的是移居海外多年的金领、高知群体。他们在多年后回到中国，主要基于两个动因：中国的经济发展机会，以及国外的升职障碍。如今，“海鸥”们往往任职于跨国企业、高校或在国内自主创业。

旅居海外多年的精英们，在面对机遇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面对中国的“关系社会”。多年海外经历令大多数受访者对拉关系的行为有所保留，但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回乡随俗”，亲力亲为地拉客户、陪领导吃饭、请挂名顾问，种种方式不一而足。当意识到不能仅凭借个人能力获得事业突破时，“海鸥”们擅用曾经的社会关系，与阔别已久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校友重新联系，并通过他们一步步延展自己的社会网络。

尽管重新逐步重建自己的事业人脉，但“海鸥”的家庭关系却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碎片化。由于受访的金领阶层大多已在海外定居，伴侣也多在异国有稳定事业，回国使得“海鸥”们成为“抛

“妻弃子”的孤家寡人。多名受访者对于亲子关系和婚姻问题表示忧虑。移民导致的家庭关系碎片化并不罕见（诸如80年代香港人移民加拿大的浪潮），但对于二次移民而言，回归“故土”却导致家庭危机，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问题。

“海龟”：高不成，低不就

新近回流的小“海龟”们，则面临截然不同的事业挑战与家庭关系。作为新晋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在海外的时间较短（很多是一年制或两年制的短期研究生课程）。与金领、高知追求发展机会不同，他们回流国内，恰是因为难以在经济低迷的欧美找到心仪的工作。

回国后，受访的“海龟”并未对中国的社会表现出强烈不适——相反的，他们担忧的是海外经历使其缺乏足够的社会关系，并使他们在与本地毕业生竞争时占了下风。镀金的海外大学招牌，也成为找工作时施加给自己的精神压力。

“高不成，低不就”——一名受访者如是说。

家庭关系上，受访小“海龟”最大的困扰并非家庭太疏离，而是环境太亲密，缺乏个人空间。独立生活之后回归故土，相当一

部分单身海龟不免要面临与父母同住的窘境。加之就业市场竞争力渐衰，不仅经济难以独立，精神上也必须面对上一辈的种种生活压力。
bì hūn

“海岸”？中国并非终点站

早期移民研究往往关注单方向的移动，即移民搬往新家园，并在移居地进行的同化（或抵抗）。如今多站式的迁移活动则使得学者必须重新看待“跨国的自我”（transnational self）——“回家”，可对于横跨大洋的迁移者们来说，哪里是“家”？而什么是“回家”？

研究者认为，海外回流群体已经深谙实用主义。他们用实用性代替了刻板的国籍属性和身份，发展出适应性强的多重身份认同。换言之，回流精英，尤其是在海外旅居多年的群体，发展出了既本土、又国际的身份认同。许多受访者感到，他们既无法被中国文化接受，也无法完全融入欧美，于是一种新的、流动的身份应运而生。一如一名受访者表示的：“美国人问我，我答我是来自内地的美国公民；中国人问我，我答我来自上海，住在美国十年的海归”。长远看来，许多受访者仍根据事业与家庭考量未来

移居地，中国绝非终点站。

不过，在受访的小海龟们看来，中国依然是家。海外经历甚至增强了其民族情结与思乡之情。短期旅居、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的孤独经历，反使得他们对于中国的归属感更为强烈了。

尽管研究的样本数量与多样性仍有待提高，对于回流移民群体的探索则为我们思考移民问题打开了另一种可能的角度。固化的身份认同标签已随着全球化浪潮而愈发流动起来，而我们亦需要从新的角度审视自我、族群与民族主义。

参考文献

- Huang, Y., & Kuah-Pearce, K. E. (2014). "Talent circulators" in Shanghai: Return migrants and their strategies for success.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1–19.

“蓝翔”们的困境：差生才去职业学校？

户口制度的限制迫使很多初中成绩较好的学生不得不进入学习氛围差、“混日子”风气浓重的职校，最终也淹没其中。连职校学生自己也抱怨学校生活的荒废。在很多人观念中，职校成为了坏学生聚集的代名词，形成了阶层流动的恶性循环。

◎ 杨天兆

“挖掘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这一在社交媒体红极一时、塑造无数搞笑段子的潮语，将规模惊人、野心勃勃的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拉入公众的视线。段子手们对几万架挖掘机、几万名厨师整齐划一操练的调侃，侧面反映出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负面影响刻板印象。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凌旻华通过在上海近二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入接触走向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子弟。她发现：职业教育

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数不多的教育选项中的一个，而现实的限制让这些职校学生难以逃脱留在社会中下层的命运。可以说，“蓝翔”背后是无数学生和家庭的困境。

政府：开放职校教育，一石二鸟

为了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融入城市，同时淘汰“社会不稳定因素”，上海市政府从 2008 年起允许 32 所公立职业学校面向农民工子女招生。事实上，由于职业学校的市场化以及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这一政策也旨在缓解上海的“劳务荒”和职业学校间的激烈竞争。

政策指导有着鲜明的指向性：非上海市户口的务工人员子女，仅可以选择与制造业、服务业相关专业，例如酒店管理、美发、机械、汽修等一些社会急需但是劳力紧缺的行业。研究者认为，对就读专业的限制使得外来务工人员被进一步加打上了“低端廉价劳动力”的标签。在此政策的文件中甚至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他们使政府既解决了农民工子弟就业，也缓解了用工需求。

学生：随波逐流

在上海，只有一部分的公立职业学校面向农民工子弟招生，而

其中开放的专业也有具体的限定。许多农民工子弟，为了随父母留在上海，只能选择职业学校作为初中之后的下一站。研究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和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初中生一样，过着读书、学习、备考的典型生活，却突然之间被迫选择自己未来将长期致力的职业工种，提前结束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式的单纯生活。

研究者发现，由于在选择专业时缺乏经验和外界支持，又苦于家庭在上海没有较强的社会关系，他们普遍对就业前景充满迷茫。

研究者援引华盛顿大学丽莎·霍夫曼博士（Dr. Lisa. Hoffman）的一项研究进行比较——这项研究发现，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十分善于把自己的专业与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在选择就业的时候费尽心思；而作者研究中的农民工子弟却正好相反，他们尚不谙世事，更没有具体的经验和学校的帮助来辅助他们做决定，一切看起来都只是随波逐流。

不过，他们已然察觉到“外来务工”的社会评价并不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已经走出了父辈打工的定式，希望“自己当老板”。虽然萌生了“不再一辈子打工”这种观念，但他们所获得的机会十分有限，“老板梦”或许终究只是个梦。

职校 = 弃儿？

研究者指出，学习成绩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不仅仅是学生水平的量化，也暗示社会对一个年轻人整体的评价。而为了“抢生源”，许多职业学校不惜降低成绩要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许多人对职业学校教育充满不屑和鄙夷。户口制度的限制迫使很多初中成绩较好的学生不得不进入学习氛围差、“混日子”风气浓重的职校，而最终他们自己也淹没其中。连职校学生自己也抱怨学校生活的荒废。好学生嫌弃差生不学无术，但自己却也迷茫、无奈。“混日子”风气日益剧增，使得很多人观念中的职校成为了坏学生聚集的代名词，形成了阶层流动的恶性循环。

不同于普通高中时时要面对来自教育部门和家长对应试成绩的期待和压力，职校并没有一个热心的“监管者”来保证其学业的进步。职校学子许多来自中下阶层，家长自身并未接受良好的教育，家庭教育几乎为零。教育部门对职校也没有过高的期许，似乎在职业学校里荒废学业理所应当。与普通高中系统要经历频繁的统考、测试甚至排名不同，职校甚至缺少一个统一的标准化考试。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许多职校为了节约开支，更雇佣外省来的退休教

师，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整个教师队伍的水平良莠不齐。

这篇论文很好地用职业学校作为题材探索了中国当代的阶层流动。农民工子女虽然得到了正式走向城市的渠道，但是户口制度的不公、教育资源的差异以及观念上囿于成见还是让许多农民工子弟回到了父辈的中下阶层。

上海的实例分析在带来了许多一手材料的同时，也应该引起我们对整个职业教育系统的关注。诚然，职业学校再造中下阶层的困境来源于制度、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但社会对职校教育的负面评价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的“代际传播”。本文虽以“蓝翔”为题，但实际上蓝翔技工学校蒸蒸日上，而这也使得“蓝翔”的流行终究带了那么一丝戏谑与遗憾：正因生活中的职校并非如此，蓝翔才显得那么突出。

参考文献

- Ling, X. (2015). “Bad students go to vocational schools!”: Education,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youth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73, 108–131.

为什么人人都说自己是“屌丝”？

户口制度的限制迫使很多初中成绩较好的学生不得不进入学习氛围差、“混日子”风气浓重的职校，最终也淹没其中。连职校学生自己也抱怨学校生活的荒废。在很多人观念中，职校成为了坏学生聚集的代名词，形成了阶层流动的恶性循环。

◎ 柴路得 / 特约观察员

自 2012 年以来，“屌丝”一词不仅横行网络，还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屌丝心态”），甚至与其拼音写法一同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大银幕。

现在，“屌丝”已不只是相对于“高富帅”的“矮穷矬”。从年轻农民工、醉心于网游的宅男到不限于单身白领、码农的网民们，再到在常青藤学府接受精英教育的学生，人人都毫不介意且乐于自我认同为“屌丝”。究竟是什么使中国人团结在“屌丝”这个微妙

而暧昧的标签下？

屌丝 = 中国的 99%?

在研究者 Marcella Szablewicz 的观察中，屌丝文化现象具有变色龙式的本质，在不同语境中被阐释为不同的意义，并有流动的意义生产过程。有趣的是，“屌丝”一词是由自己的反面所定义的：“屌丝”是什么众说纷纭，但至少决不是“高富帅”，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不能与“女神”约会。

“屌丝”不能完全算作当代版的“阿 Q”，尽管它具有精神胜利法的部分特质。屌丝与阿 Q 最大的不同在于：屌丝是被互联网媒体的革命性分享力量所建构的。屌丝不仅仅是个体身份标签，更形成了一个通过在线交互建立身份认同的群体。

从根本来说，“屌丝”直接揭示出中国社会经济现状迫使年轻网民希望幻灭的事实：社会阶层剧烈分化与阶层间流动性的严重缺乏。虽然“屌丝”只能勉强被翻译为并不准确的“loser”或“screw”，却有另一个著名英文词条在一定程度上与“屌丝”共享了时代精神——那便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99%”（运动中常见的标语即“我们代表 99% 不再承受 1% 的贪婪与腐败”）。这二者跨越中西方

语言界限，共同指向一个区别于占有财富与权力的少数人“集体”，指向一个残酷的事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难之又难。

矛盾的情感共同体

“屌丝”既挑战了又强化了人们惯有的观念。屌丝话语与多种大众文化消费话语相联系。与其表面上的无意识恶搞相矛盾的是，“屌丝”依赖着并有意识加强了一个刻板而悖反的预设：财富和地位是男人权威和吸引力的绝对来源。同时，女性依旧被置于以外貌与性作为衡量标准的权力秩序之下。除了“女神”或“女屌丝”，一系列对女性更具有冒犯性的词也都与屌丝话语联系在一起，比如用于界定女人性经验多少的“黑木耳”和“粉木耳”。

Szablewicz 将屌丝分析置于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关于“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的理论框架中，认为屌丝话语尚未形成发展完全的“对抗性公众”，而是表现出一种以鲜活现实生活体验为纽带的集体情感认同。就如文化理论家 Sara Ahmed 认为“情感”其实是一种“社会力量”一样，“屌丝”凝聚了焦虑的年轻人们对现实不满的情感共识，他们期待重塑其可

实现的生活方式，也乐于拥抱新身份和新的流动可能性（比如“逆袭”）。

“屌丝”还意味着对某种成功观的抵抗。人类学家 Lisa M. Hoffman 描述过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爱国专业主义”（patriotic professionalism）：大量青年人才因其成长、教育背景对国家形成强烈忠诚心，以“爱国主义”之名规划职业，并为了国家发展更好而在其专业素养上持续精进。学者 Andrew Kipnis 则勾勒过一幅以“教育渴望”（educational desire）占据中心的中国图景：家长们渴望孩子考入大学以改变命运；教育资本化，家庭与政府投入不遗余力；以及所有教育机构的激烈竞争。正是“爱国专业主义”、“教育渴望”以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成见一同形塑了中国式成功观。在 Szablewicz 看来，“屌丝”共同体的意义在于其暗含着一种对这种成功观的隐形拒绝与抵抗。

日常政治还是集体高潮？

在 Peidong Yang 和他的合作者们看来，“屌丝”则是一个日常政治（infrapolitics，亦有底层政治、内部政治等多种译法）的典型样本。他们的研究在“屌丝揭示社会流动性现实”方面与上文提

及的 Szablewicz 解读遥相呼应，并且指出了其他面向——

首先，“屌丝”所形成的全民自嘲其实是一种对于政治环境的反应。研究东欧后社会主义的学者 Boyer 及 Yurchak 将高度渗透国民生活的官方话语模式命名为“超级日常化”(Hypernormalization)。这些话语具有过量、刻意阐释、重复而模板化的特点，与人们日常语言和思维模式相隔甚远。在 Peidong Yang 等人的研究中，“屌丝”被理解为一种对于刻板生硬、非人性化的政治话语（譬如新闻联播）最普遍而直接的民间反馈：中国网民简单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利用平民粗话形成恶搞式反抗。就像其他同类型热词一样，比如“屁民”和“裆中央总竖鸡”，“屌丝”也是一个“粪便学”(scatology)意义上的比喻，直接将与人体性器官部位有关的身体经验修辞化。尽管不雅，它们却是最身体化和人性化的表达，且与官方话语形成直接对峙。

其次，这些研究者们建议屌丝现象也不应被过度政治化解读。“屌丝”一词并无诉求社会转型或制度变化，甚至不如“草泥马”等词更明显的政治指向。屌丝共同体更多建立在虚拟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让大众想象和消费的集体幻象。这个幻象的集体性来源于“屌丝”产生的“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

cy，人类学家 Michael Herzfeld 提出的理论)：面对外国人来说很尴尬、难于启齿或丑陋，甚至粗俗的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秘密”，对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局内人”来说反而恰能加强文化认同、亲密感和凝聚感。

无论实际身份如何，中国人在自诩为“屌丝”的认同过程中都分享着一种隐秘的快乐：既隐含对现实的批评，“政治正确”地宣泄不满，又通过昭示谦虚美德对已有或将有的地位和财富构成自我保护，还能与“他者”结盟，达到集体娱乐的高潮。在这个意义上，“屌丝”精准捕捉了当前最被中国人自己广泛接受的作为普通中国人所具有的共同特质。因此，屌丝身份可被看做是一种对中国性或国民身份的最新阐释。

参考文献

- Szablewicz, M. T. (2014). The 'losers' of china's internet: Memes as 'structures of feeling' for disillusioned young netizens. *China Information*, 28(2), 259–275.
- Yang, P., Tang, L., & Wang, X (2014). Diaosi as infrapolitics: Scatological tropes, identity-making and cultural intimacy on China's Internet. *Media, Culture & Society*.

如何“优雅”地让你爱国：历史教育的作用

从前着重彰显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战胜封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胜利者叙事”，悄然被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艰难抵御外来侵略的“受害者叙事”所取代。

◎ 杨天兆

历史上通过暴力胁迫百姓追随国家政权的例子并不少见，今天大多数政权已摒弃了这种赤裸裸的“强迫性爱国”。现代国家更愿用文明和温婉的方式激发人民的爱国之心，历史教育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普及历史常识”的旗号背后，爱国性的历史教育还会给受教育者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打砸”日货、保卫奥运火炬、反对台独等等，这些不同层面的事件都与人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息息相关。

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的汪铮副教授阐述了

他对中国历史教育的案例研究。他针对 1991 年起中国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反思教育如何潜在地影响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也被编入汪铮所著的《勿忘国耻：中国政治与外交关系中的历史记忆》一书中。该作品更加全面地探讨了历史教育对中国外交的深刻影响。

研究者认为，这一运动的背景根植于苏东剧变、“和平演变”、民主化运动等对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全文从五个方面重点讨论了发端于 1990 年代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首先，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课程经过改革，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叙事变为更多地介绍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而从前着重彰显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战胜封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胜利者叙事”，也悄然被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艰难抵御外来侵略的“受害者叙事”所取代。2002 年教育部颁布《历史教育大纲》，以官方口吻指导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同时系统地将新的历史教育融入各级学校的教学中。如今高等院校中“中国近现代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以及国防教育等课程的设置，也是此运动的延续。

第二，党政系统内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得到突出。在领导人的许多讲话中，从前党员干部浓厚的阶级色彩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为复兴民族、振兴中华而艰苦奋斗的新形象。例如，江泽民任总书记期间就曾通过多次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了“最大牺牲”、“最大贡献”。而这种基于民族主义情感，动员党员干部为“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官方话语，已然完全取代过去共产党员身上红色意识形态的印记，成为主流。

第三，国家广泛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5年，民政部将一百处纪念性建筑、遗址确定为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者将这些“教育基地”分为“对外战争”、“对内战争”、“神话故事”和“英雄人物”四大类，而以对外战争为主题的基地为四十个，占各类最大比重，可见其意义之重大。

第四，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形式与时俱进。2004年，由教育部等牵头，共十个党政机关参与制定和推出了爱国教育“三个一百”名单，即百种爱国主义教育歌曲、电影和图书。同时，通过安装多媒体工具，增加互动，许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力求在形式上一改旧貌，吸引年轻一代。而“红色旅游”的推出，更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休闲旅游结合，旨在用灵活有趣的形式，更“优雅”地教你爱国。

最后，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正成为制度化的长期政策。作者指出，以往研究表明，思想只有具体地成为社会制度和规则，才能拥有政治影响力。不同于一些受制于领导人意志的短期政策以及传统、激进的群众动员运动，爱国主义教育似乎并不是“三分钟热度”。执政党使用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越来越倾向将这一运动日常化（routinization），如通过设立相关领导小组、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政治生活等。1994年，中共中央通过的《爱国主义实施纲要》也强调爱国教育是一项长期政策，全体党员干部都应“坚定地、不懈地”为之努力。

不难发现，越来越多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事件在近年爆发。研究者指出，这也许可追溯至始于1991年的这一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所带来的非理性情绪。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年轻群体中得到很多共鸣，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外，执政党需要保证民族主义思想仍在其控制之内，否则来自社会的压力或许会给外交政策的正常制定带来不便；对内，爱国、民族主义使得执政党维护和强化了其合法性，尤其可以防范“敌对势力”在思想上的“演变”。而这一点也符合国际关系中“吸引注意力政策”（Diversionary Policy）普遍观点，即国家通过渲染对外矛盾

缓解自身内部矛盾。

不过，是否这些爱国主义行为的爆发都来自执政党的教育运动呢？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就在其遗著《中国大陆和台湾政治的文化逻辑》中指出，华人传统政治文化本身就存在儒家思想中倾向服从权威的一面。也就是说，当今社会的爱国主义行为也许可以在历史和文化中找到原型，而不仅仅是当代政治教育的结果。

同时，牛津大学的艾利娜·辛肯恩（Elina Sinkkonen）博士就曾在其研究中开创性地指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中国并非“同义词”，实际上两种情绪可能使得人们对同一政策或事务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因此，研究者在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进行了深入剖析的同时，也留给我们许多思辨的空间。

参考文献

- Wang, Z. (2008).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4), 783–806.
- Wang, Z. (2012).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陶郁. (2013).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政见
CNPolitics. <http://cnpolitics.org/2013/12/nationalism-patriotism>

环境与健康

穹顶之下，我们无路可逃。

怎样让市长关注环境治理？

虽然 GDP 依然是升迁指挥棒，但环境污染已经开始影响官员仕途，使他们不得不重视治污。同时，公众越关心环境污染，政府官员也会越上心。

◎ 马亮

中国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触目惊心，但许多人乐观地认为：经济增长迟早会推动环境改善。

的确，环境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监管状况之间是 J 型曲线关系——穷国几乎没有动力执行环境政策，而当中等收入国家日益富裕时，它们的环境监管力度也会快速增强。

这种简化的理论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政府官员是治理环境污染的关键主体，能否对他们施加适当的激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天能否变蓝。

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干部考核和晋升机制，使政府官员少有动力关注环境保护。但是，中央政府近年来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试图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并赢得执政合法性。比如，自“十五”规划以来，中央下达能源效率和主要污染物浓度等约束性指标，对地方政府进行环境保护绩效考核。

与此同时，许多地方都因为环境污染和邻避运动而发生群体性事件，危及地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民众也借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表达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对政府施加外部压力。民众的关注、参与和抗议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使政府不得不重视环境保护以维稳。

在中国，城市领导人更像“三明治”中的“夹心层”，受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压力。在这种背景下，环境治理绩效会影响市长的升迁机会吗？来自中央和民众的压力能否推动市长重视环境保护？清华大学的郑思齐和孙伟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Matthew E. Kahn 以及中山大学的罗党论最近撰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环境改善有助于市长晋升

该研究首先考察了环境绩效对市领导升迁的影响。由于数据限制，研究样本为 86 个主要城市 2004–2009 年的数据。该研究涵盖了市长和市委书记，但以市长为主，因为市长主要负责城市日常管理。

环境绩效的衡量包括了反映政府投入的会计核算指标，以及体现实际污染状况的指标。能源效率以单位 GDP 的能源消耗量来衡量，以各城市的产业结构换算。空气污染状况的测量指标有两个：废弃处理设施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

不出所料，数据分析显示：经济增长绩效是决定市长升迁的最关键因素。相对于前任来说，现任市长在任期内的经济增长率越高，就越有可能被擢升为市委书记。

但是，如果城市的环境状况得到了改善，市长也更有可能获得升迁。与空气质量没有变化的城市相比，空气质量改善最大的城市市长平均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的升迁概率。

相对于实际污染指标（如 PM10），会计核算指标（如能源效

率和环境投资)对市长升迁的影响更明显,这表明中央政府更倾向用此类指标对下考核。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指标更容易被测量和收集,尽管它们同环境改善的直接关系并不紧密。

公众关切推动城市改善环境质量

该研究使用谷歌搜索热度来衡量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切程度,以各省搜索“环境污染”的强度为测量指标。此外,还通过谷歌搜索各城市主流报纸对“环境污染”的报道篇数,将其除以发行量来予以标准化。

研究表明,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程度差异较大。空气污染越严重,当地公众就越关注环境污染议题。有趣的是,与香港的地理距离越近,相对来说媒体开放程度越高,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切程度就越强。

与此同时,人均GDP越高,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率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公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也越强,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程度也更大。

研究还发现,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越强,市长就可能更努力地治理污染。有趣的是,市长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市长就

越有可能节约能源并投资环境治理。

拐点可能提前到来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通常用于刻画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关关系，认为二者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即在经济起飞前人均 GDP 与环境污染正相关，但当收入水平达到某个临界点时，二者转为负相关关系。

研究显示，中国城市的人均 GDP 与环境污染呈现 S 型曲线关系。由于早期城市的人口规模小，环境治污影响大，使经济与污染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是，目前多数城市都已进入倒 U 型曲线的区间。所以，至关重要的是判断污染下降的“拐点”何时到来。

这则研究表明，来自公众的环境关注度越高，居民和市长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就更早来临。换句话说，关注环境改善的居民和市长使这些城市不必等到经济发展水平达到预定值，就可以提前享受环境污染伴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的好处。

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都会影响政府官员的仕途，而二者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为了谋求升迁，地方主政者不得不

找到某个平衡点，以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环境。公民社会的发育可能调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天平，使地方官员更关心环境治理。

参考文献

- Zheng, S., Kahn, M. E., Sun, W., & Luo, D. (2014). Incentives for China's urban mayors to mitigate pollution externalities: The rol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ism.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47, 61–71.
- 郑思齐, 万广华, 孙伟增, 罗党论 (2013). 公众诉求与城市环境治理. 管理世界, 6.

资源何以成为善治的“诅咒”？

在中国的一些省区，自然资源越丰沛，地方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投入反而越少。这种“资源诅咒”背后有三大重要成因。

◎ 陶郁

资源本是造物主的恩赐，但它在人间却往往成为带来严重治理问题的诅咒。国人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煤都山西的“塌方腐败”。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詹晶教授等学者分析了“资源诅咒”的另一个面向：在中国的一些省区，自然资源越丰沛，地方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投入反而越少。

此前，对“资源诅咒”现象的研究几乎都集中于跨国比较。对

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研究显示，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丰饶的资源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经济表现，反而常会带来许多不利于长期发展的问题。

例如，在资源丰饶的国家，政商巨头只要牢牢控制与资源相关的产业，就能够轻松获得丰厚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压力与动力去回应普通民众的意见与诉求，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而且常会因为过分贪图眼前利益而忽视对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公共投资。

为了探索“资源诅咒”是否也可能存在于一国之内的某些地区，詹晶及合作者们整合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两种研究方法。一方面以省为单位对资源依赖程度与公共投入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另一方面在山西、江西和内蒙古等地的一些重点矿区开展了实地调查，厘清了导致资源型地区治理水平相对较低的三个机制。

统计数据显示，在包括山西在内的许多内陆省份，资源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据了相当显著的比重；来自资源行业的增值税、营业税和其他相关税费，往往构成了省级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西、黑龙江、青海和新疆等四省区，资源产业对GDP总量的贡献达到或者超过了两成；而在陕西省，这个比率也超过了10%。

为系统测量各省经济对资源产业的依赖程度是否导致其对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投入存在差异，詹晶教授及合作者们综合了数个统计年鉴的资料，构建了 1999 至 2009 年间的数据。经过统计分析，他们发现，那些经济更依赖资源产业的省份，对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投入确实显著更低。平均来说，就每年的人均教育投入而言，经济最依赖于资源行业的省份要比经济最不依赖资源行业的省份低 1.7 元；而就每年的人均医疗投入而言，前者更比后者要低上 2 元——考虑到在 1999 至 2009 年间，人均教育和医疗投入的省级年度最低值分别仅为 32 元和 10 元，上述统计结果所揭示出的“资源诅咒”，称得上触目惊心。

那么，为什么在一些省区，资源不仅没能带来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更高投入，却成为了影响治理水平的“诅咒”？学者们在五个资源城市进行深入调查，发现背后有三大重要原因：一是资源型经济结构对本地劳动力的需求较少，地方政府没有投资教育和医疗以提升人力资本的迫切需求；二是资源型地区政府职能长期由企业分担，导致地方政府对自身在教育和医疗的义务在认识和作为上都不足；三是资源型地区的居民和官员存在短视心理，忽视对人力资本的创作和培养，不重视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

就经济结构而言，在资源大省，经济活动往往围绕资源行业展开，而与资源关系不密切的行业则往往发育不良，甚至会出现萎缩。例如，研究者们发现，随着山西某市资源产业在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原本齐备的工业体系不再能够平衡发展，形成了煤炭产业一家独大的格局；在羊绒制品久负盛名的内蒙某市，随着煤价不断提升，采矿业的利润越来越丰富，而畜牧业和相关的加工业则随之严重萎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条件较好的采矿企业往往借助丰厚的资本实现了机械化与自动化生产，而那些条件较差的采矿点所需要的劳动力又往往不需要特别高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程度，加之企业偏爱雇佣更好管理的外来务工人员，使得资源产业对于本地劳动的需求往往不足。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地方政府缺乏投资本地人力资本的动力。

就政府职能而言，资源型地区长期存在着政企合一的情况。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曾是常态：企业不仅为负担着员工的福利，实际上也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所在地区的公共服务职能，包括为驻地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改革以后，大部分行业实现了政企分离，然而在一些以矿区、油田为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政企分开的步伐相对比较缓慢。研究者们发现，直到最近，山西某市

的国有资产企业还要为当地中小学教育补贴 200 万元；甚至地方政府明确接管这些学校以后，企业还为学校的教职员又支付了两年工资。同时，该企业目前每年仍需投入 200 万元维系其附属医院的运转。虽然企业的贡献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方政府公共职能缺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企业的首要目标毕竟是生产经营，他们提供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往往不佳；同时，资源型企业对于教育和医疗等服务的投入规模，也会受其经营状况的影响。

就地方官员和民众的心理而言，资源型地区往往容易出现在一代人时间内暴富的情况，这或许能在短期内迅速改善民生水平，却可能导致地方官员和民众因短视而忽略投资教育和医疗等事关长期发展的领域。研究者们发现，在他们所调查的五个城市，都存在民众在本地发现资源后通过卖地获取大量收入的情况；而一旦卖地以后，民众即便不去工作，也可以依靠补偿款过上相当不错的生活。此外，对于生活在资源型地区的民众而言，相对于辛勤工作，“搞关系”更能从资源经济的发展中渔利。特别是在这些地区，由于资源企业所上缴的税费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官员往往会想方设法排除可能干扰企业生产活动的民商纠纷，“花钱买稳定”成为一种简便易行的手段，而一些民众也因此

产生了“吃大户”的心态，将精力放在如何尽可能从资源经济的发展中分得一杯羹上，而对于地方官员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服务则并不那么在意。

用于开采变现的自然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只有良好的治理结构才能保证一个地区的长治久安。研究者们建议，中央政府应该在提高治理水平和扩大人力资本建设投入等方面加大对地方政府——特别是资源型地区地方政府——的监督、引导和考核。

参考文献

- Zhan, J. V., Duan, H., & Zeng, M. (2015).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24.

跨省污染：为什么污染企业喜欢扎堆在省与省交界处

污染企业更愿意选址在本省与其他省份相邻的边界县市，省际边界仿佛成了一个“公共垃圾箱”。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环保政策的具体执行依赖地方政府，各地发展程度不同，环保政策的执行也有别，给了污染企业用脚投票的空间。

◎ 奚应红

在柴静的《穹顶之下》中，河北以负面典型的形象出现。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由于首都环保要求的提高，很多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逐步迁往河北。不过，它们并没有远离北京，而是落脚在临近北京的县市，以便继续享受地理优势，这也为所谓的“跨省污染”提供了条件。可见，污染企业的选址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着充分的理性考虑。

法国学者克洛伊·杜维威尔（Chloé Duvivier）教授以河北省

为例进行分析，发现污染企业更愿意把厂址选在本省与其他省份相邻的边界县市。换句话说，省与省交界的县市比坐落在省内部的县市更容易吸引污染企业。这一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而交界县市的居民则更加容易受到高比例的污染的影响。

在这篇论文中，研究者排除了不同县市的面积、人口、人均GDP、受教育程度以及邻近省份县市的市场和资源空间等因素的影响，经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污染企业的确更倾向于在边界县市设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研究者提出了两个假设：“污染庇护所”和“搭便车”。

“污染庇护所”的假设认为：污染企业更愿意把厂址设在环保政策执行相对较松的地区。远离中心、且与他省相邻，就既能避免较严格的环保监控，又可以享受邻近省份的市场红利。

“搭便车”效应则体现在某一省份更愿意把环保的时间和成本花费在人口集中的本省内部，而省际边界就成了一个“公共垃圾箱”，人人都可以放，却没有人愿意清理。

这两个假设能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环保政策执行的“去集中化”。虽然环保部的权力越来越大，但它仍然只是在宏观

层面进行调控和把握，而具体的执行则更多依赖地方政府。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异质化程度特别高的国家，各地之间的发展程度不同，环保政策的执行也有别。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差异，污染企业才有了用脚投票的空间。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集中环保政策，减少地方自主解释的空间？这是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

文章的分析主要是站在企业自身利益得失计算的经济学角度，但经济学的分析并不总是奏效。研究者也提到，之前已经存在的重工业企业选址更多是出于国防和政治的需要，远离海边，躲进深山，才有所谓的“三线建设”。而且那时候并没有环境保护的意识，国家也没有出台相关政策，也就谈不上企业的自利考虑。随着污染情况的越来越严重，国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清晰，才给企业自主选择带来了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企业选择“跨省”的现象越来越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论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边界县市污染企业的数量上，而不是生活在边界县市的居民受污染伤害的程度上，显得好像没有切中要害，毕竟研究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还是要落实到人本身，污染企业的数量也不能等同于污染的后果。研

究者也承认，如此选择的原因还是由于数据的缺乏和环境监测的不到位。或许住在边界县市的人们更严重受到污染伤害可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假设。

参考文献

- Duvivier, C., & Xiong, H. (2013).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polluting firms' location choices in Hebei provinc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18(4), 459–483.

高速公路长假免费通行的环境代价

人们对小型客车在重大节假日免费通行的政策拍手叫好，但这项政策也可能导致值得关注的环境代价。研究显示，2012年国庆长假的免费通行使空气污染恶化了20%，公共健康成本超过10亿元。

◎ 马亮

春节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许多人开车回家过大年。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人们可能忽略了由此导致的空气污染问题。实际上，与燃放烟花爆竹一样，道路免费通行的空气污染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2012年国庆长假期间首次施行道路免费通行，西南财经大学的傅十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谷一桢研究了它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他们发现，与2011年国庆长假相比，免费通行使2012

年国庆的空气污染指数（API）增加了20%，PM10增加了27%，能见度降低了一公里。仅就PM10的恶化来说，节假日期间的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高达11.8亿元。

道路收费的环境效应

尽管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等许多城市推行道路拥堵收费政策，但有关道路收费的环境效应却鲜有研究，而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则更不多见。

2012年7月24日，国务院同意交通运输部等制定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在重大节假日期间免费通行收费公路。许多人为之拍手叫好，认为这项政策还利于民。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道路免费通行的一个负面效果是严重的环境负效应——私家车“扎堆”出行，造成触目惊心的交通拥堵，高速公路变成“龟速路”甚至停车场。当机动车低速运转时，其排放的尾气更甚，空气污染更为严重。

高速公路多数是连接城市之间的道路，但由免费通行引致的高速公路交通量，也会使市内交通状况恶化。因此，道路免费通

行也会对城市空气污染产生影响。

免费通行的准实验研究

研究者利用中国 98 个城市 2011—2012 年间的日均空气污染和天气数据，排除了风速、温度、湿度、降雨量等天气因素的影响，使用回归断点法和双重倍差法进行模型估计。这些城市的空气污染、天气状况和高速公路数据等都可以公开获取。

将国庆长假视为外生的政策变量，研究者估计了它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结果显示，2011 年国庆长假期间的空气污染程度优于同期工作日，但 2012 年国庆长假期间的空气污染程度则有所恶化。由于两个节假日之间的唯一差别是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否免除，因此可以推测免费通行导致了空气污染的恶化。

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的出台，可能使原本计划在节后的旅行因此而提前到节假日期间。环境健康文献将此称为“收割效应”，即免费通行政策失效后，通行量锐减，空气质量自然会提高。

不过，当研究者将节假日后的日期考虑在内后，发现节后空气质量的改善并不明显，说明不存在所谓的“收割效应”。当然，人们也可能将原本计划在节前的旅行推迟，但结果同样表明不存

在这种影响。

基于样本城市的高速公路收费标准，研究者还计算了空气污染的通行费弹性系数。其值为 0.16，即通行费每降低一个单位，空气污染上升 0.16 个单位。换句话说，将通行费提高 10%，可以使空气污染降低 1.6%。如果单从该弹性系数来考虑，若收取适当的通行费，可以缓解道路免费通行导致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不过，收费又会牵扯到许许多多其他方面的问题。

高速公路在长假期间免费是惠民举措，但人们在节假日出行时最好能同时考虑环境影响，尽量选择绿色方式。当然，相比免费通行政策的“利好”而言，空气污染的负效应到底有多大，仍然值得研究。毕竟，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环境负效应而因噎废食，而更需要通盘考虑，从该政策的“净效应”来予以评估，可能更为合宜。

参考文献

- Fu, S., & Gu, Y. (2014). Highway toll and air pollu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ssrn.com/abstract=2517819>

空气污染如何影响平均寿命： 来自环境经济学的解释

空气中 PM10（包含了 PM2.5）的浓度每增加 100 μg / 立方米，人群（包括出生婴幼儿）的预期寿命减少 1.5 年；而对于 5 岁以上的人群来说，预期寿命减少 2.3 年；每十万人中由于心肺疾病致死的数目增加 79 人。

◎ 康思勤 / 政见特约观察员

穹顶之下的中国，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空气污染的危害。来自环境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空气污染确实对居民健康和平均寿命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引发更多心肺疾病导致的。

中国社会在过去二十年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寿命在这期间增长了 5.4 年。然而，这个看起来不错的寿命增长，比起同期的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来得都低——虽然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大大低于中国大陆。更值得注意的

是，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长大部分源自减少贫困人口之后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相对而言，成年人寿命的实际改善并没有统计数字看起来那么美好。

究其原因，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可能是罪魁祸首。作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严重的空气污染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里广泛存在，然而一直缺少详实的污染、寿命和疾病数据以供学界分析。此前，陈玉宇和李宏彬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文章借助“烧煤供暖以淮河为界”这一政策进行研究，发现在烧煤供暖会降低人均寿命五年。令人震惊的结果引起了多方辩论，关于文章的批评一方面在于方法论上的缺陷，例如断点回归的结论只能应用于淮河两侧的城市而不是整个南北方，对生活环境有顾虑的人群会主动进行迁移等。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并没有直接检验空气污染是如何影响人均寿命的，以及对于不同年龄的人群有何不同的影响。

为了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Ebenstein 和何国俊等学者从中国国家疾病监测点获得了各地的平均寿命数据，将每个城市（观测点）的平均寿命数据与中国环境年鉴中各地的空气污染数据相匹配，进行微观经济学分析。他们发现，空气污染显著阻碍了中

国人的健康改善。

他们的证据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长期观测表明，由污染导致的死亡率下降比其他死亡原因要缓慢得多。换句话说，由心肺疾病（cardiorespiratory illnesses）导致死亡的人群比例飞快上升。

另一方面，文章作者检验了不同城市的收入、污染和健康水平的差异。他们运用横截面上的回归模型发现，重度污染会降低人均寿命，但是并非直接降低每个人的寿命，而是通过增加心肺疾病实现的。一阶差分模型结果表明，对于长期处于空气污染下的人群而言，空气中 PM10（包含了 PM2.5）的浓度每增加 100 $\mu\text{g} / \text{立方米}$ ，人群（包括出生婴幼儿）的预期寿命减少 1.5 年；而对于 5 岁以上的人群来说，预期寿命减少 2.3 年；每十万人中由于心肺疾病致死的数目增加 79 人。

拿青岛（位居全国空气质量改善程度较好的四分之一）和武汉（空气质量改善程度较差的四分之一）作具体的例子来说，青岛的 PM10 指数降低了 $67.9 \mu\text{g} / \text{立方米}$ ，而武汉只降低了 $19.2 \mu\text{g} / \text{立方米}$ 。根据模型推断，在由空气质量改善而提高的平均寿命上，武汉的全部人群（包括婴幼儿）比青岛要少提高 0.75 年，而对于 5 岁以上的居民来说，这一数字是 1.11 年。

这篇论文从环境和健康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寻找空气污染致病途径”的问题。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但是该文“空气污染主要是通过增加心肺疾病死亡的途径降低平均寿命”的结果暗示空气污染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些易得心肺疾病，或者是已经罹患心肺疾病的人。这个结论也意味着空气污染程度较高的城市应该增加在心肺疾病方面的医疗预防和保障投入以保障居民的福利。

柴静的《穹顶之下》让空气污染再次成为关注热点。正如@Stanford于洋所提醒的，“记者的职责是提醒人们注意问题，不应苛责其呈现的完整性。那么研究者的责任就是接棒记者，呈现更完整和深刻的事实。”我们不应止步于声讨两桶油、煤炭企业、汽车，也不应该简单化伦敦治理雾霾的过程，而应该深入讨论空气污染对健康和寿命影响的具体机制，影响规模和后果程度。

参考文献

- Ebenstein, A., Fan, M., Greenstone, M., He, G., Yin, P., & Zhou, M. (2015). Growth, pollution, and life expectancy: China from 1991–201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空气污染数据造假，这些城市嫌疑最大

对中国 113 座环保重点城市的分析显示，半数城市在 2001-2010 年间在空气污染数据上存在造假嫌疑。城市造假很狡猾，往往在能见度高和风速低的时候下手，以掩人耳目。

◎ 马亮

还记得“我为祖国测空气”运动吗？2011 年底，北京雾霾极为严重，但是北京市环保局的官方数据却就很“和谐”，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监测数据则一度“爆表”。两个来源的数据“打架”，让人们开始怀疑官方数据的可信度。于是，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发起“我为祖国测空气”，期望募捐自购监测设备，以发布独立的空气污染数据，与官方数据“抗衡”。但是，环境监测设备昂贵且专业性强，“小米加步枪”的便携式自测设备的专业性同样备受

争议。

那么，问题来了。官方数据是否造假？如果造假的话，如何找到证据？加州大学两位研究者试图通过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使用 2001—2010 年的中国 113 座城市日均空气污染浓度数据，揭示了城市自报数据的造假证据与造假时点。

他们的研究显示：高达一半的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造假嫌疑。有意思但是，城市的官方数据往往倾向于在不易被觉察的时间造假（如能见度高而风速低的时候），以避免被发现。

不过，数据造假并非“天衣无缝”，通过两位作者开发的方法，就可以揭露其篡改行径。两位作者将其形容为“徒劳的修饰”，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城市篡改空气污染数据是徒劳无益的。

空气污染数据的造假诱因

为了激励城市政府重视空气污染治理，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中往往包括诸如“蓝天数”这样的指标，即全年空气污染指数低于 100 点的天数。比如环保部开发的“城考”体系，规定环保重点城市全年 85% 的天数必须达到蓝天标准。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越来越强，地方官员的晋升也受其影响，因

此他们有动力去达到这些环保考核指标。但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高昂，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弄虚作假显得更容易。

由于缺少独立的监督机制，地方官员有强烈的激励去弄虚作假，以低报空气污染数据并获得较佳的考核结果。

数据造假的危害是明显而严重的，因为它减弱了环境监测的预警效应，也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如果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但官方发布的数据却不予提醒，那么暴露在污染中的市民无异于“躺着中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承受污染侵害。基于这些被篡改的数据而开展的实证研究，也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则可能是误导性的，可谓“遗患无穷”。

研究者将数据造假界定为不报告真实污染水平的行为，如篡改数据或隐藏不好的污染数据。值得一提的是，数据造假不包括政府临时关停工厂、单双号限行等策略性行为——无论是 2008 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以及 2014 年的北京 APEC 领导峰会，政府都曾使用类似的手段，以在短期内改善空气质量。这些策略性行为虽然效率不高，但的确在短期内降低了污染程度，因此不能说是数据造假。

揭露数据造假的“福尔摩斯”

揭露数据造假的最佳方式当然是使用独立的数据来源，与官方数据进行比对。但是，这种数据往往很难获取，特别是大样本和跨时期的数据更难找到。

不过，还有别的办法来识破造假的蛛丝马迹。在不存在数据造假的情况下，空气污染浓度的分布应该是连续的或平滑的曲线。当地方官员试图造假时，最有可能在空气污染浓度处于蓝天标准的临界点上（即 API 为 100 点）时下手。

这样一来，把略高于临界点的数据稍微拉下来一点，就可以使当天的空气污染数据符合蓝天标准，且不容易被人察觉。如果这种情况三番五次地发生，就可以说明存在数据造假的嫌疑。

研究者的数据来自隶属于环境保护部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它只是汇总各地政府上报的空气污染数据，因此数据如果发生造假，应归因于地方政府。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外披露的数据只有 API 和主要污染物，而不包括各污染物的具体浓度值。研究者获取了所有详细数据，发现城市的 API 均值是 76.32，蓝天数占 84.6%，刚好接近蓝天数的考核标准（85%）。

研究者使用一种叫做“断点检验法”的方法，发现数据中的确存在值得关注的造假问题，其表现是：在临界点上出现不连续的断点。

他们发现，大约半数的城市存在捏造 PM10 污染浓度的嫌疑。但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数据造假并不明显。由于 PM10 是中国多数城市无法达到蓝天标准的主要诱因（高达 73.7%），因此在这个指标上造假就不足为奇了。

找准数据造假的时机

光发现造假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锁定城市造假的时机。这就需要通过适当的匹配方法，将地理位置和省份特征都类似的城市配对。研究者将地理邻近且属于同一个省份的城市配对，获得了 13 对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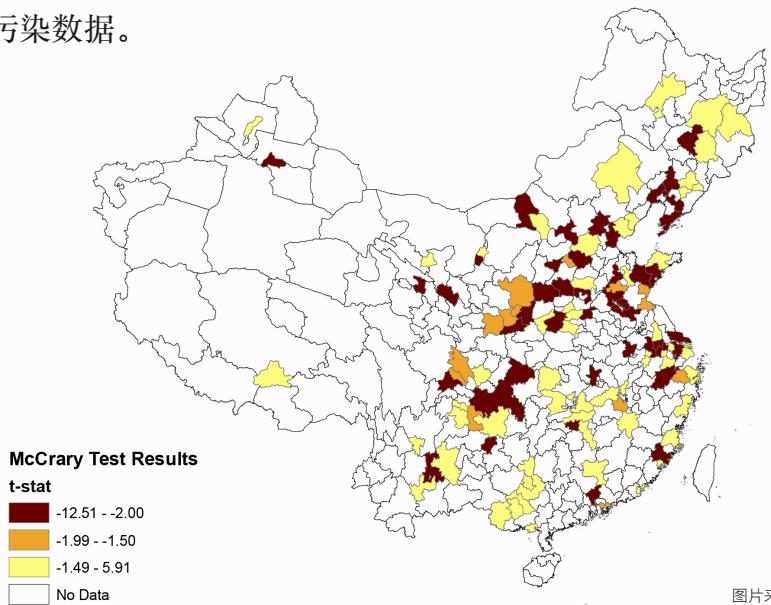
在能见度和其他天气情况相同的情况下，配对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应该是接近的。如果某个城市出现异常情况，就可以揭示城市在哪些情况下更倾向于造假。

研究者使用的气象和天气数据包括能见度、气温、大气压、降雨量、风速等，其中能见度与空气污染程度的相关程度最高，可

以视为空气污染程度的代理指标。气象数据来自美国的国家气候数据中心，天气数据来自中国的国家气象局。由于气象局没有激励去数据造假，因此可以将其报告的数据视为可信的。

借由“面板匹配法”，研究发现：13对城市中有4对没有造假嫌疑，剩下9对都有可能造假。

为了掩人耳目，数据造假最可能发生在异常情况不易被揭发的日子。在能见度高而风速低的时候，数据造假更容易发生。能见度高时，人们会认为空气污染不严重，造假不易被觉察。风速低的时候，空气污染物无法随风而去，需要人为干预以影响空气污染数据。



图片来自原论文

猫和老鼠的游戏仍将继续下去

这项研究只是说明处于临界点的数据造假更容易发生,但实际上数据造假可以在任何环节出现,因此其严重程度可能被低估了。

城市	造假嫌疑指数	城市	造假嫌疑指数	城市	造假嫌疑指数	城市	造假嫌疑指数	城市	造假嫌疑指数
沈阳	☆☆☆☆☆	武汉	☆☆☆☆☆	泸州	☆☆☆	北海	☆	厦门	☆
石家庄	☆☆☆☆☆	广州	☆☆☆☆☆	铜川	☆☆☆	秦皇岛	☆	金昌	☆
鞍山	☆☆☆☆☆	济宁	☆☆☆☆☆	泰安	☆☆☆	韶关	☆	哈尔滨	☆
北京	☆☆☆☆☆	泉州	☆☆☆☆☆	绍兴	☆☆☆	宜宾	☆	攀枝花	☆
成都	☆☆☆☆☆	枣庄	☆☆☆☆☆	呼和浩特	☆☆	吉林	☆	焦作	☆
南京	☆☆☆☆☆	南通	☆☆☆☆☆	烟台	☆☆	马鞍山	☆	遵义	☆
合肥	☆☆☆☆☆	大连	☆☆☆☆☆	扬州	☆☆	九江	☆	齐齐哈尔	☆
杭州	☆☆☆☆☆	安阳	☆☆☆☆☆	拉萨	☆☆	温州	☆	湖州	☆
西宁	☆☆☆☆☆	长治	☆☆☆☆☆	曲靖	☆	保定	☆	株洲	☆
渭南	☆☆☆☆☆	兰州	☆☆☆☆☆	邯郸	☆	三门峡	☆	石嘴山	☆
长春	☆☆☆☆☆	潍坊	☆☆☆☆☆	宜昌	☆	赤峰	☆	牡丹江	☆
洛阳	☆☆☆☆☆	大同	☆☆☆☆☆	芜湖	☆	上海	☆	淄博	☆
重庆	☆☆☆☆☆	济南	☆☆☆☆☆	唐山	☆	郑州	☆	桂林	☆
锦州	☆☆☆☆☆	镇江	☆☆☆☆☆	福州	☆	岳阳	☆	海口	☆
天津	☆☆☆☆☆	贵阳	☆☆☆☆☆	南充	☆	自贡	☆	湛江	☆
开封	☆☆☆☆☆	银川	☆☆☆☆☆	汕头	☆	常德	☆	珠海	☆
湘潭	☆☆☆☆☆	宝鸡	☆☆☆☆☆	玉溪	☆				
青岛	☆☆☆☆☆	德阳	☆☆☆☆☆	无锡	☆				
苏州	☆☆☆☆☆	咸阳	☆☆☆☆☆	克拉玛依	☆				
徐州	☆☆☆☆☆	延安	☆☆☆☆☆	平顶山	☆				
常州	☆☆☆☆☆	日照	☆☆☆☆☆	本溪	☆				
包头	☆☆☆☆☆	绵阳	☆☆☆☆☆	宁波	☆				
太原	☆☆☆☆☆	连云港	☆☆☆☆☆	柳州	☆				
临汾	☆☆☆☆☆	阳泉	☆☆☆☆☆	抚顺	☆				
乌鲁木齐	☆☆☆☆☆	深圳	☆☆☆☆☆	南宁	☆				
西安	☆☆☆☆☆	南昌	☆☆☆☆☆	长沙	☆				

根据造假嫌疑从大到小排序, 不包括荆州、昆明和张家界的数据。贵阳的数据出现两次, 但都存在造假嫌疑, 我们以最小的数值为依据。造假指数据根据 T 检验的统计量大小计算, 五颗星代表存在严重造假嫌疑, 四颗星代表存在中度造假嫌疑, 三颗星代表存在造假嫌疑, 两颗星代表可能造假, 一颗星代表不存在造假嫌疑。需要说明的是, 统计结果只是提示性的, 统计参数的变化可能影响分析结果。(数据来源: 文中表 4 和表 5。)

该研究列出了数据造假和未造假的城市榜单和地图分布，从中可以发现无论南北、沿海或内地、大城市或小城市，都有造假的嫌疑。

有趣的是，为什么某些城市造假，而另一些城市却没有造假？其背后的原因何在，尚值得未来研究予以揭示。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出台后，特别是国家加强了大气污染防治举措，使各地政府不得不重视空气污染治理。随着各地数据直报系统的逐步建立，以及时均数据的实时发布，都使地方政府干预空气污染数据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数据造假的新迹象仍有待考察。

参考文献

- Ghanem, D., & Zhang, J. (2014). "Effortless perfection:" Do Chinese cities manipulate air pollution dat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68(2), 203–225.

越来越胖的中国孩子，越来越不平等的肥胖率

中国儿童的体重增速要大于身高增幅。超过一半的天津和上海 7 岁男童处于超重状态，而同样超过一半的广西农村 7 岁男童处于体重不足的状态。

◎ 刘冬舒

“民以食为天”，让人们吃饱肚子一直是中国的难题。数十年前，中国还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如今，农村和贫困地区依旧存在相当数量的营养不足现象。然而，在城镇地区——特别是诸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肥胖问题。

诺丁汉大学教授司马辉（Stephen Morgan）指出：中国有约四分之一的城市学龄儿童面临超重或肥胖，同时也有三分之一的儿童体重不足。看似矛盾的现实，充分揭示了当今中国营养摄入

和粮食发展问题的复杂和多样。这项研究不仅提供了不少关于中国儿童体重和营养摄入的有趣数据，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扩大的城乡和地区差异。

中国孩子长高了，但变胖更为明显

司马辉利用国际通行的 BMI 指数——即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来反应体重程度。数据主要源自 1975 年到 2005 年间的六次全国学生体质调查报告，该调查主要针对小学和中学的汉族学生。

从 1979 年到 2005 年，中国各年龄段儿童的身高和体重平均值都有所上升，而城乡之间的身高差距有扩大趋势。同时，BMI 指数平均值也在上升，这意味着中国儿童的体重增加速度要大于成比例的身高增幅。

总体平均值增加的背后是相当分化的变化趋势。一方面，严重体重不足的儿童比例有所上升，其中城市的体重不足儿童无论男女都增加了 10%，而农村男孩体重不足的比例甚至翻倍。相较而言，体重不足问题在女童中较为明显。

另一方面，超过四分之一的城市男童面临超重或肥胖，超过

13% 的城市女童和农村男童面临同样的问题，只有农村女童群体的超重或肥胖比例不足 10%。

在肥胖或超重儿童的比例方面，1985 年到 2005 年间的增幅相当明显。1985 年城镇男童和青年几乎不存在肥胖现象（0.19%），而在 2005 年，他们的肥胖率平均值已经超过了 11%。这巨大的增幅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对中国人生活方式和营养摄入的重大影响。

上海男童大半超重，广西农村男童大半体重不足

正如上文所言，城乡儿童的 BMI 平均值都有增长。90 年代之前，城镇和农村男孩体重水平相当，然而自 90 年代起，城镇男孩的体重稳定的超过了农村男孩，并且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例如，2005 年 7 岁城镇男童的平均 BMI 是 16.3，而农村男童只有 15.5；12 岁组的对比为 19.0:17.7；17 岁组为 20.9:19.9。女孩数据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这似乎印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

进一步分省分析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更为明显的城乡和地区差距。

例如，超过一半的天津和上海 7 岁男童处于超重状态，而同样超过一半的广西农村 7 岁男童处于体重不足的状态。许多省都存在相当数量的 7 岁农村女童处于体重不足状态，而近一半的城镇女童却可以达到或超过世卫组织推荐的标准水平。12 岁组和 17 岁组的数据同样展现了差距。

实际上，通过研究者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省际 BMI 均值差距在逐渐拉大，这种变化在所有年龄组的儿童身上都有体现。而且，最小 BMI 均值与全国平均均值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

研究者又按照东北、东部、中部及西部及直辖市（除去重庆）五个地区的数据来分析地区差异。结果显示，1979 年全国各地区 7—17 岁儿童的 BMI 均值几乎没有差异，而到了 2005 年，差异变得显著。西部地区的男孩和女孩都是全国最轻的，而直辖市地区的平均 BMI 则在所有年龄段位居各地区之首。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越容易肥胖，这与发达国家中低收入群体肥胖比例较高的现象截然相反。研究者指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深刻影响了东西部之间体重和营养摄入的变化：尽管全国似乎面临着普遍的青少年超重 / 肥胖问题，但西部贫困乡村的儿童显然是个例外。

营养摄入变化趋势的成对相关系数分析

研究者最后试图通过统计手段来分析影响营养摄入和体重变化的相关因素。他认为，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导致了食品消费的增长、食品价格的相对下降、摄入食物种类的变化以及工作和生活消耗能量的下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孩子越来越胖。

毫无疑问，中国超重和肥胖青少年的比例在迅速增长。包括研究者在内的许多学者相信经济增长在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经济增长促进了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消费高能量食物，外出就餐比例提高，快餐消费大量出现。同时，经济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体力劳动的减少，步行或自行车交通的降低，体育活动的减少和对电子产品的痴迷都影响了中国人体重的变化。

同时，研究者也指出了文化因素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肥胖在中国传统中拥有较为美好的寓意，而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父母和祖父母更倾向于溺爱孩子并过度喂养，这也导致了青少年较从前更容易超重乃至肥胖。

对于写作本文的政见观察员和本文的大部分读者而言，本文揭示的现实也许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身体条件、生活方式和

营养摄入。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本文介绍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长期存在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凸显了中国政府在贫困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及公共卫生领域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参考文献

- Morgan, S. L. (2014). Growing fat on reform: Obesity and nutritional disparities among China's children, 1979–2005. *The China Quarterly*, 220, 1033–1068.

民主迷思

科学民主的口号我们喊了一百年……

我们在见证民主的衰退吗？

民主运动往往并不是独裁政治的杀手锏，真正扮演终结者角色的是国家经济疲软、外部援助终止以及对国家机器的失控——其中，外援终止的原因最为耐人寻味。随着冷战进入尾声，美国与苏联不再需要掏出真金白银扶植大量的盟国。

◎ 刘岩川

近几年，关于全球经济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针对民主政治的担忧情绪也在学界弥漫开来。世界各地的战乱和高压政治，似乎正在颠覆 1990 年代民主浪潮的成果。民主的大潮是否真在退却？在 2015 年第 1 期《民主期刊》中，哈佛大学的 Steven Levitsky 与多伦多大学的 Lucan Way 反驳了学界盛行的“民主退潮”论。

要判断民主是否在世界范围内萎缩，就必须确认参照物。研究者发现，悲观者选取的参照物都是 20 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局势。

的确，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中东欧的剧变，一度让西方社会认为民主政治必将在世界遍地开花。南美、非洲和南欧的民主转型，也在西方滋养了乐观情绪。

可是，集权政治的毁灭真的能归功于民主运动吗？研究表明，民主运动往往并不是独裁政治的杀手锏，真正扮演终结者角色的恐怕是国家经济疲软、外部援助终止以及对国家机器的失控——其中，外援终止的原因最为耐人寻味。随着冷战进入尾声，美国与苏联不再需要掏出真金白银扶植大量的盟国。在美苏对抗中渔翁得利的独裁者们由此失去了金主，也丧失了掌控国内局势的权力根基。

在短暂的衰落之后，一些非民主国家的政权逐渐巩固了。世界经济的回暖，尤其是油价的上升，赋予了许多政治强人重操国家机器的实力和威信。研究者将洪森和普京定以为这个群体的代表性人物。同时，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处在上升期，不少非民主国家又找到了新的盟友。此外，在媒体、市场和反对党面前，独裁者们也在不断掌握应对之法，不至于出现一触即溃的现象。

也有些政客看起来进行了“壮士断腕般”的体制改革，但研究者认为，他们的“牺牲”是别有用心。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坛看

起来百家争鸣，但那是因为叶利钦失去了一统江湖的能力。在柬埔寨，洪森也是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压力下委托联合国举行竞争性的选举。同一时期，诸如海地和孟加拉国等非民主国家进行了像模像样的选举。虽然选举的程序可圈可点，但因为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系统，新上任的政客故态复萌，又使国家沦落到独裁政治的境地。

概言之，1990年代集权政府的衰落给西方造成了“条条大路通民主”的幻觉，但历史的发展证明事与愿违。就算独裁政权轰然崩塌，继之而来的既可能是西方期望的民主政体，也可能是变本加厉的集权政治，还可能是社会的分崩离析。在两位研究者的笔下，1989年后的波兰、1979年后的伊朗和卡扎菲倒台后的利比亚，分别是这三种可能性的现实案例。

既然1990年代并不适合作为参照物，民主的“退潮”或者“萎缩”也就无从谈起。

那么，回顾20世纪以来西方对民主政治全球化的期待，我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研究者强调，民主的建立和延续不是无条件的。数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在穷困而且治理能力弱的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且治理能力突出的一党制国家，在受到西方支持

的君主政体，在经历过暴力革命的社会以及与西方少有往来的政权，稳定的民主转型都极为罕见。与其说21世纪的民主正在经历萎缩，不如说民主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水土不服。好在还有波兰、克罗地亚和台湾地区这样成功的转型案例，让民主价值的提倡者感到欣慰。

虽然研究者反驳的是“民主退潮”论，但我们应该看到研究民主转型的西方学者，并没忘记在民主和专制之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政体。它们并不是过渡性的存在，我们也很难判断它们要朝哪个方向去。数十年来的政治学研究总结了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种种条件，但这些都不是转型的必要条件。如果某些政权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革，研究者也告诫我们不要轻易将其与民主化挂钩。用改革来缓解眼前危机的案例并不少见，只要在进行改革的同时继续牢牢把持国家的军警、媒体和财源，民主转型就很难真正出现。

本文为政见团队供财新《新世纪》周刊专栏稿件

参考文献

- Levitsky, S., & Way, L. (2015). The myth of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6(1), 45–58.

美国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影响力基本为零？

政策制定并不是零和游戏，一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普通民众与经济精英的偏好其实十分相近，即使精英实质上主导了政策制定过程，政策也可以符合大众利益。然而，当普通民众的偏好与经济精英和利益团体的偏好不一致时，前者通常会失败。

◎ 刘冉

民主国家的政策一定符合大众利益吗？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曾提出“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美国政治距离这个目标究竟有多远？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Martin Gilens 与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 Benjamin I. Page 在美国政治学学会的《政治观点》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了令人忧心的现实——通过研究美国 1779 项政策与普通民众和利益团体的关系，他们发现，经济精英和代表商业

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最显著的影响，而普通公民对政策的影响力趋近于零。

研究者将美国政治学界的相关研究分为四种理论体系：多数选举民主理论，经济精英控制理论，以及两种利益团体多元理论——多数多元和偏倚多元理论。简单来说，这些理论分别认为普通公民、经济精英、代表大众的利益团体和商业导向的利益团体对美国政治具有最大影响。

为检验这四种理论，他们收集了1981年到2002年间各类全国性问卷调查中一系列关于政策变化支持度的问题，最终获得1779个案例。通过记录这1779项政策提议在四年内是否得到采纳实施，作者尝试分析民众与利益集团的态度如何影响了这些政策的命运。

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如果分别计算普通民众、经济精英以及利益团体的偏好与政策结果的关联，三者均呈现出显著的正面影响。看起来，他们都影响了政策制定。

然而，如果同时考虑三者的影响力，那么就只剩下经济精英和利益团体还有影响了。普通民众的影响不仅大幅下降至接近零，甚至干脆在统计上不再显著了。也就是说，单独看起来，似乎大

家都对政策制定有话语权；但在控制了经济精英和利益团体的作用之后，研究者发现，普通民众其实只是搭便车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效果呢？要知道，政策本身并不是零和游戏，一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例如在本研究中，普通民众的偏好与经济精英的偏好其实十分相近；他们在许多议题上都持同样的态度。于是，即使精英实质上主导了政策制定过程，我们也常常会产生政策符合大众利益的印象。作者认为这也是多数选举民主理论始终有其拥趸的原因之一。然而这项研究发现，当普通民众的偏好与经济精英和利益团体的偏好不一致时，前者通常会失败。

同时，虽然代表大众的利益团体对政策有显著影响，但商业导向的利益团体的影响力是其两倍。更值得注意的是，利益团体与普通民众的偏好相差甚远，二者的相关度仅为 0.04；即使是所谓代表大众的利益团体，其与普通民众对政策态度的关联度也很低。更奇怪的是，商业导向的利益团体与经济精英的态度关联也不高。作者认为，这说明商业团体受利益驱使，而经济精英则抱有理想化的政治倾向，因此二者态度并不一致。例如，经济精英

倾向于政府减少开支，而商业利益团体则会极尽全力游说政府在其相关领域加大投入。

研究者认为，该研究证明多数选举民主理论在分析政治影响力时是失败的。美国政治并不由普通民众控制，尽管很多时候他们似乎决定着政策走向，但这只是经济精英和利益团体影响下的错觉罢了。那么，由精英来决定政策有何不可呢？精英和利益团体是不是比普通民众具有更多的政治能力和知识呢？研究者指出，这种论调是荒谬的。也许富人和大公司对商业和税务了解得更多，但对于医疗保险、食物券、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政策，他们怎么可能比普通美国人体会更深？更何况，掌握更丰富的政治信息，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为大众福祉服务。当精英和利益团体对政策的影响力完全碾压普通民众的意见，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无疑是令人忧心的。

该论文甫一发表，便在美国社会引发广泛讨论。《华盛顿邮报》^{*}以〈富人说了算！〉为题目刊发专文介绍；两位作者还受邀

* Bartels, L. (2014). Rich people rule!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4/04/08/rich-people-rule/>

上了《囧司徒每日秀》^{*}，与囧叔谈笑风生。《纽约日报》^{**}则邀请五位学者就此展开辩论。其中，曼哈顿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Scott Winship 指出，该研究虽然证明利益集团与精英阶层对政治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但恰恰也证明大部分时候精英与普通民众的政策偏好趋于一致；此外，即使是精英和利益集团的偏好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而统计模型无法覆盖更复杂的现实情况。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Theda Skocpol 则指出，美国政治的出路在于普通民众应当自我组织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利益团体。诺贝尔

-
- * Martin Gilens & Benjamin Page. *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 <http://www.cc.com/video-clips/kj9zai/the-daily-show-with-jon-stewart-martin-gilens---benjamin-page>
 - ** Teixeira, R. (2014). Political inequality worsens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4/04/21/do-the-rich-call-the-shots-13/political-inequality-worsens-economic-inequality>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更特地撰文评论^{*}，在赞赏该研究发现的同时，也警告普通民众不应因此而放弃关注和影响政府政策的努力。

附：数据分析技术细节

测量普通民众与精英的政策偏好相对简单，因为每一个案例都收集了受访者的经济收入情况，作者以此计算了三类人群对不同政策的支持情况：较低收入者（收入从低往高排在 10% 的人），中等收入者（收入排在 50% 的人），和较高收入者（收入排在 90% 的人）。作者用中等收入者的政治偏好来代表普通民众的偏好，而较高收入者的偏好则被作为经济精英的代表。

为测量利益团体的偏好，作者基于此前的研究，建构了一个新的测量方法：利益团体净支持度。首先，作者采用《财富》杂志历年评选出的“最具影响力的 25 个利益团体”名单，并加入十个不同产业中游说投入最高的利益团体，作为研究中使用的总名

* Krugman P. (2014). Class, olig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ynicism. *The New York Times*. <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4/04/21/class-oligarchy-and-the-limits-of-cynicism/>

单。之后，作者通过各方信息，判断每一个团体对于这 1779 项政策的态度，并根据其支持 / 反对的程度进行加权，而后将支持与反对的团体数量分别相加，取其对数，最后相减。最终得出的数值代表了利益团体对于某一项政策的总体支持程度。在进一步分析时，作者又将利益团体按照性质区分为代表大众的利益团体和商业导向的利益团体，并依照同样的方法分别计算其对每一项政策的支持程度。

参考文献

- Gilens, M., & Page, B. I. (2014).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3), 564–581.

如何（科学地）破除民主迷思？（一）

——苏东剧变后的民主与生活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当地人民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民主化究竟是造福社会的福音，还是摧残生活的噩梦？本文将带领大家走进（政治）科学，揭开苏东剧变之后当地生活的神秘面纱。

◎ 邵立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当地人民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民主化究竟是造福社会的福音，还是摧残生活的噩梦？

随着相关数据资料的完善，不会当地语言、没去过当地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分析数据一窥究竟。你所需要的工具就是一台连上互联网电脑，一点基础统计学知识，以及[下载好的盗版 Excel](#)或者 Stata 等统计学分析软件。这一次，政见君将带领大家走进（政治）科学，揭开苏东剧变之后当地生活的神秘面纱。

我们分析所需的数据都可以从网上免费获得。但在搜集数据之

前，我们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理论假设。听起来十分高大上的玩意儿，但本质上就是开脑洞，想象一下，如果民主化是坏东西，当地将会发生什么？

在这篇文章里，政见君先开第一个脑洞：如果民主化是坏东西，在越民主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就越低。

这个大脑洞会带来两个小脑洞，第一，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第二，如何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所幸的是，这两个脑洞都有数据可以支持。

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可以从公民的政治权利上去衡量。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通常拥有比较宽泛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而在世界上，有一家叫“自由之屋”的非政府组织，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专门对每个国家的公民自由权利进行评分—相当于一个志愿者大妈在社区内家庭评比“文明家庭”称号一样。在自由之屋的评价体系里，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各占七分，自由越少的国家得分越高。虽然这个评分不是直接评比民主制度的高低，但可以看作在间接衡量政体的民主程度。

而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指标就比较多。由于篇幅原因，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仅对一个指标进行讨论，那就是人均 GDP。而

作者太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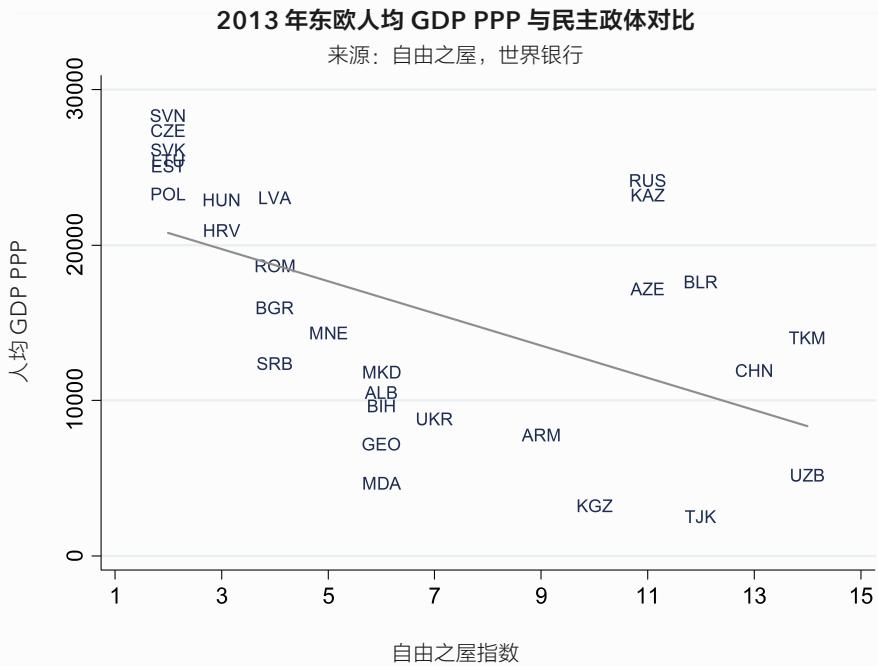
且，本文关注的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就采用经过购买力平价折算后的人均 GDP，英文简称一跟我一起念—“鸡的屁屁屁屁”(GDP PPP, 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这个指标与普通的人均 GDP 不同，将各国商品的物价之间的差异也考虑在内了。这样就不会出现“A 君年收入 20000 美元，但在 A 国连鸡蛋都买不起；B 君年收入 2000 美元，但每天都买一只鸡”这样的问题。所以，它更有利于比较人们生活花费之间的差异，也就有效反映了生活质量。

人均 GDP PPP 的数据从哪里来？政见君这次找的是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银行是这样的银行，你不用办网银买 U 盾，不用 IE 浏览器，也可以在上面……下载经济数据。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上去瞅瞅：data.worldbank.org。

所以，指标已经找好了，由于本次关心的是前苏联东欧国家，我们就将所有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的数据都找出来。其中包括 15 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6 个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和 7 个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东德）。为了作比较，我们也把中国的数据拿出来。现在让我们先看看 2013 年这些国家的 GDP PPP 和民主政治的比较状况。

2013年东欧人均GDP PPP与民主政体对比

来源：自由之屋，世界银行



正如上文所说，自由之屋指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公民自由，满分7分，另一部分是政治权利，满分也是7分。分数越高的国家的自由程度越低，也就是民主程度越低。为了方便，这里把两部分的分数加总，组成自由之屋指数。

所以，这张图传达的意思是……从东欧各国的情况来看，人均GDP PPP 越高的国家，例如排名前列斯洛文尼亚（SVN）、捷

克 (CZE)、斯洛伐克 (SVK)、爱沙尼亚 (EST) 和波兰 (POL)，自由之屋指数越低，也就是民主程度越高。而民主程度最低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其他国家，人均 GDP PPP 也越低。

那么，难道民主制度真的能改善人民生活吗？这里的因果关系能不能成立呢？答案当然是——“还不能”。因为人均 GDP 的高低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政治环境之外，各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工业基础和人口等也有可能影响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不一定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更有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为了摒除这些因素，我们将更多的数据纳入我们的理论模型进行考察。

那么，有什么因素可能会影响经济水平呢？首先是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通过出口原材料发财致富。在这里，我们使用了“能源租金占 GDP 份额”作为变量。

其次，如果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贸易约发达的国家也可能经济越发达。所以，第二个变量是“贸易占 GDP 份额”。

第三，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里，政见君找到了各国非劳动人口（65 岁以上，15 岁以下）

脑洞

与劳动人口的比率。这个指标比例越高，说明光消费不产出的老人和孩子占人口比例越多，劳动力也越不充分。

第四，每个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不一样，也可能导致经济水平不同。这里采用了“每百人的电话线路总数”作为参考数据。原因很简单——这个数据与其他描述基础设施的数据相比，比较齐全。

第五，欧盟成员的身份可能可以得到其他欧盟国家的帮助和优惠，经济表现会更好。最后，战争也可能对经济产生影响。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模型，将 1990 年后的 20 多年分为两个部分，1990 年到 2000 年，2000 年到 2013 年，将所有变量取平均值然后进行回归分析。这样做好处是，将同一国家在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减少，以便突出对国家之间的比较。

统计结果发现，在这个模型里，有三个因素对人均 GDP PPP 有显著影响：百人电话线总数、自然资源租金和欧盟会员。根据我们的理论，它们分别代表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或能源经济是否发达以及欧盟会员的影响力。其中正面影响力最高的是欧盟会籍。如果在每十年间，一个国家早加入欧盟一年，该国的人均 GDP PPP 就会平均多 853.5 美元。

至于民主程度，它的 p 值等于 0.085，在 95% 的置信水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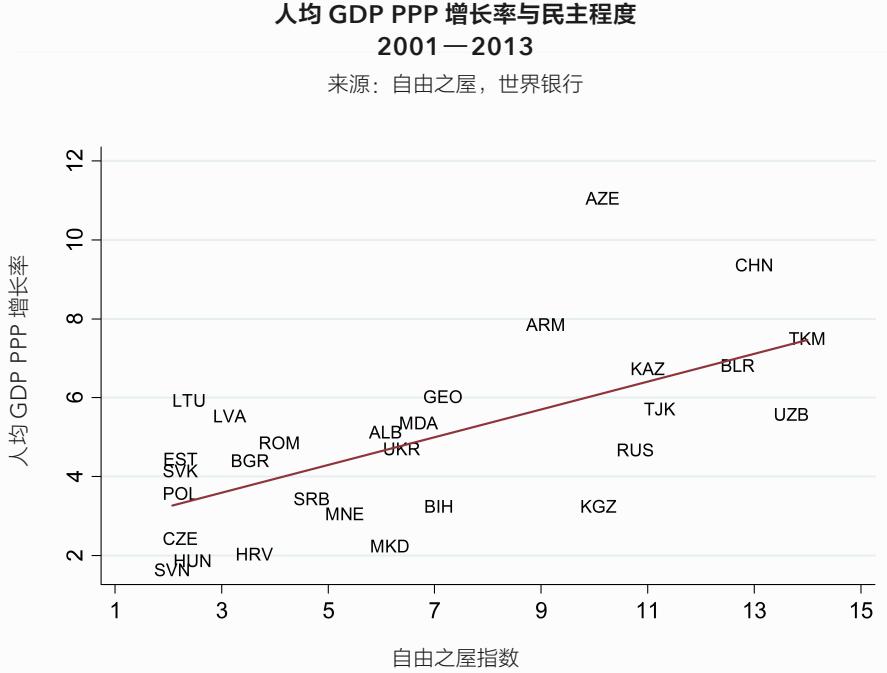
效果并不显著，但在 9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同的政治学家会下不同定论。一个谨小慎微的政治学家会说，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会对人均 GDP PPP 有影响。

但一个急于发论文拿职称的政治学家就会说，民主程度对国家的 GDP PPP 水平有显著影响。平均下来，自由之屋指数每降低一点，即民主程度每高一点，这个国际里每个人平均收入就会多 409 美元，如果升两点，每个人都多买一部 iPhone 6 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当然，如果一个政治学家这样写的话，他的潜台词是：看我的理论牛逼吧快给我发表吧快给我终身教职吧哇哈哈哈……

但是，细心的读者就会指出，你的理论有不妥的地方呀。首先你还是无法解决“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即到底是高人均收入带来高民主，还是高民主带来高人均收入。其次，人均收入受影响的因素很多。那些高收入的国家，可能在还没有民主化的时候就已经很有钱了。这个因素没有考虑到模型里。最后，如果你要证明民主的确能带来经济好处，你应该测量的是民主程度和人均 GDP 增长之间的关系，而非与人均 GDP 水平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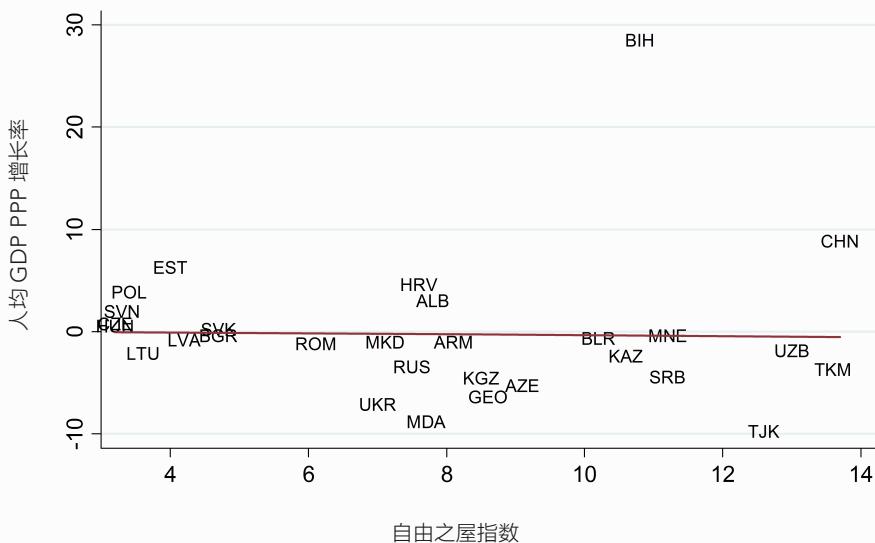
于是政治学家悻悻回去，又找出人均 GDP PPP 增长率进行统计。他先看了这个图：



纳尼?! 不是吧，这不是说明，在 2001 年到 2013 年之间，民主程度越低的国家经济增长越高吗？然后他们又看了前十年的图。

人均 GDP PPP 增长率与民主程度 1991—2000

来源：自由之屋，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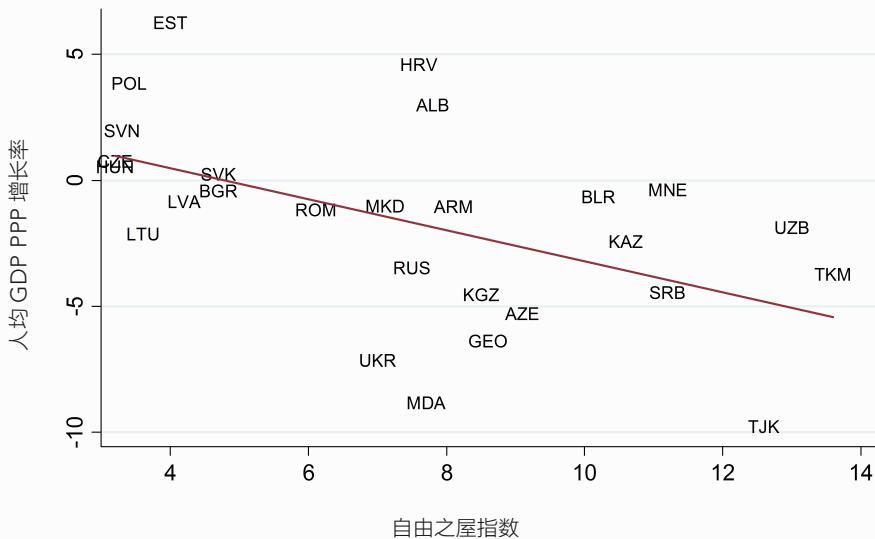
这条直线表明，人均 GDP 增长率和民主程度明明是没什么关系啊。但政治学家马上发现了中国（CHN）和波黑（BIH）这两个国家的增长率比较独特，可能会影响对总体效果的影响。所以他把这两个国家去掉之后又画了一个图。

人均 GDP PPP 增长率与民主程度

1991—2000

没有计算中国与波黑

来源：自由之屋，世界银行



这个结果更是令人困惑，即在 1991—2000 年期间，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人均 GDP PPP 增长率也越高，这与后面 13 年的结果正好相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只有八个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是大于 0 的，也就是在 1991 年到 2000 年之间，大部分苏东国家处于经济衰退。根据这几张图，政治学家得出初步结论：

第一，在苏东剧变之后，民主化和私有化改革进行的十年间，

大多数苏东国家遭遇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个现象在 Przeworski 的著作以及后续学者的著作里有更详尽的说明。

第二，在这些国家里面，成功进行民主化改革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幅度要小于非民主国家。

第三，进入 21 世纪之后，非民主国家的增长率要快于民主国家。

为了确证这些结论，我们用同一个模型再次测量对两个十年间苏东 27 国进行回归分析。所有自变量维持不变，因变量由人均 GDP PPP 的平均值换成了平均增长率。

统计结果表明，民主程度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 9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且影响与十年人均 GDP PPP 平均值的结果恰好相反！根据统计结果，自由之屋指数每升高 1 点，也即是一个国家变得相对不民主一点，十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就会增加 0.76%。也就是说，从平均上来说，国家越不民主，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到了这里，急着发论文的政治学家已经想跪了。但谨慎的政治学家就会问到，这个结果是不是可靠？虽然这个结果在 95% 的区间上显著，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少（只有 54 个），所以现在就下结论说“独裁有利于经济增长”显然太武断。如果该命题成立，我

们必然会在数据里找出更多的证据。

所以，我们现在说，在苏东国家范围内，国家的民主程度与它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因果关系暂时得不到数据支持。

而且，这个新的十年的模型还存在很多漏洞。首先就是牺牲了一个国家每年增长的不同差异。而且也没有解决“鸡生蛋蛋生鸡”的“内生性”问题。

在下一篇文章里，政见君将把十年模型变成一年，探讨从1990年起民主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模型 1	模型 2
因变量：十年人均 GDP PPP 平均值	因变量：十年 GDP 平均增长率	
自变量参数：标准误	自变量参数：标准误	
民主程度	-409.02	0.76*
	-232.61	-0.35
每百人电话线	243.63**	-0.12
	-70.03	-0.11
非劳动力比例	-90.82	-0.45***
	-62.16	-0.09

* $p=0.5$, ** $p=0.01$, *** $p=0.001$

	模型 1	模型 2
	因变量：十年人均 GDP PPP 平均值	因变量：十年 GDP 平均增长率
	自变量参数 : 标准误	自变量参数 : 标准误
战争年数	257.74 ----- -378.36	0.22 ----- -0.57
贸易占 GDP 比例	11.91 ----- -19.47	0.03 ----- -0.03
资源占 GDP 比例	136.45** ----- -42.25	-0.02 ----- -0.06
欧盟会籍	8535.33*** ----- -2102.75	4.07 ----- -3.15
Constant	7762.8 ----- -4242.73	19.53** ----- -6.37
R-squared N	0.75 ----- 54	0.38 ----- 54

*p=0.5, **p=0.01, ***p=0.001

参考文献

- Przeworski, A.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nsen, N. M. (2003). Rational citizens against reform poverty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9), 1092–1111.

族群政治

议会中谁最支持宽松的社会福利政策

多元交互主义（intersectionality/intersectionism）是目前美国种族 / 族群政治中比较热门的范式，它可被用于多重身份对群体行为影响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政见观察员将介绍两位美国学者是如何运用这一范式研究美国州议会中少数族裔女议员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

◎ 励轩

在美国，谁最支持社会福利政策？传统研究告诉我们，答案是少数族裔和妇女。那么，如果既属少数族裔，又是女性，对此类政策的支持是否会出现相乘效应呢？

这就是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Beth Reingold 和博士候选人 Adrienne R. Smith 的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两名学者运用量化方法来求证。

他们提出了两个假设作为这道“证明题”的起点。第一个假设是：如果议会中女性多，那么通过的社会福利政策就会越宽松；

第二个假设是，少数族裔女议员比白人女议员、少数族裔男议员更加支持宽松的社会福利政策。

为了检验这两个假设，两位学者研究了部分社会福利政策在各州议会的表现。如果假设正确，那么在女议员特别是少数族裔女议员数量多、权力大的州中提供的贫困家庭现金补助就应该更高、贫困家庭资格申请条件限制更少、相关规则更灵活、所谓“家庭帽”（拒绝对受到福利救助的母亲和家庭在另一个孩子出生后进行更多的经济资助）更不流行、更多会考量家庭暴力因素。研究者搜集了 50 个州持续十年的数据，选择模型启动论证过程。

就第一个假设，学者采用“相加模型”（additive model）作为研究框架，检测社会福利政策和所有女议员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采用相加模型是因为该模型假设不同维度的身份（在这个研究中就是种族和性别）对议员行为态度的影响是分别独立的，且这种影响可以相加（少数族裔女性 = 少数族裔 + 女性）。这个模型考量因素包括女议员、黑人议员、拉丁裔议员的数量和权力。不过，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议会中女性多，虽然可能会使贫困家庭补助申请资格受限更小，但其他政策宽松指标都未达预期。

就第二个假设，学者采用的是“多元交互模型”（intersection-

al model)，这一模型假设不同维度的身份对议员的影响要取决于该议员在其他维度的身份，真正重要的是各个维度身份的交叠部分。研究者考量了少数族裔女议员、白人女议员、少数族裔男议员的数量和权力大小对政策的影响。数据统计结果显示，第二个假设成立，少数族裔女议员相比之下更倾向于宽松的社会福利政策。

把两个模型放在一起，研究者发现，白人女议员未必会坚定支持宽松的福利政策，这是第一个模型未能证明相关假设的重要原因。

两名学者的研究同时运用相加模型和多元交互模型，通过对比，多元交互模型通过对各种因素的重新组合体现了更多微妙细节。

当然，正如多数定量研究一样，两名学者的研究虽然控制了多种变量因素，但还是存在漏洞，比如如何量化议员的“权力大小”，论文中就没有给出具体说明。

感谢政见同仁宿亮和张跃然对本文的编辑与建议。

参考文献

- Reingold, B., & Smith, A. R. (2012). Welfare policymaking and intersections of race, ethnicity, and gender in US state legislatur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1), 131–147.

恐怖主义与国际关系

伊斯兰国是如何兴起的？

为何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

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伊斯兰国”：中亚地区的新威胁？

中亚地区对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和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但当前中亚正处于政治新老交替转换期，各类风险和变数增多，特别是“伊斯兰国”等新威胁趋于活跃，将对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何种影响和冲击？

◎ 归宿

新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持续活跃，其影响已经波及中亚。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近期发表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在中亚地区逐渐活跃，对于地区安全稳定的影响和冲击不断上升。

当前，中亚地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内部仍存在不少隐患积弊。其中，各股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的渗透破坏尤为值得关注。这一地区在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和安全中地位重要。习近平

和李克强上任以来都连续两年访问中亚，习近平的访问足迹更是遍布中亚五国。中亚地区也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经之地，发挥着纽带和枢纽的作用。因此，“伊斯兰国”在中亚的活动尤其值得关注。

“伊斯兰国”招募的中亚人不乏精英

报告援引西方机构数据称，在过去三年中，有2000—4000名中亚人加入“伊斯兰国”。其中来自乌兹别克的超过千余人，其他中亚国家分别在数百人至数十人之间。由于当前叙利亚、伊拉克战事持续胶着，“伊斯兰国”势力仍在扩张，中亚籍人员数量仍有可能继续上升。

“伊斯兰国”在中亚的招募小组规模很小，行动隐秘，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招募人员。他们的招募场所则是遍布中亚的清真寺和祈祷室（namazkhana）。“伊斯兰国”的招募对中亚人颇具吸引力，往往一个家族或村庄中有人加入“伊斯兰国”，剩下的人在不久后也纷纷加入。在整个招募过程中，各类网络社交媒体也发挥了沟通和联络作用。

报告通过调查走访发现，“伊斯兰国”招募的中亚人来自各个

阶层，并不全是宗教狂热分子和恐怖分子，其中也不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他们加入“伊斯兰国”的动机也并不统一，有一部分是为了“圣战”，更多的只是认同“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寻求更为纯粹的宗教精神生活。此外，还有一些中亚人加入“伊斯兰国”只是为了谋生计甚至寻求冒险和刺激。

政治腐败和宗教氛围的双重刺激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中亚人加入“伊斯兰国”？报告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中亚各国内部。

一方面，中亚各国政府在治理上表现不佳。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尽管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各国经济增长有好有坏，但治理却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五国中，政治专权、压迫和腐败是普遍现象，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更是著名的警察国家。哈萨克斯坦虽然依靠石油资源，近年来发展尚佳，但在政治稳定、政权延续等方面也存在着突出隐患。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山地穷国则面临更为现实和直接的政治经济危机。报告指出，中亚民众对于本国政府普遍失望，这也导致加入“伊斯兰国”的中亚民众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另一方面，中亚各国宗教氛围日益浓厚也是重要原因。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教迅速填补了中亚地区的意识形态真空。而随着全球伊斯兰保守主义的兴起，中亚部分穆斯林信仰上愈发走向原教旨主义，行为上则更为激进化。中亚各国糟糕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这一趋势。但同时，由于中亚国家清真寺中的阿訇宗教水平有限，对于年轻穆斯林吸引力不足，更满足不了宗教需求，导致其在意识形态上更多转向新兴的“伊斯兰国”。而对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认同，也是中亚籍人员加入“伊斯兰国”的最直接原因。

另外，报告中也提到，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一些地区，“伊斯兰国”的招募小组可以在当地安全机构的眼皮底下招募成员。这表明中亚各国政府管制能力低下，安全机关水平有限，难以有效阻止民众投奔“伊斯兰国”。

直接威胁尚不明显，但潜在威胁值得关注

报告认为，尽管“伊斯兰国”中的中亚籍人员数量上升，但目前看对于中亚地区的直接安全冲击还比较有限。“伊斯兰国”的活动重点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部分加入“伊斯兰国”的中亚人，

也主要跟随组织活动，短期内回流中亚的意愿并不强烈。

但从长期看，这些中亚人已经成为全球恐怖网络的一部分，未来可能加大对中亚地区恐怖组织的联系和互动，这对地区安全形势构成一定潜在威胁。

报告也指出，当前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目前看，“伊斯兰国”的猖獗势头，特别是叙利亚的局势发展已引起中亚各国高度重视，但各国为预防“伊斯兰国”渗透而在国内采取的一些强硬措施，却又进一步激化了早已存在的矛盾，刺激更多中亚人出境投奔“伊斯兰国”。

报告建议，中亚各国应改进反恐政策措施，从“去极端化”角度入手，高度重视国内存在的“极端化”因素，通过政治、经济、民生等多领域改革推进“去极端化”进程。包括俄、中、美、欧盟等在内国际相关方，也应认识到中亚人员加入“伊斯兰国”的潜在威胁，各自采取措施或加强合作帮助中亚各国应对这一问题。

中国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已将中亚地区从冷战时的前线转变成了目前的战略后方，这也是冷战后中国外交的一大成果。总的来看，在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保持中亚地区的稳定尤为关键。而当前和未来几年，中亚各国正处于政治新老

交替的转换期，风险和变数增多，包括“伊斯兰国”渗透的新威胁也不断涌现。对于中国而言，有必要做好相关形势研究和预判，提前采取预防性政策措施，以减轻乃至避免地区出现系统性风险时的损失。

参考文献

-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Briefing N°72. (2015). *Syria Calling: Radicalisation in Central Asia,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Briefing).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外交事务》：巴基斯坦的亵渎神明法与恐怖主义

巴基斯坦一直未能消灭塔利班（TTP）恐怖主义的原因不在于缺乏资金或国际支持，而在于其部分法律条文为塔利班侵害公民权利提供了“正当”理由，进而在国内形成了施暴而可以免于惩罚的危险氛围。

◎ 陈硕 / 政见特约作者

由 Amjad Mahmood Khan 撰写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上的最新文章“Pakistan’s dark days: Terrorism and the blasphemy laws”分析了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猖獗的根源。作者认为，巴基斯坦一直未能消灭塔利班（TTP）恐怖主义的原因不在于缺乏资金或国际支持（事实上，在美国的支持下，巴基斯坦已在反恐方面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而在于其部分法律条文为塔利班侵害公民权利提供了“正当”理由，进而在国内形成了施暴而可以免于惩

罚的危险氛围。

几十年前，巴基斯坦军事独裁者齐亚·哈克颁布了亵渎神明法（blasphemy laws）等严苛的法律。亵渎神明法适用于“任何用语言、文字、视觉手段，诋毁、讽刺、影射先知默罕默德圣洁之名”的人，被告可能面临死刑的指控。

1984年以来，巴基斯坦有数千公民因捏造的亵渎神明罪而被逮捕和起诉，罪行包括穿带有伊斯兰教标语的T恤、在广场上使用伊斯兰教的问候等。这些事件也引起了针对被告人的极端暴力，例如，因为一张“亵渎神明”的Facebook海报，塔利班支持者烧毁了村庄里的多间房屋，造成包括一位老人和她的两个年轻孙女在内的四人死亡。而比这些个别事件更令人忧虑的是塔利班利用相应法律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他们宣称屠杀印度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原因是他们侮辱了伊斯兰教、杀害军人家庭孩子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暗中支持美国的打击行动。塔利班支撑他们行为的理由很明显：镇压对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地位造成威胁的人，不论这种威胁是多么间接。

由于自身也受到塔利班的威胁，至今，巴基斯坦政府都未能就先前的袭击对塔利班武装完结诉讼。罪犯被逮捕之后迟迟无法

定罪，案件进展缓慢、结果摇摆不定，甚至完全被放弃，主要原因包括警察无法提供定罪所需的证据、律师和法官都不敢面对限制亵渎神明法的运用范围这一难解之题、为被告辩护的律师还经常受到威胁甚至被杀害。此外，巴基斯坦政府中最反对亵渎神明法的官员也都遭到了暗杀，其中前旁遮普省省长塔席尔 (Salman Taseer) 的刺杀者竟得到了 500 多名伊斯兰神职人员的支持，在进入法庭前被赞颂“保卫”了伊斯兰教。而在塔利班刺杀前少数民族事务部长沙赫巴兹·巴蒂后，其发言人指出，这一行动向所有反对亵渎神明法的人发出了明确信息。

基于对上述事实的分析，作者指出，如果巴基斯坦真正想要消除恐怖主义，要做的不仅是简单地宣战，还需要解决塔利班实行恐怖统治而不受惩罚的深层原因，必须修订相应的刑法法规，真正为公民提供保护。最重要的是，巴基斯坦需要在意识形态上，而非只是简单地在武装层面，做好打击其最大敌人的准备。

恐怖袭击、种族报复与社会同化程度

9·11 事件后，美国发生了大量的针对穆斯林的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对穆斯林群体融入美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果。

◎ 陈硕 / 政见特约作者

9·11 恐怖袭击由伊斯兰极端种族主义者发起。该事件发生之后，欧美各国反穆斯林行为激增，这些行为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穆斯林群体的种族意识并降低他们对外来文化的认同感呢？解答这一问题对理解 9·11 事件的长期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尚未能对此展开严格实证分析。由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经济系的两位学者 Eric D. Gould 和 Esteban F. Klor 撰写，刊发于 *Economic Journal* 的最新论文 “The long-run effect of 9/11: Terrorism,

backlash,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Muslim immigrants in the west”旨在回答该问题。

同化是指移民放弃其固有文化模式与传统，吸取迁入国文化且最终完全融入其中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移民种族意识的降低和对外来文化认同感的上升。本文选取了四个指标来衡量穆斯林移民在美国的社会同化程度：通婚状况（族内 / 族外）、子女数量、英文使用率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与美国本地居民相比，受种族传统文化影响的穆斯林移民更倾向于选择同族通婚、多生孩子。同时，该群体的英文水平及使用频率远低于美国本地居民。此外，由于穆斯林女性以家庭为中心，因此她们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度较低。然而在美国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下，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这些差异在逐年缩小，亦即移民的同化程度在逐年上升。作者预测 9·11 事件的发生改变了这一趋势。紧随恐怖袭击而来的报复行为使穆斯林移民与其他社会群体形成紧张的对立局面，这增大了移民建立对外社会网络的成本，同时提高了建立族内社会网络的回报（如：加强族内团结可提高对入侵行为的抵抗力），因此移民的同化程度会下降。

本文以美国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报复行为对穆斯林移民社会

同化程度的影响。作者利用 1990—2010 年个体层面的全国面板数据，并以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作为报复行为的代理变量，进行了一系列实证分析。仇恨犯罪指出于对某一群体（种族）心存不满或怨恨而发起的攻击性行为。9·11 事件后，全美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空前爆发。短期来看，2000 年至 2001 年此类案件由 28 起激增至 481 起；长期来看，1990—2000 年此类案件年均 23.3 起，而 2001—2010 年则高达 139.5 起。作者分别考察了州人均仇恨犯罪案件数对穆斯林移民通婚状况（族内 / 族外）、子女数量、英文使用率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影响，发现州人均仇恨犯罪越多，穆斯林移民族内通婚的可能性越大，子女数量越多，英文使用率越低，同时女性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越低。这些发现证实报复行为对移民的同化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为进一步确证上述因果关系，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作者对各州仇恨犯罪的外生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仇恨犯罪通常发生在种族歧视（并非仅指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歧视，还包括针对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严重或者移民数量较少的地区，但是与当地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整体同化程度或者个体同化特征无关，这证明了仇恨犯罪具有外生性。其次，作者在控制了个体和洲际

特征后发现结果依旧稳健。最后，作者考察了针对穆斯林的报复行为对其他移民群体（西班牙裔、华裔、日裔及韩裔移民）社会同化程度的影响，但都没有获得显著结果，此对照结果加强了本文的因果逻辑。

本文在文献上有两方面显著贡献。一方面，本文弥补了实证研究的不足。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用访谈等定性方法来分析9·11事件对穆斯林群体的影响，而本文首次通过系统性定量方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9·11事件引发的报复行为降低了穆斯林移民在美国的社会同化程度，提高了他们的族内凝聚力。这一发现进一步扩充了9·11事件的长期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本文扩展了报复行为的类型。恐怖袭击引发的报复行为一直为研究政治冲突的学者所关注，但是他们一般聚焦于对袭击者所属国家或隐藏地区的报复行为，如9·11事件后美国对阿富汗的袭击就属于这类报复行为，而本文探讨的则是对袭击者所属族裔的报复行为及其影响。

参考文献

- Gould, E. D., & Klor, E. F. (2014). The long-run effect of 9/11: Terrorism, backlash,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Muslim immigrants in the West. *The Economic Journal*.

社会

社会管理这堂课，政府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当然，不光是政府。

社会应该怎么管？从云南民间机构说起

虽然政府的控制力正在加强，但社会组织受到的影响并不一致。有些组织获得了合法地位和政府资金，并借此站在了更广阔的运作平台。相应的，很多敏感领域的草根组织没能获得合法地位，也因此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 刘岩川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政府以一己之力承担了近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随着社会需求的多元化，政府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越来越需要社会力量的配合。恰在此刻，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又让政府对民间力量心存疑虑。在维护政治稳定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双重压力下，政府一直在寻找折衷的办法。

美国学者赵娜（Jessica C. Teets）发现，云南的社会组织管理正从较为宽松的“云南模式”向更为严格的“北京模式”靠拢。虽

然政府的控制力正在加强，但社会组织受到的影响并不一致。有些组织获得了合法地位和政府资金，并借此站在了更广阔的运作平台。相应的，很多敏感领域的草根组织没能获得合法地位，也因此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云南模式”顾名思义是云南官方与当地社会组织磨合多年后产生的社会管理机制。民间组织在云南的活动源远流长，而艾滋病防治可谓云南民间机构发祥的源头。由于云南省毗邻“金三角”，艾滋病病毒借助重复使用的针头迅猛传播。由于财政的压力和机关事业单位的精简，截止到 90 年代末，拥有 4000 万人口的云南省只配备了 200 名从事艾滋病检查和治疗的医护人员。在艾滋病肆虐的大背景下，针对艾滋病防治的民间机构应运而生。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向云南伸出援手。一套国际组织提供资源、本土组织提供服务、政府配合民间力量工作的模式逐渐成型。

对于民间机构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贡献，云南官方心知肚明。相对于政府的医疗服务，艾滋病患者更信任民间机构。在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艾滋病的传播背后有毒品和性交易的因素，公立医院在诊治病人的时候也配合公安部门的抓捕工作。结果，许多患者对就医产生了抵触情绪，使艾滋病的传播隐藏得越来越深。与

公立医院相反，民间机构利用组织成员的社会网络找到了很多患者，并且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不要求患者透露身份。

政府慢慢发现，依靠非政府组织防治艾滋病不但更为有效，而且可以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或基金会的资源。如果让政府自己提供防治艾滋病的资源，那么当局难免要增加税费或者征地卖地。这两种措施都可能激起民怨并招致中央的责罚。事实证明，利用外资既节省政府的财力，又让云南的卫生部门从上级处博得了“创新治理”的赞赏。国务院和卫生部甚至主动向外省推介云南的成功经验，让云南政府面上有光。

200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组织管理理念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汶川地震的惨剧点燃了国内的公益热情，让政府看到志愿服务也是聚拢民心的抓手。另一方面，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促使以中央政法委为代表的权力机关对民间力量提高了警惕。云南环保组织与政府在怒江水电站问题上的分歧最具代表性：政府希望利用水电发展经济，而环保组织则力图阻止破坏环境的工程。在这场博弈中，民间力量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也失去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的社会管理模式开始向“北京模式”靠拢。

所谓“北京模式”，是以政府向民间机构外包公共服务、政府认可的孵化器向民间机构提供专业培训、机构运营依赖境内资金为特征的管理制度。通过提供资金、培训和布置任务，政府可以深度介入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同时向社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这与依赖境外资源、重视国内外民间机构与政府合作的“云南模式”风格迥异。

两份文件的出台让云南民间机构感受到政府理念的转变：《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云南省规范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暂行规定》。前者对接受境外资金的民间组织做了约束，后者则要求民间组织注册合法身份。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云南的行动需要在当地民政部门和外事部门登记，使许多从业者不得不面对政府的繁文缛节。国际组织在向民政部门注册的同时，还需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完成登记。这就是著名的“双重管理”制。登记后，国际组织和基金会还要向官方提交为本土机构提供资金的相关文件。从此，社会组织登记和境外资金的交接受到了政府监督。此外，国际组织不仅要定期向官方递交工作报告，还需要每两年重新注册一次。

赵娜在社会管理升级前的 2007 年和之后的 2010 年采访了同一

批官员和民间机构。她发现，顺利登记的民间机构未受明显影响，只是外办审批的慢条斯理让从业者大为反感。许多组织选择主动登记，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获得合法地位取得国际组织的支援。现阶段，国内个人和企业对公益的捐赠并不充裕，而政府的资金又难以同时满足项目开支和组织的行政成本。为了生存，云南的民间机构依然需要国际力量的支持，因此注册合法身份成了绕不开的环节。牺牲最大的恐怕是那些在敏感领域活动的草根组织。由于很难取得合法身份，这些组织正在消失。

虽然政府对云南民间机构的管理越来越严格，但“云南模式”并未完全消亡。赵娜发现，云南依然需要境外的资源提供公共服务，因此不能完全用本土力量取代国际组织。同时，旨在提高政府管控力度的“北京模式”虽然受到诟病，但也确实有助于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在北京，政府支持的孵化器恩派（NPI）向民间机构提供了项目书写作、审计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不能说无助于民间机构的发展。

目前，“北京模式”有在全国推广的势头。赵娜提醒我们，中国各地的政府机关还在摸索社会组织的有效管理模式。换言之，在“北京模式”和“云南模式”之外，还存在许多不太为人注意的试

验。有学者称，民间机构越来越受重视的趋势反映了中国“协商式民主制度”的发展。赵娜则认为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升级，恰是“协商性权威制度”的表现。无论学界怎样概括中国的现况，中国的社会管理模式还会不断衍化。要做出准确的判断，还需要耐心的观察。

参考文献

- Jessica. C. T.(2015). The evolu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Yunnan province: Contending models of civil society management.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4(91), 158–175.

福建之谜：“半自发性”组织如何减少农村集体上访

老人协会这样的“半自发性”组织对于官民纠纷的解决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它们不单有能力提供基层政府所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物品，同时还有能力监督政府管治，投诉甚至“罢免”失职的基层官员。

◎ 杨鸣宇

集体上访为什么发生？目前政治学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是欧博文（Kevin O'Brien）和李连江提出的“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该概念认为中国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抗争者可以利用国家法律、政策或者意识形态，一方面合法合理化抗争要求和行为，另一方面尝试在不同层级彼此“不连贯”的政府部门之间寻求帮助和救济。遗憾的是，对于一个村庄是否存在那些具有“依法抗争”能力的抗议领袖，很难从调查数据里得到反映，因此这个解释无法用统计手段进行验证。不过根据研究者的

访谈所得，“依法抗争”的论断大致上是准确的。

第二种解释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蔡晓莉教授提出。沿着社会资本分析思路，她发现：教堂、庙宇和宗祠等“团结性组织”的存在有助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增加官民之间的互信，从而更可能达到较好的管治水平。因此在那些“团结性组织”发达的村庄里，集体上访的发生就较低。反之，集体上访的发生就较高。

第三种解释来自 Thomas Bernstein 和吕晓波。他们从中部地区农民的抗税行为出发，认为地方财政收入较低或不足的村庄更可能出现不合理的税负水平、官员腐败、过分依赖预算外收入等问题，因而更可能发生集体上访。

西北大学研究者 William Hurst 和合作者最近在学刊《比较政治》上撰文，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村庄里存在具有调解能力的“半自主性”社会组织，集体上访的发生机会和规模将会降低。这种“半自主性”组织需要满足三点要求：第一，它是完全开放的，任何人都有参加的权利；第二，它并不由政府官员或者机构把持或主导；第三，它至少被一部分村民或者官员认同其具有解决官民纠纷的能力。这种“半自主性”组织和蔡晓莉所谓“团结性组织”的区别在于，后者并不一定都具有“调解能力”。

论文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中国 6 个省份 120 条行政村，每一个省份对应一个特定的区域，比如说福建就对应着东南区域。汇总后的调查样本虽然不能够代表全国，但是亦足以用作分析区域差异之用。

实证结果显示，“半自发性”组织的参与率越高确实能够显着降低集体上访的发生，尤其是人数在 40—100 或以上的较大规模的抗争。相反，教堂、庙宇或者宗祠数量较多的村庄并未如预期般较少发生集体上访，宗祠数量越多的村庄甚至更可能发生 100 人以上的抗争。最后，模型结果也不支持 Thomas Bernstein 和吕晓波的观点。事实上较富裕的村庄反而更可能发生规模为 30-40 人以上的抗争行为。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与 Bernstein 和吕晓波提出结论时相比，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所致（比如说当时农业税尚未废除）。

然而中国的区域差异如此之大，上述论断是否足以推广至全国？经过细致的检查后，作者发现福建是一个特殊例子。因为它的“半自发性”组织参与率竟在 19% 以上，而其他地区均在 4% 以下。这使得无论是蔡晓莉还是研究者本人的观点，都只适用于福建的情况。在排除福建的样本后，数据之间的显著关系不再存在。

为了解开“福建之谜”，作者采取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尝试通过对村民和农村基层官员的深度访谈来了解不同地区的村庄内部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他们发现，120个村庄样本里其实存在着两种非常不同的集体上访控制模式。

福建省代表了第一种模式。在那里，老人协会这样的“半自发性”组织对于官民纠纷的解决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老人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是退休官员和教师，这使得协会在农村里拥有很高的威望、合法性和政治影响力。情况就正如蔡晓莉的发现所描述的那样，老人协会不单有能力提供基层政府所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物品，同时还有能力监督政府管治，投诉甚至“罢免”失职的基层官员。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既有威望又熟悉公共事务的社会组织的存在，有时候连在位的基层党委书记也不得不寻求老人协会的“帮助”，借用他们的力量在一些公共事务上和上级政府进行判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基层政府是通过老人协会进行治理，从而控制集体上访的发生。因此，福建省展示的是：发达的农村社会资本如何可能在缺乏民主制度的情况下，提高基层政府的“问责性”。

其他省份则代表了第二种模式。在那里，基层政府借助类似

“黑社会”之类的组织来执行上级要求的任务，同时运用暴力恐吓之类的手段来堵塞村民组织集体上访的可能。作者特别指出，这种基层治理的“黑社会”化在统计指标上有时候是很难和第一种控制模式进行区别。两种控制模式可能同样使村庄的财政收入稳定或集体上访稀少，看起来都像是良好的基层治理。而事实上它们代表了非常不同的治理模式。如果真实情况是第二种模式的话，则会在造就长期的社会不稳定。

总括而言，这则研究有两方面的明显贡献。在经验上，它通过细致的定量检验和详实的深度访谈，不单对既有研究里认为影响集体上访发生和规模的因素进行了整体检验，并且具体清晰的描述了两种看似结果相同、但手段差异明显的集体上访控制模式。在理论上，它指出了区域差异对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者要避免“一叶障目”的危险。而这则研究发现的两种泾渭分明的集体上访以至农村基层治理模式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参考文献

- Hurst, W., Liu, M., Liu, Y., & Tao, R. (2014). Reassessing collective petitioning in rural China: Civic engagement, extra-state violence, and regional vari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46(4), 459–482.

为何中世纪德意志地区鼓励大学发展，而晚清政府打压新学？

探讨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以往学者用来衡量人力资本高低的标准主要是“数量”，然而人力资本的类别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 王绍达

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是经济学中长盛不衰的研究话题之一，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与探讨。

然而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学者用来衡量人力资本高低的标准主要是其“数量”，比如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国家的文盲率等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不同类别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差异。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简化处理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比如我

们不难想象，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一个皓首四书五经的秀才和一个学习理工科的大学生，同样是十年寒窗，二者人力资本的“数量”似乎相差无几，但在当时，相对于国家迫切的工业化、现代化需求而言，后者的价值很可能远较前者为高。因此，在探讨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人力资本的类别（或者称之为“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基于上述认识，自 2010 年以来，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 Noam Yuchtman 与其合作者接连创作了三篇论文，首先分别在中世纪德意志地区与清末民初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定量验证了新型人力资本的涌现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进一步地，他们试图解释为何对于新型人力资本的积累，有些政府（比如中世纪德意志地区政府和教会）会选择加以鼓励，而另一些政府（比如晚清政府）则选择进行打压。

大学促进了商业革命

在发表于 2014 年的文章中，Yuchtman 教授与其合作者实证检验了早期大学的成立对于德意志地区商业革命的贡献。他们指出，在 1378 年以前，德意志地区的大学数量很少，完全难以满足

本土的高等教育需求，当地的学生通常只能选择去法国接受高等教育，当地的教授也通常只能选择在法国的大学任教。

但在 1378 年，欧洲爆发了“天主教会大分裂”，德法开始交恶，前者支持罗马教皇，后者则支持阿维尼翁教皇。信仰和政治的冲突导致德意志地区的学生很难再选择赴法国接受高等教育，于是对本土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时，由于许多原来在法国任教的老师不断返回本土，德意志地区的高等教育师资也得以增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意志地区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涌现了若干所优质大学。

由此造成的一个客观后果是，在德意志地区内部，不同的地区获得高等教育的难易程度发生了相对变化。具体来说，如果我们以“该地到最近的一所大学的距离（简称 D）”这一指标近似衡量一个地区获取高等教育的难易程度，那么在教会大分裂与本土大学成立以后，有些地区的 D 保持不变或只略微降低，而另一些地区的 D 则大幅降低。

研究者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发现，这两种地区在教会大分裂以前的市场化趋势几乎没有差异，但在教会大分裂以后，那些 D 大幅降低的地区，市场化趋势也大幅加快，并显著地快于那些 D 没

有大幅降低的地区。对这一统计结果的合理解释是：由于在这些地区附近成立了新的大学，这些地区拥有了更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从而促进了市场的成立与商业革命的发生。

研究者通过进一步分析史料指出，大学生之所以能够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在大学接受了与“罗马法”相关的训练。罗马法相对于当时其它的法律体系，可以设计出更合理的合同，从而大幅降低交易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对于商业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学与近代工业化

新型人力资本在中国的意义如何？在 2010 年的一篇工作论文中，Yuchtman 教授指出，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新学比旧学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价值，而这应该具体反映为新学具有比旧学更高的教育回报率。

为了定量地检验这一猜想，研究者分析了天津-浦口铁路的员工数据，并发现：接受新式教育的员工，多数占据了工程师等核心岗位，并获得了最高的工资和教育回报率。而接受旧式教育的员工，大多担任文员一类的工作，待遇虽然高于那些没有接受

过教育的员工，却与接受新式教育的员工存在明显的差距。

这样的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作为一种新型的人力资本，接受西式教育的大学生在中国清末民初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价值。

是否威胁执政地位是关键

这两则研究表明：无论是对于中世纪的德意志地区还是清末民初的中国，新型人力资本的涌现都具有非常正面的价值。然而，中德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前一种情况下，作为新型人力资本的高等教育得到了德意志地区政府与教会的大力扶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清政府却在非常长的时期内刻意压制新学的地位，比如直到1905年才正式废除以旧学选拔官员的科举制。两个政府对待新型人力资本的不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果：中世纪的德意志地区发生了商业革命，经济飞速增长；而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之路却显得举步维艰。那么，政府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逻辑来选择自己对待新型人力资本的态度呢？

在发表于2013年的一篇论文中，Yuchtman教授与合作者试图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描述政府选择人力资本类别背后

的经济逻辑，并据此对中世纪德意志地区政府与晚清政府的行为加以解释。

他们首先假设存在一种新型的人力资本，它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并且此种人力资本除了可以为拥有它的个体带来更高的经济收入，同时还可以带来额外的社会价值，即具有正的“外部性”。在这种情况下，仅凭私人决策会导致对新型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因此为了实现社会的收益最大化，政府应该对新型人力资本进行额外的补贴。

而对于政府的决策，研究者考虑一个简单的两阶段模型：在第一阶段，可以决定是否要对新型人力资本进行补贴。假如补贴，则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政府从而可以在第二阶段获得更多的税收。但同时，某些新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可能会滋生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这个社会阶层有可能会对政府的执政地位产生威胁。于是，政府需要在财政收入与执政地位的稳固性之间进行一个权衡取舍。相应地，假如政府选择不进行补贴，则可以确保自身执政地位的安全，但同时只能获得较少的财政收入。

这个模型背后的直觉非常简单，即“新型人力资本是否会威胁政府的执政地位”是影响政府决策的核心因素。假如政府认为新

型的人力资本比较“安全”，则会选择补贴，从而达到一个社会最优的均衡结果；假如政府认为新型的人力资本会对自身不利，则不会选择补贴，那么新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就会受到限制。

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地区，掌握罗马法的大学生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十分可观，同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们会滋生反政府、反教会的思想，因此政府和教会选择对于大学及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待遇。而在清末的中国，政府虽然提出类似“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口号，但实际上，接受了完整的新学教育的个体往往很难不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而这样的思想西化将对清政府的执政地位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清政府并没有给新学的发展以足够的鼓励和支持，相反地，他们直到 1905 年才取消了依据旧学选拔官员的科举制，这在客观上极大地抑制了新学的发展。

Yuchtman 教授的这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两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经济案例，但无论是实证部分的结论，还是理论部分的思想，对于其它历史时期的其它国家与地区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比如当今世界，某些国家有 70% 以上的大学生选择人文类专业，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这一比例不足 5%。某些国家有接近 60% 的学生

修读商科或者社会科学，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这一比例不足 10%。人力资本类别的巨大差异，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经济绩效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又有多少比例是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或许通过借鉴以上三篇文章的分析思路，我们可以对这些重要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参考文献

- Cantoni, D., & Yuchtman, N. (2012). Medieval universities, leg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Yuchtman, N. (2010). Teaching to the test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ducat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Cantoni, D., & Yuchtman, N. (201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histo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拉铁摩尔与他的时代： 怎样寻找一套理论解释社会的兴衰？

他1岁来到中国，自学成为中国边疆史专家，还应罗斯福总统之邀担任过蒋介石的顾问。他从未接受过本科教育，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硕士学位。他曾经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却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被怀疑是苏联间谍，被迫出走英伦

◎ 刘岩川

提起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多数读者都会感到陌生。其实，这位出生于1900年的美国人不但拥有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在学术上也以另辟蹊径著称。

他1岁左右就随父母来到中国，在近乎自学的状态下成长为中
国边疆史专家，还应罗斯福总统之邀担任过蒋介石的顾问。他从
未接受过本科教育，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硕士学位。他曾

经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却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被怀疑是苏联间谍，因此被迫出走英伦。他做过公司职员和报社记者，但最让他受益的经历是在中国北疆的旅行。从东北到内蒙再到新疆，拉铁摩尔把内地与边疆的互动观察得细致入微。他独到的研究视角不但成就了经典之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也帮助他在 1930 年代末接掌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拉铁摩尔与很多同时期的西方史学家一样，热衷于西方文明扩张所引发的思考：西方社会的发展为何一骑绝尘？其他群体在西方的紧逼下缘何不堪一击？纵观拉铁摩尔的一生，他都在寻找一套科学理论来阐释社会的形成、衍化和兴衰，并且以边疆地区不同人群的互动和依存关系为切入点。在拉铁摩尔的视线里，历史并不存在偶然性，也不会以直截了当的直线轨迹发展，而是在人类社会与周遭环境的相互砥砺中前进。惊世骇俗的事件或人物都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总是深藏在表象之下。

究竟哪些因素在影响社会的发展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教授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研究发现，拉铁摩尔内心的答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历史或者历史学本身的变迁而不断衍化。

环境和种族决定中国“落后”？

拉铁摩尔步入学界的初期，也是“环境决定论”在学界大行其道的阶段。不少20世纪初的地理学者们认为，自然条件是影响所在地人类特征的决定性因素。简言之，因为所处环境的差异，某些地区的人类势必在心智上超越同类，从而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很多历史学家也受到了地理学的影响。有美国学者在著作中宣称，美国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发展是祖先走出潮湿的东部沿海、开发干燥的西部平原的结果。在汉学界，生于德国的魏特夫（Wittfogel）提出，中国古代专制的形成是半干旱地区需要行政力量维护水利设施决定的。

年轻的拉铁摩尔曾经全盘接受“环境决定论”，并且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内地（较之欧洲）相对单一的地貌与经济模式。可是，“环境决定论”因为逻辑过于简陋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非议。此时的拉铁摩尔也顺应学术潮流，开始在自己的历史论述中疏远环境因素，转而强调人对自然的主动改造。

与“环境决定论”同时影响拉铁摩尔历史观的还有种族论。就

像圣经中的人类因为祖先品行的差异而体现出不同性格，100多年前的某些学者也深信种族的差异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优劣。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更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发展不过是优胜劣汰的丛林游戏。罗威廉指出，诸如此类的西方学术思想经过严复的翻译，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诱发了“驱除鞑虏”以重振中华的革命主张。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也开始对汹涌的东南欧移民潮感到恐慌，生怕来自不发达地区的新鲜血液会让本国的发展偏出正轨。

罗威廉审视了拉铁摩尔在哈佛读书期间的著作，发现他也曾热衷于种族的历史角色。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拉铁摩尔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并不重视白种人对于其他人种的优越性，反而关注种族的差异如何驱使华夏文明自身对周边族群施加帝国统治。然而数年后，拉铁摩尔的观点出现了明显的缓和。在研究了清末民初东北地区不同族群的互动之后，拉铁摩尔渐渐认为种族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被夸大了。当希特勒的种族屠杀大白于天下，而美国的种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候，历史学界和拉铁摩尔本人都抛弃了种族论。

用生命体比喻社会发展

就在西方学界争论环境和种族的历史作用之时，共产主义在东方兴起。马克思认为起始于原始社会的人类将在经历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后迎来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对历史发展的线性解释受到了许多学者和革命者的青睐。根据罗威廉的观察，拉铁摩尔的学术思想明显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名词频繁出现；同时，生产技术也取代了环境和种族，变成历史发展的主要推手。

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拉铁摩尔坚称历史不会朝特定的方向直线发展。他认为，狩猎与采集、游牧、农业之间不存在层层递进的关系。当社会扩张到资源匮乏的地区时，人类不得不放弃农耕，转而采取游牧的生活方式。因此，游牧只是人类在资源匮乏地区的变通手段，而不是农业的前驱。对于拉铁摩尔来说，农耕和游牧也就不是文明与野蛮的界限。正是基于此种观点，拉铁摩尔强烈抨击过国民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农耕的政策。

虽然拉铁摩尔不认同马克思对历史的直线性阐述，但他也认为人类会走过不同的发展阶段。罗威廉发现，拉铁摩尔经常将研

究对象比拟为要经历出生、成长和衰弱的生物。在拉铁摩尔的学术思想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用生命体比喻社会、文化和文明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的诞生，标志着理想主义者希望让中国焕发新生命的愿望。日本全面侵华之前，历史学者内藤湖南也曾呼吁年轻的日本用其活力保卫年老体衰的中华文明。

冷战时期，拉铁摩尔声称苏联就像处在上升期的生命体，而西方则垂垂老矣。此类观点成了麦卡锡主义者打击拉铁摩尔的口实。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拉铁摩尔为莫斯科工作，但他在学术生涯的后半段被迫出走英国。因为他的加盟，英国利兹大学的中国研究站在了西方汉学界的前沿。

1989年，拉铁摩尔在美国去世。他的学术思想经过了多次变化，但正如罗威廉所总结的，值得我们审视的不仅是拉铁摩尔的学术贡献，还有促使他做出变化的时代。

参考文献

- Rowe, W. T. (2007). Owen Lattimore, Asia,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3), 759–786.

经济

看经济学帝国主义是如何看这个世界的。

以及……其他学科是怎么看经济学帝国主义的。

亚投行面临的三大内部挑战

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的加入标志着亚投行筹建取得重大进展，但亚投行存在的内部挑战依然不可忽视

◎ 归宿

继英国之后，法德意三国近日也宣布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从而正式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同时，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沙特等也在考虑加入，这也标志着亚投行组建取得了重大进展。

作为中国主导发起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重点支持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被广泛看做中国利益拓展、重塑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举措。但在一些智库

和研究人士看来，亚投行依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研究员孙云（Yun Sun）最近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就指出，当前亚投行内部存在三大挑战，可能影响其作用，甚至阻碍中国实现建立亚投行的战略目标。

挑战之一，如何定性亚投行？中国在提出创建亚投行之初就强调，亚投行是多边商业银行（multilateral commercial bank），而非发展援助机构（development aid agency），这也意味着亚投行要追求一定的投资回报。但一般而言，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融资额度大，盈利困难。特别是在当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经济风险突出的情况下，相关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甚至存在“血本无归”的可能。如果只将收益回报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亚投行开展投资会更为谨慎。这也会导致一些不发达国家更难获得投资，与中国发起亚投行的初衷相悖。

挑战之二，亚投行应该采用怎样的决策机制和标准规则？亚投行股权由成员国根据各自GDP规模按比例分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然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但由于亚投行是国际多边组织，又有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治理结构，中国也很难一家独大。

文章认为，从以往经历看，中国参与此类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并不算成功。中国一度对组建“金砖银行”（BRICS' New Development Bank）热情很高，但由于金砖各国在资金分配、总部位置、领导层人员等问题上迟迟难以达成共识，中国也渐渐失去了对“金砖银行”的兴趣，主要精力转向筹组亚投行。因此，如果亚投行组建运行中再遇到阻碍，中国也可能将更多精力投向“丝路基金”：这是一个中国主导的，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双边投资机构，中国对其有更好的掌控。

亚投行的治理标准规则（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也将对其未来发展产生影响。美国已经多次公开对亚投行的标准规则提出质疑，要求亚投行提高标准，但是标准提高就意味着效率降低。事实上，正是世界银行（WB）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低效，促使中国组建亚投行。不过中国也应认识到，较高的治理标准和较严格的监管会帮助亚投行获得更高国际评级，这对于亚投行的声誉和募资都是有利的。

挑战之三，亚投行尚未形成固定的融资模式。中国可以动用外汇储备或发行特别国债为亚投行项目融资，但亚投行的其他成员国却很难有这样的财政灵活度。文章指出，尽管同业拆解、PPP

等都有可能成为亚投行的融资模式，但观察人士认为，由于缺少有力的信用评级和贷款担保制度，亚投行未来的融资可能会遇到一定阻碍。

尽管存在上述困难和挑战，但孙云相信亚投行总体符合中国战略利益，因此推进亚投行建设仍是中国优先的政策选项。中国会积极协调解决上述问题，所以亚投行的未来总体上依然为人看好。

参考文献

- Sun, Y. (2015). China's AIIB challenge. *PacNet*, 16. Retrieved from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Pac1516.pdf>

钱去哪儿：中国海外投资扫描

谁是中国海外投资大户？钱去了哪些国家？集中在什么产业？又有哪些典型案例？本文根据目前唯一可公开获取的数据库，制作七张详尽的示意图，告诉你答案。文后更附有中国海外投资目的地排行榜的全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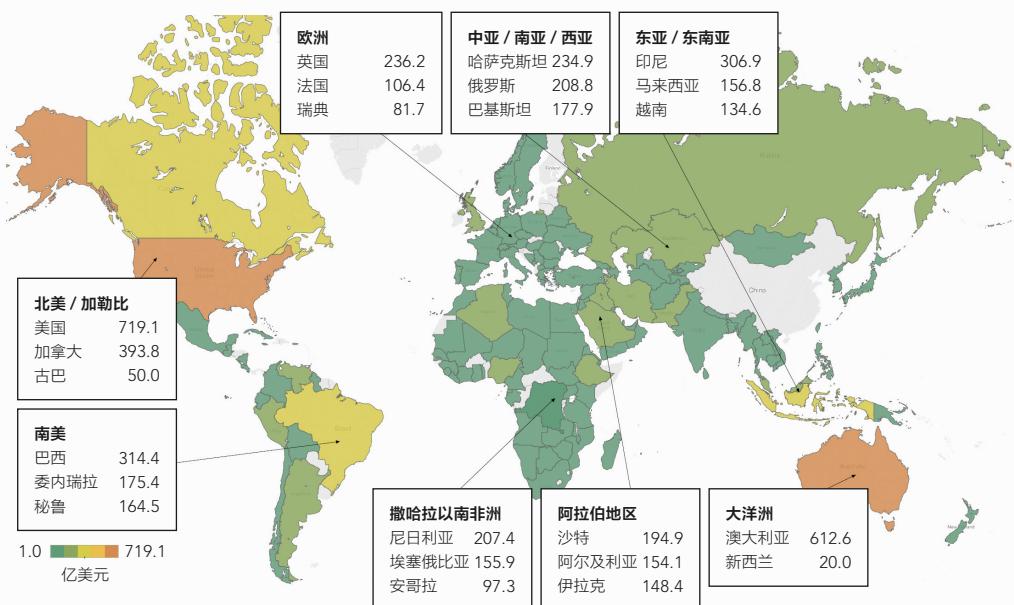
◎ 羽人

过去十年间，中国雄厚的外汇储备、对能源矿产资源的高度需求、中国公司对海外市场的渴望等因素，都推动着中国的海外扩张步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承揽工程项目，中国已经积累了极为庞大的海外利益。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中国企业入股国外的公司或者在当地设立新的企业，海外工程投资项目则主要是中国企业海外承揽大型的基建项目，例如公路、铁路、和水电建设等。相当部分的项目以中国援建的形式出现，也有部分项目中国企业

将获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

以下，政见观察员将利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推出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Th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CGIT）对中国的海外利益进行解析。该数据库记录了自2005年以来中国一亿美元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或工程项目，也是目前唯一可公开获取的中国海外投资数据库。

中国的海外触角伸到哪？



中国公司2005—2014上半年海外直接投资与工程投资分布图（单位：亿美元）

由上图可以看出，中国的海外投资和工程基本上已经触及世界各个角落。根据官方的《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目前共有 1.53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 184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2.54 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中国在美累计投资额达到了 719.1 亿美元，使美国遥遥领先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最大接收国。由于对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高度需求，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累计投资也达到了 612.6 亿美元。或许让人有点惊讶的是，在东亚 / 东南亚区域，获得中国海外投资总额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该图的投资数据包括了海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工程投资。

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的海外投资增长十分迅速。2005 年，无论是海外直接投资还是工程金额都在 100 亿美元以下，而 2013 年这两者都已超过了 500 亿美元，其中（根据官方数据）直接投资更是达到了 1010 亿美元。由于 CGIT 只记录 1 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因此官方数据和 CGIT 数据的差异有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相对小金额的海外直接投资。

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排在美国（3383 亿）和日本（1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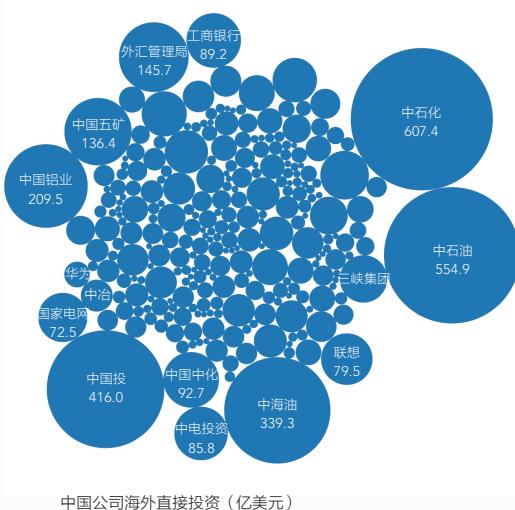
亿) 后面，相信 2014 年中国的海外投资有很大可能接近甚至超越日本。从 2005 年到 2014 年上半年，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累计达 5153 亿美元，工程投资累计达 3551 亿美元。政见观察员估计，用不了多久，中国的累计海外利益将突破 1 万亿美元。

超大国企唱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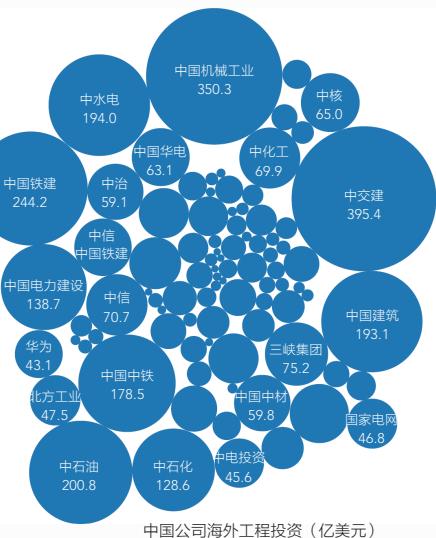
从公司分布来看，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和工程基本上都被国

家队所垄断，石油企业成为当仁不让的海外收购大户，而中国的工程建设也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上。比如说中海油2012年以151亿美元全资收购了加拿大Nexen石油公司，而中国中铁2010年承建印尼的一条煤炭运输铁路线并且获得其24年的运营权。

结合下图可以看得更清楚——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家超大型油企动辄数十亿亿美元的投资让他们傲视群雄，而作为民企领军企业的华为在金额上就相形见绌了。中国海外工程的投资分布就更为平均，不过依然是超大型的国有企业唱主角，特别是是铁路、建设和电力企业。



中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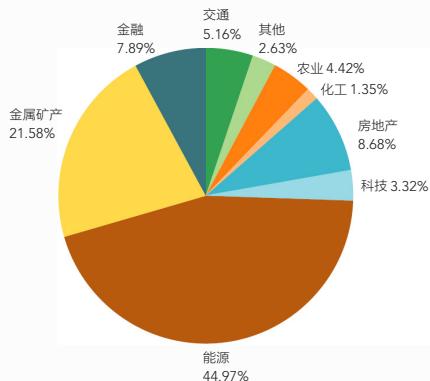


中国公司海外工程投资（亿美元）

钱都在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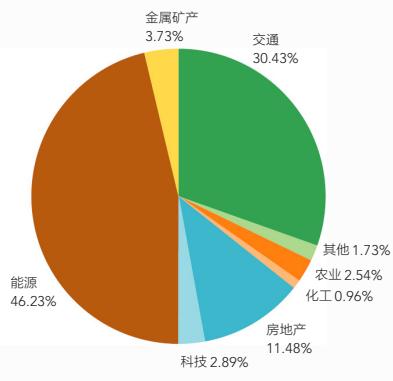
对投资行业的分析，可以看出海外投资的重头是能源，无论是累计金额达 5153 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还是累计金额达 3551 亿美元的工程项目，能源行业占据了将近 50% 的比重。金属矿产类行业也是直接投资主要目标，而海外工程项目的另一重点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交通行业。

2005—2014 上半年累计金额 5153 亿美元



海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累计投资占比）

2005—2014 上半年累计金额 3551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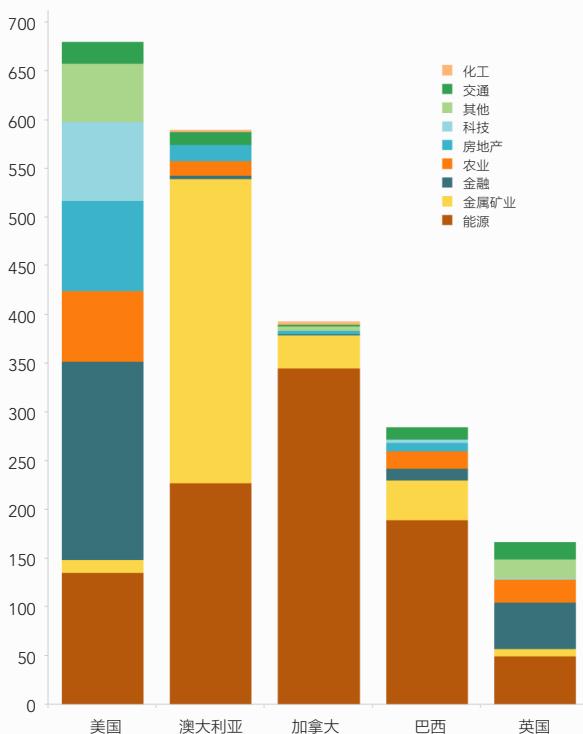


海外工程投资行业分布（累计投资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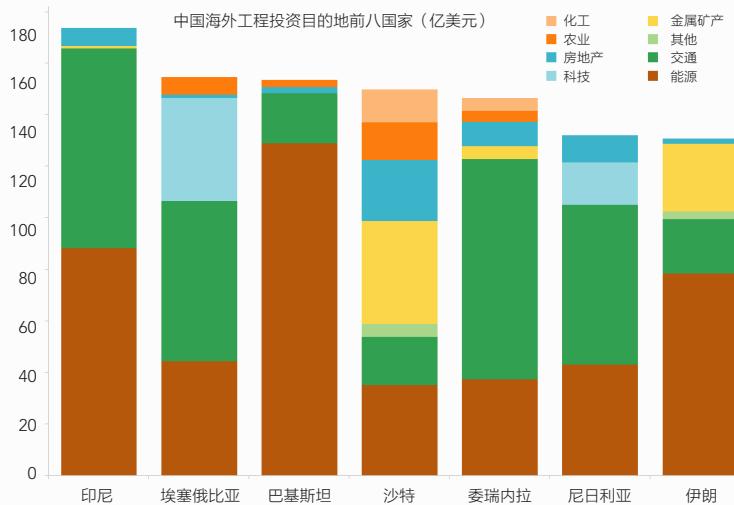
再看中国海外投资的目的地国家，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发达国家，而工程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去向是美国，而所投资行业更是五花八门，主要有金融业和能源业，还有科技、房地产、农业等等方面的投资。英国的金融业也吸收了不少中国投资。虽然澳大利亚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去向，不过所投资领域集中在资源产业。

海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累计投资占比）



中国的海外工程
项目显示的是另一幅
图景。其目的地主要
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
家，并且主要围绕铁
路、公路等基础建设，
中国在这方面是行家
里手。虽然能源相关
行业依然是重要部分，
但不一定局限在石油。
比如在印尼的许多投
资是煤炭相关，而在
巴基斯坦则有相当部



分是水电建设，在伊朗的项目既有石油天然气，也有水电等。

尽管中国海外扩张的步伐引起了不少争论，不过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了对外投资的大国，并在不断地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自然地，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极为庞大，如何保护好相关利益便成为了现实的议题。众多的海外投资项目中，有巨额亏损的，有胎死腹中的，也有引发与投资地冲突的，“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言犹在耳，如何更好地面对和处理这种种问题，是需要利益相关者认真思考的。

最后，是政见观察员为您整理的海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家和地区全排行。觉得有价值的话，记得分享给朋友。

2005—2014 上半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亿美元）

国家	排名	累计金额	项目数	国家	排名	累计金额	项目数	国家	排名	累计金额	项目数
美国	1	679.6	89	智利	34	40.1	4	波兰	67	8.4	2
澳大利亚	2	589.3	63	叙利亚	35	37.6	3	中国台湾	68	8.2	2
加拿大	3	392.5	32	匈牙利	36	36.1	4	毛里求斯	69	7.4	1
巴西	4	284.1	28	泰国	37	32.8	6	乍得	70	6.7	2
英国	5	234.0	30	阿富汗	38	32.7	2	巴布亚新几内亚	71	6.7	1
哈萨克斯坦	6	165.2	8	印度	39	29.8	6	古巴	72	5.0	1
俄罗斯	7	164.9	24	比利时	40	29.6	2	也门	73	4.7	1
秘鲁	8	164.5	10	委内瑞拉	41	29.1	4	墨西哥	74	3.1	2
印尼	9	133.2	22	文莱	42	28.0	1	塔吉克斯坦	75	3.0	1
法国	10	106.4	11	瑞典	43	27.0	2	尼加拉瓜	76	3.0	1
伊拉克	11	101	4	以色列	44	26.4	3	苏丹	77	2.6	1
阿根廷	12	94.9	9	土耳其	45	25.5	5	马耳他	77	2.6	1
南非	13	89.4	11	坦桑尼亚	45	25.5	2	卢森堡	79	2.2	1
新加坡	14	89.4	13	巴基斯坦	47	24.3	6	格鲁吉亚	80	2.0	2
瑞士	15	81.7	4	西班牙	48	24.1	5	乌兹别克斯坦	81	1.9	1
尼日利亚	16	75.5	5	缅甸	49	22.9	2	吉布提	81	1.9	1
几内亚	17	74.1	3	安哥拉	50	22.5	2	多哥	81	1.9	1
刚果(金)	18	62.7	6	斯里兰卡	51	21.2	4	纳米比亚	81	1.9	1
马来西亚	19	61.0	12	津巴布韦	52	20.9	5	牙买加	85	1.7	1
德国	20	58.5	15	新西兰	53	20.0	5	乌克兰	86	1.6	1
葡萄牙	21	53.8	3	朝鲜	53	20.0	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87	1.5	1
希腊	22	53.3	5	老挝	55	17.2	2	马达加斯加	87	1.5	1
埃及	23	52.0	6	荷兰	56	17.2	4	埃塞俄比亚	89	1.4	1
尼日尔	24	51.8	2	喀麦隆	57	17.0	3	奥地利	89	1.4	1
莫桑比克	25	50.0	3	日本	58	16.4	7	肯尼亚	89	1.4	1
厄瓜多尔	26	47.2	4	赞比亚	59	16.1	4	保加利亚	92	1.2	1
韩国	27	47.0	7	哥伦比亚	60	14.1	2	刚果	92	1.2	1
意大利	28	46.0	7	蒙古	61	14.1	3	利比里亚	94	1.1	1
挪威	29	45.0	2	加纳	62	12.0	1	卡塔尔	95	1.0	1
沙特	29	45.0	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63	11.7	2	圭亚那	95	1.0	1
塞拉利昂	31	44.4	4	菲律宾	64	10.2	1	巴哈马	95	1.0	1
乌干达	32	42.9	5	越南	65	9.9	5				
伊朗	33	41.2	3	柬埔寨	66	9.2	3				

数据来源: Th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经济学家：社科世界中的殖民者？

虽然表面上各学科地位平等、百花齐放，但在很多人心目中，它们存在高低贵贱的鲜明差异。而站在这个等级结构塔尖上鄙视众生的，无疑是经济学。

◎ 张跃然

社会科学研究者无时无刻都在面对一只“房间里的大象”——那些所有人都能看见，却都不愿意承认其存在的庞然大物——“学科鄙视链”。虽然表面上各学科地位平等、百花齐放，但在很多人心目中，它们存在高低贵贱的鲜明差异。而站在这个等级结构塔尖上鄙视众生的，无疑是经济学。

“经济学是最‘科学’的”

客观来看，经济学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远远好过社科领域的其他同行。他们的物质待遇更为优厚（2012年，美国高校经济学教师的工资中位数是10.3万美元，10%的人工资超过16万美元；社会学家的这两个数字分别是7.6万美元和11.8万美元，这还不算经济学家在企业界从事咨询等兼职挣的外快）、更受社会尊敬、在政策议题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看看给美国各大媒体写专栏的社科学者里经济学家占的巨大比例，看看多少经济学家担任政府顾问，甚至直接进入政策部门工作）。

同时，经济学相对于其他社科专业的优势地位也体现在经济学家自身的优越感上。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曾经坦率地写到：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使用的分析工具没有我们强大，他们知道的也比我们少——至少我们这样觉得。从GRE分数和其他指标看，我们专业吸引的学生比他们强，另外我们的课程对数学的要求也更高。

这一观点显然在经济学界很有市场。200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美国顶尖经济学系就读的研究生中，77% 认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里最‘科学’的学科”。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优越感，往往使他们在面对其他社会科学同行时有种不屑一顾的态度。

面对经济学的强势，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心态十分复杂。他们既眼红经济学家们的优渥待遇和巨大话语权，又蔑视（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在解释某些复杂现实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幼稚，同时也因经济学家对其他学科的不屑一顾而忿忿不平。当这种种复杂心绪纠结在一起，最后往往只能汇成一句话：“呵呵。”

除了“呵呵”，受经济学欺压的社科劳苦大众们能拿起学术武器对抗经济学霸权吗？这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 Marion Fourcade 与其合作者近日发表论文，不仅明白指出了房间里确实存在一只硕大无比的大象，而且从各个角度细致刻画了这只大象的模样，从而引导人们反思：这只大象的存在是否是理所当然的？

自我封闭的王中王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逐渐转向

以应用微观经济学为基础、以因果推断为目的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开始大面积涉足那些原先不被认为是经济学研究范畴的议题，大到政治制度、历史兴衰，小到犯罪行为、家庭生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对政治学、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域的涉足，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与其他社科同行展开对话。

诚然，在美国社科学术界，各学科的自我封闭倾向都很严重，但经济学在自我封闭方面可谓是王中王。1997年的数据显示，经济学论文的引用文献中高达 81% 来自本学科，而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这个数字则是 59%、52% 和 53%。

其他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对 2000—2009 年顶尖学刊《美国经济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美国社会学评论》引用数据进行分析后，Fourcade 与合作者发现，《美国经济学评论》所发表论文的全部引用文献中，40.3% 来自本学科前 25 名的期刊，0.8% 来自政治学前 25 名的期刊，0.3% 来自社会学前 25 名的期刊。相比之下，《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引用中来自本学科、经济学和社会学前 25 名期刊的比例分别是 17.5%、4.1% 和 1.0%，而《美国社会学评论》引用本学科、经济学和政治学前 25 名期刊的比例分别是 22.0%、2.3%、2.0%。针对具体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引用情况的

分析，也呈现出一致的趋势。

以上数据呈现的景象是，经济学不仅是个极端自我封闭的学科，而且和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科门类存在一种极端不对等的关系：相对于政治学、社会学对经济学界的关注，经济学家对其他社科同行的关注实在太少了。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情况当然是由于学科间方法和取向的差异导致的。比如，社会学家重点关注“宏观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个体行为”，这就和经济学界“从个体行为出发‘推导’宏观状态”的主流分析范式相互抵牾。又比如，存在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中的大量质性研究和比较历史研究，势必入不了经济学家的法眼，因为——正如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 Edward Lazear 所说——经济学人往往将基于数学语言的形式建模和依靠统计工具的精确因果推断视作最高级、最“科学”的方法取向。

经济学从业者自身的自信和高傲，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学对其他社科门类的漠视。2006年的一项问卷调查中，高达 57.3% 的经济学教授反对“跨学科知识优于单一学科的知识”。作为对比，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中，反对比例分别只有 28.0% 和 25.3%。经济学家们对自己学科的自信可见一斑。

近些年经济学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化的趋势，被经济学家骄傲而又略带调侃地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而在其他社科同行看来，经济学家确实跟帝国主义殖民者差不多：他们疯狂地寻找和踏足每一块尚未被经济学开垦过的研究领域，在探索该领域的初期也会寻求“原住民”（一直在研究该领域的其他社科同行）的引导和帮助，但他们并没想真正从“原住民”那儿学些什么东西。相反，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会甩开其他学科的同行们，关上对话大门、甚至无视同行们的存在，沉耽于对经济学视角和方法的自豪与崇拜中。

内部结构：整齐划一，层次分明

另一个可能导致经济学极端自我封闭的原因是，这个学科内部有高度的凝聚力。一方面，经济学家们在认知层面有极强的共识：他们对于如何训练博士生、如何开展研究、该做什么样的研究、什么是好研究什么是坏研究等问题的认识高度统一；另一方面，经济学科内部层级分明，学科“精英”对于整个学科的发展有强大的掌控力。认知统一和精英掌控，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体现在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博士生找工作。经济学界博士生毕业找工作的流程之统一、之规范是其他学科无法想象的。每个学年开始之时，各个大学的教授先对自己学校本年度毕业的博士生进行内部排名，然后根据这个排名，各学校的就业负责人（Placement Officer）将求职学生和有意雇佣的大学一一匹配。在每年一月份的社会科学联合会（Allie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会期间，会议酒店的各个房间里，不断进行着雇佣方对求职者的正式面试。而最终的决选，则在接下来的春季学期尘埃落定。如此规范、流水线般的招聘流程带来的后果是，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博士生的毕业工作去向和其所就读的学校排名有更强的相关性——美国顶尖的几个经济学系更频繁地雇佣对方的毕业生，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团体，不断强化经济学系内部的等级体系。

比如发表论文。美国顶尖经济学系对顶尖学术期刊论文发表的垄断程度是十分骇人的。Fourcade 等人的统计显示，2003—2012 年在顶尖学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作者中，28.7% 就职于排名前五的经济学系，对于《经济学季刊》来说，这一数字高达 37.5%。作为对比，《美国社会学杂志》的论文作者中，只有 22.3% 来自前五的社会学系。如果将论文作者的博士毕业学校

当做观测指标，这种“发表垄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垄断现象既说明了美国经济学界内部等级差异多么分明，也说明了这一学科的从业者对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多么统一（相比之下，在社会学界很多学者通过出版专著、而非发表期刊论文的方式在顶尖社会学系获得了教职）。

再比如学术组织的管理。美国经济学会的组织形态和运营模式，体现出鲜明的中心化和等级制倾向。在 2010—2014 年期间，学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中来自排名前五的经济学系的比例高达 72%。而每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的组织和议程设置权力，完全掌握在人数不多的组织委员会手中。相比之下，在美国政治学会和美国社会学会，执行委员会中来自顶尖前五名院系的成员比例只有 12% 和 20%。更重要的是，这两大学会底下还有着众多的分会，这些分会才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进行日常学术交流的制度平台，它们拥有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和规章制度，以及在每年政治学年会、社会学年会期间自行设置议程的权力。

自我认知：天之骄子 + 救世主？

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对当代生活的巨

大影响力无疑是其他社科学者完全无法相比的。无论是在政府部门、企业公司还是国际组织，经济学家（作为外部顾问或内部员工）在决策环节能够施加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样的社会环境加上经济学家对自身学科在视角和方法上的天生自信，使得经济学家们认为自己既有能力、又有责任去干预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也即所谓“经世济民”。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尝试通过理论模型推导来完成最优制度设计；田野实验法的逐渐走俏，为经济学家“尝试”各种制度干预提供了大量机会；计量方法的不断精细化，使经济学家能更加“准确”地评估各种政策的实际实施后果。这一系列学术潮流，加深了经济学家在智识上的自信，也进一步点燃了经济学家在干预社会时那种“舍我其谁”的天之骄子心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学家既不在现实世界中掌握什么话语权，也对学术能否真的改良社会心存怀疑。和经济学家相比，社会学家更看重社会现象背后的复杂性、更强调宏观结构因素和历史条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更倾向于认为社会现状无法通过个别人的主观干预而改变。这样一来，社会学家已经注定置身于政策圈之外，把自己安排在“社会批评家”的边缘角色上——社

会学家批判现实，希望通过研究成果引起广泛的社会反思，但极少尝试去“修补”或“拯救”社会。

当我们讨论经济学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以及评价这种影响力是好是坏时，不能忽视两个因素。第一，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在众多社会科学门类中，经济学家往往是政治倾向最保守的：更相信自由市场、更注重效率而非公平。例如，一项 2013 年的调查显示，只有 $\frac{1}{3}$ 的经济学家认为“大企业赚取的利润过高”，只有一半的经济学家认为“就算继续扩大赤字，政府也应该帮助穷人”。在社会学家中，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frac{2}{3}$ 和 90%。

第二，近二十年内美国经济学家的薪酬水平一路飙升，而美国民众的平均收入情况却并未有明显改善。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和普通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当经济学家越来越富时，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看问题，又如何做到理解并代表社会整体的福祉利益呢？

黑过经济学家后，我们还能做什么？

在看到经济学在社会科学界占据的强势中心地位之后，在领略了经济学家的自我优越感之后，我们应该作何感想？如果我们

认为，经济学家真的比其他社科同行要聪明、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真的比其他学科优越，那么经济学的高高在上便没有什么问题。就像 Richard Freeman 所说，经济学博士生的 GRE 分数最高，经济学用数学用得最多（虽然“数学用得多等于更‘科学’”这个观点非常值得商榷），那么经济学家的“一览众山小”心态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但我们也反过来问，这一切真的是理所当然的吗？在更根本的层面上，经济学的强势，是否是由某些社会和历史因素所塑造的？作为长期将经济学界当做制度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 Marion Fourcade 曾在 2009 年出版专著，通过多国比较和历史分析，说明了经济学界内部的组织形态和经济学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各个社会的政治环境和历史发展轨迹。

如果我们还相信社会科学世界中的每个学科都各有所长，如果我们还认同跨学科交流更有益于人类智识的提升，那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现象足以引起更多反思。至少，经济学家们似乎可以略微放下身段、多听听其他同行的声音？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这么一篇把经济学家从头到脚黑了一遍的论文，能在最近发表于经

济学界顶尖的综述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经济学界善意的努力。

参考文献

- Colander, D. (2005).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st redux.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5–198.
- Fourcade, M. (2009). *Economists and societies: Discipline and prof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1890s to 199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ourcade, M., Ollion, E., & Algan, Y. (Forthcoming). 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1).
- Freeman, R. B. (1999). It's better being an economist (but don't tell anyon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39–145.
- Gross, N. (2013). *Why are professors liberal and why do conservatives ca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n, S. K. (2003). Tribal regimes in academ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rket structure across disciplines. *Social Networks*, 25(3), 251–280.
- Jacobs, J. A. (2014). *In Defense of Disciplines: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Specialization in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zear, E. P. (2000). Economic Imperica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1), 99–146.

民营企业家：中国经济腾飞的幕后功臣

中国民营经济繁荣发展的最大功臣，恰恰是民营企业家们本身。他们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制度歧视，在黑暗中一步步摸索。在反复不断的经济交易过程中，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下而上地建立了一整套非正式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保障私有产权。没有这一套自下而上建立的制度框架，民营经济的发展无从谈起。

◎ 张跃然

想要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永远不可能绕开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背后的原因机制究竟为何？多年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为了这一问题已经打过不少笔仗。2012年，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倪志伟和隆德大学经济学教授 Sonja Opper 出版专著《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旗帜鲜明地指出：民营企业家们主动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建设，是中国民营经济部门发展壮大的根源，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最大推力。

内生的制度变革

两位作者在书中阐释的观点，是建立在对学术界两大主流视角的挑战之上的。其一，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视角认为，政府行为和政治力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在研究中国经济腾飞史时，持有这一视角的学者往往将研究重心放在“政府做了什么”上：大到中央政府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引领经济发展路径，小到地方政府如何使出浑身解数刺激经济增长、创造财政收入。

其二，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视角认为，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若想蓬勃发展，必要的前提条件是一整套保护私有产权、降低交易成本的正式制度。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没有公正完善的司法机构，私有经济的发展比登天还难。

然而，本书的两位作者指出，这两种视角都不能解释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为什么在中国能蓬勃发展。在执政者启动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时，头脑里根本没有“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码事。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不仅没有一套鼓励私有经济

发展、保护私有产权的政策框架，反倒是对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和刁难随处可见。纵观历史，中国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支持性表态和立法，是落后于私营经济的实际发展步伐的。可以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在政府的忽视和打压、正式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现实恰恰和“国家中心主义”与“新制度主义”视角所做的理论预测背道而驰。

在本书作者眼中，中国民营经济繁荣发展的最大功臣，恰恰是民营企业家们本身。他们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制度歧视，在黑暗中一步步摸索。在反复不断的经济交易过程中，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下而上地建立了一整套非正式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保障私有产权。没有这一套自下而上建立的制度框架，民营经济的发展无从谈起。

而这一套非正式制度之所以能够被建立起来，是因为一系列社会机制为其提供了土壤。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民营企业家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他们之间的经济交易提供了信任基础和道德动力，输送了信息、传递了资源。而当这些社会纽带编织成一张细密的网，企业家们的道德共识得以汇聚，一整套商业语境下的道德规范得以形成，并被不断强化。这些社

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的总和，便构成了支撑民营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

民营经济在非正式制度的支持下蓬勃发展，吸引更多人成为民营企业家。而更多人参与到民营经济活动中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套非正式制度。在这样一来二去的“正反馈”之下，私有部门终于成为政府无法继续忽视或打压的重要经济力量。在这样的压力下，政府才“被迫”出台正式制度和法律，对民营经济的非正式制度进行“合法化”。这一由民营企业家们自己主导的制度建设，被本书作者称为“内生的制度变革”。

社会机制的力量

研究者对长三角地区的七百余家民营企业进行了两轮问卷调查（2006年和2009年），同时在2005—2011年间对一百余位民营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访谈材料和问卷调查数据的相互印证，本书作者生动刻画了民营企业家如何利用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在步履蹒跚地经济尝试中建立非正式制度，以及这些非正式制度如何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许多民营企业家们表示，他们一开始决定独立做生意，是因为

耳闻目睹亲朋好友经商成功后受到鼓舞，或者干脆是被其他经商成功的亲朋好友劝说鼓动的结果。在创业伊始、两眼一抹黑之时，企业家们往往依赖于这些亲朋好友提供宝贵的经商经验。换句话说，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传递，一方面使得民营经济滚雪球似的壮大起来，另一方面使得经商知识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分享。在很多地方，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为正在创业的亲友提供经验和技术上的帮助支持，被视作一种道德义务。而这些新企业家站稳脚跟之后，则愿意和原先的“恩人”建立一种长期的互助关系：互相分享信息和经商建议、互相介绍客户、避免直接竞争。

因为民营中小企业难以在正式金融系统中获得融资渠道，向亲朋好友借贷便成了企业家们缓解资金燃眉之急的主要渠道。因为借贷行为以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借贷双方之间的信任被最大化，信息不对称被最小化。同时，这种社会关系也产生了道德压力，既迫使出借的一方痛快借钱，也迫使求贷的一方按时还钱。更重要的是，借贷双方往往在生意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长期的互助往来，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极大地增加了求贷者债务违约的成本。互相信任和道德约束，往往使得借钱过程既不需要正式字据，也不需要抵押物。同时，因为这种借贷行为依据的是“人

情逻辑”，出借方并不会收取利息（当然，求贷方可能在还钱时主动支付利息作为答谢）。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使得民营企业间的非正式借贷成为可能，极大增强了资金流动的灵活性、拓展了低成本融资渠道。

正因为许多民营企业家是在亲友熟人的吸引和帮助下走上经商之路的，许多地方出现了民营企业“扎堆”从事同一行业的情况，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产业集群”。同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家们有大量 的机会进行社会互动，久而久之便建立了人情纽带。随着这些人情纽带连成社会关系网，一整套有关“如何做生意”的社会规范便逐渐成型、并被社会关系网所强化。企业家们开始依靠社会关系组织大规模、多维度的商业合作，比如共同购买原料、协同制定市场营销策略、合伙投资、技术研发等。在密密麻麻的人际纽带中，消息和“闲话”都传播得飞快，因此，一旦某个企业家做出了有违道德规范的事，其他企业家往往能迅速知晓，进而切断和该人的生意往来与互助关系。这种“社会执法”机制有效维护了产业集群内的经济秩序。同时，当企业家们之间出现生意上的纠纷，他们很少求助于法律或政府，而是依托关系网中的其他企业家进行调解。

两位作者的分析还显示，基于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的非正式制度在民营企业获取组织合法性、解决用工问题、开展技术创新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总而言之，民营企业家们自下而上地建设非正式经济制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在尝试中摸索、在实践中学习的过程。而种种制度创新被应用到实践当中，成为了民营企业解决种种经济难题的最重要武器。

从理论到现实

综观全书，两位作者的理论和分析依然有可被质疑之处。虽然作者对“国家中心主义”的自上而下视角进行了大力批判、极力强调社会中个体行动者（民营业主）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下而上发起“内生制度变革”的重要意义，但从根本上讲，书中讲述的故事同样离不开国家行为的深刻塑造。一方面，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国家政策对私营经济发展影响有限，那么为什么私营经济为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销声匿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十年才重露萌芽呢？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设计鼓励引入市场机制，为人们进入民营经济“试水”提供了空间，造就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另一方面，人们之所以敢于进入民营

经济闯荡，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地方政府默许、容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民营经济的发展，依然和政府息息相关。

从根本上讲，“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和“内生制度变革”视角完全可以被统一起来。中国民营经济崛起的过程，乃至中国社会其他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转型过程，实际可以看做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和自下而上的社会不断互动的过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勇于并善于在夹缝中进行各种令人咋舌的制度实验，但开展这些实验的前提是国家的政策为社会提供了“夹缝”。而当社会自下而上的制度实验达到蔚为壮观的程度时，政府又会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来规范、引导民间制度建设的成果。换言之，“内生制度变革”是对国家行为的反应，而国家下一步的行为，同样是对已有的“内生制度变革”的回应。这一互动游戏的进程，并不在哪一方的掌控之内；在各方的随机应变之中，整个社会的制度发展轨道沿着无法被预期的方向前行。

另外值得反思的是，即使本书作者揭示了过去三十余年中非正式制度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也并不意味着非正式制度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优的制度环境，更不意味着非正式制

度能对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民营经济也将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民营企业家们还能仅凭借着非正式制度渡过难关吗？正式制度是否将在未来变得越发不可或缺？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观察和讨论。但无论如何，这本《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提醒我们，在享受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物质成果时，不要忘了那些极富开拓精神和主观能动性的民营企业家们——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他们的勇气、智慧与汗水。

参考文献

- Nee, V., & Opper, S. (2012).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韦伯错了吗？——来自发展经济学的证据

我们可以把马克斯·韦伯留下的大部头扫进垃圾箱了吗？其实，经济学家们正更加热烈地拥抱韦伯，他的著作已经成了经济学家们在讨论文化与人类行为关系时的基本参照系和出发点。

◎ 王也

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关于这一主题，影响最为深远的论述大概就是马克思·韦伯在其不朽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所作的分析。韦伯指出，新教使人们相信，唯一为上帝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就是通过不断劳作来履行个人在尘世间的责任，同时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中的一员。这一“新教伦理”促使人们摒弃享乐，积累财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和道德基础。

2009年，两位经济学家 Doepke 和 Zilibotti 在《经济学季刊》

(QJE) 上发文，基于韦伯的思想，构建了一个精巧的动态博弈模型，试图说明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了工业革命前后的社会结构。

他们假定，父母可以主动“投资”（即影响）子女对时间和闲暇的偏好（即耐心程度和吃苦耐劳精神），且其效用受到子女福利水平的影响。在一个前工业时代的社会里，穷人（没有土地的家庭）可选的职业只有农民（不需人力资本投入）和工匠（需要人力资本投入）两类。假定存在预算约束，即家户不能借贷，那么对于穷人来说，理性的选择是尽可能地让孩子更加耐心、更能吃苦，以便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而对于富人（有土地的家庭）来说，因为租金收入跟努力程度无关，培养孩子对闲暇的热爱则更为合宜。均衡状态下，整个社会会自动地分为偏好不同的两个阶层，其中穷人的子弟会根据农民和工匠的相对收入选择自己的工作。

但是，一旦工业革命发生，一种新的职业——通过储蓄和投资成为企业家——对大众开放，事情会变得大不一样。由于比富人更有耐心、更能吃苦，比农民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工匠家的孩子会实现更快的资本积累，逐渐提升收入水平，最后超越原先的富人阶级，成为新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集团。两位研究者指出，

模型得出的结论跟工业革命前后的实际社会情况相当符合。

当然，无论是早年的韦伯还是后来的博弈模型，都只是援引了史实叙述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并未得到数据资料和统计工具的支持（韦伯只是进行了一些跨国比较）。“新教伦理”真的存在吗？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否真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明显？

两位德国经济学家 S. Becker 和 L. Woessmann 于 2009 年在 *QJE* 上发表的论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们利用 19 世纪普鲁士的人口普查数据证明，韦伯的观察确有其合理之处：新教徒密度较高的地区，确实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如更高的人均所得税收入）；这一现象甚至在今天的德国依然存在。然而，具体的机制却跟韦伯设想的大不一样：在控制了各地平均识字率差别之后，两位研究者发现，新教徒密度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消失了！

他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宗教改革常常为人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其对于教育事业的推动作用。马丁路德本人相信，教众应该获得自己阅读圣经的能力；因此他一方面号召各地领主修建公立学校，一方面鼓励群众送子女入学。这一举动的结果，就是无论在 19 世纪的普鲁士还是如今的德国，新教徒较多的地区人均教育水平普遍更高。因此，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新教伦理”，而是新

教对教育投资（或者说人力资本积累）的鼓励，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快速发展。

D. Cantoni 发表于 2014 年的论文，对上述结论形成了有益的补充。公元 1555 年，在经历了教派之间的多次流血冲突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德意志新教诸侯在奥格斯堡签订和约，规定了“教随国立”的基本原则。从此，帝国境内的大小诸侯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尊奉的教派。利用 1300—1900 年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 272 座城市的人口数据，研究者发现，在奥格斯堡和约签订之后，那些选择了新教的城市并未比天主教城市表现出更快的发展趋势。为了进一步控制两类城市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差别，作者利用了如下史实：距离维滕贝格（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之处）越近的城市，就越可能选择尊奉新教；而这一距离跟城市的特质并无关系。然而，即使只考虑这一外生因素导致的教派变化，新教城市仍然没有比天主教城市表现得更好。

研究几乎同一问题的两篇文章，为何结果会如此迥异？Cantoni 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19 世纪上半叶）之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才日渐凸显；在此前漫长的历史阶段，稍高的教育水平并不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显著变化。这进一步说明，“新

教伦理”本身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更为有趣的是，经济学家们在中国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香港科技大学的龚启圣和白营两位研究者利用 1920 年代的历史记录发现，当时传教士比例较高的中国县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更高。然而，有没有可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会吸引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呢？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两位作者考察了义和团运动这一历史事件形成的外生冲击：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主要根据地在长江以北；而在长江以南，张之洞和李鸿章等人签订了所谓“东南互保”的协议，为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提供了保障。因此，一座县城离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地越远，离江南越近，就越可能吸引较多的传教士。通过这种方式，作者们成功建立起了从人均传教士比例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因果关系。但跟 Becker 和 Wossemann 的文章一样，在排除了当地人均的学校和医院数目的影响后，传教士比例的作用就不再显著。

此外，两位作者还分别考察了基督教不同教派影响的差异。如果韦伯提出的机制是正确的，那么最为恪守清规加尔文宗应该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但实际观察到的结果，反而是长于兴学校、建医院的路德宗所起效果最为明显。

综合上述的研究成果，我们似乎可以说，韦伯的理论已经成功地被当代的经济学研究证伪。那么，是不是如一些人宣扬的那样，我们可以把韦伯留下的那些大部头统统扫进垃圾箱了呢？

从目前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文化经济学的前进趋势来看，恰恰相反，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加热烈地拥抱韦伯。事实上，韦伯的著作已经成了经济学家们在讨论文化与人类行为关系时的基本参考系和出发点（见 Alesina & Giuliano, 2013；Nunn, 2013）。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并不是因为全篇严丝合缝、毫无纰漏，而是因为其宏大的框架和宽广的视野，让我们每次阅读，都能产生新的体会，激发新的思路。戴蒙德的地理决定论早已被 Acemoglu 的一系列工作证明是漏洞百出（Acemoglu, 2002 & 2005），普特南关于意大利城市社会资本积累的阐释也被认为是不符史实（Fukuyama, 2014），但《枪炮、细菌与钢铁》和《使民主运转起来》仍然是每一个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不可不备的案头读物。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这些曾经的巨人，将会一次又一次被后人踩在脚下；然而，只有站上他们的肩头，举首四顾时，我们才能意识到，他们曾经的艰辛跋涉，将我们和天空的距离缩短了多少。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1294.
-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5).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1, 385–472.
- Alesina, A., & Giuliano, P. (2013).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No. w1975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Bai, Y., & Kung, J. K. S. (2014). Diffusing knowledge while spreading God's message: Protestantism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China, 1840–1920.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Becker, S. O., & Woessmann, L. (2009).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2), 531–596.
- Cantoni, D. (2014).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esting the Weber hypothesis in the German Land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Diamond, J. M., & Ordunio, D. (2005). Guns, germs, and steel. *National Geographic*.
- Doepke, M., & Zilibotti, F. (2008).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2), 747–793.
- Fukuyama, F. (2014).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Macmillan.
- Nunn, N. (2013).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 347.
- Putnam, R. D., Leonardi, R., & Nanetti, R. Y. (1994).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 (2002).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other writings*. Penguin.

在外企打工的本地工人，怎样跟外企老板博弈？

本地工人对基层政治势力提供政治支持——包括在村委会和其他组织选举中投票，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腐败、谋私和选举造假，以此来换取基层政治势力对他们劳工权益的保障，并对外资雇主施加压力。

◎ 刘冬舒

在外资企业打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震惊国人的富士康员工“连环跳”就是一个注脚。不过，工人们也有自己的策略，与外资工厂主谈判和博弈。来自韩国的 Wooyeal Paik 博士发现，在外资企业打工的本地工人主要通过“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基层政治组织”两种形式来保障自身的劳动权益，

这项研究基于对山东青岛的数家韩国工厂的实地考察而完成。它不仅填补了本地务工人员劳动权益研究的空白，更从一个重要角

度揭示了基层政府、本地居民和外资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关系，展现了基层政治生态中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

土地所有权给外企造成压力

在中国，农村和乡镇的许多土地仍然属于集体所有性质，所有权由当地村委会控制。伴随着改革开放，许多沿海地区距离大城市较近的村镇开始吸引外资设厂发展经济。研究者所调查的青岛市周边某县（X 县）就是这样的例子——当地村庄在招商引资的时候，通常会劝说外资企业不去申请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或者仅仅做出（改变所有权性质的）口头承诺而不最终兑现。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土地不是外企的，而是依然属于集体所有。由于担心当地村镇对这些土地采取行动，韩国企业主不得不向当地村镇的某些要求妥协。这些要求包括大量雇佣本地人、严格保障本地工人劳工权益及不得随意解雇等等。

即便是在工厂土地已按照法律程序合法转变为国有土地的情况下（理论上，这种土地的所有权与当地人已经没有直接法律关系），外资企业主仍然会面对相当大的压力。X 村的工厂 A 的韩方经理就对研究者表示，“村民仍然认为他们对于土地有一定的

所有权”，因此，尽管工厂拥有一切合法文件，“任何事仍然都可能发生”。在这种压力下，韩方工厂 90% 的工人雇佣自本地村镇。

基层政治势力的庇护关系

一个村的村民往往都属于少数几个姓氏家族，而这些氏族基于在本地的影响力又往往占据了村委会和其他村务机构的关键职位。很多时候，这些大氏族甚至会组成自己的保安队，形成一定程度的暴力威慑力量。因此，本地工人往往可以通过其所属的氏族，形成一个联系亲戚、其他村民、村保安队以及村级政治组织的网络。这个网络往往可以对本地工人形成强有力的支持。

研究者发现，许多韩国工厂处理违纪的本地工人时都会面临这种压力。来自当地村委会、警察局和其他机构的人员会对工厂施加压力，工人的本地亲戚会组团前往工厂抗议。甚至，有些工厂会面对暴力组织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工厂不得不试图与当地重要的地方势力保持密切的关系，以图在必要的时候借助他们的力量来“解决麻烦”，而维持这种关系基本上意味着要优待与这些势力相关的工人和雇员。

研究者更进一步认为，基层政治势力对本地工人提供的劳工

权益保护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庇护关系。本地工人对基层政治势力提供政治支持——包括在村委会和其他组织选举中投票，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腐败、谋私和选举造假，以此来换取基层政治势力对他们劳工权益的保障，并对外资雇主施加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基层政府尽管十分渴求外资以发展经济，却仍然对外资工厂劳工问题频频施加压力。

和外企形成对比的是，本地工厂里的本地工人，基层政治势力提供的劳工保护就微乎其微。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庇护关系的存在：因为本地企业主同样可以与本地政治势力存在恩庇关系，因而本地工人面对雇主所具有的优势就不复存在，基层政府出面加以保护的可能性自然大为降低。

不可否认，这种对本地工人的劳动权益保护机制有其存在的正面意义。考虑到外资工厂的劳工权益保障问题越发突出，而外资企业的工人又缺乏有效的工会来保障其利益，这种渠道的存在起码可以一定程度避免可能的“血汗工厂”对工人的剥削。

然而这种渠道毕竟不够正规。首先，这种保护很难延伸到没有本地资源的外来务工者身上。这项研究就显示，这种劳工权利保护机制不仅不能保护外来务工者，反而会成为进一步歧视和剥

削外来务工者的帮凶。这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在本地或临近地区打工，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近年来越发严重的沿海地区农民工荒。

其次，这种机制毕竟存在大量灰色地带的元素，并不稳定，且对其他领域的社会正义也会构成伤害。这种机制本身并未建立任何可靠的劳工权益谈判的渠道和空间，任何劳务纠纷的解决都不是依靠成型的解决机制，而是通过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和交换，这对于继续吸引外资和社会正常发展都有弊端。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本文揭示的这种通过“土地所有权”和“本地政治势力和组织”来保护本地工人劳工权益的机制已经成为许多地方劳工保护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劳动权益保护，也影响了从基层地区招商引资策略、劳动力结构乃至基层政治权力互动等许多领域。

参考文献

- Paik, W. (2014). Local village workers, foreign factories and village politics in coastal China: A clientelist approach. *The China Quarterly*, 220, 955–967.

为什么欧元区深陷债务危机泥潭无法自拔？

在美国经济逐渐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同时，大洋彼岸的欧元区依然徘徊在停滞和通缩的困境中。不断的政治角力严重阻碍了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政策产生，这正是欧元区至今无法走出债务危机困境的重要原因。

◎ 韩笑

在美国经济逐渐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同时，大洋彼岸的欧元区依然徘徊在停滞和通缩的困境中。经济复苏的缓慢不仅要归结于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也与经济调整政策的乏善可陈以及欧元区国家政府之间不断的相互攻讦有关。一方面，德国被指责缺乏作为，其巨额的贸易顺差更是“以邻为壑”；另一方面，德国官员则质疑债务国政府经济改革的意愿和决心。而饱受高额外债、通缩和失业困扰的希腊将在本月举行大选，极有可能上台的激进

左翼联盟（Syriza）一直主张重新谈判希腊主权债务并放弃目前的紧缩政策，这无疑会引发与国际债权人的冲突。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Jeffry Frieden 撰文阐述了由债务危机是如何演变为围绕着经济调整负担如何分配的政治冲突的。政治冲突通常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分歧在于如何分摊清理坏账的成本。在国内层面，债权国和债务国内部都分别面临哪个群体的利益将被牺牲以解决债务问题的利益集团之争。Frieden 教授认为，不断的政治角力严重阻碍了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政策产生，这正是欧元区至今无法走出债务危机困境的重要原因。

简单来说，在国家间的债务关系中，债权国希望债务得到偿付，债务国则希望减免债务。但是国家间的调整并不完全是经济层面的，很多时候需要采取政治手段解决失衡。双方之间协商与谈判的筹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退出选项（exit option），债权国与债务国分别会以切断融资和违约相威胁。1980 年代初，深陷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因不愿失去外部融资途径而失去谈判筹码，最终接受了代价高昂的债务重组。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欧元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债务国几乎没有谈判筹码（除非它们愿意

退出欧元区），所以不得不接受痛苦的经济调整。

债务国国内经济调整的过程通常是降低实际工资水平、减少消费并提高产出；为了刺激出口、减少进口，还要使本币贬值；政府为了偿还债务，还需要增税并且减少非偿债支出。这些措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利益，如货币贬值会降低本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但有利于出口产业。因此，与国际层面的谈判相似，国内经济调整的中心问题是“由谁来承担经济调整的成本”。目前欧元区的边缘债务国正采取被称为“内部贬值”（internal devaluation）的经济措施，即在缺乏汇率手段的情况下，通过紧缩手段以压低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这意味着经济调整的成本主要由劳动者承担。换句话说，债务国不得不通过大量裁员和降低工资水平提升竞争力，而外部赤字的降低则来源于国内需求的剧减。在债务国面对通缩痛苦的同时，债权国内部也会围绕如何处理坏账而产生分歧，即在接受债务重组的情况下，债权国的纳税人是否愿意为本国银行不当的贷款决策埋单。危机爆发前，正是即使出现问题也会被纾困（bail-out）的想法，使得北欧几国的金融机构不断在债务国身上加码。

Frieden 教授认为欧元区各国政府有不同的经济调整政策，而

不同的政策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政策影响力。同时，国家间和国内的调整紧密连结，国内的政治考量往往限制了国家间的政策协作，也使得国家间的妥协更难以达成。德国在应对此次债务危机时的进退维谷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尽管有评论不断指责德国不愿向债务国施以援手、将紧缩政策强加于人、甚至为提高自身竞争力不惜损害他国利益，但是意大利 Trento 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德国的立场来自其对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发展模式的坚持以及对于失去通过 20 多年艰苦改革换取的竞争力提升的担忧。

德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目标是在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实现持续改善个人和社会福祉之间保持平衡发展，实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同时保证工业产出的可持续增长。两德统一后，为了摆脱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以及 2000 年代初的经济乏力，德国总理施罗德推行了艰难的社会改革——“哈茨改革”（Hartz reforms）。其目标是鼓励就业，降低失业救济水平；降低雇主的社会保障负担；并向劳动者提供激励，促使其学习新的技能等。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德国为了提升竞争力，努力控制实际工资水平——目前的实际工资水平只略高于 1999 年。通过

艰苦的国内改革和辛勤工作，德国成为欧洲最出色的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国。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政府一边面对国内民众不愿为他国纾困的抵触情绪，另一边还要面对要求德国允许更高国内通胀、增加内需的欧元区其他国家，但是这既有悖于德国一贯实行的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同时还可能导致失去十多年来的改革成果。另外，德国政府也担心纾困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以及债务国政府缺乏约束公共财政的改革决心。

虽然欧洲央行不断采取措施推出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等复苏计划，欧元区经济至今仍无法走出困境。而经济衰退和紧缩政策使得债务国走向了政治极端化，激进政党崛起进一步威胁欧元区的政治团结和欧元的稳定。因此，正如 Frieden 教授所说，摆脱政治角力对更加有效的改革政策的阻力是解决欧元区经济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 Frieden, J. (201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djustment and rebalanc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 Bonatti, L., & Fracasso, A. (2013). The German model and the European crisi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51(6), 1023–1039.

让·莫内的欧盟理想与欧元困境

目前欧元区就被困在高成本地继续一体化与代价同样高昂的解体危机的困境中无法自拔。在现实面前，莫内当初的设想显得太过理想化。

◎ 韩笑

一场发端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将整个欧元区经济拖入通缩的困境。包括哈佛大学经济学家 Martin Feldstein 在内的批评者将其归咎于欧洲一体化进程走得太远，并断言货币联盟已经失败。支持者则认为目前的欧元危机正是因为一体化进程尚未完成，所以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继续推进一体化——银行业联盟、财政联盟甚至是政治联盟。

欧洲一体化的制度设计俨然已经成为解决欧元区问题争论的

焦点。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 Enrico Spolaore 认为，欧洲一体化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即部分领域的一体化会引发对更多领域融合的期待，从而形成逐渐紧密的联盟。这是被誉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Jean Monnet）半个多世纪前的美好设想，但也正是这位法国政治家看似无瑕的政治设想及其局限性造成了今日欧元的困境。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一系列超国家机构（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和政府间机构（intergovernmental institution）的相继建立——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联盟法院，以及欧洲理事会。各成员国让渡了部分政策权力。整个进程在超国家机构与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拉锯中不断前进。这一历史进程也见证了地区一体化最有影响力的两支理论流派的产生——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

功能主义认为在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超国家机构和个人（如让·莫内和雅克·德洛尔），而不是主权国家政府及其选民。功能主义将莫内的“连锁反应”理念建构成为理论，即部分领域融合带来的好处会促使各成员国向超国家机构让渡更多权力，而且经济一体化最终会带来政治一体化。莫内的理念在上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欧洲一体化进展较为顺利时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但是自 1965 年“空椅子危机”开始，一体化进程趋于停滞，成员国政府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间主义理论的地位也随之上升。

政府间主义认为国家是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基本行为体，超国家机构只是主权国家政府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该理论强调一体化进程中各成员国经济利益和国家偏好的作用。正是“政府间主义”式的妥协解决了“空椅子危机”（《卢森堡协议》赋予成员国在部长理事会的否决权，限制了欧共体委员会这一超国家机构的权力）。

随着雅克·德洛尔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连任三届欧盟委员会主席，功能主义理论重新主导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深刻影响了货币联盟的建立。如果没有莫内的主权国家让渡部分权力于超国家机构的主张，欧元也就无法产生。而欧元的诞生也是“连锁反应”的体现——每一步推进既解决了之前的危机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从 1979 年欧洲货币体系的启动到 1992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再到 1999 年欧元的正式使用，每一步的推进也被认为是不可逆的。

但是，研究者认为，正是莫内的“连锁反应”机制和功能主义

理论的局限造成了欧元的困境。

首先，功能主义强调的超国家机构离不开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实际上，超国家机构这种看似权威高度集中的行为体在主权国家政府面前有时显得无能为力。缺乏执行力与约束力的《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即是明证。

其次，所谓的“连锁反应”机制只适用于异质性成本(heterogeneity cost)较低的经济一体化。随着一体化深入到异质性成本较高的领域，如法律、公共政策、安全等，渐进式一体化造成的危机无法通过进一步融合而解决，反而可能会导致整个一体化进程的崩溃。

目前欧元区就被困在高成本地继续一体化与代价同样高昂的解体危机的困境中无法自拔。显然，在现实面前，莫内当初的设计显得太过理想化。

参考文献

- Enrico Spolaore (2013). What is European integration really about? A political guide for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 125–144.

请前政府官员做董事，能抑制公司高管天价薪酬？

数据显示，前政府官员做董事，有助于控制上市公司高管的过高年薪。

当有政治关联的外部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每增加 1% 时，高管薪酬降幅达 36.1%。

◎ 逸凡 / 特约观察员

公司高管领取天价薪酬的消息，不时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在大洋彼岸，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得美国上市公司高管的天价薪酬成为媒体和公众讨伐的对象。2014 年 8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着手部署央企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对于成长中的中国企业，什么因素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Chizema 教授与其合作者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上市公司外部董事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对抑制高管薪酬以及公司内的薪酬

差距有着重要作用。

过往的薪酬研究认为，董事会的外部董事在决定高管薪酬问题上扮演了很重要的监督角色——如果一家公司的外部董事监督比较弱，那么其 CEO 常常会获得高额的薪酬。然而，外部董事的背景和意识形态却很少被提及，而这恰恰决定了外部董事的监督作用。尤其是外部董事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在中国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更是重要因素。区别于过往以美国公司为实证基础的薪酬研究，研究者着眼于中国公司的薪酬决策过程，试图寻找外部董事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公司薪酬决策之间的关系，从而突出不同制度环境对公司战略决策的重要性。

研究者通过上海和深圳证交所、中国证监会网站以及上市公司网站，获得 964 家上市公司从 2002 年到 2008 年的年报。样本中的大部分公司来自制造业，并剔除了财务结构独特的金融企业。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排除了国有股权比例、外资股权比例、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交叉上市、高管平均年龄以及 CEO 更替等因素的影响之后，有政治关联的外部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对公司高管薪酬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当有政治关联的外部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每增加 1% 时，高管薪酬降幅达 36.1%。另外，有政

治关联的外部董事对公司内薪酬压缩比（即员工平均收入与薪酬前三位高管的平均收入之比，压缩比越大意味收入差距越小）有显著正影响。当有政治关联的外部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增加 1% 时，薪酬压缩升幅率达到 52.8%。同时，当有政治关联的外部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超过 12.7%，公司业绩对高管薪酬的正影响不再显著。

简言之，数据显示，前政府官员做董事，有助于控制上市公司高管的过高年薪，遏制不平等态势。

研究者认为，可以用“社会比较理论”来解释这其中的因果关系。这一理论认为，人们在做决策的过程中通常会与自己类似的参照系进行比较，从而设定令自己感到对等的预期。在中国公司中，有政治关联的外部董事在帮助公司获得政策优惠和特许的同时，还在向公司输送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确保公司运作符合国家期待。而这种意识形态在薪酬方面的表现就是倾向平等。此外，在薪酬决策过程中，由于曾经在政府工作，这些外部董事也会比较政府公务员与所在公司高管的收入。这时，公务员相对较低的薪酬水平便使得外部董事倾向压低高管薪酬。

同时，过高的高管薪酬即使在西方也会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口

诛笔伐，这种公众压力也会使曾经是政府公务员的外部董事倾向压低高管薪酬。类似的，这些有政治关联的外部董事了解公司内部高管和员工的薪酬，在倾向平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他们也会在薪酬决策中尽量缩小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距。因为这些外部董事的存在，公司业绩对高管薪酬的正面影响也会被削弱。

这项研究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董事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公司薪酬决策的假设——在倾向平等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有政治关联的外部董事偏向压低高管薪酬及公司内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距。研究者因此建议，选择前政府官员作为外部董事可以推进高管薪酬的合理化。

参考文献

- Chizema, A., Liu, X., Lu, J., & Gao, L. (2014). Politically connected boards and top executive pay in Chinese listed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村官的裙带关系如何发挥作用

对越南的研究表明，村官给亲属带来的好处，即所谓的“裙带关系”确实存在。不过，这种裙带关系更多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表现出来的。

◎ 张森 / 特约观察员

最近几个月，经济学家周其仁和华生就土地制度和城市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就在同一时间，《发展经济学》学刊专门推出了关于土地和产权的专题，集结了西方微观发展经济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一系列最新研究。

在这一专题中，哥本哈根大学经济系两名研究者利用越南农村家庭数据检验了有亲属担任官员对家庭的土地产权及农业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官员给亲属带来的好处，即所谓的“裙带关

系”确实存在，不过这种“裙带关系”更多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表现出来的。

由于社会制度、历史背景的相似性，这一研究对中国也有着的启发价值。

裙带关系的理论背景

关于裙带关系的理论模型，最早可追溯到去年逝世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大师加里·贝克尔 1971 年的经典研究。贝克尔将“歧视性的”裙带关系定义为在官员的效用最大化函数中给亲属赋予了比其他人更高的权重。按照人人平等的社会福利函数，这种“裙带关系”下的最优分配结果是无效率的。

不过，随着合约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也注意到了：如果官员对亲属的了解比对普通人更多，官员们将资源分配给亲戚们或许会避开委托-代理问题而实现更高的社会效率。

裙带关系带来更高的农业投资

在这则研究中，学者们使用了来自越南 12 个省份 2008-2012

年的家庭调查数据。由于这项调查选择的省份分别参与了两个扶贫计划项目，因此样本省份并非随机抽取，而是比全国的平均水平更贫困，人口密度也更小。有 2148 个家庭在 2008、2010 和 2012 年的三轮调查中都接受了调查。

研究者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官员有联系的农户有着更高的农业投资。

在这一主要结论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又深入研究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可能渠道。他们提出并检验了三个可能的原因：1、与官员有关系的家庭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土地产权。2、与官员有关系的家庭更容易获得信贷。3、与官员有关系的家庭更容易获得补贴以及其他转移支付。

第一个渠道尤其值得一提。虽然经济学家们早就意识到了产权对农业生产决策的巨大影响，但以往的证据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无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相较之下，微观层面的研究一直不足。2008 年耶鲁大学的 Goldstein 和 Udry 两位教授在《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发表的文章利用加纳的

农业数据做了极其细致的研究。通过控制大量变量，甚至对所有地块的土壤理化性质作了仔细的考察和分类，他们证明：清晰的产权关系确实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利润。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官员的产权比普通村民更加稳固，因此可以将土地放心休耕更长时间以获得最优的产量，其他人则只能缩短休耕时间以防自己的土地被别人抢走。

对越南的分析还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以上三个可能的渠道中，如果选择代表官方渠道的变量，比如官方颁发的土地产权证、来自公共部门的信贷和官方的补贴，那么有裙带关系的家庭只在补贴一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然而，这些家庭在全部三个渠道的非官方途径中都有着显著的优势，他们被政府从土地上驱逐的概率更小，更容易拿到非官方贷款，也更容易得到来自私人的不必偿还的经济援助。

对制度的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研究者们确认了官员在分配资源时会向与其关系更密切的家庭倾斜，从而使与官员关系更密切的家庭有条件

进行更多的农业投资。这种分配不均至少在本文所研究的地区更多出于“歧视性”的裙带关系而非仅由于信息不对称。因此，如果能从制度设计上进行约束，使得资源能更平等的分配，农业可望获得进一步的增长。相反，由于这种裙带关系主要是通过非官方的途径实现，如果法令不清使得“灰色地带”扩大，这类不平等无疑也会加剧。

微观发展经济学最近 20 年来取得了大量成果，通过使用精心搜集的数据和精确的计量分析为检验经济学假说，理解经济发展的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例如本文就为我们早已熟知的一个现象提供了更深刻，更准确的分析。二十世纪初，胡适和李大钊先生就曾经有过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今日，如何去使用现代技术更准确的理解中国农村现实，恐怕仍旧是比提出观点更紧迫的一项任务。

附：数据分析细节说明

家庭与官员产生联系有三种情况：1、家庭内部的一个或多个成员是官员；2、家庭有一个家庭外的亲戚是官员；3、家庭成员的朋友是官员。一个家庭内部成员是否决定成为政府官员，以及

家庭是否去结交官员朋友，都会受该家庭农业投资额的影响，例如，一个在土地上有大量投资的家庭显然更希望结交一个官员以保证其利益不受侵犯。因此，基于排除内生性和数据可获得性方面的综合考虑，研究者只关注了其中的第二种情况，即家庭外的亲戚是官员。

对样本中随机选取的十二个村落的附加调查显示，农村官员的平均任期是 8.5 年，而每年只有大约 6% 的官员会轮换。这表明，农村官员的位置是稳定的。

此外，25% 的家庭在调查时期内有过增加或减少一个当官的亲戚的经历。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详细考察了这种变化产生的可能渠道。家庭增加或减少一个当官的亲戚，可能是由于 (a) 一个亲戚被任命为官员或被解聘（无法从调查数据中获得信息），也可能是 (b) 一个现有的官员通过婚姻途径与家庭发生联系。而后者又可以被细分为两种情形，即 (b1) 家庭内成员和官员结婚后离开家庭，(b2) 和家庭的某个亲戚和官员结婚。为了准确估计官员本身带来的影响，需要尽可能保持家庭其他情况的稳定，而家庭内成员与官员

结婚后离开家庭，会减少这个家庭的劳动力供给，也由于受到家庭自身决策的影响而更容易产生反向因果问题，因此，如果 (b1) 是这种联系的主要渠道，使用回归技术估计的系数将不能反映真实的官员对家庭投资带来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对这几种可能性进行考察，研究者们从调查数据中筛选出两个相关变量：家庭过去一年是否举办了婚礼，以及家庭成员去年出席了多少其他家庭的婚礼。这两者分别对应了一个官员通过婚姻进入家庭，以及一个官员与这个家庭的亲戚结婚的可能性。使用了固定效应的对数回归的估计表明，家庭成员去年出席的婚礼数量对一个家庭与官员发生联系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家庭是否举办了婚礼则与之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从一定程度上排除了 (b1) 作为家庭和官员间发生联系的主要渠道的可能，因此减轻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接下来，研究者们得以开始研究本文的核心问题，以家庭的年度农业投资作为因变量，以代表家庭和政府官员的关系的指标作为主要因变量，控制其他的家庭变量和家庭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特征后，通过主要因变量的系数来表现两者是否存

在显著的相关性。在选择不同的控制变量和函数形式的四个模型中，研究者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官员有联系的农户有着更高的农业投资。

参考文献

- Thomas, M., Finn, T. (2014).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land-related investment in rural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91–302.
- Becker, G.S. (1971).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2nd 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stein, M., Udry, C. (2008). The profits of power: Land rights 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Gh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6), 981–1022.

国内政治

你懂的……

中纪委反腐行不行？

新一轮反腐大潮中，中纪委怒刷官员的存在感，在赚足眼球的同时，“老虎”“苍蝇”一起打，彻底高调了一回。作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纪律检查机关，中纪委自成立以来的表现如何？改革开放之后的反腐作业中又能打多少分？

◎ 奚应红

两会期间，崔永元在记者会上提问王岐山，笑称见到王书记心里很紧张、很害怕。这大概说出了很多人尤其是某些官员心底的声音。新一轮反腐大潮中，中纪委怒刷官员的存在感，在赚足眼球的同时，“老虎”“苍蝇”一起打，彻底高调了一回。作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纪律检查机关，中纪委自成立以来的表现如何？改革开放之后的反腐作业中又能打多少分？

在题为“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the Party”的文章中，美国吉尔佛学院的 Xuezhi Guo 教授分析了中纪委及其下属机关的组织架构、办事程序以及纪律制裁的标准，并且审视了中纪委运作的方法和手段。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自主性的缺失让中纪委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捉襟见肘。如果再加上结构、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制约，中纪委的“疗效”可谓差强人意。

自主性的缺失主要来自地方纪检委自身角色和地位的不明确。1978 年地方纪检委成立，但其成员却是由地方党代会选举产生并隶属于同级党委，不需要对上级纪检部门负责。十二大之后，地方纪检委开始接受地方同级党委和上级纪检部门的“双重领导”。虽然此后党中央一直在努力减少地方党委对纪检机关的影响，但实际上这样的“双重领导”让地方纪检部门主动向所在地党委靠拢，最终使地方纪检委对当地党委的审查和监督形同虚设。

2004 年，随着“双重领导”被取消，地方纪检部门只接受中纪委的直接垂直领导。然而，没有地方党委的配合与支持，纪检的工作也无法顺利展开。一些权势很大的地方领导甚至让人忌惮三分。在中国式“条”（垂直）“块”（水平）管理的体制下，地方

党委的优势地位加上其与地方纪检部门的连带关系，直接影响到反腐的有效性。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给腐败带来了新土壤。在此过程中，由于对经济绩效的过度重视，只有那些真正影响到地方经济发展或者迫于舆论压力而不得不办的腐败案才会受到调查。这样的反腐往往是有选择的，且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而有些案件即使立案，在后续的处理过程中还会受到各种力量的左右而不了了之。

Guo Xuezhi 发现至少有四个因素影响到反腐案件的进行。

第一，虽然共产党一直在强调党政分开和政治制度化，但依法治国依然不完善。说到底，纪检委依靠的是党纪而不是国法。

第二，中国历来有“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现存的规章制度更多只适用于对省部级干部或以下官员的检查，而对更高级别干部的监督依然不明确。

第三，错综复杂、无所不在的“关系网”无疑又给案件的检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关系已经成了社会交往的制度化形式，官员甚至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

最后，影响案件和惩罚程度的因素往往是社会舆论。涉及到假药、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的腐败案件往往由于民愤激烈而受到纪检部门的优先“照顾”，而其他案件则只能等待时机。

正是上述存在的结构、制度以及文化因素，使针对某案件的处理甚至定论都很难进行。即使到了裁定阶段，“有罪之人”通过申述否认指控，到最后也可以“无罪逃脱”。这当中便是“关系网”在发挥作用。

每天被送到中纪委的上诉多到超过其处理能力，而重新评价一个上诉的案子往往需要地方党组织的配合。通常，涉案的地方党组织会拒绝合作甚至抵制调查，给那些意在为受指控者“洗白”的人提供了施展空间。这时，当事人的级别、威望、资历甚至名声都会发挥作用。在立案调查、处罚官员以及恢复被调查官员等各个环节都会出现的“权力运转”，在中纪委的作业本上打了无数个叉。

中国共产党反腐的决心很大，在新一轮的反腐高潮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纪委的一些制度创新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也发挥着很大作用。可是，反腐压力仍然在不断增长。如何让反腐从运

动式纠错和内部纪律监督向“依法治国”转变，仍然是未解的问题。作者最后提出了两个方法，或可帮助思考：一是有条件地赦免腐败分子，只要其把非法所得上缴；二是设立政改特区，选拔新官员、公布官员财产。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中纪委自己的“存在感”是否也会打折扣呢？

参考文献

- Guo, X. (2014). 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the Party: China's 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The China Quarterly*, 219, 597–624.

人大代表到底是怎样“间接选举”出来的？

在市级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中，各方推荐的候选人的总数应该比之前确定的代表名额多20%—50%。不过，有些代表是必然会当选的。在党委的主导下，选举结果几乎必然会和选举计划要求的代表数量和“成份”构成一致。

◎ 杨鸣宇

又是“两会”季。看着代表委员们在北京参政议政，你是否了解他们是怎么被选出来代表我们的？

根据法律规定，人大代表可以通过“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方法产生。前者适用于区一级人大代表，而后者则适用于区一级以上的行政单位。“间接选举”并不公开进行，而是采取下级推选上级的方式，比如说市级人大代表由区一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省级人大代表由市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依

此类推。

那么，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显得神秘的过程具体是如何操作的？中山大学学者孙莹去年发表的论文，以某市的市级人大代表产生过程作为例子，对“间接选举”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让我们得以一窥其中究竟。

简单来说，这个过程由三个部份组成：制订选举计划、推荐候选人和选举代表。

制订选举计划

选举计划的核心是要确定市级人大代表到底有多少人，以及代表们的“成份”如何。根据《选举法》，市级人大代表的名额基数是 240 名，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

随着人口变迁，代表的名额数目会随之而变化。但代表的“成份”构成在实践中几乎不变——比如说，在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里，女性代表不能少于 25%，共产党员代表的比例则不能超过 65%，同时要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和港澳台代表。这种代表“成份”构成的比例要求在这篇论文研究的城市里得到严格遵守，从而出现了 2% 少数民族、4% 海外华人代表、25% 女性代表，同时共产党

员代表少于65%的“黄金比例”。

代表“成份”的另一种构成方式是职业——他们应该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军人五个社会群体构成，确保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广泛性”和“先进性”。

推荐候选人

确定了名额和比例，接下来就要产生候选人。代表候选人的推荐过程可以概括为“党委主导、人大协调、其他部门支持”。

也就是说，所有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拥有推荐候选人的权利。同时党委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候选人推荐过程中向特定的社会群体倾斜，以更好地整合社会利益。比如说，本文研究的城市就特别强调要吸收三类社会群体：来自外企和高新科技企业的企业家、社会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农民工代表。

所有候选人的名单会汇总到市人大常委会，由常委会和市党委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候选人是否出现重复、候选人的道德素质是否过关等内容，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选举代表

选举代表是“间接选举”的最后一步。原则上，候选人的总数

应该比之前确定的代表名额多 20%—50%，从而形成一定差额。

不过，有些代表是必然会当选的，这些人通常是党政机关、司法两院和市级人民代表大会等组织的领导人。在党委的“主导”下，选举的最后结果几乎必然会和选举计划要求的代表数量和“成份”构成一致。

总括而言，孙莹认为市级人大的“间接选举”事实上体现的是中国政府如何自上而下吸纳（co-opt）不同社会力量的过程，它可以让政府“适应”（adept）伴随市场化过程而变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适应”能力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中国能够拥有持久的“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Ying S. (2014).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elections in the PRC: A process of co-option. *Asian Survey*, 54(4), 773–800.

中国式协商民主：有助维稳，还是促进变革？

中国政府意识到：社会已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变得多元，纯粹依靠命令和压制进行管治，只会削弱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在地方治理中引入“协商”过程，归根究底是因为这项技术有助于维稳。而且，它只被应用于特定的政策项目中，这样的公众参与是可控的。

◎ 杨鸣宇

听证会、市民论坛和参与式预算，这些都是“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常见形式。协商民主是近二十年兴起的一种治理技术，试图让更多公众参与政府的管治过程中，提高政府部门的响应性、问责性和决策质量，从而提高民主的质量。

有意思的是，这些公众参与方式在中国也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运用。这就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协商”往往和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相应的治理技术是否可能适用于中国？第二，中国政

府为何想要引入“协商”过程到地方治理之中？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协商”治理问题的何包钢教授和合作者给出了他们的解释。

中国引入协商，因为有助维稳

他们认为，“协商民主”可以分拆为“协商”和“民主”两个部份。前者指代一个开放和透明的政治过程，不同的利益主体可以通过平等对话来取得理解和共识，最终形成一个合意的决策结果。至于后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包容性”的制度，亦即受政府决策影响的个体有机会通过投票等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偏好。他们进一步指出，虽然民主制度相较而言更可能为“协商”过程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但是从理论上说，“协商”过程作为一种沟通方式并不仅限于民主制度。

由此，他们提出了“威权协商”(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的概念。和“协商民主”相比，在“威权协商”下，政策议程和最终决定权仍然被地方政府所掌握，但是决策的过程可以引入公众参与而变得更透明和开放，比如说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就是一个

被反复提及的案例。*

研究者认为，中国政府在地方治理中引入“协商”过程，归根究底是因为这项技术有助于维稳。中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已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变得多元，纯粹依靠命令和压制进行管治，只会削弱政府决策的合法性。事实上由于“协商”过程目前只被应用于特定的政策项目之中，这样的公众参与是“可控的”，不会构成政体的“民主化”压力。

而且，通过“协商”过程，地方政府更可能发掘出市民的真实偏好，接收更多的决策信息，提高最终决策的质量和认受性。这无疑有助提高治理绩效和社会稳定。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地方政府想要使用这样的治理技术。

居委会：维权和维稳的中间人

如果说何包钢从理论方面认为“协商”治理在中国是可行的话。Beibei Tang 最近的研究文章则尝试展现“威权协商”如何具体在城

* 刘冬舒（2014）。居民参与预算制定：中国政治参与改革的新路径？政见
CNPolitics. <http://cnpolitics.org/2014/09/participatory-policy-making>

市基层里进行。

通过在沈阳的田野调查，她调查了 24 个分属三种不同类型（中产、工人和回迁）小区的基层治理情况。她发现，基层的“协商”过程往往是通过居委会进行的。居委会虽然不是正式的政府机构，但是往往在基层承担着为数不少的行政职能。在现实中，其半官方性质使它容易成为同时服务于小区居民“维权”和地方政府“维稳”的“中间人”。

那么居委会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协商”过程来缓解居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这取决于三个因素：小区里的权力对比、小区居民的组织能力和小区居民的“协商”能力。

在解决利益纠纷时，“协商”过程理论上要求不同主体都拥有平等的对话身份。但是因为居民身份的现实差异，这往往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研究者的调查就发现，在下岗工人为主的小区里，因为申请低保需要通过居委会，假如居委会发现有人计划上访，可以威胁不登记低保来逼使工人放弃上访。但在中产和回迁小区里，因为居民的经济条件较好，双方相对平等的地位就要求居委会通过对话沟通的方式解决居民的“维权”要求。

小区居民的组织能力对于“协商”过程的效果同样重要。比如

中产小区往往会有自己的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不但有助发动居民自发式的“维权”行动，也可以作为小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平台，帮助居民明确“维权”的目的和具体要求，同时作为和居委会、地方政府讨价还价时的居民代表。

小区居民的“协商”能力也会影响“协商”过程的效果。所谓“协商”能力可以理解为把维权要求合理化的能力，具体理由可能基于政府政策、法律或地方习俗惯例等。显然，由于居民在教育程度和政策知识等方面存在差异，“协商”能力在工人小区较弱，在中产小区则较强。

总括而言，围绕着“威权协商”这个概念的理论思辨和实践，两篇研究文章在解答相应疑问的同时引申出了更多的研究问题。

对于那些基于西方民主经验来理解“协商”过程的学者而言，“威权协商”只是一种理论上存在但欠缺现实例子的概念，因此一直少有被人讨论。但在中国，这正在成为现实，这无疑扩充了政治学理论的边界和想象力。

不过，在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威权协商”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协商”过程这种治理技术的原意，并最终提高管治绩效？正如 Tang 的田野调查所示，这取决于一系列现实因素。更为重

要的是，中国政府推行“威权协商”到底是会有助于中国的政体稳定，还是会成为“民主化”的一股助力？何包钢等认为短期的结果是前者，长期结果则会是后者。这种结论正确与否，还有待未来更多的研究和观察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 He, B., & Warren, M. E. (2011). 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9(2), 269–289.
- Tang, B. (2015). Deliberating governance in Chinese Urban Communities. *China Journal*, 73, 84–107.

街名政治学：“西东方红大街 174 号”是什么单位？

一个广场在 20 年内先叫“希特勒广场”，后改名“斯大林广场”，最后叫“飞行员广场”。街名也是一种政治，是一座城市最便宜的纪念碑，更换街名就是对游戏的背景重新设定，用“官方批准”的方式来纪念或抵消某段历史的重要性。那么问题来了：西东方红大街 174 号是什么单位呢？

◎ 宿亮

1991 年 4 月，东西两部分刚刚合并的柏林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柏林市政当局讨论更改老城区的三条街道，它们分别由东德领导人威廉·皮克、奥托·格罗提渥、赫尔曼·马特恩命名，其中奥托·格罗提渥大街地理政治意义重要，准备改名为 Toleranzstraße。但是，法国政府却于 1992 年初提出抗议，理由是法国使馆将搬回柏林的巴黎广场旧址，距离这条街不远，但新街名竟和法国首都巴黎一条臭名昭著的妓女街类似，不雅！

这条街只得再次改名，用西德前总理的名字命名，即现在联邦总理府所在的维利勃兰特街（Willy-Brandt-Straße）。

几年后，《纽约时报》记者史蒂芬·金泽尔这样写道：“在德国，历史就像悬在空气中的阴云，连命名一处街道这样无辜的工作都有潜在的政治危险。”

“街名”容易被人当成理所当然的东西所忽视，但它与纪念碑等同样具有政治意义，而且是极易被人操纵的一种政治工具。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背景下，街名成了“特定时代的镜子”，反映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折射出地区、国家，甚至是国际关系的历史。

一

就从柏林开始说吧。1813年开始，柏林街道的命名必须由普鲁士内政部根据霍亨索伦王室的要求进行命名，一大批由帝国战争英雄或王子公主命名的街道出现。1918年成立的孱弱的魏玛共和国没有大规模更改柏林传统街名，新扩张的城区街名也用花鸟鱼虫等无关痛痒的名称替代。希特勒广场、格林街则出现在纳粹时期，同期还出现大量带有纳粹色彩的街名。

1945年纳粹投降后，街名成了一个大问题。德共领导人卡尔·马伦入主柏林警察系统后，提出更改当时1万多条街道中1795个街名的建议，特别是打算把纳粹街名占多数的新滕伯尔霍夫地区街名全部改头换面，甚至在1946年连续出两版柏林地图，显示地名变化。其中，卡尔·马克思、萝萨·卢森堡、恩斯特·台尔曼（魏玛时期德国共产党领袖）的名字都在新街名之列。但因社会主义统一党选情不佳，真正改变的街名也不过只有计划的10%。

东西柏林分裂后，东柏林迅速更新街名，多用新名称，不仅改纳粹街名，也改普鲁士色彩的街名，这被政治学者看成从“反法西斯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标志。

比较有趣的案例是：法兰克福街在最初改成斯大林街，反映了对苏联的依赖，但1961年去斯大林化过程中迅速被拆成两条街，分别命名法兰克福街和卡尔·马克思街。另外，东柏林去除了那些二战后被波兰占领的原德国领土命名的街名，如布瑞斯拉尔街、什切青街、但泽（格但斯克）街等。

1971年，埃里希·昂纳克出任东德领导人后再次改街名。这个在纳粹监狱里住过很久的领导人使用大量反法西斯战斗中牺牲者的名字命名新街道。同一时期的西柏林也在改造纳粹时代街名，

但速度不快，主要是改回原来普鲁士名称。这也被政治学者看成是政治保守主义的特征。

两德统一后，新的街名革命再次开始。数以百计的街道广场名字被改变，大量左翼人物在街名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符合西方英雄主义价值观的街名。

柏林议会 1991 年通过的修正案要求，去除 1945 年至 1989 年之间那些“反民主的、斯大林独裁式、东德体制及不公正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的街名”。支持者称强调这种改变是对旧意识形态的排斥，阻止其死灰复燃；反对者认为体现了西德的政治傲慢。

政党政治版图中，保守的基民党要求恢复纳粹之前的地名，社民党试图寻求中间路线，左翼绿党欢迎改名，但不希望使用老名称；而东德政党则希望维持一点点“东柏林认同”。

最终，柏林的几个老城区大规模改名，特别是在历史重新被重视的时代，原先东柏林的街名不少被改回历史名称，而那几条东德领导人命名的街名在惹了不少麻烦之后也纷纷换以新名称。几个东柏林时代新扩张的城区街名都是以社会主义英雄的名字命名的，两德统一后，这些地方开始了大规模的换名，多是花名树名，或是国家城市名称——据称，这是为了避免以后再次出现因政治

原因不得不改街名的情况。

当然，也有没改的。埃里希·昂纳克时代那些反法西斯英雄名称命名的街名都保留下来，甚至有明文规定不得更改。这或许是德国的“政治正确”吧。

二

政治力量有必要创造一种城市景象，来印证制度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特别是在作为国家实力与团结风向标的首都。这也是为什么柏林会发生不断变更街名的原因。打个比方，更换街名就是对游戏的背景重新设定，用“官方批准”的方式来纪念或抵消某段历史的重要性。

在罗马尼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首都布加勒斯特。

欧洲有使用街名来纪念某人或某事的传统。布加勒斯特也不例外，这座城市老早就用“胜利大道”来纪念拜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立的1877年战争。

1947年12月30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建立，与苏联其他“卫星国”一样，实行苏联体制。在市中心，罗马尼亚建立斯大林塑像和苏式建筑以宣示国家的定位与选择。新的历史书把阶级斗

争放在中心位置，把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视作是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街名的改变不可避免。

1948年，布加勒斯特150条街道改名。原本以罗马尼亚第一任国王卡罗尔一世和王后伊丽莎白命名的东西主干道被改名为“共和国大道”和“3月6日大道”；第二任国王费迪南一世命名的主干道改由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命名；费迪南一世的王后雷吉纳·玛利亚命名的大道则改用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命名。

布加勒斯特南北走向的几条主干道原本由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罗马尼亚政治家命名，1948年6月，伴随着工业国有化的命令，这些街道也都改用1848年罗马尼亚革命中的工人和农民阶级领导人命名，还有一段南北主干道被命名为“1848年大道”。

除此之外，布加勒斯特大大小小的街道也都有了新名字，大部分由罗马尼亚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命名，其中有些人并不出名，在党外甚至无人知晓。另外，罗马尼亚共产主义运动刊物 *Working Romania*，以及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人物也都成了街名。

在城市新区，新的名字则采用抽象的方式彰显罗马尼亚的新政治身份：民主街、自由街、革命街、科学街、和平街、劳动大道、进步街、农业改革街、大国民会议小路等。其中8月23日街

出现了 10 次，用以纪念罗马尼亚工人党 1944 年发动的一次政变。

罗马尼亚没有像苏联一样打击东正教堂。在布加勒斯特，20 世纪 50 年代还保留着 36 条街道由东正教圣徒命名、24 条街道由主教命名。

真正有趣的是布加勒斯特一些跟随政治风向而不断变化的街名。为了表达对苏联的忠诚，布加勒斯特北部的一条街道在 1948 年改名为斯大林大道，这条路边的一处广场叫做斯大林将军广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广场二战期间叫做希特勒广场）。类似的街名古比雪夫街、7 月革命街、苏联红军高速路、托尔布欣将军街都在向苏联“献礼”。甚至苏联化学家门捷列夫、农学家米秋林也成了布加勒斯特的街名。一大批俄罗斯作家、作曲家的名字登上布加勒斯特地图，甚至普俄战争中沙俄指挥官的名字也用来命名街道。更不用说，城中有三条街道叫做斯大林格勒街。

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赫鲁晓夫 1956 年发表震惊苏东的演讲后，布加勒斯特的斯大林广场被改叫飞行员广场；三条斯大林格勒街改回原名；以斯大林命名的居民区改名为 12 月 30 日区；甚至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命名的居民区也因为他过于亲斯大林而低调改名。

随后，乔治乌-德治发现，赫鲁晓夫要罗马尼亚专心发展农业，这导致罗马尼亚更依赖苏联。于是，乔治乌-德治开始拉开与苏联的距离，追求独立的发展道路、“去俄罗斯化”。街名因此又得改动。以苏联将军、政治家命名的道路再次换名。

另外，罗马尼亚开始强调自家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去世后，出现了乔治乌-德治大道和乔治乌-德治广场。

不少主干道在 20 年内改了 3 次名。尽管每一波街名变更内容不同，但对居民来说是一样的折腾。他们都要去更改身份证件、驾驶执照上的信息，给朋友和亲属留下新的地址。而这一切，都是政治在微观层面上的显现。

三

在中国，街名地名的改变更不是什么新鲜事。

王莽篡汉就曾经更改了全国 800 多个主要地名，尽管这些改动在东汉建立后就尽数废除，但这的确显示了王莽试图显示自身权力与威望。古代君王通常把街名中涉及自己或亲属的名讳字眼改掉，也是向老百姓彰显自己的绝对权威。

加拿大-中国友好协会成员 Robert C. Cosbey 在一本名为《见

证中国改变》(*Watching China Change*) 的书中记录了这样的故事：他站在天津解放路上，面朝欧式的中国银行大楼，手上分别拿着 1917 年和 1932 年的两份天津地图。在地图中，这条路叫做“维多利亚路”，那栋楼还是英国银行的总部。

不难理解，这里曾经是天津的英国租界，周遭也都是“格林威治路”、“牛津路”；而附近日本租借地是以“三菱路”为特征的，法国租借地是以“富柯将军路”为特征。当然，两份地图的地名有不小的差异，因为一战击垮了德意志和奥匈帝国，他们的租借地易主，街名随即更换；美国在世界崛起，同样向中国施压，于是在天津俄租界“克里米亚路”之类的路名附近，出现了“伍德罗·威尔逊路”，或许是为了照顾坐落在这条街上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总部。

1949 年后，各种政治运动也都是街名变更的“契机”。更改街名，是因为那些旧街名能够提醒人们旧制度、旧意识形态和旧习俗，其中不少内容是新社会的禁忌。“长征路”“大跃进路”“大庆路”等路名的使用就是出于类似逻辑。

当然，街名变更的疯狂浪潮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疯狂地为街道、广场和建筑物标记上“革命名称”，为的是反对“资

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

在北京，道路“变红”。长安街改名“东方红大街”（所以本文标题中的问题有解了：西长安街 174 号中南海新华门），地安门大街改名“总路线路”、德胜门内大街改名“人民公社路”、安定门内大街改名“大跃进路”。外国使领馆云集的东交民巷改名“反帝路”，苏联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

农展馆附近的道路在文革时是“大寨路”、马家堡路荣升“秋收起义路”、三里河路改名“革命友谊路”、西什库大街改名“集团化路”。瑞金、延安、韶山等地名也进入到北京的街名序列中。

当然，中国所谓的“四旧文化”在街名改造的过程中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如夕照寺街就改成了“光明路”，听上去吉利多了。

同一时期，“红卫兵路”“东方红路”“革命路”“卫东路”“反帝路”“反修路”“向阳路”等充满革命气息的道路出现在中国的大小城市里。类似的名称还有很多，特别是在那个浩劫的年代，不少更改的名字来不及填进正式的地图。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的政治氛围发生巨变。我们不再学大庆大寨、重新读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先驱历史。在街道名称上，诸如“大庆路”“大寨路”“东方红路”等疯狂时代的印记都消散在地图

之外，“中山路”、“逸仙路”得以回归。

四

同样例子还有许多，例如如今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的街道从1920年开始就在尝试排除“外来名称”，实现街道名称的“民族化”，以避免“居民对民族主义失去应有的热情”，以期推动爱尔兰独立。在美国，大大小小城市把街道命名为马丁·路德·金街也有同样的道理。

政治学者认为，纪念性质的街道名称能够把历史与日常生活连接在一起，让过去成为今天现实的一部分，或让政治意志成为一种全面的宣示。

政治力量的表达要通过如何描述历史和现在来完成，而街道的名称就是这两者之间最明显的交叉点，这就是“街名的政治学”。

参考文献

- Verheyen, D. (1997). What's in a name? Street name politics and urban identity in Berlin. *German Politics & Society*, 4, 44–72.
- Light, D., Nicolae, I., & Suditu, B. (2002). Toponymy and the communist city: Street names in Bucharest, 1948–1965. *GeoJournal*, 56(2), 135–144.
- Conboy, S. (2011). Changing Dublin street names, 1880's to 1940's. *Dublin Historical Record*, 205–225.
- Mitchelson, M. L., Alderman, D. H., & Popke, E. J. (2007). Branded: The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streets named in honor of reverend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8(1), 120–145.
- Hassid, J. (2013). Place names, symbolic power and the Chinese state. *Symbolic Power and the Chinese State*.
- Cosbey, R. C. (2001). *Watching China Change. Between the Lines*.
- 李华君 (2002). *A Preliminary Study on Political Street-Name in China*.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论文.

外交

中朝关系：从同志战友到贸易伙伴

随着经贸交流不断拓展深化，中国和朝鲜这两个曾将对方首先视为同志和战友的邻邦，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贸易伙伴，这一过程给中国基层官员和企业家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

◎ 陶郁

近日，一名朝鲜逃兵越境后枪杀四名中国公民的案件被披露，再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山水相连的邻邦。澳大利亚学者吴瑞利（James Reilly）最近在《中国季刊》上发表论文，指出这对曾将彼此首先视为同志和战友的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贸易伙伴。这一过程给中国基层官员和企业家带来了不少新机遇和新挑战。

长期以来，中朝关系被定义为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这对肇

始于一场惨烈战争的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受到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与塑造。然而，伴随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特别是最近十年——来的剧烈变化，经济贸易逐渐给中朝关系注入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已逐渐发展为这对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

经贸合作促使高层频繁互访

吴瑞利研究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朝两国政府的高层次交往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趋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国省部级以上干部出访对方的频率平均不到每年一次，而仅在 2009 到 2011 三年间，出访朝鲜的中国高级官员就达 20 人次，而到访中国的朝鲜高级官员更高达 27 人次。

形成这种态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2005 年以来中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中朝两国经贸合作的政策措施，试图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方式推动中国企业走进朝鲜，加强双方在经贸领域的互动。这些措施不仅旨在扩大中朝贸易互动的规模和水平，更鼓励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在内的多类中国机构参与到朝鲜的矿产能源开采与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丹东与吉林的竞争

上述政策让不少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看到了发展的机遇，甚至引发了不同机构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又反过来促使人们各显神通，努力扩大与朝鲜的经贸交流。吉林省和辽宁省丹东市都具有与朝鲜互动的有利区位条件，二者之间的竞争也相对明显。

丹东市力图把自己打造成中国人员、资金与商品进入朝鲜的桥头堡，通过与朝鲜协商，不仅开通了中国公民免签证前往新义州的旅游线路，还从2013年1月1日起开通了每日前往平壤的旅游列车。此外，丹东市也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利用朝鲜的劳动力资源；截至2012年6月，有超过两万名朝鲜妇女在中朝边境地区纺织厂和食品加工厂就业。

吴瑞利指出，促使丹东积极拓展对朝经贸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吉林省的有力竞争。与丹东市政府一样，吉林省政府也在推动赴朝旅游、利用朝鲜劳动力和对朝投资方面积极行动，不仅希望将珲春和图们建成对朝经贸交流的枢纽，还积极为民营企业通过延边进入朝鲜创造条件。在中央政策引导和地方政府推动的交互作用之下，中朝贸易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迅猛发展，2008年

的双边贸易总额几乎达到了 2000 年规模的六倍，而这项指标到 2011 年几乎又翻了一番。

与韩国对朝贸易模式迥异

在吴瑞利看来，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扩大对朝贸易和投资离不开政策措施的推动，但中朝经贸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以货易货、各取所需的市场贸易行为，这与韩国建立在高比例政府补贴基础上的对朝贸易模式非常不同。

具体来说，中国向朝鲜出口原油、机械、工业产品和食物等朝鲜亟需的物资，并从朝鲜进口煤炭、电力、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以便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源和能源。吴瑞利发现，不仅像五矿集团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在中朝经贸合作中表现积极，包括万象集团在内的民营企业，也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积极参与了对朝投资与贸易，给双边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更丰富的内涵。

中朝经贸合作隐忧

然而，由于中朝两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地方政府机构和各类企业在利用政策扩大对朝投资和贸易方面，也

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吴瑞利指出，一些中国企业利用政策优惠片面追求利润，不惜卷入一些尚未被朝鲜方面允许的业务，从而可能会对中国在朝形象造成损害。更重要的是，中朝边境上的贸易有很大比例都以人民币现金结算，这不仅给寻租、走私和偷逃税款等不法行为留下了空间，而且可能会影响中央政府调控双边贸易的力度。

同时，一些中国企业在进入朝鲜后也发现，由于两国在市场发育、社会习俗和法律法规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自身利益可能会遭受意想不到的损失，民营中小型企业尤其容易陷入这种困境。

此外，在日益市场化的中朝经贸合作中，难免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例如，商务部就曾在2011年发布预警，要求中国企业在签订对朝基础设施投资合同前仔细审阅全部条款并购买保险，避免盲目行为。

吴瑞利的研究比较全面地揭示出了最近一个时期中朝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其深层次原因，并且敏锐地指出了一些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在上述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丰富了我们对中朝关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该研究生动刻画了高层政策对基层经贸交流产生的复杂影响，既展现了基层实践者在利用政策实现

自身发展时所表现出的创新和活力，也提醒我们关注这种基层自主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对政策目标造成扭曲和挑战。

参考文献

- Reilly, J. (2014). China's economic engagement in North Korea. *The China Quarterly*, 220, 915–935.

如何打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僵局？

虽然当前中美关系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但对于“核心利益”概念的争议已成为中美达成“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主要障碍。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尽快打破“新型大国关系”共识僵局，对于两国都是“双赢”局面。

◎ 归宿

今年以来，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力度明显加大。即便面临着来自俄罗斯和 ISIS 的现实挑战和威胁，在 2 月初公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亚太再平衡”依然被列为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同时，白宫高调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印尼等亚太四国领导人年内访美，这一非同寻常的外交举动也充分表明了美国全力推进“亚太再平衡”、并与相关国家加强联系的决心。

对于美国而言，中美关系既是“亚太再平衡”框架下的一个方

面，也是需要单独慎重考虑的一个变量：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关系到“亚太再平衡”的步骤和效果。对于中国来说，“亚太再平衡”不仅关系到中美关系，更关乎外部政治安全环境和力量格局变化，所 以其冲击和影响更为直接。因此，如何在“亚太再平衡”的背景下 维护、巩固、发展好中美关系，是两国在双边关系领域面临的共 同挑战。

尽管当前两国领导层沟通互访相对频繁和密切，但目前双边 关系发展远谈不上顺畅，特别是双方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 概念上迟迟难以形成共识。近日，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的史蒂夫·哈德利（Stephen Hadley）和清华卡内基中心研究员韩 磊（Paul Haenle）在《外交事务》杂志网站联合发表文章，指出 中方提出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表述已成中美关系的“第 22 条军规”（Catch-22），不仅阻碍两国达成“新型大国关系”共识， 更可能为两国关系发展埋下隐患。

文章开篇即指出，中美关系常常陷于某种“里子”和“面子”之 争。2009 年奥巴马刚上台，其亚洲政策团队在与中国官员讨论未 来中美关系发展方向时，中国官员就提出将中美关系升级为“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试图以此体现双方互信以

及美国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尊重。中方官员当时表示，只有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中美双方才可以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并开展务实合作。美方观点却正好相反，认为只有先开展建设性合作，双方才能称得上“战略合作伙伴”。谈判不出意料地无果而终。

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后，又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这也遇到了类似困难。总体上，美方认真对待中方“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但对其中“尊重双方核心利益”一条有所顾虑。这一方面是由于中美双方确实长期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存在分歧，同意中方的倡议则意味着美方在这些议题上让步。这不仅有损美国国家利益，也会使美国政府在国内遭受压力。另一方面，美方认为中方的“核心利益”概念过于宽泛，甚至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所指的“核心利益”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台湾、新疆、西藏等议题，甚至还一度想把钓鱼岛、南海列为“核心利益”。这无疑将损害美国与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同盟 / 准同盟关系，与美国现行政策相悖。

研究者指出，中方已经意识到“新型大国关系”表述过于空泛以及美方的顾虑，因此在去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与来访的奥巴

马总统会谈时，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表述由三点增加到六点，并指明伊朗核问题、反恐、气候变化等中美两国可以开展务实合作的领域。然而，尽管“不做损害彼此核心利益的事”这一表述在中方六点内涵中的排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美方而言，除非中方彻底去除“核心利益”这一概念，或对“核心利益”内涵做出明确解释，否则这依然将是中美达成“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主要障碍。

研究者注意到，其实中国官员在私下表态中也承认，让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其实是让美国给中国开“空白支票”，在政治上是“有毒”的。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大多敏感而复杂，需要双方共同仔细审视、妥善应对，在这些问题上开展创造性合作的难度也很大。事实上，从中美两国多年来的交往历史看，“求同存异”才是双方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条件。在涉及“核心利益”的敏感议题上锱铢必较，并不利于双方互信的建立，更不利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达成。

文章最后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亲自提出的倡议，无论对于中国对美政策还是他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美方应该高度重视。如果中方愿意在“核心利益”定义上做出妥协，美方

也应积极跟进。早日承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表述，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 Hadley, S., & Haenle, P. (2015). The Catch-22 in U.S.–Chinese relations: The future of bilateral ties. *Foreign Affai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02-22/catch-22-us-chinese-relations>

兰德公司报告：中美如何避免“擦枪走火”

政府权力不仅仅导致腐败，还导致愚行。领导人可能过分相信直觉和经验、傲慢死板、对困难和时间预期不足，甚至在决策时替对手想好应该怎么走，只可惜对手没有一次是听话的。

◎ 宿亮

在决策过程中看错形势、误读信息，可能导致个人不爽、公司崩溃——倘若涉及战争与和平大命题，结局可能是国家失败。国际政治风云际会，每时每地的新情况都需决策者全面理解、正确对待。历史上无数强人栽在这上面，无数强国因此“总被雨打风吹去”。

如今，东亚乃至全球的中美博弈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线之一。势力日增的中国要摆脱贫积弱年代，在东亚施展影响力；传统霸主美国在失落之余“重返亚太”，要保住地区强权。看上去，东

亚对中国比对美国更重要，但中国因此就可以低估美国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吗？而美国步步为营，是否低估了自身行动让中国产生危机感的程度？美国与盟国关系愈发紧密的背后是够低估了这种动向可能印证中国对周边环境恶化的认知？

两国是否同时高估了自身控制局势的能力？这会导致中美两强“擦枪走火”吗？

美国顶尖智库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龚培德（David C. Gompert）、著名军事和外交学者 Hans Binnendijk，亚太安全领域学者 Bonny Lin 在一份名为《忽视、愚行与战争：中美要学些什么》的报告中提出：中美应向历史求教。

纵观历史，无论是决策信息不足，还是决策者选择性使用情报，国家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问题上“拎不清”的情况并不少见，“擦枪走火”的后果也关乎国运兴衰。

1812年，拿破仑认定能够打垮沙皇亚历山大，纵兵东进、在俄罗斯冻饿交加，事后证明这是导致法兰西帝国覆灭的“烂招”。二战期间，希特勒也犯了同样错误，大独裁者明知拿破仑的下场，还坚持认为苏联1941年肯定会败给德国。

一战期间，英吉利海峡边的德国军事决策者们坐拥大量情报，

仍认为美国至少一年后才会参战，决定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以促使英国孤立投降，结果美国并没有给德国时间，不仅通过反潜舰队增加向英国给养，并在德国预期时间点一年前就派军队参战，让德国美梦破裂。

珍珠港事件前，日本决策者认定当美国从偷袭中恢复过来时，日军已然占领全部东南亚，凭此可以与盟国讨价还价。虽然明知美国是当年的军事工业第一强，仍发动偷袭。

1979年，中国政府虽然看到越南打退了法国、拖垮了美国，但还是决定要教训“小兄弟”。军事冲突让中国付出大量代价，但最终也达成军事目的让越军退出柬埔寨。同一年，苏联决策者不顾军事将领反对，认定控制阿富汗大城市就万事大吉，根本没考虑对付游击队的问题，结果就是十年后元气大伤的苏联撤出阿富汗，不久就黯然解体。

1982年，阿根廷认定撒切尔夫人不会倾全国之兵挥师南下，美国也不会支持英国对马岛的领土要求，随即出兵马岛，压根没准备打仗，结果面对英军迅速投降。

最新的例子是小布什认定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关系紧密，定要出兵再战波斯湾。结果，美

军大量伤亡、陷入伊拉克泥潭，本来借反恐旗号营造的国际形象毁于一旦，美国在中东地区也没完成政治上“树典型”的任务。

当然，也不是所有领导人都会误判。美苏 1973 年地中海对峙中基辛格的判断就避免事态不可收拾；苏联 1982 年决定不出兵波兰也不失明智之举。

说来说去，国家领导人及时有机会获得各方情报，仍因认知模式的问题可能导致错判。领导人也是人，愿意高估自己，愿意听取“顺耳”的判断，可能忽视歪曲重要信息。

从这些案例中看，领导人在决策中误判，无非是因为过分相信直觉和经验、傲慢死板、对困难和时间预期不足，甚至在决策时替对手都想好应该怎么走，只可惜对手没有一次是听话的。这种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判断上，这样出错的结果至少也是代价惨重。

总而言之，就像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荒唐”进行曲》中的观点那样，政府权力不仅仅导致腐败，还导致愚行。

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既然在不少公共领域决策过程中都采用了第三方独立政策分析的模式，没有理由在战争与和平这些大命题上缺乏类似的分析。类似中美这样的国家，决策者需要建立独立的第三方机制协助制定重大战略政策。这种机制不需要有实

体模式，以免形成部门利益或受到掣肘，但在重大决策前，应自动激活，向决策者提供包括政策分析假设、对手能力意愿、政策实施难度及可行性等全方位的战略评估。这种方式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各类信息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得到全面平衡的考量，以避免重大误判。

另外，报告认为中美领导人应该在峰会和热线之外拥有其他沟通机制，重要机构也应该在战略经济对话之外拥有更好的沟通方式以互相挖掘更多信息，增加了解。同时，智库与战略研究领域学者的交流也应该更加紧密、有效率。

兰德公司报告的结论看上去似乎是个自我广告，但其实不无道理。美国有完善的对华战略分析机构，但做出的所有决定并非都合情合理，一旦有一个决策踩住中方的“神经”，后果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而中国也在加紧国家安全战略决策机制和智库建设，既有模式是否足够独立以便提供完善第三方声音？还是总发出类似“首都人民喜迎地铁涨价”这样的声音？这些的确值得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参考文献

- Gompert, D. C., Binnendijk, H., Lin, B. (2014). Blinders, blunders, and wars: What America and China can learn. RAND Corporation.

“宙斯盾”？多少钱一斤？

军用技术哪家强？太平洋对岸找蓝翔，呸，找美军。不过，交点学费就想跟美国学技术恐怕不现实。美国凭什么要把高科技输出到中国？美国又能约束得住中国购买军用技术吗？那么问题来了，“宙斯盾”多少钱一斤呢？

◎ 宿亮

还记得《考克斯报告》以及科学家李文和吗？那份1999年公布的报告，除了指控中国拉拢美籍华人科学家窃密外，还指认包括休斯、摩托罗拉、罗拉等高科技公司向中国出售可以用于军事用途的计算机、导弹卫星技术等。

怕泄密，为啥不直接禁运呢？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学者 Hugo Meijer 认为，冷战后，美国政坛陷入对华技术输出上的争论，既要防着中国超越，又不得不推动技术输出管控门槛不断放松。这

到底是为什么？

技术输出管控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一种避免把敏感技术交给潜在竞争对手的政策，主要针对苏联，涉及技术或产品往往是军民两用，如既能预报天气、又能加密破译的超级计算机，以及李文和案中涉及的核武器技术、生化武器技术等。

冷战后，中国成为技术输出管控的主要目标，但此时的世界格局和高科技技术市场彻底改变。一方面，西方国家共同敌人的概念变得模糊，技术输出管理的国际机制逐步弱化；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大量求购技术。在当时美国技术输出管控清单涉及的项目贸易中，中国成为占据 86% 市场份额的最大进口国，排第二的俄罗斯只占 6%。

换句话说，在美国谈技术输出管控，谈的就是要不要把高科
技卖给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技术贸易和国家安全的行为范式都在改
变。美国也开始面临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这个难题。

在美国，技术输出管控主要涉及“三驾马车”：商务部、国务
院和国防部。在“三驾马车”之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部门间出现
分歧时负责协调立场、敲定政策。1990 年代之前，国防部严格反

对涉及军事的技术及产品出口，主张要国家安全，不要经济利益。

但冷战后，国防部观点 180 度转变，支持放松管制。除国务院国防贸易控制办公室外，其他各部门都持有类似态度，因此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对华放松管制。

这种转变的背后逻辑其实并不复杂。首先，由于世界形势变化，美国的技术输出限制实际成了单边无效行为，唯一作用就是让美国国防产业在中国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其次，技术更新换代速率不断加快，中国本身能力提升迅猛，美国的控制步伐能不能跟上实在可疑。最后，冷战的结束让美国国防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往是政府出资，承包商研发实际是为军队打工；冷战后则变成企业自主出钱研发，此时良性的市场行为就成为研发的基础。

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出口限制都会阻止企业盈利，进而减少投入下一代技术研发的资金，削弱五角大楼所依赖的工业基础。

因此，美国政坛出现了一种声音，即与其限制出口，还不如让美国“跑得更快”，用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保证国家安全。那如何让美国拥有研发新技术的更强动力呢？答案就是健康和充满活力的高科技市场，也就是所谓“出口 = 高科技企业 = 强大国防”

等式。

当然，作为这一等式中的利益攸关方，高科技企业也是游说政府的重要力量。

以超级计算机为例，美国 1993 年开始放松管制，随即收到价值 15 亿美元出口产品申请，1994 年价值 6000 万美元的超级计算机出口至中国。美国 1996 年按照目的地分成不同控制级别，中国和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分在第三级，规定不许执照就可出口至这些国家民用技术，而潜在军事用途基础或特定规格技术产品需报批。

1997 年至 1999 年，中国购进 1924 台超级计算机，数量是同级别国家中第二名至第四名的总和，给美国计算机业带来 100 亿美元的收入。

《考克斯报告》适时而至。其实，共和党议员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一直就试图在技术输出控制议题上掣肘。1990 年代中期，共和党取得国会两院多数，开始批判政府向中国出售超级计算机的“疯狂政策”。1999 年 1 月，《考克斯报告》出炉，至今还未解密；当年 5 月，面对大众的版本公布，再加上当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

21世纪头十年，共和党保守势力都在试图阻止对华技术输出。在小布什时期，这种态度的确引发了政府微妙的调整。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态度趋向保守；甚至连一直推动放松管制的商务部也把出口管理局改名为工业与安全局，以表明把国家安全作为最高目标。

不过，冷战后的结构变化彻底颠覆了技术输出的游戏规则。

还以超级计算机为例，中国市场代表了全球市场的79%，第二名俄罗斯只占11%。就算国防部拿出中国可能成为网络战争中美国的最大对手的观点，同样不能论证不向中国出口超级计算机的合理性，因为就算中国不买美国的超级计算机，一样可以通过多台商用计算机并行处理完成破译等涉及军事用途的工作。

最终，美国整个各部门达成共识，需要限制的只是那些中国无法生产而美国是唯一供应方的技术，否则无法保证管控有效性。2006年，美国政府不再以计算速度作为超级计算机的评价标准，也就使大部分超级计算机出口不再受政府管控限制。

奥巴马政府期间，技术输出管控继续放开。美国已经开始打破冷战思维中的“美国堡垒”概念，启用新的策略：“用更高的墙围住更少的东西”，也就是缩小那些需要保护的技术范围，只保护

那些能够有效保护的技术，其他的交给市场运作。

美国在对华技术输出管控上的政策并非如《考克斯报告》所说的那样失败。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的技术能力，特别是军事技术能力突飞猛进，但并没有在实质上超越美国，撰写《考克斯报告》的共和党也没有在政策上趋向极端。

从另一个方面看，长期对华武器禁运的欧盟中，法国等军工大国一直在要求联盟解除对华禁运，但受制于联盟内全体一致的表决机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在法国人不断游说的理由中，重要一条就是军工企业要应对美国的竞争。同时，美国一直在以安全问题为由呵斥欧盟不能解禁对华武器销售。咦，好像读懂了什么？

参考文献

- Hugo, M. J. (2015). Actors, coalitions,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security policy: US strategic trad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今天的中美关系 = 一战前英德关系？

有学者将今天的美国和中国比作一战时期的英国和德国——新兴崛起的大国不满于现行的国际秩序，想要扩大影响力，挑战已经存在的霸权国。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面临战争的风险？

◎ 柯莱阳 / 政见特约观察员

用历史上重要的双边关系来对比中美关系，靠谱吗？今天的学者看待中国的权力积累和中美关系的龃龉时，有的将两国比做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有的比作一战时期的英国和德国——都是新兴崛起的大国不满于现行的国际秩序，想要扩大影响力，挑战已经存在的霸权国。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Ja Ian Chong 教授和牛津大学的 Todd H.

Hall 教授重新审视了这种对比。他们仔细分析了中美关系和一战前英德关系的相似性和差异。

类比的缺陷

两位研究者承认，今天的中美关系确实和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存在高度的相似：中德都是短期内经济高速发展的非民主国家，同时又努力发展海军，试图超越作为霸权国的英国和美国；而美英都是海军霸权、民主国家，将处于上升期的大国视为外交上的挑战者。

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粗线条的相似性意味着中美将会走向战争，因为有诸多因素削弱这一类比的可靠性。

首先，一战前欧洲各国紧张的生存空间使得零和博弈效果被放大，德国的崛起使英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压力。相比起来，太平洋的战略纵深提供给中美两国更多让步的余地，没有必要采取冒险行动。

其次，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由于中美都存有数目可观的核武库，并且在投送能力上差距不大，因此，基于对相

互毁灭的恐惧，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这也是英德关系中不存在的变量。

此外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一战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在国际事务中盛行。但今天世界范围内不再有殖民地可以争夺，而经济领域的竞争也是在制度框架下基于市场的竞争。国际政治从一战前充满敌意的“霍布斯文化”（Hobbesian Culture），转变到冷战后以合作为原则的“洛克文化”（Lockean Culture），极大降低了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尽管提出了这么多的反驳，但两位作者并没有全然抛弃掉这一类比，而是沿着这一比较的思路，客观分析了历史和现状，提醒我们可能导致战争爆发的三个现象。

Lesson 1：复杂的安全联盟

一战前，大量的双边条约让国家间相互依赖。一些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为了获得盟国的支持而许下大量承诺。同时，一些大国（比如英国）为了避免被拖入与己无关的冲突，倾向于做出模糊的表态，从而释放出绥靖的信号，这使得德国有自信发起冲突。尽管

这些同盟关系都是双边协议，但一环扣一环，导致了多边的结果。

今天的东亚也是如此。小国由于害怕中国的崛起，因此尽可能绑定与美国的同盟。而美国不希望被拖入东亚的冲突，因此尽量避免作出明确的承诺。研究者认为，美国对东亚的外交政策是一种战略模糊：既安抚盟友，又约束盟友，同时还能威慑对手。但是这种战略并不能持续下去——与英国的处境类似，这种不确定的策略会传达错误的信息，以至于盟国会恃无恐，而对手会低估你的决心。

不仅美国，东南亚的小国家也倾向于做出模糊的战略姿态。印尼、越南、泰国、新加坡纷纷表示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同时又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因为他们既害怕中国的权力，又希望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益。这样的战略会使中美同时质疑与东南亚国家的长期伙伴关系的可靠性，也会导致中美加剧在这一地区竞争影响力。随着这种复杂的双边安全纽带不断加深，大国间在危机中误判的可能性也提高了。

Lesson 2：民族主义

研究者指出，二十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由于高速的工业化

进程导致社会经济利益的分化，政府、军队以及保守派精英日益面对来自社会民主派的压力，于是通过在公众舆论中培养民族主义来维护他们的权力。

民族主义的特点往往反民主和寻求建立强政府，它们因此是寡头体制的“天然盟友”。同样，民族主义也追求强硬的外交政策，批评对外国妥协、积极支持使用军事手段。一战前的德国和俄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浪潮。政府既制造民族主义，又被它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所束缚。因为民族主义不能容忍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妥协，因此限制了政府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此外，民族主义的盛行不仅影响在政策层面，还会恶化两国民众的关系。这是一种“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

今天的中国政府也向民族主义寻求对其合法性的支持。不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网络上，都能看到民族主义者活跃的身影。研究者认为，执政党在特定问题上不一定有执行弹性外交政策的能力，因为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制造了激烈的政治环境，执政者无法再忽视他们，而且还依赖他们的支持和宣传。同样，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不妥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内民族主义的制约。

Lesson 3：不断出现的危机

研究者认为，一战的爆发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单一的矛盾，而是一系列国际危机长期累积导致的。

在一战爆发前，欧洲出现了两次摩洛哥危机，一次波斯尼亚危机，两次巴尔干战争，以及日俄战争。持续出现的国际危机带来三方面影响：首先，每一次的危机都会导致敌对双方的怨恨加深，在上一次危机中处于下峰的国家会希望在下一次危机中报复对手；其次，每出现一次危机，都导致国家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第三，由于每次危机都没有引起全面战争，相关国家于是放松警惕，不再克制自己的行为。

反观近两年的东亚国际关系，危机不断发生。从朝鲜半岛核试验和韩国天安舰击沉到中国南海和钓鱼岛争端，以及中日韩竞相划分防空识别区。虽然每次危机最后都安全着陆，但是相关国家的立场越来越强硬，冲突也日益激烈。研究者认为，这种持续的相互挑衅以及依赖于强制的外交政策如果得不到控制，最后很有可能在朝着战争的方向上无法回头。

在结论中，两位研究者再一次提醒：认识到这些不稳定因素

的存在，不代表就能轻松解决这些问题。维护亚太和平的理想方式应该是建立持久的国际机制安排来管理这类风险。这也依赖于美国和东亚诸国有意识的避免通过以邻为壑的方式来寻求民族自豪感和政权合法性，而要尽可能采取外交手段挖掘双边合作的可能性，最终消除一百年前的英德对抗留在今天的阴影。

参考文献

- Chong, J. I., & Hall, T. H. (2014). The lessons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 Missing the trees for the fore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1), 7–43.

中国对外援助：为何有的见效，有的无效？

中国项目在太平洋岛国援助效果的差异主要源于受援国与中国就援助项目进行谈判、协调与监督实施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方式。

◎ 周航

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不断增加，但效果参差不齐。

从 2006 年北京倡议建立“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以来，中国对该地区的援助不断增加。2006 至 2011 年，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双边援助约为 8.5 亿美元（同时期，澳洲约为 48 亿美元）。这阶段中国援助的大部分源于温家宝总理在 2006 年“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承诺的 30 亿人民币优惠贷款。2013 年 11 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届“合作论坛”上，中国宣布在未来四年

为该地区提供 10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

中国对该地区援助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受援国的发展？又有什么因素影响中国援助项目的实施效果？来自澳洲国立大学的 Matthew Dornan 和澳洲罗伊研究所的 Phillipa Brant 在太平洋四个岛国（汤加、瓦努阿图、萨摩亚以及库克群岛）进行实地调研，认为中国项目在这些国家援助效果的差异主要源于受援国与中国就援助项目进行谈判、协调与监督实施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方式。

具体而言，以下三点因素非常重要——

1、受援国完善的援助协调机制

研究者考察的四个国家均就接受援助设立了考察与审批程序，但是，这些程序是否能对政策的最终制定带来影响则存在差异。在萨摩亚，重大的援助项目必须通过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批准与审查。在传统援助国的支持下，这两个委员会在 2005 年由萨摩亚财政部组织设立。它们在日常的运作中也会就具体援助项目得到其他相关政府部委的建议。委员会的设立确保了政府在就制定发展援助相关政策时得到充分的信息支持，透明度较高，并且各个相关职能部门也会对重要的援助项目有一定的了解。此外，萨摩亚

财政部还组织了“援助国协调会议”避免援助项目重复立项，并把援助集中用于当地优先发展领域。中国官员也逐渐对参加这个协调机制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

库克群岛财政部也设置了援助国协调机制，向各援助国介绍当地的优先发展领域，而中国使馆也长期参与这个机制。

相同的协调机制在瓦努阿图和汤加同样存在。但是，这些机制却大多仅仅由传统援助国或者区域组织推动设立，并未被当地政府内化。因此，政府的决策制定大多也不受这些协调机制的影响。在瓦努阿图，中国的援助深受当地政治动态与文化影响。瓦国各部委负责人提交的援助立项申请通常都只顾及各自支持者的地方利益，缺乏国家层面的协调。在汤加，当地政府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得了两笔优惠贷款。汤加财政部因担忧国家债务问题，并不建议政府寻求第一笔优惠贷款，但是其意见遭驳回。随后，财政部更是通过媒体才得知政府寻求签署第二笔贷款的消息。

2、援助透明度

研究者认为，中国对四个岛国的援助透明度均不足。采访的岛国政府官员往往表示他们难以理清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援助

项目承包商以及其他职能部委之间的关系，对在北京进行的项目招标进程也缺乏了解。援助从立项到实施过程缺乏透明度也会使得受援国当地社会对中国的援助产生更多疑虑，尤其是在受援国政治精英腐败问题较为突出的情况下。

研究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中国援助项目的承包商在项目立项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的实施需要通过招标，但承包商们却通常直接接触受援国政府，承诺可以从进出口银行处获得资金支持立项。他们甚至承诺来自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以后会被豁免，以便获得当地官员的支持。

3、项目监督机制

与许多其他援助国一样，中国并不为受援国提供监督项目实施的专项资金。在萨摩亚，当地的交通基建部专门负责监管中国援助项目的落实。但由于自身能力不足，该部门通过公开招标聘用专业的国内或者国际建筑工程公司来监督中国援助项目落实。在汤加，虽然当地对中国援助项目的质量大多满意，但仍担心由于缺乏监督机制而可能带来的风险。

瓦努阿图过去则是由政府部门直接负责监管，但效果低于预

期，如中国援建的农业学院大楼质量就不如人意。因此，当地政府也开始聘请专业人士负责项目监督。在库克群岛，因以往数个由中国援建的项目在项目质量、创造就业岗位和是否切合当地优先发展需求方面有待改善，库国政府也尝试完善对援助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譬如，当地外交部颁布了一项三年规划以合理使用援助，并确保中国的援助项目与库国的《国家可持续战略计划》所定的发展目标相吻合。

研究者最后总结，这四个岛国之间的官员也会就中国援助项目的申请立项及实施监督方面越来越频繁地进行交流，相互学习经验。这种区域内部国家之间的经验交流对提升援助有效性会带来正面影响。其他几个岛国也对中国与新西兰和库克群岛目前开展的三方发展合作项目——拉罗汤加岛供水项目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寻求中国和传统援助国的支持建立自己的三方合作项目。

参考文献

- Dornan, M. & Brant, P. (2014), Chinese assistance in the Pacific: Agency, effectiveness and the role of Pacific Island governments.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1(2), 349–363.

美国的亚洲朋友圈

美国是民主价值的出口国，但接受民主价值的盟友也会给美国出难题。最近新闻又爆出美国驻日本大使频频接到恐吓电话。美国在亚洲经营朋友圈的过程中有哪些辛酸的往事？盟国的人民又为何如此任性？

◎ 刘岩川

美国是公认的民主价值出口国，但接受民主价值的盟友也会给美国出难题。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 Andrew Erickson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嘉颖提醒美国政府，随着亚洲国家民主转型的深入，美国在冷战期间对亚洲独裁者的支持以及美军基地给当地社区造成的困扰，已经成为亚洲政客竞选时的“谈资”。亚洲国家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也时常将美国推向尴尬的境地。

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扩散，冷战时期的美国与多个亚洲独裁

政权结盟。这期间，不但独裁者对本国民主运动的压制和血腥报复得到了美国的默许，而且美军基地给当地社会造成的影响也不能被公开讨论。今天，独裁政权的消亡为反思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在亚洲国家的民主竞选中，美国的所作所为渐渐成为政客们的攻击目标。反对党派不厌其烦地呼吁选民重新审视本国与美国的关系，以求得到更高的“票房”。不巧的是，美国又需要亚洲盟友在许多战线上的配合，比如保障航道畅通、反恐、保持军事基地等。

Erikson 和庄嘉颖进言，要想适应亚洲国家的变化，美国就必须坦诚面对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历史形象。

在韩国，有不少人认为韩国自身的威权主义遗存、朝鲜的军事威胁以及美国的安全需要绑架了本土的民主政治。有关美国的负面故事比比皆是。在天安号沉没之后，李明博政府慌慌张张开展调查。反对派认为李明博的调查操之过急，既不符合本国的民主程序，又过早地听信了美国的一面之辞。2002年，两名韩国女孩死于驻韩美军的车轮下。美国法庭认为驾驶车辆的美军士兵无罪，而当时的韩国政府表现得无所适从。在更遥远的1980年代，韩国军队在光州事件中对群众进行了暴力镇压，造成大量学生和平民死亡。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美国被认为站在了韩国军政府一边。

在冷战期间的台湾，美国是两蒋政权的赞助方。台湾民主化之后，李登辉和陈水扁开始大力宣扬台湾的本土意识。意在统一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展开了数次对峙，迫使受制于《台湾关系法》的美国在海峡两岸左右为难。其中，对台军售是台美关系久治不愈的伤口：台湾人认为美国提供的武器既昂贵又过时，大陆又指责美国干预中国内政。

日美关系也是命途多舛。美军驻日基地对周边社会和生态的影响长期困扰着两国关系。2009年，刚登上首相位置的鸠山由纪夫一心要让日美关系更加平等和透明，因此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分歧。日本自卫队的舰船甚至撤出了以反恐为使命的“持久自由军事行动”。安倍晋三上台之后，日本在靖国神社、二战历史方面频频与中韩发生冲突，使希望与三国保持友善的美国备感尴尬。

在独裁政权垮台后的菲律宾和印尼，美国对独裁者的支持更让人记忆犹新。菲律宾的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不但在当权时享受美国的援助，而且他的流亡生活也由美国一手操办。在1960年代的印尼，苏哈托政权曾在美国的支持下展开反共清洗，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1998年，在苏哈托政权步入黄昏时，美国又拒

绝支持印尼的民主化进程，间接导致苏哈托的支持者大肆烧杀抢掠。在施暴的人群中，据说就有美国训练的印尼特种部队。

Erikson 和庄嘉颖建议，要防止美国的过往政策成为盟国选战的话柄，就必须了解亚洲民主国家内部各派的立场、保持沟通。乐于看到美国影响力下滑的观察者应该明白，美国的“衰落”未必是中国国力提升所使然。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亚洲多国的政情变化正在压缩美国的政策空间，使其不得不审时度势地调整策略了。

参考文献

- Erikson, Andrew S., and Ja Ian Chong. (2015). The challenge of maintaining American security ties in post-authoritarian East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Retrieved from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challenge-maintaining-american-security-ties-post-12145>

法律

通向公平正义的唯一道路就是法治。

“任性”的权力：以打击内幕交易为例

权力的“任性”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对法律的无视。2007年证监会下发的《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就是一例。它不仅超越了证券法授权的范围，同时也违反了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众多现行法律。

◎ 武卓韵

内幕交易向来是令证券行业监管者们头疼的问题。在中国的证券业发展史中，泛滥的内幕交易更是一直为广大散户诟病。其实，针对内幕交易的法律已初具雏形：刑法第一百八十条、一百八十二条，证券法第五条、第七十三条都为规范内幕交易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基础。然而年，由于这些上位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在具体执行中，执法者不得不依靠大量行政机构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对内幕交易行为认定影响最大的，是证监会2007年发布的《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

来自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郝山教授（Nicholas Calcina Howson）在其 2012 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虽然上述《指引》在实践当中被广泛使用，但是在中国现行的行政法框架下，颁布这一《指引》并不在证监会的法定职责范围之内，其内容也超越了上位法所规定的框架。他也相信，这一现象体现了目前法律和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的广泛冲突，让观察者得以一窥中国在实现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过程中所面对的严峻现实和挑战。

证券法中的内幕交易认定

2006 年修订的证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禁止“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从而将内幕交易的主体限定在了这两种范围内。

根据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包括：（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尽管在实践中有对法条当中使用“包括”一词是否属于排他性的限定有不同解读，但研究者认为，2006 年证券法修订时，中国的法律中已经广泛存在“包括”和“包

括但不限于”两种不同的措辞。此处使用“包括”而非“包括但不限于”清晰地表明了立法者将“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限定在第七十四条当中的立法意图。

同时根据上述规定，内幕交易行为也仅仅针对“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所以下列三种行为并不是证券法所要处罚的内幕交易：(1)公司重组并购的参与人员；(2)从非“内幕信息知情人”或非“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处得到内幕信息；(3)利用第(2)项中的消息进行证券交易。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七十四条第七款授权国务院证券管理机构“规定”何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而类似地，第七十五条最后一款在认定何为内幕信息时，授权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认定”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属于内幕信息。虽然“规定”和“认定”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细微的差别表明，立法者要求监督机构在扩展“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时，必须以立法性的文件为依据。

《指引》错在哪里？

2007年颁布的《指引》实际上是对06年修订的证券法第

七十三条和七十四条的回应。但在研究者看来，证监会的回应无疑是不成功的。首先，这份指导意见并非正式的立法性文件，与证券法中“制定”的表述存在冲突。其次，由于这份文件仅仅作为内部的指导意见下发而未对社会公开，也违反了证券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最后，这份文件严重地歪曲了证券法第七十四条的原意。它不仅是对七十四条的扩展，而且从根本上扭曲了对于“内幕消息知情者”的定义方法。

实际上，与上述《指引》一起发布的还有另一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这两份文件同时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试行）〉及〈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的通知》下发，下发的对象仅针对“中国证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监管局，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内各部门”。由制定主体、下发方式和针对的对象可以看出，这份《指引》显然不是立法性文件。即使将其当做非立法性的规范性文件，也明显违反了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中要求“监督管理工作应当公开”的要求。

即使满足了这些程序和形式上的正当性，研究者认为这份《指引》在实体上也是无效的，因为根据证券法，这份《指引》唯一

的授权只能是来自于证券法第七十四条第七款。在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认定上，该《指引》完全无视了证券法的立法意图和法律结构。在证券法“内幕信息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之外，该指引第十二条另行规定了一类“内幕人”，将传递内幕信息者、公司并购重组参与人员等明确不在证券法规定范围之内的人员纳入了打击对象。第六条更是规定“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也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将所有拥有内幕信息的人（无论是否以合法手段获得）都纳入到了打击范围之内。

如果这些问题仅仅停留在理论上，那我们大可不必这么关注它。研究者调查发现，这份《指引》在实际操作中的确深刻影响着对内幕交易行为和主体的认定。从公开资料可以发现，由于这份《指引》肆意扩大了内幕交易的主体和行为，导致数起在证券法下本不应被当做内幕交易主体的人受到了行政处罚。这明显违反了《行政处罚法》中有关“处罚法定”的规定。

让权力不再任性的出路何在？

在目前的现实中，尽管困难重重，研究者仍然为挑战这种“任性”的规定提供了一些建议。

首先，在该《指引》的合法性上，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说，“行政机关往往将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在实际操作中，法院根本无法对抗强势的行政机关和海量的红头文件，所以研究者也承认这种论点获得实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来说，尽管行政诉讼法刚刚经过大修，但仍然没有有效地针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渠道。虽然立法法八十八条授权国务院可以废除不适当部门规章，但如上述所说，这份《指引》并不属于正式的部门规章，自然也就不受此限制。由此看来，受到行政处罚的内幕交易“参与者”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可是考虑到目前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凄惨现状，这也许只是存在于理论上的途径。

最后，幸运的是，这样的指引文件在刑事处罚方面影响力十分有限。在认定内幕交易是否涉及犯罪时，这份指导文件几乎不会成为法院定罪的依据。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刑事审判和行政文

件两不相干，也就决定了在行政文件不会作为定罪依据的同时，刑事审判也不会涉及到任何这些文件是否合法的问题。由此可见，在正式的立法性文件出台之前，这份《指引》将依然以尴尬的身份和不合法的内容，指导着中国的反内幕交易执法。

证券法是技术性较强的法律领域之一，但《指引》所反映出的问题却具有十分普遍的现实意义。红头文件、内部规定越权逾矩比比皆是，法律在许多人眼中也没有行政命令来得简单有效。但如果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可以用自己的内部文件肆意专断地扩大、扭曲甚至无视法律的规定，如果有效的司法审查机制继续在中国法律体系当中缺位，我们只会继续在任性的权力当中继续历史几千年的轮回，而离现代的“法治”精神越来越远。

参考文献

- Howson, N. C. (2012). Enforcement without Foundation? — Insider Trading and China's Administrative Law Crisi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60(4), 955–1002.

美国宪法的启示 *

为什么公办军校只招男生是违宪的

男性与女性之间生理上的不同的确是持久的。但是我们开始认识到，男性和女性之间‘内在的不同’是我们应当欣赏的，而不能用来贬低一种性别，或者用来人为地限制个体的机会。

◎ 袁幼林

前言

羊年春晚结束后，节目中隐含的许多歧视现象，特别是性别歧视，引发巨大争议。回顾往年春晚，各种实质为地域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残障歧视的“笑点”也不在少数。

这样的歧视在美国最高院的判例中曾经也并不少见。尽管在

* 专题“美国宪法的启示”始自《政见合辑·二〇一四年秋冬》。

南北战争结束后的 1866 年，国会即通过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保护”（平等保护条款），但是社会中存在的歧视并不因为国会的提案而在一朝一夕之内得到缓和。这些歧视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了最高院的判例中。

1896 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最高院判决州政府的“隔离但平等”政策符合宪法平等保护条款的规定，开始了为种族隔离制度背书长达 58 年的历史。1908 年的穆勒诉俄勒冈州案（Muller v. Oregon）中，最高院判决男性有宪法保护的选择每天劳动时间的权力，而州政府可以限制女性的工作时间，因为“女性的生理结构使得她们处于劣势… 日复一日的工作会对她们的身体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女性的健康对于后代的繁衍至关重要”。

以下介绍的这则案例，是美国最高院判例中关于性别歧视的经典判例。大法官在判决中的精彩论述，或许能为我们思考性别平等问题提供一些启发。

案件源起

1954 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

tion of Topeka) 中，最高院判决：种族隔离的政策不可能保证完全的平等，因此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值得玩味的是，为了保证获得最高院九位大法官——特别是保守大法官们的一致赞同票，沃伦首席大法官并未推翻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的判决，而是得出了一个局限的结论：在教育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社会中，种族隔离导致不同种族孩子享受到的无形因素的教育并不平等。

那么，在非教育场所的种族隔离是否违宪？在教育场所的性别隔离是否违宪？这两个问题悬而未决。

1990 年，美国司法部长宣布起诉弗吉尼亚州及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MI），认为后者只招收男性学员的政策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VMI 于 1839 年成立，是弗吉尼亚唯一的单性别州立院校。VMI 致力于培养“公民士兵”，教学方法主要通过向学员施压以及消除个人隐私空间，增强他们的纪律性、抗压能力以及道德感。

弗吉尼亚地方法院判决认为：VMI 独特的教育理念增加了弗吉尼亚州教育的多元性，如果女性加入 VMI，那么学校就必须改变现有的教育理念，比如给予更多的个人隐私空间，以及修改一些体育方面的要求。

随后，第四巡回上诉法院采纳了美国司法部长的上诉，认定弗吉尼亚州教育的多元性不能只为男性而不为女性所享受，并且认定“VMI 的教育理念并非完全不适合女性”，但是考虑到个人隐私空间的问题，允许弗吉尼亚州建立一个和 VMI 相似的军事院校，专门招收女性。

于是，弗吉尼亚州建立了弗吉尼亚女性领导力学院（VWIL），同样致力于培养“公民士兵”，只招收女性。但是 VWIL 新生的 SAT（美国高考）分数明显低于 VMI，并且 VWIL 不提供科学学士学位。同时，VWIL 并不采用“施压式教育”，而是采取“增强自尊的合作式教育”。弗吉尼亚地方法院以及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判决认为：VMI 和 VWIL 两者十分相似，因此不违反平等保护条款。但美国司法部长并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决定上诉最高院。

最高院判决

最高院的多数大法官意见由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执笔。大法官们认定，即使有 VWIL，VMI 不接受女性学员的政策仍然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金斯伯格大法官写道：“男性与女性之间生理上的不同的确是持久的。但是我们开始

认识到，男性和女性之间‘内在的不同’是我们应当欣赏的，而不能用来贬低一种性别，或者用来人为地限制个体的机会。性别区分不能用来创造或者继续女性在法律、社会以及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因为弗吉尼亚州并未展现将女性排除出 VMI 教育体系的‘极具说服性的理由’，并且 VWIL 也没有提供平等的机会，我们决定驳回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

弗吉尼亚州认为 VMI 的“施压式教育”无法适用到女性学员身上，因为男女都各自具有“基于性别的不同”：男性更加需要一个施压的环境，而女性在合作的环境中能够更好的成长。金斯伯格法官反驳认为，法院需要格外审查对于男性女性“天性”的概括性论述。虽然大多数的女性也许并不会选择 VMI 这样的“施压式教育”，但本案中的问题是：对于那些有能力有意愿参与 VMI “施压式教育”的女性个体，弗吉尼亚州是否能够合宪地剥夺她们这个机会？认定女性不适应施压式的环境是一个自我验证的预言，而这样的预言在历史上不断地被用来剥夺女性的机会：1876 年，明尼苏达州剥夺女性成为律师的权力，因为她们需要照顾孩子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法律；1925 年，哥伦比亚法学院拒绝招收女性学生，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伟大大学的男子汉学生都会去哈佛法

学院！”

金斯伯格法官接下来列举了 VMI 和 VWIL 的巨大不同，从教学理念、教育质量，到声誉、财政资源，两者都存在巨大的不平等。金斯伯格法官写道：“关于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概括性论述，以及关于什么适合大多数女性的估计，不能用来剥夺女性个体的机会。”

后记

《礼记》中说，男女有别。生理上的基础区别在长期社会化的进程中变得更加显著，也扩展到了其他方面，尤其是社会对于性别期望的不同。我们在立法司法中是否应该完全不顾及男女的不同？如果顾及一些不同，又该怎样掌握限度，以免我们的立法司法“继续女性在法律、社会、经济上的弱势地位”？

金斯伯格大法官的判决并没有给出答案；就算有答案，是否适合中国社会也值得商榷。但是判决中无处不在的对于概括性论述的警惕，对于个体的尊重，是政见观察员希望明年的春晚可以注意到的。

在美国，经过近 150 年的演变，平等保护条款的覆盖范围也

几经波折：经过了1960年代的扩张和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上台后的收紧，时至今日，平等保护条款的范围和理论框架仍然是美国法学界辩论的焦点。最高院即将审理的同性婚姻案或许也会对我们对于平等保护条款的认知产生巨大的影响。

访谈

政见带你与全世界最著名的学者们面对面。

古德曼： 超过八成的财富和地位是世代相传的

到底什么样的人在中国算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阶层到底有多壮大？中产阶层会带来政治变革吗？想要跑步进入中产，到底有多难？深入研究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古德曼教授一一解答。

◎ 缪莹 / 采访

精彩观点集锦

- ※ 在中国，领导阶层占了人群的 3%，中产阶层占了 12%，剩余都是下级阶层。
- ※ 大多数受访者在被问到“你是中产吗”的时候，会否认自己是（对方定义的）中产阶层，但如果需要他们自己定位自己的阶层，则大多数会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这其实就是中产焦虑的一部分。

- ※ 目前来说，中产阶层的态度是支持国家政府的。中产阶层一直是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并不想拿自己的财富、地位和权力冒险。
- ※ 一般来说，世界各地的下层社会都有一种独裁的性格——他们对自己的地位不满及愤怒，但他们也忠于维持现状。总的来说，下级阶层不会带动政治改革，他们只能是炮灰。
- ※ 中产阶层的神话——好像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努力来赢取财富、地位和权力。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没多少实证依据的……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有 73% 的财富和地位是世代相传的。在中国，这个数字大概是 83%。
- ※ 精英阶层有许多策略来保全自身。打个比方，假如你们家在 1948 年是地方精英，你是不是会建议一个儿子加入共产党，一个加入国民党？假如 49 年后你们家还没有和共产党建立起联系，你是不是将你某个美丽的女儿嫁给某个刚进驻你们地方的大兵？假如在 1946—49 年你们家是地主，你是不是会放弃自己的土地，以便取得“贫下中农”的称号？

- ※ 西方国家往往认为中国人更注重精神发展，而日本人更注重物质的东西。事实恰好相反。

你中产了吗？这个国家中产了吗？

这两个问题都不太好回答。虽然中国正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时常被人热议，但是到底谁是中产，中产到底代表了什么，意味着什么，依旧是说不清楚。光是“中产收入”这一项，便众说纷纭：从网络上流传的二十万年薪，到福布斯发布的一万到五万美元年薪，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六万年薪，中产的底线一直在波动。2014年世界银行的一项报告更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收入划为两美元一天——年薪合折起来只有人民币四千五百多元，不由让人跌破眼镜。在这种不确定性下，许多人瞬间“被中产”。

更令人纳闷的是，虽说大众印象中的中产收入线比学界给出的收入线要高出很多，但也有全国性数据显示，当被问到自己属于社会哪一分层时，有超过 70% 的人认为自己的确属于中产阶层。城市里收入不菲的人们似乎对自己的中产身份既认同，又焦虑不安。离中产线还差那么一点的人群里，更有“屌丝逆袭”等呼声，

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社会的中上层，赢娶白富美，出任 CEO……五花八门的主观阶层认知，给学界尝试的客观阶层划分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与此同时，不少西方学者在观察了英美等国的历史经验后，得出结论：中产阶层是一个国家民主现代化的基石。于是，在中国人均收入见长，白领阶层日益增多，高等教育也日渐普及的时刻（这三者是中产阶层最重要的标志），大家都在猜测：中产阶层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学界也没有共识。一方面，调查显示中产阶层比其他阶层有更鲜明的政治需求，支持自由民主方面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有数据显示中产阶层注重维护社会稳定，并不想改变现有的政治环境。

所以，关于中产的问题真是一箩筐：到底什么样的人在中国算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阶层到底有多壮大？中产阶层会带来政治变革吗？想要跑步进入中产，到底有多难？

就这些问题，政见团队采访了悉尼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的古德曼（David Goodman）教授。古德曼教授同时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职，并担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新建的中国研究系系主任。作

为深入研究中国中产阶层问题的学者，他着重指出了中国中产阶层和国家机构间的联系，并认为这是中产阶层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政见团队此前也曾介绍过他的研究^{*}。在访谈中，古德曼教授根据其新书 *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的几个重要观点，以及多年的研究观察，对中国现有的社会分层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剖析。

一、收入不是中产的唯一指标

政见 CNPolitics：您的新书是关于中国的社会阶层的，这是一个饱受关注的话题。在您看来，中国的领导阶层、中产阶层和下级阶层（dominant/middle/subordinate classes）是如何划分的呢？在书里您提到：在中国，领导阶层占了人群的 3%，中产阶层占了 12%，剩余都是下级阶层，这个结论又是如何得出的呢？

古德曼：阶层是基于家庭之上的。领导阶层（上层）控制财富和权

* 缪莹（2014）。中国离中产社会还有很远。政见 CNPolitics. <http://cnpolitics.org/2014/12/china-middle-classes>

力，中间阶层通过积累技能、知识、专长和经验以达到财富、地位和权力分层的中层。下级阶层是那些只能通过体力劳动来累积财富和地位的人。

具体社会分层数据的计算很复杂，可以参考 *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olity 2014年出版) 一书中 58—63 页和 107—109 页的相关段落。这些数据主要来自大型的中国社会调查，比如中国社科院开展的那些。

政见 CNPolitics：假如您可以用一句话形容，什么样的人在中国才能算中产阶层呢？

古德曼：那些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和政治地位而可以在国家机构或企业界担任专业性强的工作、管理类工作，或自主创业的人，可以被称为中产阶层。

政见 CNPolitics：光从国家公布的中产收入数据来看的话，发达城市里其实有很多人已经达到了中产的标准。但在交谈中，我们往往可以发现，很多中产收入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中产的生活目标，或者说对目前的生活依旧抱有很大的焦虑。对于这

种对中产主观和客观的不对等解读，您有什么看法吗？

古德曼：收入不是判断中产阶级的唯一指标，它只能说明一个人有没有“中等收入”。实际上，学界普遍认为焦虑是中产阶层的身份特征之一。不过，主观身份认同和客观社会分层之间有差距，也是调查者经常见到的。在中国过去二十年内的一系列采访已经证明，大多数受访者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否认自己是（对方定义的）中产阶层，但如果需要他们自己定位自己的阶层，则大多数会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这其实就是中产焦虑的一部分。

二、中产和国家机器相辅相成

政见 CNPolitics：在书中，您提到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和体制有紧密的联系。在您看来，这对政治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古德曼：简单来说，中产阶层和目前的国家机器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在可见的未来应该不会有大的规模或者影响。目前世界各地都

对中产阶层抱有一种期待，觉得中产阶层会引领中国走入英美模式的自由民主。我不这样认为。中国的政治显然是跟着经济发展在变化的，但“所有社会经济发展都会和一种政治形态殊途同归”这种说法未免太简单化了一些。

政见 CNPolitics: 有读者就您这个观点发问：您觉得这种关系（中产阶级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强弱与他们（中产阶级）的态度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呢？

古德曼：有很大的相关性。但目前来说，中产阶层的态度是支持国家政权的。中产阶层一直是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并不想拿自己的财富、地位和权力冒险。当然了，他们比下级阶层要更无私一些。

政见 CNPolitics: 什么叫中产阶层更无私呢？是哪种方面的无私？

古德曼：已经有研究证明（比如怀默霆、李静君、汤蓓蓓的研究）其实中产阶层比下级阶层更关注社会不公，哪怕下级阶层才是过去三十年的弱者。这对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在很大

程度上，他们把自己看做“忠诚的反对派”。他们会提出国家政策意见，但并不会反对国家制度本身。

政见 CNPolitics：目前学界已经达到一定共识，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受惠且依附于体制的。但如果一旦体制无法继续满足中产阶级的物质期待（比如经济增长停滞），这时候中产阶级的不满能否成为一种政治不稳定因素呢？这种可能性在目前一些业主维权运动是不是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古德曼：不。业主维权运动的确体现了目前政治环境正在产生变化，但他们并不预示着政治制度会改变。实际上，业主维权是为了让当下的制度可以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并不是把现有的制度替换掉。对于一个依赖并衍生于国家制度的中产阶层来说，哪怕经济增长放缓了，也很难预见他们和国家制度作对。出现这种情况需要更多的压力，比如说社会秩序的完全破坏。

政见 CNPolitics：执政党应该如何应对新生的中产阶层呢？可否举出几个具体政策例子？

古德曼：“应该”这个词用得让人担忧。国家政府很明显是希望看

到一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中产阶层的，这是他们推动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的一部分。但这两者都面临着结构限制。目前中国的社会福利系统还很不完善，所以人们需要存款，而非消费。户口系统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化和中产阶层的壮大。

政见 CNPolitics: 假如说中国大多数人还处于社会的下层（subordinate class），那么在您看来，他们持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古德曼：一般来说，世界各地的下层社会都有一种独裁的性格——他们对自己的地位不满及愤怒，但他们也忠于维持现状。总的来说（和毛主席说的不一样），下级阶层不会带动政治改革，他们只能是炮灰。

政见 CNPolitics: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下级阶层的不满和对维持现状的意愿，与中产阶层的不满和维持现有制度的意愿有什么不同呢？

古德曼：下级阶层看问题的时候更偏向个人，而不是宏观。他们对自身遇到的不公平感到不满，但并不觉得这是系统性的不公平，

反而觉得这是某个特定政府部门，或者官员给他们带来的不公平。他们抱怨公路造到了他们家门口，甚至他们家都给拆迁了，然后安置房小区（或者他们被逼新买房的小区）里又没有适合他们小孩的学校，连交通都不方便。当然中产阶层也会有这种问题，但有一部分中产阶层（并不是说所有人）可以看到过去三十年带来的一系列的系统性问题。他们在提出不满时往往代表其他人、甚至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民”。与此同时，大多数中产阶层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现状是富裕的，也明白这是因为和国家关系密切的原因。

三、超过八成的特权是世代相传的

政见 CNPolitics：在您看来，不同阶层间的流动性有多大？是通过什么途径流动呢？在当下中国，一个出身农村，父母为农民工，或出生城市底层，父母皆收入不高的人，有多大可能凭自己的努力成为中产阶层呢？

古德曼：在现代许多社会中都有这种中产阶层的神话——好像任

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努力来赢取财富、地位和权力。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没多少实证依据的。

去年二月，Gregory Clarke 发表了一项多国研究，其中就发现：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有 73% 的财富和地位是世代相传的。在中国，这个数字大概是 83%。这个数字和我自己的研究相近（这是两份相互的独立研究，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我的研究显示中国 82—84% 的地方精英是 1949 年前地方精英的直系后代。其他的研究甚至认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更低。一项北大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共同开展的研究就曾发现，中国女性的工作、地位和财富几乎完全取决于她父亲的工作和地位。对男性来说，大概是 80% 的影响。

在中国，主要社会流动的途径依旧是教育和政治。不过流动性其实并不大，或者说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当然了，82% 的特权是世代相传的，就意味着有 18% 的特权阶层是靠个人努力或运气走到今天，而不是靠家庭背景。目前这种不平等情况过于严重，使我们根本无从谈起杯子是半满还是半空的。对一个来自贫穷和弱势背景的人来说，他积累可观财富、地位和权力的可能性并不容乐观。当然这种事情也是有的，但英国有句古话说“一燕

不成夏”，所以这些只是个别案例，远远不能代表普遍情况。问题的重点在于：贫穷和弱势背景的人是否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运气往上爬，以及国家该如何鼓励和为这些出生在弱势家庭的人提供充分实现自己能力的机会。

政见 CNPolitics： 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显示说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依靠在她丈夫的社会地位之上的。在您看来，这对现代女性试图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意味了什么？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依附于他们最近的男性亲戚（父亲、丈夫）之内的吗？如果是，那是否意味着女性和其后代——尤其女儿——的社会地位还是得依靠她是否“嫁得好”？

古德曼： 是的，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依附，或者“隐藏”在她们最近的男性亲属的社会地位之后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女性们甚至希望这样。陈明路做过一项研究，发现有许多女性创业者更愿意将她们的企业放在她们丈夫的名下。有时候她们甚至雇佣自己的丈夫做“门面”，这样一来，在大家眼里她们就不再被看做是独当一面的老板。所有的调查都显示女人希望嫁得更好（嫁个社会地位高于她的人），这种态度也会影响她们的行为。那些社会地位独立于

男性的女性呢？当然有，但她们依旧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政见 CNPolitics：在您的新书中，您提到了中国在 1949 年建政前的地方精英到了政治条件允许的时候（比如 1978 年后）又会再次成为新的地方精英。那么在您看来，精英地位的代际传递具有多大弹性和耐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克服社会动荡和政治体制的强行改变而继续下去？

古德曼：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在刚开始做这类社会研究的时候认为社会政治动荡（或者不利的政治气候）会严重扰乱甚至推翻精英阶层的自我延续。其实不是这样的。精英阶层有许多策略来保全自身。打个比方，假如你们家在 1948 年是地方精英，你是不是会建议一个儿子加入共产党，一个加入国民党？假如 49 年后你们家还没有和共产党建立起联系，你是不是将你某个美丽的女儿嫁给某个刚进驻你们地方的大兵？假如在 1946–49 年你们家是地主，你是不是会放弃自己的土地，以便取得“贫下中农”的称号？社会资本——精英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技能、长项和行事习惯——这些并不会因为一个家庭的经济地位的（暂时）下降而消失。不然毛主席为什么为了“又红又专”而花费许多精力？

政见 CNPolitics: 在您看来，近两年“屌丝”、“高富帅”这种词在中国网络舆论中大行其道，甚至在传统媒体上登堂入室，是否体现了某些社会群体的阶层 / 阶级意识？

古德曼：是的，我认为这些词句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对于社会分层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主观认识。人们往往是被“和我们一样的人”与“和我们不一样的人”这种区分方法来影响的。关于素质的一系列争论其实就是关于社会差异和分层的辩论。

四、意识形态的当代作用

政见 CNPolitics: 您所使用的“阶级”和“中产阶级”概念，都源自对西方社会的分析。使用这些概念观察中国社会，有时候会带来新的洞见，有时候却让人觉得水土不服。就您的研究经验而言，在使用源自西方的概念观察中国社会时，应当注意些什么？

古德曼：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有一群学者（包括我）在九十年代早期就开始考虑过这个问题。发源于欧洲的一些社会学概念，比

如阶层，可以直接用在中国社会里吗？如果不能的话，那么社会学就需要调整来将中国社会的经验包括进去，要不然社会学就没有普适性了。所以说，首先最好承认社会和社会是不同的，而不要像很多人那样认为各个社会是彼此相同的。

政见 CNPolitics：请问您怎么看待近年来饱受关注的“中国威胁论”？

古德曼：假如你说的“中国威胁论”是说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可能带来后果的担忧，那么这种论调是确实存在的。但我觉得这被夸大了。和世界大多数发达经济国家比，中国依旧很穷。中国的国民人均年收入依旧低于一万美元，这比苏联在其经济最发达的时候好不了多少。中国政府显然不喜欢被人当软柿子捏，但也没有多少证据说明中国有统治其他国家的愿望，无论是像历史上的殖民国那样，还是像美国那样。

政见 CNPolitics：我们的微博上有网友想听听您对中国当下意识形态（ideology）的看法。您觉得现如今强调意识形态还有意义吗？在您看来中国当今的意识形态到底代表着什么？

古德曼：假如你说的意识形态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解读的话，那么很明显，它已经是以市场为导向了。但让我更惊讶的是商业化和市场化在中国依旧有限制。因为户籍系统的关系，目前依旧没有自由人力市场。意识形态的思想建设显然对领导人还是重要的，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在这上面花这么大精力。不过，很明显目前领导人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意识连接是很弱的。

政见 CNPolitics：假如这种连接很弱的话，那么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哪里呢？为什么这种连接会很弱呢？

古德曼：对领导人来说，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给他们的行动提供合法性，以及加强他们和被领导者之间的联系。问题在于人们（总的来说）已经得到了更多的政治教育，并不再无条件信任领导人所说的话。无论是工作场合和大街上都可以看见对政治的怀疑和嘲讽，这是过去六十年思想和政治动荡带来的后果。在五十年代初期，大家对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有很高的热情。现在大家对这种意识形态都有种走过场的感觉了。看看中国学生对他们必修的政治教育课的态度就知道了。

政见 CNPolitics: 您觉得在目前，中国的执政党主要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社会的公平？背后的的压力和动力又是什么呢？

古德曼：总的来说，市场有利资源分配，但国家要保证人人机会平等。在中国，市场还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国家也只给少数人一些有限的帮助，但加大了对支持机会平等的力度。从 2002 年开始情况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但对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的加大投资还是不可少的。

政见 CNPolitics: 您觉得西方国家对中国是否有误解？倘若有，最大的误解在哪里？

古德曼：我觉得最大的误解在于西方国家往往认为中国人更注重精神发展，而日本人更注重物质的东西。如果要这么说的话，还不如说事实恰好相反。

政见 CNPolitics: 可以对这种说法做出解释，或者举例吗？

古德曼：（关于中国和日本的精神和物质对比）这一块会是有趣的研究课题，但我们得小心不要把话说的太满。就以商业世界举

例，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和日本做生意需要靠关系。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某位银行家可能仅仅是因为对方和他是校友，就把钱借给了他，无论对方的商业企划如何。在中国，关系当然重要，但商人在政治影响力外还需要一个好的商业企划和资本。

政见 CNPolitics： 我们有读者想问您中国是否有信仰。您觉得呢？如果有，是什么样的信仰呢？

古德曼： 中国有信仰吗？没有像欧洲那样的信仰。在欧洲，宗教是互斥的信仰体系。你不能又是穆斯林，又是犹太人。当然这在中国也很少见，但在中国有些地方，人们在同一座庙里祭拜耶稣、孔子、毛泽东和道教诸神的做法却颇为常见。

政见 CNPolitics： 在未来十年（或者五十年）中，你觉得中国会有任何大的变化吗？假如有，会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古德曼： 变化是不可阻挡的。假如没有变化，那才奇怪呢。经济发展会让社会更有多样性，也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

政见 CNPolitics： 假如有一次机会可以让您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

位人物见面并问一个问题，您会选择见谁呢？又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古德曼：孔子。我想问这些著作都是你个人写的吗，如果是的话，你写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

五、给学者的建议：少睡觉

政见 CNPolitics：您多年来的研究跨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在您看来，学科研究和地域研究之间应该是什么样关系？

古德曼：学生们应该在本科时候专攻一项学科，然后到了研究生往后的阶段再转向地域研究。

政见 CNPolitics：您曾经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分别执教，现在又来到了中国。在您看来，不同国家（包括中国）在中国研究这一方面，入手点和注重点有哪些明显不同呢？

古德曼：在澳大利亚和英国，中国研究更注重了解中国和这些国

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该学科则将本国发展置于其自身语境中加以理解。

政见 CNPolitics：您觉得当下中国研究最容易被人忽略，却最不该被忽略的是哪一点？

古德曼：所谓“中国经验”的规模和多样性。在中国研究的领域里，大家经常会去寻找“典型的”、“平均的”、“常态的”。这样中国就被过度概括和浓缩了。

政见 CNPolitics：假如您可以向全世界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给出一条建议，会是什么样的建议呢？

古德曼：少睡觉。

政见 CNPolitics：最后，请您推荐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及其作品吧。

古德曼：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苏黛瑞的《从车床到织机》。这本书是社会科学的典范。

何式凝： 在性别与亲密关系里寻找另一种民主

春晚对于女性和小众群体的标签化，提醒我们注意一种时常被忽略的民主：性别与亲密关系中的民主。香港大学何式凝教授接受政见团队访谈，讨论性别平等、性别政治与平权运动。

◎ 林知阳 / 采访

精彩观点集锦

- ※ 在约会市场、婚恋环境、家庭结构里，有些人始终处于系统性的劣势之下，而这往往是由性别、年龄、族群、性取向等因素决定的。
- ※ 性与政治都是人们关于超然（transcendence）的追寻，都想追求超乎生活、超乎自我的世界。

- ※ 社会运动是种 sexual adventure，你嫌这种形容太固定刻板，不妨把它看做一场爱情。
- ※ 有一个标签，自然就有不服标签的人站出来质疑，并创造出新的标签。连 Armani 都有年轻的副线嘛。
- ※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这种所谓的“正常”，不也很值得挑战吗？

央视羊年春晚对女性和其他一些群体的调侃与嘲讽，激起轩然大波。反对者认为晚会的低俗段子歧视了小众群体，而支持者则认为节目娱乐无伤大雅。

对女性研究和性学研究者们而言，不论是幽默小品，还是家居生活，都能集中反映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文化语境。“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这一句被广泛使用的女权主义口号，并不仅仅号召经济上的平权。它背后争取的，是另一种时常被忽略的政治民主：性别与亲密关系中的民主。

性、性别与政治之间有什么关系？主流与小众之间的冲突如何

调和？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何式凝接受政见团队访问，讨论了这些问题。作为中港性别议题的推动者与公共运动的参与者，何式凝长期观察性与性别同社会政治变迁的关系。目前，何教授致力于跨文化对比研究大陆、香港、欧洲人群在性经验与性观念上的异同。

引子：什么是性别平等

政见观察员注：访谈进行中，一名大一新生敲门求教，与何式凝讨论课程报告“什么是性别平等”。特附上部分讨论内容，是为访谈之引文。

学生：我不是很理解“不公平”的概念。在香港，生活中我并没有见到很多不公平。是不是“有些事男生才能做，女生做就不太好”，那是不是就是不公平？

何式凝：其实“不公平”有很多种解释。你设想，如果我是一名男教授，拥有我现在所有的条件，我能不能“泡”到你们全班女同学？

学生：（笑）如果您是男生……以您课堂上的表现，绝对做得到。

何式凝：但我作为女（教授），有没有这个条件“泡”到你们全班男同学？肯定做不到啦。但你并不能仅就现象讲现象，说男女有差异就是不公平。你要进一步思考，这个概念其实有什么样的问题？它能解释什么样的情况，而什么情况它解决不了？如果男孩和女孩做的事全都一样，那是否一定就是公平？也未必这么浅白。

我们可以划分不同的范畴。以学业来说，目前其实算挺公平。港大女生很多，成绩又好，交换实习什么的选女生，绝对没什么不公平。但我反而有时要担心，男孩这么弱，帮下他们，再不收男生的话，就没男生了。

尽管学术世界算是相对公平的，可很多女孩子，毕业出来，马上头脑一晕便谈恋爱，要扮乖，不能有太多意见；要想办法留住身边的男友，免得他移情别恋；接着又要想结婚，因为没结婚那就没保障嘛；然后生小孩，因为想要个家庭；生完小孩，那我的事业呢？发展肯定不如那些不用生小孩的。

学生：所以女性的形象就被框住了？

何式凝：不仅仅是形象。我们做的事，因为“我”要找男友，因为“我”要建立家庭，“我”要做个好人，已被这些规范限制住了。哪怕从表面上来看是公平的，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学生：但我还想不通生理差异这一块。如果您在失火现场，您会期望见到男消防员还是女消防员？当然是男消防员了。

何式凝：你看 *Chicago Fire* (美剧)，里面一样有很多女消防员。在失火现场，最重要的是对全盘策略的思考，不是仅仅抱起个人就算了。

学生：所以策略上女生更胜一筹？

何式凝：其实这根本没什么男女的分界。最重要的是，社会要给更多机会让大家去做不同的事。但这已是很明显的一点，你要快点想通，脱离这一层次。你更应思考的是，为什么在你的生活之中，你经历不到这些男女不平等？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希望你在你的报告中，帮着大家一起思考：不公平是怎样浮现出来，但大家又是怎样对其视若无睹的。

一、挑战“主流”与“正常”标准

政见 CNPolitics: 在媒体眼中，您常被视为替小众发声的学者。对您而言，什么是小众，什么是大众？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

何式凝：在很多场合，我们认为女性比起男性有一定的劣势。不过，如今的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后现代理论家也认为，像我这样身份地位（政见观察员注：女性、教授、中产阶级）一样可以化身父权压迫，所以怎能把大众和小众仅用男女性别来划分呢？不过，这个社会仍然有更为宏观的、结构性的分裂。比如我若身为男人，以同样的社会地位、普通的相貌身高，大把女孩会来追我。可作为同等条件的女性，遭遇一定不会如此。

大众和小众在后现代社会越来越难划分，我们要做的，是不断探讨并重新划定它们的分界。不过，我们也必须认清更大的现实：在约会市场、婚恋环境、家庭结构里，有些人始终处于系统性的劣势之下，而这往往是由性别、年龄、族群、性取向等因素决定的。他们是结构中的小众——哪怕他们中有出类拔萃、打破间隔的个体。

政见 CNPolitics: 您的研究中涉及很多不同的群体，从最不寻常的，诸如“跨种族同性恋爱人士”一路研究到最寻常的“师奶”。您为什么选择这些研究对象？

何式凝：我最早关注性小众，是试图告诉大家：他们其实很“正常”。而后来对于大众的研究，则是试图表达：这些异性恋“大众”其实有多么的“不正常”、多么的“queer”。只有从这两种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我们才能去挑战所谓的“正常标准”。

政见 CNPolitics: 您提到我们要不断划分大众与小众间的分界——这可被视为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核心观点之一，即挑战所谓的“主流”与“正常”（normality）。但是，酷儿理论也遭遇了来自自身的挑战：酷儿群体近年来被批评为中产阶级白人为主导。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

何式凝：酷儿理论并不是特定的理论。它应该是对身份的批判，是个“反身份”（anti-identity），是一种情怀，也是理论工具。它并不是拿来划定某帮人是酷儿。相反的，它是一种永恒的自我批判。不论我们在何处，认同什么样的身份，都要保持永恒的自我批判。

正如福柯所说的，现代性是一种态度。我们永远无法完成某种身份，无法抵达某种解放，但我们不能放弃这种努力。所以，在这种视角之下，没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称自己是“Queer”。不管你有什么身份，你都要在身份之内自我反省。招致批评的“中产阶级白人”酷儿，也许是他们停留在某个思考阶段，放弃了自我批判。

二、私人生活和亲密关系中的民主革命

政见 CNPolitics：您研究性和性别在政治变迁中的发展，比如1997回归对于香港同志群体情爱关系的影响。您怎么看性与政治的关系？

何式凝：我一直研究性。它给予我一个非常好的观察出发点。很多人把政治看做离自己遥远的东西，但我觉得性和政治有一个很接近的地方：性是 *erotic energy* 的表达，政治也是。性与政治都是人们关于超然（*transcendence*）的追寻，都想追求超乎生活、超

乎自我的世界。社会运动也是如此。社会运动是种 sexual adventure，你嫌这种形容太固定刻板，不妨把它看做一场爱情。

政治与人们间的连结其实非常相关。有些人关心的政治是宏观政策、民主代表性，我虽然关心这些，但我更关心的并非这些前台政治，而是私人生活上的：有没有人批判父权制度？有没有人关心不平等？有没有更为平权的经济政策？还包括如今有人提出的女权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试图从女权角度寻找另一种资本。我关心的，主要是私人生活和亲密关系中的民主革命，这些绝对是政治的，它们是身份政治。

所以，我观察民主运动时，我会看，究竟我们有多少男权预设出现在运动之中？很多人为社会民主运动提出意见，可他们的话语体系拎出来，会带出多少充满男权和高人一等的元素？这些反思，可以帮助社会运动打开思路，并找到新的策略。

政见 CNPolitics：您这么说，不怕人们骂您“左胶” *?

何式凝：一定会的（笑）。没办法便接受。左胶就左胶呗。

* 注：粤语，意思近似网络标签“白左”。

政见 CNPolitics: 您之前的研究涉及香港的男女同志群体用新的群体标签与主流话语体系抗争。但现在另一种困惑是：标签越来越多了。从无性恋（asexual）到泛性恋（pan-sexual），数十上百种性别身份推陈出新。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何式凝：这就是我在当年博士论文和后期研究所试图研究的问题：身份的增殖（proliferation of identity）。一定会有新的身份不断繁衍出来，这几乎像是自然法则。有一个标签，自然就有不服标签的人站出来质疑，并创造出新的标签。连 Armani 都有年轻的副线嘛。一个固定的身份的背后，一定有种种反抗的力量，也一定有新的标签来取代旧的。没有什么长存不朽，人也是，现在正当红，总会被取替，除非你用新的方式来重新发明自己。

政见 CNPolitics: 之前您的一个访问激起了许多争议。在访问稿中有一段关于“提倡女性多边关系”，不知访问是否表达了您的本意？一些女权主义者对此表示批评：在整个男权社会，婚姻的建构没有打破之时，去鼓励女性发展多边关系，其实会为女性带来更多压迫，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这是不是反男权与反异性恋主流话语这两个思想潮流的冲突之处？

何式凝：我提出的多边关系，是作为传统一夫一妻制关系的一种批判，而我所提出的，当然也可以受到不同的批评。

我认为：没有哪一种特定的关系，能够在当前社会免于父权的压迫。提出多边关系仅仅只是多提出一个选项，增加多样性与选择。大家在种种社会关系之中，如何对亲密关系进行革命，颠覆旧有的权力压迫，这是需要我们毕生投入的民主事业。但我也觉得这些批评未必不对。如我们最初说的，无论这些改革声音有多少，我们依然有个更大的现实无法在短时间内被改变，即结构所带来的不平等。我认为这些声音是很好的提醒。不过，不代表我提出多边关系就代表我加强了结构性的不平等。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这种所谓的“正常”，不也很值得挑战吗？

政见 CNPolitics：之前大陆媒体的访问里引用您的话说，“情欲里没有公义”，引发很多争议。您认为，情欲里有没有公义？

何式凝：之前的访问似乎遗漏了一些信息，没有讲清楚，我也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引发许多争论。很多人对于亲密关系中公义的理解有问题，认为公平交换才是公义，我给你多少，你便还给我多

少。我想说的是，有些民主原则的东西，一样在关系中得以运用，给对方自由。而非单纯遵循经济原则基础上的“公义”。其中有迁就、有尊重、有适应。

三、从直接的政府管控到隐晦的社会工程

政见 CNPolitics: 以性作为切入点来观察政治——这在主流社会科学界依然较为边缘。您认为需不需要，或者怎么要，与其他学科进行合作？

何式凝：我认为这需要不断的对话沟通。比如我和陈祖为的对话，他去年出版了 *Confucian Perfectionism: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大家看对方的书，评论对方的观点，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交流互动。但我们必须创造这些机会。尤其在一连串的社会运动之后，我更加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做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能使得大家理解你？如果我们能进行更多的平等沟通，那么大家都会受益。过去可以不理睬别人，但现在恐怕一定要“勾结”

外部势力”（笑）。

政见 CNPolitics：您最近与英国学者 Stevi Jackson 进行了东亚与欧洲的比较研究。您认为东方与西方的性学研究有分别吗？

何式凝：很多。其实我们的对比，主要基于东西方在物质条件上的差异。传统的西方理论不仅不能解释中港人群，其实也很难解释西方自己所经历的社会现实。他们往往局限于用特定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观察，却未必准确。性与性别理论中的一些分类在前提上不够完备，而现实却复杂得多。传统西方理论连自己的社会现实都难以解释，我们照借他们的理论框架，那更加难以分析大陆与香港。所以，我们用一些特定的方法来进行跨文化的对比——比如，我们把香港搜集来的访谈资料给英国受访者看，研究受访者的反应，反之亦然。

政见 CNPolitics：自毛时代起，中国政府对于性与性别的隐性控制一直存在。您怎么看待当今的政府对于性与性别的影响？

何式凝：其实现在的直接控制已经减少了。你看 Deborah Davis 写婚姻的私有化，国家解放了性与婚姻选择。但与此同时，彭晓辉

与潘绥铭等性学家所受到的社会压力，令我们见到政府对性与性别的管控更加精妙，由直接的政府管控变为隐晦的社会工程。更有问题的是管控的任意性。某种思路可能被放开，但随时可以受到整肃。

四、“你喜欢这种自由的生活方式，那便享受这条路上的风光吧”

政见 CNPolitics：您觉得您是不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何式凝：我很受女权主义的启发，但我不挂名。有时他们未必认为我做的事和想法都不是典型“女权”，这招致更多困惑与反感，所以我我不挂名为“女权主义者”。但我不否认女权主义对我影响深远。

政见 CNPolitics：您将自身经验作为研究重要的灵感来源与观察手段。您如何看待对您的研究“太主观”的批评。

何式凝：会被批判太主观，但是我并不介意。质性研究本来就是主观的——我们要珍视主观，利用主观，亦要挑战“科学性”这一

概念本身。我并不会介意这种批评，因为这就是我的研究。

政见 CNPolitics: 您对于年轻女性学者，有什么建议？

何式凝：我有建议过的。身边有一些年轻学者成就显赫，四十上下。她们从未放弃过自己将来找到年纪相若的伴侣、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我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放开自己呢？为什么仍然活在这样的梦幻之中呢？我并非不支持这样的理想，但必须面对现实，机会已并不多。在这一大前提下，同龄同条件的男生多已结婚，那必须重新考虑自己想要什么：若需要性生活，便追求性生活；若追求旅行伴侣，那便寻找旅伴；但在学术象牙塔之中坐等婚姻降临，那何必日日坐在房间里写书？不如出去约会好了。

政见 CNPolitics: 那这是要她们为自己的职业选择牺牲婚姻吗？

何式凝：不是牺牲，而是拓宽选择面。如若真想结婚，那就去想办法结。但并不能坐等婚姻、家庭、子女的降临。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你如果对其他的替代选择都有鄙视，那可能最后剩下机会就更狭窄了，岂不浪费自己的青春。所以，年轻女学者在 tenure-track 上是尤为辛苦的。这是个竞争极度激烈的环境，如果在年纪比较

大又没有一早结婚，很可能已经错失生子的机会。有少数非常优秀与幸运的可以得兼，但并不多。这不是一条寻常路。但你为什么要选这条路呢？是因为你喜欢这种自由的生活方式，那便享受这条路上的风光吧。我们如果又要这种生活方式，又要阔太的生活，那岂不玩死自己？

原访谈以粤语进行，进行了一定的翻译编辑。

陈志武： 政治学、社会学应该向经济学学习

在访谈中，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谈及了人民币国际化、A股牛市行情、期权市场等诸多热点问题。他还向政见团队透露：正在筹备北大量化历史研究所，进展顺利。

◎ 杨天兆 / 采访

精彩观点集锦

- ※ 中国经济比以前有活力，其实是证明了美国式的资本化道路，不仅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也行得通。资本化不断挖掘中国的创新活力和潜力，创造经济成就。
- ※ 中国的私募基金通过私底下的联系，微信、聊天、吃饭、同城聚会等方式交流是很平常的。不同基金和投资者进而“抱

团“，一起进攻。但这在美国英国是不可以的，他们的监管很严格，跟他人讨论交易信息都要进行录音录像。

- ※ 现在老说“新常态”，其实就是意指中国不可能一直发展这么快，会回调到正常速度。到那时，中国和世界对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话题的兴趣可能也会下降。
- ※ 如果不通过货币化，把人的追求目标从物质财富最大化转变到金融财富的最大化，就很难理解这些首富们工作这么勤奋。
- ※ 政治学、社会学运用的数学或统计工具很简单，从这点来说，政治学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学，甚至远远不如经济学。另外，政治学对现实体制建议太少，应该向经济金融学学习，历史研究则更应该。

近日，政见 CNPolitics 团队在香港大学邀请陈志武教授进行了访谈。陈志武是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主攻证券、期权、资产定价研究。关注中国经济、资本市场的他尝试在时评、科普与复杂的金融模型间寻找平衡。在访谈中，他谈及了人民币国际化、A

股牛市行情、期权市场等诸多热点问题。

目前，陈志武正致力于推动国内量化历史研究的发展。他向政见团队透露：自己正在筹备北大量化历史研究所，资金已经解决，其他工作也进展顺利。

一、资本市场改革会带来政治影响吗？

政见 CNPolitics：你曾在《金融的逻辑》中表示，美国社会的许多资产都能被纳入资本市场并进行流通，是美国迈向富庶的一大原因。你认为中国是否也会走这样的发展道路？

陈志武：每个社会都有资源，美国、中国、非洲、中亚……比如，哈萨克斯坦，有很多石油；中东，俄罗斯，有石油天然气；印尼，有矿藏资源如铁矿石。但是，有资源、资产并不意味着有资本——资本在这里的含义是流动产权。这些物理资产是死的，不能流动，不能再配置、投资，但是它们一旦资本化，变成流动资本，价值再创造的能力就根本改变了。

美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多年历史中，特别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

不断地把各种土地资产、矿藏资产，甚至未来的收入流这种传统社会感觉只能想象不能变现的东西纳入资本流通，通过股权、债权，以及其他产权方式使之可以交易流通，让金融市场发展了，原来不能流动的资源资产变活，让美国资本充裕，特别是给创业者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且，美国还到处通过流通的产权进行布局，经济变得扎实。

实际上，中国经济比以前有活力，特别是像互联网产业，手机等新兴产业，包括出现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公司，其实是证明了美国式的资本化道路，不仅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也行得通。资本化不断挖掘中国的创新活力和潜力，创造经济成就，就是因为学美国。

政见 CNPolitics: 你在许多作品中提到，资本市场不光只是经济层面的，它和政治也紧密联系。那么，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是否会给中国带来经济领域以外的更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多元？

陈志武：那肯定也是。比如说 A 股市场，我们现在看到了沪港通，这是迈向开放的第一步，但改革不会就停在这里。未来，深港通，

甚至沪深跟更多资本市场联通都有可能出现。

这些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监管体系、法律甚至政治都会带来间接的影响，道理很简单：比如说最近中国的一些私募、公募基金，联合起来，集体打跌铜价，操作了很多铜期货，冲击了实体行业的企业，让全球金融市场很惊讶，他们之前并不知道中国可以有这么多私募，还可以让铜价在短短几天跌掉百分之三四十。以我的了解，中国的私募基金通过私底下的联系，微信、聊天、吃饭、同城聚会等等方式交流是很平常的。不同基金和投资者进而“抱团”，一起进攻。但这在美国英国是不可以的，他们的监管很严格，跟他人讨论交易信息都要进行录音录像，以备监管部门随时调查：是否存在利用内幕和大规模集体行动来进攻其他的大宗商品或金融价格的行为。但是中国没什么监管，即使有，相关条规也没人执行。全球铜价被极大地影响，但中国自己封闭，不受影响。这个例子说明：经济全球化对政治、法律和监管都会带来很多影响。除非有人故意闭关锁国，但那样的话自己的发展、创富、创新也会受限制。现在世界还是主权国家为主，但未来全球资本市场是不是完全开放，和全球监管政治体制很有关系。

政见 CNPolitics: 中国牵头的金砖银行、亚投行的成立等许多证据显示，人民币国际化越来越被政府提上议程。一个国家必须付出一定代价，比如保持贸易顺差，才能维持其货币的世界性货币地位。对此，你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存在哪些障碍？

陈志武：太多因素可以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比如政治的稳定、透明，如果还像现在中国不那么透明的话，并且政府权力不受到实质性民主制约的话，这样国家的货币不太容易在全世界被广泛接受。虽然现在人民币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有它的吸引力。

现在老说“新常态”，其实就是意指中国不可能一直发展这么快，会回调到正常速度。到那时，中国和世界对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话题的兴趣可能也会下降。但是另一个方面，我理解，中国政府已经将此当做最高政治任务，各个部委还是会不断推动的，而这也会推动中国各种金融市场的开放。只是作为支付手段的国际性货币，倒未必要开放，但是真的走向国际化，把人民币变成具有财富投资功能的货币，一定要开放资本市场。

二、李嘉诚的早餐也只是喝稀饭吃小菜

政见 CNPolitics: 你曾撰文探讨过马克思·韦伯提出的追逐更高社会地位的“资本主义精神”。当前中国涌现出的“土豪”阶层是否也具有这样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为社会发展带来影响？

陈志武：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把财富价值和追求财富的动力和所能带来的消费潜力划等号。换句话说，不管你追求一个亿的财富，还是几百万的财富，之所以最后有价值，就是有相对应的消费潜力。但我在这篇论文想说的就是，这个观点是狭隘的。因为现实中，不管你是李嘉诚，还是李彦宏、马化腾，当你财富高到一定程度后，你追求的就不是财富所带来的消费了，而是还有社会影响力、社会地位。

我还有一篇文章讲到货币化对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贡献是根本性的，也跟这篇论文有关系。因为如果人只是追求物理化的财富，房子、家具、衣服等等，那到最后很多有本事的人，去创业创新，发现其实一个人的物质需求其实也还是很有限。比如原来长江商学院的院长项兵。大概十二、三年前，李嘉诚找到他，想了解一

下他，请他吃早餐，项兵也很激动，想知道李嘉诚作为华人首富，有几百亿美元，到底每天吃什么，他觉得和普通人肯定不同。后来发现，李嘉诚也只是喝稀饭，吃的是很简单的小菜，就算早餐了。项兵很吃惊，没想到首富也如此。这说明一个道理，如果不通过货币化，把人的追求目标从物质财富最大化转变到金融财富的最大化，就很难理解这些首富们工作这么勤奋。

其实这篇论文主要的意思就是想理解清楚，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化对人财富追求的激励似乎是无限的，有一个亿还想几百个亿、一万个亿。如果不是货币化来转化物质财富，那人奋斗的追求可能到一定程度就“刹”住了。正因为此，资本市场出现就是让人有更多空间去买卖股票、交易，去投资甚至炒作。尽管这些个人或者机构看起来只是在投机，动机不在于帮助社会发展，但其实他们的投资、投机帮助从事创业、实业的人分摊了风险，提供了资金，间接帮助了社会发展。

三、中国期权市场的定价走上正轨还需要时间

政见 CNPolitics：众所周知，从 2014 年 10 月份开始，中国沪深

股市出现了一波牛市行情。有人认为这根本上是楼市和信贷市场的资本流入股市所致，对此你作何评价？

陈志武：楼市去年明显出现拐点，因为限购限贷等抑制泡沫的政策打压。并且，有一点很明显，在中国大城市，自有房的比率在87%左右，世界上没那个发达国家的自有房比例有这么高，这说明中国的很多有效购买力基本耗尽。而信托产品理财产品经过四年快速发展，规模很大，带来风险也大，金融监管也越来越紧，老百姓的财富不知道往哪里放。在这样背景下，股市变成很重要的处理财富的地方。加上11月央行降息，最终触发牛市。

政见 CNPolitics：除了牛市，中国资本市场近期还有另一个关注点，就是将上市注册制提上议程，这一改革会不会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得更迅速、健康？

陈志武：实际上，2015年要真的快速进行注册制改革，从股票市场走势来讲就有下跌压力。我当然反对审批制度，通过审批决定谁可以上市，这不合理。但是现状就是审批制。注册制快速上马，估计上千家公司会同时挤到市场争着上市。此时，资本却不足以

应付，股价会下降。

政见 CNPolitics: 2015年2月9日，中国证券市场正式进入期权时代，不过ETF 50遭遇低开，同时外界批评此次期权开放门槛过高，手续繁杂，你认为未来中国市场的期权是否可以成为行之有效对冲、避嫌工具？

陈志武：这个需要学习、适应的过程。要实现期权的配置风险的功能，还有路要走。不管怎样，开启走这个路比不开好。任何一个市场，投资者先吃了亏，散户、市场才能掌握不同金融工具的特点。

政见 CNPolitics: 期权市场的多空博弈情况能更好地预测第二日的市场走势，而在公司收购交易中的期权市场交易相比于证券市场所传递的预测信息更加丰富，这都是你过去重要的研究结论。不过似乎现实也存在反例：去年四月，优酷土豆股价暴跌，和之前期权市场的预测信息相反，和理论有出入，对此你如何解释？

陈志武：这个不太奇怪，我们讲的是一般性的原理，但是具体在个案上，通过期权价格和交易对公司价格走向的预测，有的时候是

不准的。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内幕人，信息有限，他们只能根据掌握的信息来判断，毕竟不是内幕高官，相比于局内人，他们的信息是片面的，不完整。所以，个案层面，肯定有这样情况，走势和预测完全相反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大量的公司情况放在一起，平均总体来讲，是否预测就是无效的呢？应该说，是有效的。

政见 CNPolitics：你在关于期权定价模型的研究中表示，主流的 Black-Scholes Model、Binomial Model 和 Monte Carlo Simulation 三个模型都有可能因为外部的市场和政府的因素而预测不准。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进入期权时代，此时的市场反应和走势是不是应该由其符合这一研究成果呢？

陈志武：美国自从 70 年代中期就发展、普及期权，不仅是期权，还有股票指数，期货期权，等等，涌现出很多金融工具。但是中国在这些方面才刚刚起步，我判断中国期权市场的定价要走上正轨还需要一定时间。比如两融，期货在中国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还有很长的摸索过程。当然，今天已经好得多了，前几年没多少私募基金，也没那么多钱、人力、知识。原来推出期货时经历很曲折，但现在不同了，进步很大。简单的说虽然还需要时间，但

是现在做尝试的条件比以前好得多。

政见 CNPolitics: 当前，中国证监会或司法机构有没有进行有效的介入呢？

陈志武：这个路还很漫长，他们做的不多。他们有规则，但规则是纸面的，没人执行。这一点香港也是：私募经济共享信息，而香港的监管不如美国严格，这些情况就会发生。

四、大数据时代的“量化历史”探索

政见 CNPolitics: 在国内经济、金融学术界，是否存在你认为拥有研究潜力和发展空间的领域和方向？

陈志武：就我熟悉的来讲，经过 20 年，经济学、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已经在所有社会科学中跟国际接轨程度最好。不管方法还是框架，好和坏的评判标准，大多数同仁已经很明确，都在这样走，至少评估标准已经跟国际一样。从这一点讲，我觉得前景很好。

过去两年，包括以后，我会要推动的一个领域就是量化历史。可能很多历史学界的人还没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意义。因为传统的历史研究都是通过读史料，来感悟道理，或者建立假说，然后整理写作成书，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有实际的问题，历史研究以往会提出很多猜想、假说，来解释现象背后规律。但是以前没有框架和方法来排除假说，没有统计和计量的系统检验方法，或者有而没人应用。过去的历史研究是过于定性的，不存在很严谨的科学假设、证明，证伪的套路方法。随着统计和计量经济等发展，现在大家都熟悉了科学的研究的全过程，即第一步了解资料，提出假设，然后有了假设再去整理更大范围素材；第三步根据大的样本，根据严谨的统计方法进行证明，如果不合乎假说的话，就可以否定掉，最后再看看方法上有没有偏差，进行统计上的稳健性（robustness）检验；到最后，如果检验成立，说明你对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就有更有把握了。

史学界现在也有危机感，因为原来历史资料不多，既然这样，仔细阅读就可以，难度不高。但是现状史料多了，通过电子化数据化，比如家谱、地方志这类历史资料太多了，比如《刑科题本》涵盖清朝两百年，将近一千万页的素材，所以学者们发现不能靠

读了，因为一辈子都读不完。现在推动量化历史的研究方法，让我们通过量化来对付大历史、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挑战。否则，传统史学会出现危机。

具体有个例子，过去大学老师教文学史、小说史，教得再好，一个学期十几个星期里面最多能挑选一个时代的小说作为典型，也就几本。但是如果通过统计，各个年代的特点都可以总结。两三本又怎么代表一个时代呢？我认为，包括文学史教学都应该引用量化，把我们浩瀚的文学大海的趋势和规律找出来，让学生更快地把一个时代的特征找出来。

政见 CNPolitics：在不少学科领域，有一种声音认为，定量研究有内生的局限，而定性分析有其独特价值。那么你认为定性分析的角色是怎样的呢？

陈志武：定量和定性是相互补充，不是取代的关系，量化历史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把定性完全替代，它可以做的是把原来的缺陷弥补。量化历史研究方法不可能回答历史研究的所有问题，同样的，定性也不可以。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完全排斥其中任何一个。

当然，我认为，政治学、社会学运用的数学或统计工具很简

单，从这点来说，政治学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学，甚至远远不如经济学。其次，经济学给社会提供了建议、预测，但是很多人文学科嘲笑金融经济学家，认为他们老是说市场，影响现实。事实上，政治学对现实体制建议太少，应该向经济金融学学习，历史研究则更应该。比如政治学、社会学中，不同的课程和方向缺乏共同性的分析框架，学完后没有踏实感，没有统一的、一致的、逻辑自洽的框架，而经济学有。或许这是一些社会科学本身的特性使然吧。

当然，经济学也不是完美的，它还在发展。经济学存在很多错误预测，因为学科还在进步之中。总之，可能两类学科结合起来会更好。

政见 CNPolitics：对于量化历史研究，你有什么进一步打算呢？是否有考虑将其建制化，设立具体学科系所？

陈志武：我正在筹备北大量化历史研究所，包括师资、奖学金、奖教金、最佳论文这些资助都在安排。每年培训班会办下去，资金的问题我已经解决。还有相关学报、学术会议，都在准备中，进行得很顺利。

政见 CNPolitics: 谢谢你接受访谈。最后，你能不能给政见的读者推荐一本中国经济方面的好书？

陈志武：倒不一定关于中国经济，但我认为 *This Time Is Different* 这本书值得读，它历史性地总结了人类过去八百年内发生的所有金融危机。

怀念

致政见制图师大猫： 愿声声海浪伴你入眠

在 2014 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深深怀念政见团队成员大猫（张韧刚）。四天前，他在厦门因为一场交通事故意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失去这位优秀的制图师和热情亲和的兄弟，令我们心痛不已。以下这些文字，是政见团队部分成员对大猫的追念。愿大猫安息。

愿声声海浪伴你入眠

◎ 马军 / 政见观察员

写在前面：周一的下午，我在厦门集美福泽园殡仪馆见到了大猫，他静静的躺在那里，接受法医的尸检。如果一切顺利，大猫在厦门的遗体告别将在元月上旬进行。

2014年12月27日添加到日历晚11点13分，大猫在厦门环岛路龙虎山路口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当场去世。

大猫生前和许多组织有缘，维基、北斗、政见、担当者等等组织都有大猫活跃的身影。我是经大猫介绍加入政见团队的。在大猫去世之后，我也第一时间赶到了厦门并见到了大猫的最后一面。我从未想到有一天会给大猫撰写纪念文章。这是我写过的最让自己难过地文章。

龙虎山南，厦门湾北。山南水北，按理是个好风水的地方，我的兄弟大猫却倒在了这里，再也没有回到我们中间。

其实在出事的那个时间，27号晚上11点，大猫并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10点钟他便从吃饭的地方直接打车回到一公里外的住处，按理当时早就已经回到酒店。我们不忍调出那时的监控录像，唯一合理的猜测就是：大猫在中途下了车，在海边散了会儿步，发了会儿呆。

那片海滩应该是我们这群有着厦门生活经验的人的共同圣地，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失魂落魄，那片海浪声都是永恒的伴奏。我知道大猫热爱那个地方，他周五从北京飞到了厦门，就是想找到这片海散心。

我和大猫彼此认识就是在离海边不远的一个小店里，那时他从上海来到厦门创业，和我的两个大学同学合伙开了一家桌球桌游馆，而那时的我在福州工作一年后，还是忍不住那片海的诱惑，刚刚回到厦门工作。

为了节省房租，大猫就住在当时店里墙上的一个六平方米的空间里，那个地方被他整理的井井有条，就像那家店一样，每一张桌子，每一个杯子都被他擦的干干净净。

后来那家店还是开失败了，大猫也决定离开厦门去北京闯闯。他决定赴京的那天非常匆忙，下午去火车站买了票托运了自行车，晚上就上了火车离开了厦门。中间短暂的时间，我跟他去爬了残存的破旧城墙。他背着跟他面庞一样沧桑的包冲上城墙的背影，被我用相机拍了下来。那是我人人网页上唯一一个单张照片的相册，那相册叫做《此照片单独成册》。

后来我也离开了厦门，去了台湾念书，大猫在北京的住处变成了我每次放假赴京游玩的据点。在那个小屋窗台上，我看到了阳台上有一个瓶子，里面装着从厦门带来的海水和沙。他说那是离开厦门那天装的，我却忘了当天他怎么会有时间再去趟海边。

其实，大猫有着把一分钟掰成两半花的能力，在他短暂的生命里，中文维基、开店创业、北斗、政见、跑马拉松、为偏远小学建图书角、陪绝症姑娘最后一程、驾车穿越新疆、谈轰轰烈烈的恋爱……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刚刚出版了自己的新书，很多人一生没有完成的事情，他用了不到三十年全都完成了。

四个多月前，大猫的表哥突发了心肌梗塞，差点离开这个世界。从那时起大猫戒了烟，更加频繁的去健身房跑步。如果老天再给他三十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家伙会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出来。

在出事前的一个小时，他还在饭桌上计划着未来的工作。他一定走的很不甘愿。

大猫还是身边无数人认识这个世界的节点，他帮忙拓展了好多人的社交圈子，而他就像是一个江湖侠客，来投奔他的人他都照顾的很好。郭政、潘博、宇翔……大猫跟我说着他那张小床接待过多少传奇人物，有着多少类似“睡过就能工资翻倍”的传奇故事……，后来这些人我终于都见到了，他们从全世界各地来到厦门，送大猫最后一程。

从大猫嘴里零星的听说过他家的情况，这次接触之后才准确的知道他家在银川当地有着怎样的产业。我们都看过他在知乎上是如何回忆他走过的那段穷日子，但实际上，喜欢走南闯北游山玩水的大猫，完全可以回家当一个少爷，一辈子以吃喝为主轴、以玩乐为副业。

但他还是选择了现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我想我能懂他，他就是想证明些什么，他生命的短暂对不起他的努力，他却努力的对得起着短暂的生命。

大猫的表哥跟我们说，他在家里是个挺奇怪的孩子，跟家人的交流并不太多。原本家里都以为他在北京是个典型的 IT 宅男，

没想到社交圈子如此的广泛。郭政说，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才会聚到一起。或许，身边这样的人比较多，才让我们忽视了在人间的大猫是多么的特别。这让我更加悲伤了，因为这样特别的人，本就存世稀少，每走一个，就真的少了一个。

但是说什么也都没有用了，人没了就是没了。尸检的时候我们去殡仪馆看了大猫，这也许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很是糟心。他见我的最后一面应该是上个月的新书发布会，他一直开玩笑说我是个说相声的，愿我留给他的最后一面是开心和欢乐吧。

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在厦门回京的高铁上，每一秒都离那个适合奋斗的城市越来越近，每一秒都离那个适合长眠的城市越来越远。大猫，你就在那个适合长眠的地方长眠吧，愿那声声海浪永远伴着你。你没走过的路，没去过的地方，没做完的事情，有这么多朋友替你完成，你就放心吧。

◎ 钱争予 / 政见制图师

得知噩耗时已是后半夜，正在下班途中检查前一天积压的零碎资讯。很震撼。

我还记得在北京的聚餐，两年零一个多月前，来的多是政见

制图组的同事。大猫加班，最后到的场，已至半席，带着一身工作的风尘——能从这个男人的西装外套上，看到某种劳作中的、尘土飞扬的景象，我觉得很神奇。

大家问要加什么菜。“先上酒吧。”

我觉得很神奇，眼前这位初次见面的老同事，带来了一种陌生的、塞外式的粗粝感。立刻又觉得很熟悉，这种早先已经渗透在他作品中的大巧不工。

希望你在另一世，能先喝上一碗酒。

◎ 方可成 / 政见发起人

大猫是国内最早关注数据可视化的人之一。2012年初，政见团队开始推出信息图产品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人人网运营的数据可视化公共主页已经颇具规模。能够邀请到这位主页君加盟团队，着实令我们高兴了一阵子。后来，他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勤奋，在数据可视化的道路上一直走了下去，有了搜狐图解财经这样在业界很有影响力的产品。接下来，他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本来这个问题会有精彩的答案，可是他的生命却在这时戛然而止，令人扼腕。

我觉得，从他的数据可视化作品中，可以读出他的个人风格。这些作品不以视觉设计的精美取胜，正如他本人其貌不扬；它们也并不做什么炫目的大数据分析，正如他本人质朴可爱；它们胜在选择了切中读者关注点的主题，并以清晰扼要的方式呈现要点，正如他本人对这个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钻研欲，并善于在众人相聚时以平实的语言侃侃而谈。

不过，单从他的作品中无法读到他曲折的人生故事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能够在生活中结识大猫，我觉得很幸运。没有能够更多地和他交流，是我深深的遗憾。大猫，一路走好。

◎ 宿亮 / 政见观察员

我比大猫大一岁，却不像他经历那么多，成就那么多。跟他接触不多，说起来只有一面之缘，却被他身上那种带着可爱的血气方刚和带着稳重的亲和健谈吸引。

作为“政见”团队的一员，大猫对团队的发展作出宝贵的贡献；作为数据可视化的大拿，大猫的离开是新闻业的损失。

他的故事和经历证明了这是一个多么善良和真实的汉子，他写下的那些话，我们都应该读一读，让文字帮我们记着大猫，也

让大猫再教教我们如何面对生活。

大猫是个普通人，大猫有理想、有激情。都说猫有九条命，希望大猫在另一个世界不再经历那么多坎坷，却一样快乐、有冲劲地奔着。

◎ 于灵歌 / 政见观察员

与大猫也是政见聚餐见过两面，但对他印象极为深刻。认识他的人很多，听闻这个噩耗，尽管只是认识而已的关系，没有人不为他的突然离去感到心痛。

有次聚餐他坐我旁边问我以后打算做什么，我根本没想好就随口说“出国吧”。他说“真好啊，你们都很厉害”。后来才知道他的背景和经历，我突然理解他坐在一圈儿戴着学术光环的年轻人里面、看着我这种拼命往头上戴光环的人，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滋味。

但是我由衷敬佩和羡慕他。因为他身上看到的是我、我们所缺乏某种光亮。真性情、理想主义、侃侃而谈……他就像野草，有那种特别真实、有韧劲儿的生命力。一直觉得跟他相比，自己就是温室的花朵，一步一步好像很正确很美丽，但其实特别脆弱。

谢谢大猫，大猫走好。

◎ 王韬 / 政见观察员

韧刚，大家都叫他大猫。我和他见过几面，第一次是2012年秋天加入政见的第一次聚餐，第二次是2013年春天政见团队成员在单向街作演讲，当时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沙龙结束后他跟我兴致勃勃地聊起他想做的公益项目，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概是想帮助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虽然想法还不成熟，但他讲得很真诚很热情，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特实在、特有理想主义的人。后来得知 he 去搜狐作新闻可视化的工作，我们还因为工作的原因有邮件来往。大猫这几年在数据新闻圈里已经小有名气，我从各个渠道看到过他的信息，读过他的文章，也看到他在大学参加讲座的照片。就这么一个靠谱的哥们，说走就走了，震惊，悲愤。愿他在天国里继续做他喜欢做的事，大猫一路走好。

◎ 张跃然 / 政见观察员

和大猫只见过寥寥两面。他的社交媒体 ID 叫“安静的大猫”，而我倒记得在一次政见聚会上，满桌只听他一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时政话题，话密得泼水不入，颇有纵横捭阖之势，一点儿也不安静。他对数据可视化有极为旺盛的热情，无论是为政见制图、运

营人人“数据可视化”主页，还是后来被搜狐挖去做“图解财经”，均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的作品中也确实频出精品。他居然就这么走了。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残忍无情，又是多么的蛮不讲理呵，能让一个人走得这样突然，留给我们无法纾解的悲痛。只能在心中默念一声：大猫安息。

◎ 归宿 / 政见观察员

与猫兄有过两面之缘，还隐约记得当年见猫兄时意气风发，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对于生活满怀激情、热爱和希望的样子。后来通过知乎、豆瓣，了解了猫兄的一些经历和生活状态，很震撼，很感动，也很佩服。

猫兄是一个不断在前进、不断在奋斗的人，尽管遭遇过失败和挫折，但凭借他的天分和努力，终于闯出了一条路。然而，就在他人生和事业即将起飞的时候，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只能说人生无常，一路走好。

猫兄在知乎上的一句话让我念念不忘，“希望大家都过的顺利一些，对这个世界保留更多的善意”。是啊，尽管生活是如此的残酷，但我们也还是要对它保留更多的善意，过好每一天。我想，这也是猫兄在天上对我们的期待。

◎ 吕妍 / 政见制图师

和大猫是在政见认识的，在没有见过面的时候就合作过一张图。^{*}

后来我回到北京，我们就更常接触了。知道这个西北男生喜欢爬香山，喜欢跑步，喜欢吃砂锅粥。聚的时候，他常常碎碎念，但是说的其实都是想多做事、多做创新。今年五月去传媒大学演讲的时候，我们告诫他别吐槽了，但是他做完自我介绍就开始吐槽了。其实现在想起来，那些都是肺腑之言，只是学生听不懂，有的时候我们也没能静下来听。

他用数据讲故事有一手，做得精做得深都出书了。至于他是怎么做的，从他透露的两件事里可见一斑：

他说，他总是先大量地看材料，到了一定量之后，他会带着iPad去楼下抽一支烟，如果这个时候看的内容能理出一条线，那么这个故事基本就成了。

他曾经在群里发过他给外包的图解文案，基本上已经是一个

* 张韧刚, 吕妍. (2012). 中美富豪比一比. 政见 CNPolitics. <http://cnpolitics.org/2012/11/chinese-and-american-millionaires>

简化的信息图了。

我想，他的王牌栏目图解财经就是这样做成的吧。

从来没想过会在 20 多岁的年纪写悼念身边朋友的文章，感觉很不真实。

他给我们的小网站数据新闻网写过两篇稿，第一篇是吐槽大数据的，我和编辑们觉得是纯吐槽没给发；第二篇是回首 PC 时代的富媒体专题，我没有来得及发，昨晚把它发出来了，但他看不到了。*

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 8 月在杭州火车站，我们前后脚去一个工作坊做培训。他准备走我刚到，他没赶上火车准备去坐飞机，就是匆忙地在火车站见了几分钟。他去杭州讲课竟然只带了一个 iPad 和一个瑞士军刀，军刀带不上飞机，交给了我。后来，我都没有来得及还给他了。

这两件事，都是我欠他未完成的事。

* 张韧刚. (2014). 回首 PC 时代的富媒体专题——以搜狐为例. 数据新闻网. http://djchina.org/2014/12/28/sohu_visualization

◎ 励轩 / 政见观察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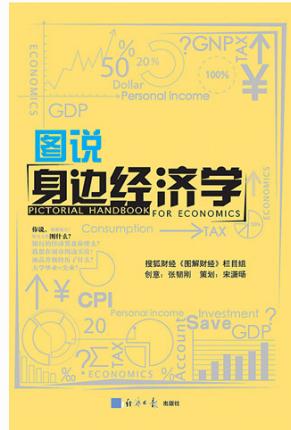
我与大猫兄是 2012 年他加入政见成为制图师之后才认识的。我们之间的直接交流并不多，线下只见过两次，我更多是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和文字来了解他。从他的作品和文字中，我发现大猫是一位带有理想主义的务实青年。我相信如果他那天没有在厦门倒下，还将会对改变这个社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也会让更多身边的人获益于跟他的相识。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回不到那一天去阻止他出现在那个街口。祝愿他在天国安息！

◎ 杨环 / 政见制图师

我与大猫兄是 2012 年他加入政见成为制图师之后才认识的。我们之间的直接交流并不多，线下只见过两次，我更多是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和文字来了解他。从他的作品和文字中，我发现大猫是一位带有理想主义的务实青年。我相信如果他那天没有在厦门倒下，还将会对改变这个社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也会让更多身边的人获益于跟他的相识。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回不到那一天去阻止他出现在那个街口。祝愿他在天国安息！

附：大猫的部分作品

- 方可成，张韧刚（2012）. 图解香港大选. 政见 CNPolitics. <http://cnpolitics.org/2012/03/hong-kong-election>
- 张韧刚，焦佳文（2012）. 国企知多少. 政见 CNPolitics. <http://cnpolitics.org/2012/09/soe2>
- 张韧刚，吕妍（2012）. 中美富豪比一比. 政见 CNPolitics. <http://cnpolitics.org/2012/11/chinese-and-american-millionaires>
- 张韧刚，宋潇旸（2014）. 图说身边经济学. 经济日报出版社.



加入我们

政见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团队，我们期待并随时欢迎你的加入。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相信：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工作，协力实现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快乐而又令人获益良多的事情。

在这里，你可以与一群优秀的朋友共事，施展自己的才华。

成为政见观察员

目前，政见观察员以在国内外修读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和从事政治报道的媒体人为主。我们致力于将理性、深刻、富于启发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给大众。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并且能够完成以下两项工作，那么你就是我们希望吸纳的新成员：

※ 阅读学术期刊或智库报告中与中国政治社会相关的文章，并撰写千字左右的文章对作者观点予以介绍。例文：〈“重感情”的中国基层政治〉 CNPOLITICS.ORG/2011/12/LOCAL-POLITICAL-PARTICIPATION

※ 联系研究中国政治的国内外学者，并进行访谈。例文：〈访法国汉学家潘鸣啸〉 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加入我们的团队之后，你的职责将是定期提供稿件。因此我们希望你每周都能有一定时间用于政见团队的工作。

政见自身拥有多种新媒体平台，并和国内外多家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可以让你的作品获得广泛的传播。我们是非营利团队，因此没有办法向你支付薪酬；如果作品被合作媒体选用，你可以得到稿酬。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和作品。作品需为上述第一类文章。来信请致：

Webmaster@CNPOLITICS.ORG

成为政见设计师

如果你爱好信息可视化，如果你是 Adobe DTP 专家，如果你计较像素对齐、标点挤压……如果恰好你也像我们一样，关注中国政治，政见期待你施展以下任一才华：

- ※ 优雅的文字设计：擅长图文编排，对文本有严谨的控制力，对图像有丰富的表现力。在这里，你将亲自实践屏幕呈现的图文设计，还将参与平面媒体的信息图制作。
- ※ 精致的用户界面：擅长信息架构，熟知互联网及移动设备的交互模式，良好的视觉表现技能。在这里，你将直接推动政见网站的改版，探索政见在移动互联网中的产品设计。
- ※ 创造性的信息可视化：擅长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动态、可交互的信息图设计。在这里，你将与时政领域最优秀的观察家紧密合作，探索中国政治话题下的信息创意传达。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和设计作品。来信请致：Webmaster@CNPOLITICS.ORG

成为政见主页君

政见是一个基于新媒体的团队，我们生产的内容依托多种新媒体平台传播。在今天这个媒体变革的年代，好的内容更需要依靠懂传播的人才能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我们希望政见主页君认同团队理念，并且能够完成这些工作：

- ※ 与现有团队成员合作，运营政见新媒体平台（包括微博、微信等）——既包括独立撰写微博等内容，也包括发布他人撰写的文章，还包括与读者互动。
- ※ 与其他网站、平台联系开展合作。

我们希望寻找的新成员，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

- ※ 做事靠谱，认真细致。对细节有完美主义的追求更佳。
- ※ 新媒体运营对及时性的要求很强，因此希望你大部分时候每天都能有一定时间用于政见团队的工作。

- ※ 思维活跃，熟悉新媒体运营，熟练掌握各种新媒体平台以及 Photoshop 等软件的使用。懂得基本的 HTML 语言更佳。
- ※ 掌握基本的政治学、社会学知识。修读相关专业者更佳。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并附文介绍自己对政见新媒体运营的想法。来信请致：Webmaster@CNPOLITICS.ORG

成为政见工程师

Web 前端工程师：

- ※ 具有扎实的计算机基础知识。
- ※ 熟悉 W3C 标准及规范，熟悉 HTML、CSS、JavaScript 等技术。
- ※ 熟悉各类 JavaScript 框架，如 jQuery、ExtJS、Yahoo UI、Prototype、MooTools 等。
- ※ 能熟练高效手工编写 HTML、CSS 及 JavaScript 代码，确保代码对各种浏览器的良好兼容性。
- ※ 熟悉面向对象的软件设计方法、对设计模式有深入的理解及应用。
- ※ 具备 JavaScript 框架开发经验者优先考虑。
- ※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你喜欢、认同这个事儿并愿意奉献自己的部分时间就行。

Web 后端工程师：

- ※ 精通 Web 编程，具备 PHP 开发经验，熟悉常用设计模式。
- ※ 熟悉至少一种主流数据库及 SQL 语言、熟悉 Linux，熟悉主流开源框架。
- ※ 热爱技术，喜欢钻研，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 ※ 有良好的沟通技能，团队合作能力。
- ※ 有移动服务端开发经验者优先。
- ※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你喜欢、认同这个事儿并愿意奉献自己的部分时间就行。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来信请致：Webmaster@CNPOLITICS.ORG

松平頼恭(編), 植物写生図帖.
描かれた動物・植物一江戸時代の博物誌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政见 CNPolitics.org © 版权所有

欢迎投稿推荐或自荐研究成果!

联系邮箱: Webmaster@CNPOLITICS.ORG